
The
Digital
Nexus
Identity, Agenc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数字联系

文化辩证法

系列编辑:拉斐尔·福沙

> 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既通过主体切片，也通过客体切片。
>
> ——西奥多·阿多诺

文化辩证法为讨论文化和辩证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舞台——它们的实践，它们的理论形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领域和研究模式的关系。特别鼓励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欧陆哲学、精神分析、法兰克福和伯明翰文化理论学派、解构主义、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和跨学科性。

系列标题

《北方之爱:加拿大男子气概的探索》Paul Nonnekes

制作游戏:一篇关于狩猎，熟悉的事物以及成为自己的陌生感的文章

Peter L. Atkinson

《跨学科的价值:理论、实践、教学法》，拉斐尔·福沙主编

《不完美̄》

帕特里克·格兰特

《未被发现的国度:加拿大知识文化随笔

伊恩·安格斯

《梵高书信:一项批判性研究》

帕特里克·格兰特

我自己的写作肖像:在信件中的自我塑造

文森特·梵高

帕特里克·格兰特

说出真相的力量:数字话语和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凯伦和理查德·霍金斯主编

《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作者:拉斐尔·福沙伊

1ne

diaidigital

naxus

身份，代理
和政治参与

RAFAEL FOSHAY编辑

@ au
press

版权所有©2016拉斐尔福沙
AU Press出版，阿萨巴斯卡大学1200,10011 -
109街，埃德蒙顿，AB t5j3s8

ISBN 978-1-77199-129-2 (print) 978-1-77199-130-8 (pdf) 978-1-77199-131-5 (epub) doi: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文化辩证法》系列中一卷:ISSN 1915-836X (print) 1915-8378 (digital)
封面设计:Marvin Harder室内设计:
Sergiy Kozakov加拿大Friesens印刷装帧

附录《机器有权利吗?》《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转载自保罗·凯洛格对大卫·j·冈克尔的采访，最初发表于2014年*《奥罗拉》*。

《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编目出版》

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拉斐尔福沙主编。

(文化辩证法)包括参考书目。以印
刷版和电子版发行。

1. 数字媒体——社交方面。2. 数字媒体——政治方面。3. 全球资讯网-社交方面。4. 全球资讯网-政治方面。福沙，拉斐尔，1950-，编辑。丛书:《文化辩证法》

hm851。D58 2016 302.23’4 c2015-908545-4

c2015-908546-2

我们感谢加拿大政府通过加拿大图书基金(CBF)对我们出版活动的财政支持。

阿尔伯塔省政府、阿尔伯塔媒体基金提供的援助。

Canadian Heritage Patrimoine canadien

Government of Alberta

本出版物在知识共享许可下获得许可，署名-非商业性-禁止衍生作品4.0国际:参见www.creativecommons。org。在注明原作者的前提下，本文可用于非商业目的。

要获得知识共享许可之外的使用许可，请联系阿萨巴斯卡大学AU Press，邮箱:aupress@athabascau.ca。

目录

致谢 vii

导言:计算转向与数字化网络 1
Raphael Foshay

第一部分 · 数字理论

1 备受质疑的互联网 25
安德鲁·芬伯格

2 《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 49
伊恩·安格斯

3 负责任的机器:的机遇与挑战人工自主代理 71
David J. Gunkel

4 开源透明度:一个改变的制作同一性 89
Daryl Campbell

第二部分 · 数字文化

5 Hacktivist (Pre)职业:自我监控，参与,和公共空间 109
Carolyn Guertin

6 主体的机构和阐释，双重的和间隔自我 127
Mark A. McCutcheon

7 转型中的网络大学 151
鲍勃·汉克

8 《旋转网络:批判话语分析及其在线空间 183
Leslie Lindballe

9 paramortal，或与互动数字共舞死的 197
Roman Onufrijchuk

第三部分 · 数字政治

10 《比较中的国家监控国家的兴起》透视 207
彼得·j·史密斯

11 数字时代的民主与同一性 231
Lorna Stefanick和Karen Wall

12 数字民主赤字:对数字投票的分析加拿大政党领袖竞选 249
Josipa G. petruniki

13 《驾驭媒体之城:数字媒体与新兴民主参与的实践 281
玛丽亚·巴卡德耶娃

14 Facebook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群组 303
Sharone Daniel

后记 321
拉斐尔·福沙伊

附录:机器有权利吗?时代的伦理学人工智能 325
大卫·冈克尔,保罗·凯洛格采访

投稿人名单 341

致谢

这本书开始是一个邀请演讲者的国际研讨会，以主题相关论文的当前卷为目标。2013年4月5日至7日，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举行了题为“同一性、代理和数字联系”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SHRCC)的连接基金慷慨资助，并得到阿萨巴斯卡大学研究办公室及时的财政和行政支持。我要感谢研究部代理副主任Donna Romyn博士、研究部经理Rebecca Heartt和财务管理员Crystal Brown，感谢他们在整个研讨会的策划和本卷的编辑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阿萨巴斯卡大学综合研究硕士课程的行政帮助，感谢我作为项目主任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这次研讨会和编辑本卷。我感谢MA-IS办公室的行政官Corinna Lewis，她在许多工作上给予了我帮助。同样热烈地感谢由非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教师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德里克·布里顿、杰伊·史密斯、伊夫林·埃勒曼、保罗·凯洛格和温德尔·Kisner，以及来自计算服务的达里尔·坎贝尔(杰伊、保罗和达里尔是本卷的撰稿人)。我还要特别感谢组委会成员和MA-IS项目的同事保罗·凯洛格博士，他在计划和研讨会组织阶段都慷慨地付出了时间。

《*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是阿萨巴斯卡大学综合研究硕士课程赞助的第二个研讨会/书籍项目。第一次是在2008年，结果是阿萨巴斯卡出版的《*跨学科的价值:理论、实践、教育学*》

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我要感谢非盟出版社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从研讨会开始，经过同行评审和编辑阶段，直到以开放获取格式出版。非盟出版社是北美第一家成立为开放获取出版社的大学出版社。它对研究成果的数字化传播的开明拥抱，清楚地证明了数字技术对学术未来的重要性，以及数字计算机化和互联网对学院的中心地位。特别感谢阿萨巴斯卡大学出版社的Kathy Killoh和Pamela Holway，以及本书的内部和外部同行审稿人的支持、指导和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导言
计算转向与数字网络

Raphael Foshay

“数字”领域是一种多样的、迅速展开的、经验上包罗万象的现象，它直接或间接地重塑了我们全球、国家和个人生活世界的许多方面。由数字代码提供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远远超出了传统模拟再现的范围和局限性:数字编码使跨媒体平台(从电视到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新型和级别的通信成为可能，它将文本和视听内容与计算机化与互联网(万维网)的融合所带来的交互性结合起来。计算机化是由计算机的电子平台促成和产生的，它本身与互联网协同作用，创造了一个整体的虚拟连接环境——这个领域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被称为网络空间——我们现在都在其中进行日常生活，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公司，机构或利益集团、社区或普通公民。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个互动连接的领域，以至于“网络空间”这个词本身已经变得古怪和废弃。在其当前的Web 2.0迭代中，它超越了早期的网络内容传递模式，现在被视为电视与互联网高度互动和多媒体环境之间的过渡:“网络空间”所代表的东西已经如此彻底地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以至于现在不可能，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回到被剥夺的存在

网络和蜂窝网络，几乎在任何可以考虑的基础上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教育、通信、军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数字网络的通信领域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私人的，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生计和个人生活，无处不在或近在咫尺，并使我们参与到我们与他人、与机构、实际上，与全球定位系统(GPS)，与我们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协同工作。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经变得数字化、网络化和相互联系，然而，自从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万维网以来，这仅仅是25年的事情。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写道，并观察到电视的迅速崛起，他预测到媒体变化的包罗万象的本质:

>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习惯于把分裂和分割一切事物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有时有人提醒我们，在操作和实际的事实中，*媒介就是*信息，这有点令人*震惊*。这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也就是我们自身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后果，都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每一次延伸，或任何新技术，给我们的事务带来了新的规模。[1964: 9];我强调)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历史学家，麦克卢汉研究了模拟电子媒体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二十世纪社会的影响。他首先将电子媒体与印刷制度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字母书写本身之前。在《*古腾堡星系:印刷人*的*形成*》(1962)的结尾处，麦克卢汉指出了媒体体制中任何重大变化的深远影响，比如印刷机，在他有生之年，还有广播、电话和电视等电子媒体平台。

> 但《*古腾堡星系*》的任务只是研究从我们的字母表和印刷机中涌现出来的机械技术。当这些旧的感知和判断形式被新的电子时代相互渗透时，机制和读写能力的新配置将会是什么?新的电子事件星系已经深入古腾堡星系。即使没有碰撞，这种技术和意识的共存也会给每一个活着的人带来创伤和紧张。我们最普通、最传统的态度，似乎突然被扭曲成了石像鬼和怪诞。熟悉的制度和联想有时显得凶险和恶毒。

2简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这些多重转变,是任何社会引入新媒体后的正常结果,需要专门研究。*(278-79;我强调)

本书正是对数字媒体发展的当前阶段进行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研究。计算机化和全球数字网络的综合影响的总体范围已经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伯纳德·斯蒂格勒所描述的数字革命的海啸般的质量中，一种伴随着创伤的洪水，或者至少是紧张的洪水，麦克卢汉承认这一点，威胁要扫除文化形式和实践的停泊，这些文化形式和实践塑造了能够使数字化海洋变化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制度，并破坏了构成生活世界概念的要素的背景感和连续性(胡塞尔，1970: 127-29)。正如伯纳德·斯蒂格勒所说:

> 1992年以来数字化的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连锁反应，在最公共的层面上改变了社会生活，在最亲密的层面上也改变了心灵个体的生活。[尼古拉斯·卡尔2012年出版的《*浅滩:互联网对我们大脑的正在*影响》一书]见证了伴随这种迅速崛起而来的巨大痛苦——这似乎越来越像海啸——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严重破坏了尼古拉斯·卡尔自己的心智能力。而这场海啸有可能摧毁各大洲所有继承下来的文明结构，这可能反过来产生巨大的幻灭和巨大的不满。(2012a: 30)

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不祥的警告，斯蒂格勒远不是一个数字反乌托邦主义者。相反，他为数字技术敲响了警钟，就像麦克卢汉在上一代人中为模拟电子媒体技术敲响的警钟一样。在最近(2012年)的一篇激烈争论的立场论文中，引用了康德的一篇响亮的文章“对问题的回答:什么是正在启蒙?”(1784)，斯蒂格勒呼吁重建数字时代的启蒙运动项目，关注困扰现代性项目的盲点和矛盾，探索现代性的黑暗面，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由两个流亡的犹太思想家在纳粹主义的阴影下构思的)中。支持蒂姆·伯纳斯-李和哈里·哈尔平最近在哲学主题下的努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工程(参见2014年Halpin和Monnin对Berners-Lee的采访)，斯蒂格勒主张对数字化的影响进行基础研究的新努力:

> 新哲学必须从网络的全球经验中产生，更广泛地说，从所有文化的数字经验中产生，这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的——这种新哲学，这些新的启蒙，不能仅仅是数字之光:它必须是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所有光明的阴影。(2012a: 31)

事实上，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文化是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唯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日益被纳入现代性革命项目的核心，带来了令人不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即启蒙运动的普遍平等和尊严价值观。正如斯蒂格勒所强调的:

> 数字化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前景，如果世界要摆脱过时的消费主义工业模式所陷入的僵局，以一种理性而坚决的方式将数字化社会化是绝对必要的(我确信这一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社会化反过来又需要创造和协商一个新的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就以新的“启蒙运动”的形成为前提。(2012a: 30)

作为数字化的学生和主体，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的范围和结构特征，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挑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本卷的文章回应理论理解，文化变革和政治分析的要求，因为我们进入了多媒体计算和万维网的数字技术融合的第三个十年。融合技术的“关系”，以及在公民、商业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由网络连接引起的级联变化，要求进行协调一致的分析。在接下来的文章的介绍中，我将指出主题关注，这些主题关注塑造了本卷对同一性、代理和数字联系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卷的标题是指关注主观和客观:同一性的问题，关于数字技术的融合性质和他们对个人的影响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经历与社会生活;与已经无处不在且快速发展的数字领域的代理(通常是令人困惑的新奇类型)有关的问题。问题还涉及到我们积极参与、使用和引导数字网络力量的能力，以及它对核心制度和传统的潜在破坏性。对万维网的准确把握也存在一些问题，无处不在的连接无疑会给公共和私人生活带来挑战。

k

在介绍论文本身之前，在它们的理论、文化和政治三大类下，我将提供一些背景，说明为什么选择“同一性”和“代理”作为与数字化相关的主要关注点。然而，首先，我将从已经引用的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作品中实现的数字化理论映射的概述开始，他可以说是目前写作的最全面的媒体技术哲学家(参见斯蒂格勒1994,1996,2001和2013)。斯蒂格勒将数字化置于语言的整体历史演变中，作为“语法化”的过程。在历史语言学家Sylvain Auroux(1992)之后，斯蒂格勒将语法化定义为“所有形式的记忆外化的历史:神经和大脑记忆，首先是语言记忆，然后是听觉和视觉记忆，身体和肌肉记忆，生物遗传记忆”(2010:71)。字母顺序写作就是这种对经验进行战略性分析的主要例子。正如约翰·廷内尔所解释的那样:“例如，字母顺序写作将语音的流动分解成一个有限的可识别字符系统，一方面是可迭代的和模块化的，另一方面，能够保持正字法的稳定性”(廷内尔，2012)。对斯蒂格勒来说，人类从一开始就以系统的、不断发展的发明和使用工具来识别;在斯蒂格勒的精辟表述中，“人类生成是技术生成”(2012b: 15)。正是他们的技术创造性的范围和程度，使人类得以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出现，而语法化和语言，尤其是人类自我发明和构建物质、观念和想象文化的复杂装置的关键载体。斯蒂格勒解释说:“总而言之，每个社会心理个性化的时代都通过自己的离散化形式(或语法化)来配置自己。这种自我配置的过程被我们所考虑的时代所证实:石器工具时代，向表意文字写作的过渡，字母和数字化”(2010:70)。换句话说，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不仅是机械印刷时代的延续，而且是人类语法化整体进化结构中书写的一个篇章。数字化是人类技术自我配置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因为它是作为写作的语法化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

> 数字技术系统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贡献性的出版和编辑系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事物”，因为res publica预设了一种由出版过程维持的公共性形式，即“公共性”——Aufklärung称之为Ö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2012a: 32)

数字写作，尤其是在Web 2.0和社交媒体交互性出现的阶段，从根本上不同于直接在它之前的视听技术，因为，与印刷时代的写作相一致，它恢复了用户的能动性，实现了积极和互动的能力，这与广播、电视、而电影则是一种被动消费的单向处置。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技术在人类进化中的核心功能是它们作为支持、记录、保留和扩展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手段。换句话说，技术发明对人类进化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hypomnemata，作为辅助记忆的记录经验的外部手段，以及铭刻、进行反思、发现叙事模式、积累有组织的思想、理解和法律和知识体系的手段。正如马克·b·n·汉森(Mark B. N. Hansen)所解释的那样，斯蒂格勒将数字多媒体视为“一种与低记忆环境相关联的新生态”，它将开创“技术与记忆的新结合”:

> 通过更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从而实现自我外化，今天的数字低记忆恢复了我们与技术共同进化的积极维度……为个人(和集体)记忆提供人工支持，这些记忆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记忆技术环境中，并受到互联网系统的滋养。(2010: 65)

这种对数字化重要性的乌托邦式和划时代的评价，与前面提到的关于媒体环境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创伤的悲观预言形成了鲜明对比。斯蒂格勒强烈地意识到人类文明事业中的光与影的对比。自哲学传统诞生以来，写作，作为一种技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往坏里说，睡眠不足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往好里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特别是在《*费德鲁斯篇*》*中*，柏拉图用苏格拉底来对比记忆缺失，一种外在的记录，和记忆缺失，一种内在的原始记忆，这是有纪律的哲学探究的首选目标。对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书写与其他形式的表现或mimē*sis一样*，两次被从真正知识的来源中移除，与那些不变的来源不同，书写存在于日常时空经验和人类工艺的可变坐标中。在苏格拉底看来，写作，作为一种纯粹的技巧，是无法与读者互动的，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性*研究方法相反。

> 一旦被写下来，每一篇论述就会到处漫游，不分青红皂白地触及那些有理解力的人，不亚于那些与之无关的人，它不知道该对谁说话，不该对谁说话。而当它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和攻击时，它总是需要父亲的支持;独自一人，它既不能为自己辩护，也不能得到自己的支持。(柏拉图，《*费德鲁斯篇*》:275d-e)

因此，对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写作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具有潜在的治疗或中毒的危险作用，这些实体必须带着知识和理解来使用，因为它们既有治愈的能力，也有毒害的能力。正如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剂学》(1981:103)中所说，写作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矛盾的，不受逻辑中心理性的对立和等级的限制。

同样，斯蒂格勒也积极关注数字环境的阴暗面。在将记忆和知识保留外化的过程中，它有能力使深思熟虑的意识短路，并使几个世纪以来印刷文化发展起来的学习过程崩溃。他在阅读的神经生理学和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中，明确地将其归类为“药理学”关注。胡塞尔阐述了我们与经验互动并在记忆中保留经验的三个阶段。初级经验或感知是一种保留形式，我们在经历和内化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时，有意识地将这种经验记录下来。次要记忆是我们在事件发生后对主要经历的回忆;是记忆形式的保留。第三保留是通过语法化将记忆外化的阶段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将时间记忆(及其感官、情感和意向性的反应)通过语言和/或其他物质表达媒介转化为空间化的表达:

> 这种精神现实[记忆的二次保留]因此可以被投射到一个既不是大脑也不是精神的，而是技术的支持上。网络允许进入这样一个空间，通过这个空间，共享的、数字化的三级记忆被投射和注入，构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公共的、全球性的、贡献性的空间，以光速运作。这能够也必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光明和阴影，什么样的启蒙和黑暗?(2012a: 34)

在他论证的这个阶段，斯蒂格勒引用了最近重新发现的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1924-1989)的几个类别，特别是那些个性化和跨个性化。这些术语区分了个人和社会三级保留的阶段，在这些离散的阶段中，个人的自我理解是通过对记忆的二级保留的反思而形成的(有时是对写作的三级保留或该反思过程的其他外化表达)。在这个阶段，社会群体、社区和机构是在围绕着对经验的二次反思的合作、组织和行动的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更大的社会单位的复杂性必然增加，这个阶段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次保留。它们具有许多治疗和毒害的“药理学”能力。

然而，随着三级记忆保留的系统实践的出现，人类对二级记忆保留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引用阅读神经生理学的最新进展，例如，在Maryanne Wolf的工作中，斯蒂格勒观察到“大脑实际上是由社会技术器官书写的，而我们自己的大脑，她称之为‘阅读大脑’，曾经是由字母书写的，但现在是由数字书写的”(2012a: 35)。斯蒂格勒直接引用沃尔夫的话，大意是说人类“生来就不适合阅读”(沃尔夫，2007:3)，他强调，写作这个发明，毕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重构了我们的大脑，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智力进化。鉴于在数字环境中阅读的进一步发展，Wolf评论道:“我们从一个阅读的大脑过渡到一个日益数字化的大脑”(2007:12)。斯蒂格勒强调，重写大脑可以包括覆盖或完全替换那些记忆模式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经过几个世纪的完善，构成了我们进化和适应的主要成就。正如沃尔特·翁所强调的，关于我们注意力水平的相互作用，一旦人类变得识字，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与以前在口头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不同。通过他们对思想和记忆的外部表征的实践，第三层次的注意力作用于我们构建经验的方式，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初级保留)，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回忆和经验记忆(二级保留):

> 对原始初级口语的更深入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写作的新世界，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功能性识字的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些人的思维过程不是从简单的自然力量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这些力量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写作技术结构出来的。没有写作，有文化的头脑就不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思考……即使是以口头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982: 77;引用于斯蒂格勒, 2012a: 37)

用三级留存形式重新定义二级留存的含义是，三级留存的重大变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二级留存)，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我们的感知方式(一级留存)。如果涉及回忆和思维结构(叙事、图式、分析等)的二级保留性记忆中的思维方式在对数字环境的习惯中被打乱，那么社会基本制度所依赖的同一性形成的关键阶段和要素可能会瓦解，变得短路，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社会制度的结构以及这些制度所依赖的公民的心理和个性都可能受到影响。例如，关于西蒙东恰当地命名为个性化的功能，在这种功能中，人们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并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和物质传统中与其他人交流时表达自己的经验，直到最近，这种个性化过程的长期媒介一直是印刷品，具有其特有的表达和接受模式。全球数字连接的出现带来了社会性和书面表达的全新模式。因此，对二级个性化模式的三级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主要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原始感知本身的形状和形式可能会改变(如: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例如，我们醒着的时候花在各种屏幕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与人、物体以及真实而非虚拟的环境互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各种社会团体的跨个人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对成员、贡献者、领导者或简单的参与者来说，都假定并强加了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在机械印刷环境中阅读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体验。在其典型形式中，它涉及到读者对印刷页面的关注，以一种使他们脱离社会互动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与文本单独互动。这是每个在文学文化中成年并接受成人公民教育的人的一种形成性经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个性化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个性化与跨个体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是由网络和社交网络实现的(并日益强加的)，是在管理一种未知的治愈和/或有害影响的药物，这是一种全新的、尚待理解的类型。数字化是一项人类实验，在其全球化范围、社会和进化转型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我们只能作为个人和集体经验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配置的实质性变化来预测。

k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数字化影响的内部向量和日益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然而，在2013年6月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之后，我们知道，作为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用户，我们是官方监控的对象，受到迄今难以想象的规模和程度的侵入性审查。斯诺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合同工，2013年，他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媒体爆料中披露，NSA与所谓的五眼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构)合作，一直在对所有互联网和电话活动进行全球监控，要求并获得b谷歌、雅虎和威瑞森的私人用户账户和电话记录的直接访问权，对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国家的公民和国家元首(包括，例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进行监视。一份名为《2012-2016年信号情报战略》的NSA任务声明显示，NSA计划继续扩大监视活动，其“既定目标”是大幅提高对情报的掌握程度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并“获得随时随地收集任何人情报的能力”(《爱德华·斯诺登》，2014)。虽然媒体上有广泛的公众愤怒，但美国法院目前对这些国家安全局活动的合法性和合宪性存在分歧，此事很可能需要由最高法院裁决。斯诺登已成为一名逃犯，他的美国护照被吊销，目前在俄罗斯暂时避难，对于那些担心他所暴露的个人自主性和隐私受到前所未有侵犯的人来说，他是一个英雄，而与此同时，他被起诉，受到对后9/11环境的影响感到担忧的有安全意识的公众的诋毁。主要发达国家的安全机构认为，在没有问责制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监视公民是他们的权利，这违背了对隐私的所有合理期望，威胁了基本的民主权利。也违背了人们对政府监督公民权利范围的既定理解。

科学作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将外国军事情报与国内安全联系起来:美国现在拥有卫星支持的能力和政策，可以对潜在的外国敌人实施无人机袭击。戴森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斯诺登(Snowden)披露的对本国公民的全面监控:“当从技术上讲，消灭危险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抗拒时，为什么要杀死可能危险的个人(以及不可避免的无辜旁观者)?””(2013年)。随着每个数字媒体用户当前数据轨迹的细节和覆盖程度的提高，一个新的入侵和预测能力开始发挥作用:

> 信号情报和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不仅要了解人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还要了解人们在想什么。随着搜索引擎的激增，这些搜索引擎可以直接追踪人类个体的思想与构成其思想特征并日益构成其思想的文字、图像和思想之间的联系，这一目标似乎终于可以实现了。“但是，机器怎么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呢?你会问。它不需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像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一样。对你在想什么有一个合理的猜测就足够了。(戴森，2013)

戴森发现了这类统计上确定的预测的问题。引用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1936年对决策问题的解释，他在其中证明了在偶数中证明准确性是不可能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简单的算术命题中，戴森将逻辑联系到防火墙准确过滤安全风险的能力:“对于任何复杂到足以包含简单算术的系统，任何允许任何新事物的防火墙都无法将所有危险排除在外。”他认为，问题在于，这种泛光审查过滤并抑制了积极和消极的想法和潜在的行动:

> 如果不进行尝试，就永远不可能系统地区分真正危险的想法和看起来可疑的好想法。任何被授予(或假定)绝对权力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思想影响的正式制度，必然也会对原创和创造性思想产生抵触。而且，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都将是我们的损失。这是安全国家理想的致命缺陷。(戴森，2013)

在日常生活和参与市场的领域中，我们作为在线消费者的活动受到监控的程度和种类具有包络的规模和不可思议的粒度。b谷歌和Facebook的资金来源包括在其网页上投放广告，以及出售从用户那里收集的信息。例如，b谷歌最近收购的“创业公司行为学将很快赋予它一天24小时跟踪你的位置的能力，并预测你将在哪里，谁将在那里与你见面——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爱泼斯坦，2013年5月10日)。谷歌在开发其在线地图功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 今天，b谷歌的地图包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的街道，而街景目前已经收集了其中四分之一国家的图像。固定用户总数:10亿人，约占全球上网人口的一半。谷歌地图是一百万个不同网站的基础，使其地图api成为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此类接口之一。在这一点上，b谷歌地图本质上是蒂姆·奥莱利预测地图将成为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比政府拥有的更完整，在许多方面更准确的资源。(Fisher, 2013年12月11日)

整整20%的谷歌搜索涉及与位置相关的问题，导致其映射功能作为结果的一部分出现。在一篇名为“b谷歌的全球统治计划”的文章中，亚当·费舍尔指出:“互联网的土地掠夺，……可以简化为三个关键概念领域的三场关键战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最先出现的是b谷歌优越的搜索算法。*谁*是下一个，Facebook是胜利者。但*在哪里*，可以说是最大的奖品，还没有完全赢得”(2013)。随着移动设备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可穿戴计算的积极发展，GPS定位将很快使网格上每个人的物理位置和运动易于彻底跟踪。

在《*代码:2.0版*》(他的《*网络*空间的*代码和其他法则*》[1999]的第二版，经过多次修订)中，劳伦斯莱西格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早期推动者的乌托邦和自由主义乐观主义:

> 这个空间(即网络空间)似乎承诺了一种真实空间永远不会允许的社会——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没有政府的控制，没有权力的共识. . . .对网络空间的主张不仅仅是政府不会监管网络空间——而是政府无法监管网络空间。从本质上讲，网络空间不可避免地是自由的。政府可以威胁，但行为无法控制;法律可以通过，但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没有选择的——没有人能统治。(2006: 2-3)

到2005年，互联网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Siva Vaidhyanathan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曾经很明显也很容易宣布一个‘网络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将重新调整自己，赋予自己权力，并破坏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控制方法，很明显，网络数字通信不需要服务于这样的解放目的”(引用于莱西格，2006: 5)。

到本文撰写之时(2014年初)，很明显，考虑到上述安全、监管和商业利益，我们将在2014年及之后的几年里看到网络空间格局的重大变化。Lessig在1999年和2006年再次强调的论点是，互联网不仅是可监管的，而且从其原始的、固有的扁平化、多节点和分布式架构(见Hui, 2010: 5-7)来看，它受到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似乎不仅不可想象，而且本质上是不可能的。现代性中官僚化的进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合理化的奇迹和恐怖，本可以教会我们其他的东西(一方面想想医疗体系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想想不可调和的种族灭绝)。现在，莱西格的论点呼吁所有这些都要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和反击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开放和负责任的互联网实现创造性和建设性利益的强大潜力;

> 网络空间的自由不会来自国家的缺席。那里的自由和任何地方一样，将来自某种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得以繁荣的世界，不是通过从社会中消除任何自觉的控制，而是通过将社会置于一个特定的自觉控制得以存在的地方。我们像我们的开国元勋那样，把社会建立在某种宪法之上，以此来建立自由。(4)

k

在讨论论文本身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关于“同一性”和“代理”的主题，这些主题与我们所说的数字文化的“联系”有关。伯纳德·斯蒂格勒呼吁在紧密相连的全球化和数字化现象的背景下复兴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既提醒我们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工程，也提醒我们现代性19世纪和20世纪技术和官僚历史的阴暗面，以及伴随新出现的数字时代的普遍影响而来的紧密交织的挑战和机遇。“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一词引用了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哲学*论述*》(1987)中所做的代表性分析工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提到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首次出版)相呼应，哈贝马斯将他的法兰克福学派起源和他所谓的“晚期现代”(而不是后现代)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理论模型用于分析20世纪后期围绕后现代的辩论。他认为，宣布“后现代性”为时过早;现代性的工程，更确切地说，仍然是“未完成的”。哈贝马斯将康德所阐述的启蒙价值观和原则的理解视为决定性的。例如，在他1784年的一篇类似宣言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康德将个人自由、尊严和责任置于现代性的核心地位:

> *启蒙运动是*人类*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退出*。不成熟是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无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而在于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理解的决心和勇气的话。*萨佩雷*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康德，1784:58)

康德理解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自主性原则，是绝对地建立在定言令式的*先验*基础之上的。开明的个人的尊严和崇高的同一性存在于其自我授权的机构中，它自己选择个人要服从的法律。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所说:“意志的自主性是意志的属性，通过它，意志本身就是一种法则(独立于意志对象的任何属性)”(康德，1785:4:40 40)。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个人从过去的传统和制度的权威中获得自由，自由个性也从继承的世界观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被连根拔起，无论是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哈贝马斯和黑格尔以及后来对康德的接受一样，注意到康德在如此强调自由的作用的同时，加深和加剧了现代思想的二元论特征，这种二元论在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表现得很明显(即认知和*外延*)。康德的批判认识论使认识的主体从客观的自在之物世界中解脱出来。在他的三大批判中，他区分了科学、道德和艺术的知识领域——思想、行动和判断——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这种方式给任何理解现代同一性和道德行为的人带来了困难。哈贝马斯根据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和知识、行动和判断领域分离的批判来定义自己的立场，并与黑格尔自己的认识理论的要素保持一致(哈贝马斯声称黑格尔尚未利用这些要素)，他主张主体间性和社会性，而不是个体和*先验*，建构同一性。Maurizio Passerin D ' entruves在介绍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论述*》的接受情况时，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的分析置于如下位置:

>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论述》中)开始捍卫现代性未实现的规范性潜力，反对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认为它已经耗尽了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导师的承诺和计划。这种辩护是基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和交往理性在他早期的两卷本著作中提出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交际行为理论*。在那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理论，能够解释现代性的成就和病态。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的是范式的转变，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从主体中心到理性和合理性的交际概念。(Passerin D ' entrentreves, 1997: 1)

D ' entrires认为，哈贝马斯在转向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模型时，采取了介于康德和黑格尔意识哲学之间的立场，植根于个人自决的自主性，以及将同一性视为纯粹社会建构的后现代论点。哈贝马斯将后者理解为一种修辞而非完全理性的同一性模式，这与他自己的交际行为模式截然不同，交际行为模式受交际理性而非修辞说服的支配。

在哈贝马斯等修正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为主体间同一性和代理的不同基础概念而争论。或者，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和⌧i⌧ek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后，人们可以在所有试图客观地建立自主主体性和社会实践的固有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模式中寻求一致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十一世纪社会环境新发展的数字虚拟化和媒体化加剧了启蒙运动社会自我理解传统中固有的持续问题。斯蒂格勒呼吁重振启蒙价值观，以适应数字化的模糊药理效应，认识到现代性的日益深化的挑战，以及它与自然、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精神环境。

因此，数字化的药理学二价性伴随着现代性项目固有的同一性和代理问题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在数字技术之前就存在，但由于它加剧了困扰现代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固有的主体/客体二元论，而加深了这种两极分化。一方面，作为数字技术的创造者，我们通过指数技术转型的创造性和破坏性力量，积极塑造我们的集体和个人身份。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入范围日益无处不在，正在改变人类在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明显被破坏的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和关系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环境。换句话说，《*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既涉及人类同一性和自决的问题，也涉及我们技术饱和的人类环境中日益增长的力量、能量、智慧和创造力。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术语“数字联系”来表示技术的融合以及媒体和互联网的技术基础设施，技术作家凯文凯利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表示技术领域的变革本质。在《*科技需要什么*》*一书中*，凯利解释道:

> 我不喜欢发明别人不使用的词语，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已知的替代方法都无法传达所需的范围。因此，我有点不情愿地创造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周围震动的更大的、全球性的、大规模互联的技术系统。我称它为“技术元素”。技术元素超越了闪亮的硬件，包括文化、艺术、社会制度和所有类型的智力创造。它还包括软件、法律和哲学概念等无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包括我们发明的生成冲动，以鼓励更多的工具制造，更多的技术发明和更多的自我增强的联系。(2010: 11-12)

随着从工业技术到信息技术的“计算转向”，凯利看到了我们参与技术的范围和性质的重大变化:

> 当我们通过几代人的技术进化来提炼这些东西时，它失去了很多硬度。我们开始看穿技术作为物质的伪装，开始把它主要看作是行动。虽然它居住在一个身体里，但它的心是更柔软的东西。1949年，第一台实用计算机背后的聪明天才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意识到计算机教给我们的技术知识:“在不久的将来和更远的将来，技术将越来越多地从强度、实体和能量问题转向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技术不再是名词，它正在变成一种力量——一种推动我们前进或反对我们的重要精神。它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41)

因此，我们创造的技术环境越来越多地创造了我们，获得了一种动力和一种代理，凯利认为这提出了新的问题。凯利所说的技术元素，在这本书中，我们称之为数字联系，因此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形式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同一性，重新划定了社会与自然世界、人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界限。“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已经交付——并且交付——现代性的螺丝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旋转。

k

本卷中的文章根据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理论、文化和政治的范畴下呈现。主要的关注绝不是排他性的:当理解为有意识地隐含和相互作用时，这些组织类别是有用的。鉴于近几十年来文化理论对政治含义和产生的问题的强烈强调，在第二部分“数字文化”的文章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关注，尽管它们主要关注文化评论和分析。作品集的标题《*数字联系:同一性*、代理*和政治参与》所关注的领域*，讲述了数字媒体的融合，以数字化的方式，以其多媒体的性质，改变了同一性表达和行动的整体环境。数字化的这种转型效应具有智力和理论意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她对印刷机的发明对现代性产生的推动作用的经典研究中，阐明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是如何使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融合在一起的:

> 人们不能将印刷仅仅视为复杂因果关系中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为通信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性质。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对普遍存在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 . .智力和精神生活，远没有保持原状，被十五世纪欧洲复制书籍的新工具的倍增深刻地改变了. . . .印刷术为文字原教旨主义和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它仍然不可或缺。它仍然对我们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负有责任。(1979: 703-4)

正如爱森斯坦所阐明的那样，“交流的转变改变了因果关系本身的本质。”这是本文集试图强调的前提。出版媒介的根本性变化对社会环境具有变革性影响，因为它们创造了新的出版条件和手段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表达思想与交流，社会聚集与互动，政治争论与参与。

在第一节“理论”中，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有问题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Question)一书中，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对网络的整体含义进行了详细分析。芬伯格一直是互联网研究的先驱，他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长期思考为读者提供了对网络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极端的公正裁决。在第二章“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中，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将他长期以来对传播本质的研究带到了胡塞尔式现象学的解读上，即数字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作为社区基本条件的语言的理解。在第三章“负责任的机器: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和挑战”中，技术哲学家大卫·j·冈克尔(David J. Gunkel)探讨了数字化软件和硬件的伦理含义。数字编码的一个显着因素是它具有新一层认知技术复杂性的能力:从自己的过程中学习并根据生成的数据进行调整的能力。能够充当“自主代理”的机器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能够对自身和环境做出反应，能够根据反馈做出调整，那么这种反应是不是一种责任，如果是这样，它们是否也享有与人类社会中负责任的角色相关的权利?冈克尔提出了一些关于数字代理的权利和责任的伦理性质的必要和挑衅的问题。在第四章中，计算机系统专家Daryl坎贝尔询问了开源软件运动的哲学含义。他的文章是整卷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实例:数字化对通信和协调行动的形式(如软件编程的发明和阐述)有什么影响顺序?坎贝尔在评价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时，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引入“事件”的本质。

第二部分探讨了数字文化中的代表性问题。在第五章，“Hacktivist (Pre)Occupations:自我监视、参与和公共空间，”Carolyn Guertin是数字叙事的先驱专家，她对最近的跨界反思性艺术项目进行了启发性的概述，这些项目对无处不在的监控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这种监控已经成为数字监控公共、商业和企业空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第六章，“主体的机构和解释，双重自我和间隔自我，”马克·麦卡琴(Mark McCutcheon)探讨了数字媒体对其用户进行质询的方式，呼吁后殖民理论来阐明由于数字媒体的普遍存在和参与而产生的主体性殖民化所产生的矛盾主体性或质疑的混合形式。在第七章“转型中的网络大学”中，鲍勃·汉克以约克大学(加拿大)为例研究了数字网络对大学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在学术生活中产生的制度性紧张关系。网络作为一种出版媒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促进了写作的集约化，这是它使出版和辩论成为可能的结果。在第八章“编织网络”中:莱斯利·林德巴勒(Leslie Lindballe)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与书面语言受到影响的方式的相关性，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微妙的方式，都是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网络环境中被称为博客圈的语言重构。在第九章中，在暗示性的“paramortal，还是与互动的数字死者共舞”中，已故罗马人Onufrijchuk认为，当前流行文化对亡灵半衰期的关注是一种模糊的虚拟超越的症状，这种超越是由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的丰富的多媒体数据流提供的，我们将把它留在我们身后，在我们的“尾迹”中(正如Onufrijchuk教授自己在他最近去世时所做的那样，永恒的记忆)。

互联网的互动性、多媒体和即时性使社会集会、知识传播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成为可能。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到维基解密(Wikileaks)，再到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数字环境明显改变了政治同一性和机构的动态，既赋予了权力，也削弱了权力。在第三部分“数字政治”中，Peter J. Smith(第十章，“比较视角下国家监控的兴起”)和Karen Wall和Lorna Stefanick(第十一章，“数字时代的民主和同一性”)探讨了在政治和一般公共领域中前所未有的监控类型和水平。数字化监控的范围，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还是军事的，都完全重新定义了以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深刻的法律和政治挑战和复杂性。Josipa G. petruniki(第十二章，“数字民主赤字: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对数字投票技术的复杂性和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案例研究，而Maria Bakardjieva(第三章)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13章，“在‘媒体城’中导航:数字媒体和民主参与的新兴实践”)和Sharone Daniel(第14章，“Facebook群组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研究了社交媒体促成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合作的新形式。

参考文献

Carr, Nicholas. 2011.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Clarke, Paul. “Sir Tim Berners Lee.” http://www.webfoundation.org/about/sir-tim-berners-lee/.

Dyson, George. 2013. “NSA: The Decision Problem,” *Edge*. 27 July. http://www.edge.org/conversation/nsa-the-decision-problem.

“Edward Snowden.” *Wikipedia*, accessed January 11, 20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Snowden.

Eisenstein, Elizabeth.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pstein, Robert. 2013. “Google’s Gotcha,”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0 May. Accessed January 11, 2014. http://www.usnews.com/opinion/articles/2013/05/10/15-ways-google-monitors-you?page=3.

Fisher, Adam. 2013. “Google’s Road Map to Global Domination,”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Accessed January 12,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3/12/15/magazine/googles-plan-for-global-domination-dont-ask-why-ask-where. html?pagewanted=all&_r=1&.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MIT Press.

Halpin, Harry and Alexandre Monnin. 2014. *Philosophical Engineering: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Web*. Oxford: Wiley Blackwell.

Hansen, Mark N.B. 2010. “Introduction to Bernard Stiegler, ‘Memory.’” I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eds. W. J. T. Mitchell and Mark N. B. Hansen, 64–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44.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 Gunzelin S. Noerr.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ui, Yuk. 2010. “The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41–51. http://www.junctures.org/index.php/junctures/article/view/6/4.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Husserl, Edmund. 1970.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Kant, Immanuel. 1784.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 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 Century Questions*, ed. James Schmidt, 58–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1785.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Ed. and trans. Mary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lly, Kevin. 2010. *What Technology Wants*. New York: Viking.

Lessig, Lawrence. 2006. *Code: Version 2.0*. New York: Basic.

McLuhan, Marshall.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Ong, Walter.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ation of the Wo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asserin d'Entrèves, Maurizio. 1997. "Introduction." In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eds.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and Seyla Benhabib, 1–37. Cambridge: MIT Press.

Stiegler, Bernard. 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themeu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Memory." I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eds. W. J. T. Mitchell and Mark N. B. Hansen, 66–8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2a. "Die Aufkla□rung in the Age of Philosophical Engineering," *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book 2013*. 29–39. M. Hildebrandt et al. Leiden: IOS Press.

———. 2012b. "Relational Ecology and the Digital *Pharmakon*." *Culture Machine* 13. http://www.culturemachine.net/index.php/cm/issue/view/24.

Tinnell, John. 2012. "Originary Technicity and Grammatization: Twin Pillars of Stiegler's Project." 8 June. Accessed January 12, 2014. http://jtinnell.blogspot.ca/2012/06/originary-technicity-and-grammatization.html.

Wolf, Maryanne. 2007. *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the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New York: Harper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一部分 数字理论

1 互联网的问题

安德鲁·芬伯格

本章的目的是肯定互联网的民主潜力。肯定是当代批判理论的语境所要求的，在当代批判理论中，互联网日益被视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这标志着早期乐观评估的变化，这种评估仍然激励着越来越少的评论员。但主流学术观点已经转向反对现在被认为是“炒作”的观点，即对互联网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的夸大预期。

我认真对待对互联网的批评;然而，我也注意到一些夸张的说法，这让我怀疑这些批评有时如此激烈背后的动机。

这些批评确实揭示了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认识到这是一种混合现象，不太可能实现早年它所激发的民主转型的承诺。批评人士指出了其影响有限且相互矛盾的一些原因。然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只关注互联网最有问题的方面，而低估了重要的成就。将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其形成阶段，在其实现标准配置之前进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我将表明，互联网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反映在它的技术特征上，这些特征并没有分解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本章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对互联网的两种重要批评，并认为它们把技术的某些方面误认为了整体。后半部分介绍了方法论上的考虑，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互联网。

批判两点

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对互联网的批评是有价值的，我选择在这里回应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乔迪·迪恩，他们是反炒作的有力拥护者，他们巧妙地揭穿了互联网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的神话。

富克斯对互联网进行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自由非物质劳动和“大众”理论与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富克斯201o)。他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声称，知识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知识作为一种集体产品，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被私人占有。就像资本主义起源时被瓜分和征用的公共土地一样，知识属于一种被先进资本瓜分和剥削的理想公地。富克斯写道，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知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存在与其(作为社会的)本质相矛盾。富克斯总结道:“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地的剥削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富克斯，2010:190)。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知识生产者就构成了一个被剥削阶级。他们包括许多工业和政府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包括那些“非物质劳动”对社会再生产有贡献的人，比如家政工人和许多类型的服务工人。富克斯追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强调非物质商品的重要性。这些包括交际和情感商品以及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正式构成的信息体)。由于所有这些商品都是通过交流和分享在公地生产出来的，资本对它们的占有代表了对社会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部门的“殖民化”。而且，由于知识从这些多重来源流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是唯一或实际上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富克斯采用哈特和内格里的术语“大众”来指代这个复杂的新下层阶级。

1o.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富克斯关于新媒体争论的关键所在。公地现在包括那些个人交流并因此对知识总量做出贡献的互联网站点。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成为提供流行网络平台的公司进行盈利活动的机会，但用户的努力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互联网的独特结构使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持了对生产者自由劳动的剥削。由于剥削是用工资与生产的产品价值之比来衡量的，所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率几乎是无限的!

富克斯借鉴了达拉斯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解释公司如何从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力中实现利润。斯迈斯认为，在出售广告时间时，媒体公司实际上是在营销商品化的受众。斯迈斯的论点是基于他对电视的分析，电视是他写作时的主流媒体。富克斯声称，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的运作方式与此类似，它们积累用户，并将其作为受众出售给广告商。但现在这种剥削愈演愈烈，因为观众不再关注那些利用它的公司生产的内容，而是生产自己的内容，并免费提供给这些内容，以吸引那些被公司商品化和出售的观众。因此，互联网用户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媒介向参与性或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商品化”(富克斯，2010:192)。

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被剥削阶级概念的扩大及其对互联网用户的应用，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中斗争的实际碎片化。富克斯希望在统一这些斗争的主题上构建一种反霸权。它们有可能围绕抵制公地的殖民化和对大众生产的知识的剥削而汇聚在一起。无论被剥削群体的性质如何，它都有助于生产外来财富。他们联合起来，就能像早期的无产阶级那样抵抗资本主义。当然，这个理论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它可以指出在适当条件下可能团结起来的路线。富克斯为这一策略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

虽然富克斯指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但他的论点也有弱点。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样，互联网确实是新形式的生产和剥削的场所。但他的评价却令人惊讶地简化了。他似乎把互联网定义为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和

1o.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产品商品化。无论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从中获利这一简单事实决定了其本质。他写道，“当代互联网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由企业主导，它们利用这一媒介进行资本积累和广告宣传”(2011:310)。很明显，用户活动对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是人们能说的最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富克斯自己似乎在后来的文章和书籍中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文章和书籍主张他所谓的“辩证”理解，即互联网是一个阶级冲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结构的空间(2014a)。他认为，他打算在他关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采用这种辩证的观点，但在那里只关注其企业方面。然后，他反对在公司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有互联网之外，建立另一种非营利性的互联网。因此，他写道:“商业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性网络. . . .社交媒体主要是商业和世俗的空间——政治是规则的例外”(2014b: 60-61)。因此，他似乎为他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似乎持有的对互联网的广泛影响的还原解释留下了一个缺口。无论如何，富克斯的辩证解释是有用的，稍后我将通过对辩证法的技术基础的分析来巩固它。

在这里讨论的文章中，富克斯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互联网生产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与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关。当资本家把原来的公地围起来，把农民驱逐出去，从而占有了它的时候，他们就改造了土地本身，使它有了全新的用途。因此，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是商品化，而且是资源在商品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在较晚的阶段，劳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资本主义重新组织了劳动过程，产生了抽象劳动:可以量化和控制以产生利润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包容”。从工人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上说，内容被商品形式渗透了。

应用于电视，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在两个层面上产生共鸣，因为受众的注意力可以被包装和出售，也因为注意力所指向的内容是合理化和受控的。只有第一种情况发生在Facebook或谷歌上。的确，企业找到了将知识共享商品化的方法。但知识公地并没有像早期被资本占有的土地那样沦为资本的生产资源。公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新公地的经济方面寄生于一种独立的内容，一种广泛的意义和活动，即使在强加商品形式之后仍然存在。用户为相互娱乐和启蒙而生产的内容被商品化，就像电话通话被作为公共载体运营的电话公司商品化一样。用户的对话不受电话公司或社交网站管理的劳动过程的控制。工厂劳动和互联网“劳动”之间的隐喻联系被打破了。

资本主义从许多非劳动的活动中获利，互联网上的交流只是其中之一。一个阳光明媚的海滩，会邀请那些在酒店和餐馆里花钱的游客，但这些游客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却不能说他们是在为资本工作。大学为校园附近的三明治店创造了商机，但教室并不是店主免费劳动的场所。婴儿为纸尿裤制造商提供了商机，而无需为纸尿裤公司提供免费劳动力。与上述每一种情况相关联的盈利活动的偶然性，防止了它们的经济功能受到削弱。同样，用户提供的信息也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富克斯关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借鉴了早期的电视媒介理论，比如他提到的受众商品理论。他说的没错，互联网上的观众会自我组装，然后被商品化，卖给广告商。但把电视和互联网类比，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观众商品理论是在电视达到标准形态后提出的，但互联网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电视作为一项技术成就，具有多种功能的潜力。它本可以广泛应用于地方广播，也可以与电话结合起来进行互动。也许在这种系统上的一代技术工作将产生一种复杂而有效的教育、文化和政治启蒙媒介。但是，电视的悲惨历史记录了它被还原为观众商品理论所预设的狭隘的娱乐和新闻功能(Williams, 1974)。互联网没有相应的历史，至少目前还没有。用电视类比和自由劳动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互联网，就排除了这项技术的未来。

在其发展的这个阶段，似乎与互联网最相关的类比不是电视，而是人行道这样的公共空间。社会性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互联网上的互动主要不是劳动，而正是它看起来的那样，即社会互动。虽然生产无疑在继续，但经济却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经济。资本家利用了互联网，就像建筑物的所有者在繁忙的街道上租用空间，让人们互相聊天和购物一样。广告商就像商店老板，为了一个好位置而付租金。数据挖掘用户贡献通过实现有针对性的广告来提高租赁属性的价值。因此，被商品化的是有效出租的东西:网页上的空间，以及通过它获得的受众注意力。用户和他们的贡献确实被利用了，但只是在这个术语通常的常识性意义上，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由于互联网的经济功能，富克斯似乎经常忽视互联网的民主含义，但在线互动的人文意义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却依然存在。互联网用户的贡献不能被归结为他们的经济功能，就像人行道上的对话一样。这些贡献是否具有民主价值，需要在语境中进一步分析其实际内容。

这正是乔迪·迪恩(Jodi Dean)在其对互联网的文化批判中所尝试的(Dean, 2005;2010)。让我们考虑一下她对盖伊·德波(Guy Debord)关于互惠传播具有大众传播所缺乏的解放潜力的主张的反驳(2010: 108-13)。德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20世纪60年代批评经典之作《景观社会》的*作者*。他对先进资本主义持反乌托邦的观点，与西奥多·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立场非常相似。大致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精英统治着被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所奴役的从属人口。系统需求的注入使得强制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被操纵的个人自发地复制了系统。这种自愿服从的关系与传统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顺从回报的一种力比多依恋的基础上。

根据德波的观点，打破这种综合症需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戏剧性示范行为，他们能够解构束缚大众的虚拟链条。他希望，来自边缘的挑衅会成为体系崩溃的催化剂。1968年的法国五月事件可以被解释为对这种方法的确认，事实上，情境主义对大众社会的批评确实在运动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类似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美国新左派的行动没有那么有效，但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墨守成规的铁腕统治。我们今天仍然受益于这一突破。

迪安抱怨说，德波在强调先进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本质(以大众媒体为例)时，理想化了自下而上的活动破坏体系的潜力。但事实上，她认为，我们现在有了德波所梦想的大众传媒之外的自下而上的选择。它被称为互联网，它非但没有扰乱先进的资本主义，反而更有效地复制了它。互联网上的自由传播并没有像德波这样的人所预见的那样产生解放的效果，他们批评了大众媒体集中的、单向的传播结构。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交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使得德波等旧理论变得过时。

迪恩认为，互联网上的大多数交流非但没有打败完全管理社会的反乌托邦愿景，反而强化了这种愿景。互联网抹去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最重要的鸿沟。符号与物、幻想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与反抗两者并存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在互联网上，这种区别消失了，任何特定意义的权威也随之瓦解。互联网的颠覆性特征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话语外部化，并增加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用户不再致力于任何事情，对他或她自己来说是不真实的。不再被任何东西所说服，用户无法离开失现实感自我的茧。启蒙运动认同于自主个体的反身性，在这里使个体在体系的力量面前变得无助。这实际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身性，是二次思考的无底洞，它破坏了信仰和行动所必需的“象征效率”。

迪安将网络空间生活的这些方面与一种奇怪的现象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被计算机网络上的交流所解放的社会的早期先知们没有预见到的。这就是互联网用户发出的大量无用的贡献，他们既不期望也没有从他们所面对的假想公众那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这确实令人费解。一开始，人们在Facebook上发消息，希望得到回复，但渐渐地，人们发现没有回复——最终，没有回复是必要的。系统性地缺乏严肃的内容和回应，破坏了交流自由的解放意义。向虚空的网络空间发送琐碎的信息，并不是真正的互惠交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关于实体问题的讨论，这是德博德或哈贝马斯等人的构想，他们将参与等同于民主。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参与没有解放的作用。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迪安运用了斯拉沃伊⌧i⌧ek对拉康精神分析的解释的范畴。这种解释开启了渴望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与渴望缺乏本身之间的区别。后一种形式的欲望包括在追求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时强迫性的重复，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它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东西。追求本身成为了它自己的目标，并产生了一种把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吸引进去的享受。任何在网上玩过电子游戏的人都能认出这种综合症。综上所述，迪恩用强迫性神经症的模型来描述网络上的交流。

但其影响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参与网络塑造了一种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相抗衡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被困在没有内容的交流网络中的主体，一个用辩论代替行动、把参与错当成权力的主体。个人在表达意见或签署网上请愿书时，都有一种政治行为的幻觉，但实际上他们是技术拜物教的受害者。互联网不会自动将他们的观点放大为意义，而只是将其登记为真正政治行动的空洞占位符。她写道，“我们的参与并没有颠覆交流资本主义。它推动了它”(Dean, 2010: 114)。因此，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通使人口去政治化，并将其整合到传播资本主义中。迪恩承认，互联网可以有有效的政治用途，但她认为，与技术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的整体去政治化效果相比，这些作用相对微不足道。

我觉得迪恩对互联网上沟通失败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直到她得出了这些政治结论。她基于什么理由认为她所关注的活动类型是互联网最显著的影响，能够真正重塑用户的主体性?这是还原论。她假设，通过对Facebook的解释，她已经掌握了互联网的本质和政治控制的机制。但她忽略了许多其他类型的网络互动。有许多网站主持严肃的讨论，有时涉及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Slashdot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技术人员”的聚会场所。在艾伦·斯沃茨(Aaron Swartz)最近自杀后，他们开始认真对待版权和知识属性法律问题。医疗病人利用互联网来告知自己，为了相互了解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援助并影响卫生政策。1995年，我研究了Prodigy计算网络上针对ALS患者的两个讨论论坛(Feenberg, 1996)。今天，我在谷歌搜索中看到了100多个。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容易被列举出来，但在迪恩对互联网的解释中，它们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互联网取代了真正的政治行动的观念激励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迪恩。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比了南方在午餐柜台静坐的黑人激进分子的勇气，以及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的微不足道的参与(格拉德威尔，2010)。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迪恩观点的简化。格拉德威尔混淆了一种帮助政治行动的沟通方式和它所帮助的行动，并声称互联网用户通常会制造这样的混淆。但是，哪里有证据表明，在没有一个呆在家里的简单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签署互联网请愿书的人会走上街头呢?我不相信，一方面是因为网上交流与“真实”行动的不恰当对比，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人会笨到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提出另一种假设。迪恩和格拉德威尔认为，在互联网上，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假想的公众面前表达政治观点，而且没有个人风险，这一点没有错。这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但不是以他们声称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表达的证明价值，当它不涉及努力或风险时，这种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我认为，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不太可能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堪比坐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前。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网上表达的观点不会像在一个充分展示他们承诺的环境中表达的相同观点那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很难指望对网上请愿的回应会像街头示威那样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理由怀疑两者会被取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不同意见能够传播到公众面前，不管这种能力是多么的虚构，都可能会鼓励其他人站出来。这里涉及的是孤立和受欢迎的游戏，而不是对政治行动的幻想。在一个有互联网的社会里，持不同政见者的孤独感减少了。

迪恩的批判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已经从德博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和心理内省，而是，矛盾的是，建立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的自由交流和参与上，从而再现了这个体系。她的方法是一种趋势的高潮，这种趋势始于福柯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阶级权力方面，他将自己的权力概念替换为纪律和抵抗的游戏。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依赖于政治控制，不如说是依赖于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中塑造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的主体性。今天，他的方法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于解释资本主义在一个提供更多自由自我表达可能性的社会中永存的原因。

向这种新范式的过渡激发了最近的大量讨论，例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控制社会”概念(1992)，以及最近的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2007)关于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概念。早期批评家的反乌托邦理论侧重于技术统治和消费品的诱惑力量，而这些新批评家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通过交流互动和参与的人口的自我征服。

这些理论和迪恩的理论一样，都是基于发达经济部门正在发生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灵活的职业道路、个人品牌、后福特主义的参与式生产方法，以及现在的博客和社交网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技术官僚控制和消费主义的旧理论仍然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他们所描述的世界里，统治他们的不是晦涩难懂的协议，而是看得见的、等级分明的上级，他们声称自己的技术能力是合法的。大众是通过物质奖励而不是通过网络结构依附于这个体系的。正如迪安所解释的那样，也许今天这些奖励中的一些采取了交流本身的享受形式，没有意义或回报的希望。但作为基本的综合机制，这很难取代汽车、家用电器、房屋和体育。此外，尽管互联网的认知混乱，但大多数人仍然接受医生和科学家、教师和传教士的说法，许多人仍然追随大众媒体中的政治领袖和意见塑造者。

发现传播可以被消费社会的仪式所吸收，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但在这个真正自由的、互惠的自下而上的传播具有解放潜力的社会中，这种传播确实在互联网上发生，这仍然是事实。的确，今天的每一场激进运动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不同意迪恩对互联网上政治与整合活动的相对重要性的准定量评价。具有政治意义的交流可能不如迪恩批评的那类东西那么常见，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迪恩的批判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特有的一种错觉，它能够记录屏幕上发生的一切。我可以通过我在讨论富克斯理论时引入的人行道的比喻来最好地解释这一点的重要性。人行道上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因为我们没有在那里发生的交流的记录，就像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无法根据其激进的政治影响或综合影响来比较各种活动。每件事都可以在人行道上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讨论都和迪恩分析的闲聊一样无聊和毫无意义。因为它是短暂的，所以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批评人行道。人行道上言论自由的民主意义，不能简化为比例问题。

尽管有少数受欢迎的网站产生了过分的影响，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多样性，以及不墨守成规的空间。即使是被动地表达不同意见，也比我这个年纪的人成长过程中几乎普遍达成的共识有所进步。德博德希望有一种替代大众媒体的方式能有所作为，但这并不完全令人失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过去快乐的日子更有争议的社会世界里。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很少有有效的政治阻力，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互联网对此负有责任。不能因为它没有解决让美国人加入激进政治组织的难题，就简单地不予理会。美国人在文化上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持久的左派，这需要一个比所谓的“前进”运动的去政治化效果更好的解释。

总而言之，我不同意迪恩的观点，即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是由Facebook等网站上发生的互动类型所构成的有益特征，也不同意它对今天左翼行动主义的软弱负有责任。这让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如何解释当今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对互联网的猛烈批评?

我相信，像富克斯和迪安这样的批评家，已经陷入了当代知识界的内讧之中，这使他们无法关注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互联网一开始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誉，批评性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它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对它的期望总是不现实的。基于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失望而进行的批判，会因其对对象的依赖而被扭曲。

新左派的崩溃产生了一种替代政治组织的需求。鉴于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理想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因此，许多美国激进分子寻求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开源编程和其他类型的在线“公地”参与者的错误自我解释承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显然，互联网无法承受这些乌托邦式希望的重压。批评夸大的主张是有用的，但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应该超越对它们的排他性关注。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正受到严重敌人的攻击;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贡献虽然有限，但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因监管和技术的变化而消失。

互联网的层次

富克斯和迪恩基于政治经济学和一种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理论，对互联网进行了批判。他们很少关注互联网本身的技术。如果技术在他们的账目中有所体现，那么它似乎是完成的、完整的，具有单一的主导社会影响。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系统。它的社会意义与其技术特性密不可分。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技术。许多社会理论都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习惯于从使社会成为可能的技术中抽象地思考社会。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面从底层技术中抽象出来。

我主张关注技术，并不是要回到过时的技术决定论。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到社会本质上的技术特征和技术的社会特征的方法。正如社会中存在着分裂一样，这种方法必须揭示技术领域的冲突特征，反映在技术系统的矛盾心理中，它们所包含的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权力和对这些权力的抵抗所剥夺的潜力。我称这种方法为“技术批判理论”或“批判建构主义”(Feenberg, 2010:第4章)。它基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和建构主义技术研究的思想。

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得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技术是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的，但也受到来自下层的质疑。我从建构主义方法中借鉴了对解释和网络在技术中的作用的强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发展。建构主义的贡献将偶然性引入技术发展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则将对技术的偶然性社会影响与霸权力量和反霸权斗争联系起来。设计是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技术来推进其利益的地形。

这种方法在马克思关于方法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有一定的基础。马克思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具有不同目的的对象的组合，即不同要素的统一。”因此，在我们的思维中，它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观察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194,293)。

这段话预示着福柯从尼采那里衍生出来的系谱学方法。诸如人工制品和制度之类的社会客体是各种成分的集合体，它们通过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而不是通过内在本质连接在一起。这些部分可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分解和重新组合。马克思的例子是货币，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人工制品或机构的历史不能依赖于经历外部事故影响的固定实体的先验定义，而必须在其构建过程中追踪“不同元素”的转变。

这种系谱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技术。一个人工制品的发展路线似乎揭示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本质的含义，但事实上，它的元素和用法的变化方式有利于一些可能的发展分支，而排除了其他分支。从成功分支的立场回顾过去，我们将它所实现的发展标准投射到起源上，然后它似乎启动了一个目的论过程。但这是一种虚幻的目的论。正确的社会史将揭示变革，而不是假设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的历史就是争夺控制其技术代码的社会力量的历史。技术因其所服务的不同利益而变得复杂。这些利益或多或少地将结构和功能组合在一起。技术可能看起来仅仅取决于它们在人类目的中所获得的因果机制的一致性，但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了由于它们所代表的许多社会影响而产生的模糊性。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技术是具体的，因为它们以技术形式实现了与塑造它们的行动者相对应的不同层次的功能和意义。当技术代码在公共领域受到质疑时，技术所经历的转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些技术争议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但技术固有的灵活性往往使妥协成为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会在最终的设计中找到权宜之计，或者得到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相关的社会群体对最终结果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分层对于理解设计过程和设计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设计通过将与参与者赋予工件的各种含义相对应的功能层汇集在一起而进行。技术研究必须识别这些层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技术封闭，即围绕一种独特的技术代码进行的标准化，可能涉及权衡、妥协，从而导致争议各方的设计不够完美。但有时创新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满足了所有竞争各方，使行动者之间的联盟在以前存在冲突的地方成为可能。批判建构主义运用分层的概念来解释技术政治的这些独特特征。

我们能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互联网上吗?从技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似乎很明显，互联网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相互竞争的力量对其设计起作用，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有时是互补的。由于Fuchs和Dean从经济学和社交网络的主流文化角度来定义互联网，因此其政治用途显得异常。他们的分析仅限于单一的功能层面。另一位批评家达林·巴尼(Darin Barney)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这些替代性和抵抗性的实践仍然代表着与数字技术及其文化的广泛范围的霸权遭遇的咸海中的一道裂缝。为了衡量当前的危急关头，我们需要仔细的工作，记录甚至促进这些技术的战术政治用途，但我们也需要把这些用途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即仍然是一套非常强大的技术，这些技术被配置为推进和确保雅克·朗西<s:1>所描述的‘财富的无限力量’”(2011)。总而言之，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工具，不管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诸如此类的判断假定，考虑到互联网所服务的内容和主动性的巨大多样性，企业在为其目的而利用互联网方面取得的成功远比看似合理的要多。但是，相反的论点可能比这种定量比较更深入。对互联网的认真研究是必须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考虑到它的技术演变，而这一演变仍不完整。这重新聚焦了讨论的焦点。Dean引用了Galloway和Thacker(2007)的观点，他们批评“网络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不可思议的、非人类的意向性”(引自Dean, 2010: 114)。这是她试图解释的，但互联网形成“整体”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对互联网更全面的理解，会在复杂的功能矩阵中为其政治方面找到一席之地。建构主义方法考虑到了这种复杂性(Feenberg and Friesen, 2012)。

由于许多参与者在技术的特征中客观化了他们的需求，没有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它。互联网不是统一的，本质上是分裂和冲突的。分析问题在于解开这种复杂性，并将技术的各个方面分配给其背后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将重点关注其中的两种力量，一种是试图根据自己的需求改造互联网的商业利益集团，另一种是那些利用互联网的特征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行为者。它们都是利用互联网当前多元稳定状态下的可用资源，但它们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强调不同的特征。

互联网的未来取决于哪一方在确定其技术代码时占上风。商业利益支持我称之为互联网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对应的技术代码与我称之为“社区模式”的某些要求不兼容。这两种模式今天共存于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系统中。消费模式特权支持商业交易和广告的功能，而社区模式依赖于支持在线社区和公共生活的其他功能。这两种模式都在争夺对互联网未来的控制权，这是互联网的终极技术代码，但到目前为止，两种模式都未能占上风(Feenberg和Bakardjieva, 2004)。

因此，互联网是一个斗争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单一本质的确定的“事物”。富克斯的论证强调了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忽略了与之竞争的社区模式，后者并不符合他的图式。但不连贯性是一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的特征，它还没有围绕一个明确的目的定义而结束。对互联网的批判应该集中在斗争上，而不是假设它已经结束，并为商业的独家优势做了准备。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试图将这种复杂性分解为描述当今互联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从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现象。围绕其技术代码的斗争，是行动者试图通过赋予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技术层特权来解决模糊性的一种尝试。围绕一种或另一种技术代码的关闭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通过对互联网特征的彻底简化，或者通过重新组合和重新配置这些特征的新配置，以满足或至少是所有有影响力的参与者的被动接受。我认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也确实不可能知道这种模糊性将如何得到解决。作为理论家，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绘制出冲突的层次，并找出它们背后的行动者。

互联网有五个层次，这些行动者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挪用了这些层次。这些层分别是:非分层结构、匿名、广播、数据存储和多对多通信。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共享层，对相同的资源进行不同的使用。但在其他情况下，以新的方式改变或组合层以适应特殊利益的压力可能会改变互联网的特征。这是必须详细分析才能了解技术现状的斗争场景。

互联网的各层定义

非分层结构

互联网的非分层结构使商业应用复杂化，同时有利于公共用途。互联网协议创造了一个分散的网络，而不是像广播网络那样的集中系统。没有掌舵的人，没有能扼杀自己不喜欢的新闻的鲁伯特·默多克，没有能主导新闻的ABC或NBC，没有能左右品味和潮流的公司。这并不是否认广告商会把他们的信息传递出去，也不是否认互联网上的某些声音比其他声音更有影响力。但这与可预测的、管理良好的、中央控制的商业模式相去甚远。无论是广告还是影响力政治，都无法让企业控制与其电视和广播网络相当的内容。

但是，企业想要控制吗?Facebook和谷歌的巨额收入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致力于交流和信息的网站卖的是广告，而不是娱乐。娱乐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所谓的Web 2.0似乎是一种资本主义企业的新模式，它不是建立在对用户的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用户的代理之上。那些从这些例子中进行概括的人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乔迪·迪恩称之为“交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尽管他们很成功，但他们只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我怀疑它们是否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变革。此外，娱乐的分布将极大地增加从互联网中提取的财富。这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但进展缓慢。

考虑一下备选方案，问题就很明显了。商业控制的媒体，如电视，保护知识属性，并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产品和广告上。目前形式的互联网还无法接近这种模式。法国电信系统，一个基于不同协议的成功的早期计算机网络，探索了一种有前途的替代商业模式(Feenberg, 2010:第5章)，它跟踪服务的使用情况，并按分钟向用户收取电话费。这种关于用户活动和计费控制的私密细节，在互联网协议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它没有考虑到商业的需要，也没有适应商业的需要。军方为可信计算中心系统创建了互联网协议。时至今日，它仍然以这个起源为标志。广告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在互联网上出现得相当晚，是一种变通办法。目前还不清楚，通过数据挖掘社交网络实现的目标定位的优势，能否弥补协议带来的局限性。订阅服务提供了另一种商业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不是很成功。随着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通过互联网传播，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理想情况下，以消费为导向的技术代码将提高安全性，以确保良好的服务，并更好地控制分发，以保护知识属性。商业利益要求结束网络中立性，以确保娱乐等商业服务以牺牲公共使用和通信为代价获得更大的带宽。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斗争远未结束。到目前为止，像“水印”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还没有成功地防止知识属性被盗。很难说互联网协议的哪些修改会有所帮助。相反，商家已经转向法律压制，最近还转向提供便利的服务，吸引买家购买那些可以在其他地方免费获得的商品。尽管如此，互联网已经对娱乐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非实施激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否则娱乐业将继续发展。如果这些解决方案占上风，互联网将转变为类似电视的东西，一个由少数网络控制的系统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以及有线电视公司，而不是我们目前所享受的去中心化、无层级的配置。

匿名性

除了这些与商业相关的非等级结构的不便之外，它还支持匿名，这有利于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匿名保护了任何形式的污名化或反社会活动。这类活动大多具有商业性质，例如，有偿分发色情作品。但匿名也服务于社区。那些原本害怕表达不受欢迎观点的后果的个人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地这样做，他们可以在论坛上辩论当天的问题，或者与他人聚集在一起阐明自己的想法和行动。虽然打破匿名的面纱是有可能付出一些代价的，但它已被有效地用于建立政治反对派。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匿名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由于商业行为者和网络活动人士都从匿名中受益，因此他们都没有为强制性实名身份进行游说。这主要是政府——第三个相关的社会群体——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民主社会中，政府主要是为另外两个行动者的要求提供法律和监管支持。互联网的监视和控制功能只影响了它在中国等国家的意义。

广播

互联网上的广播有可能覆盖数百万人。这标志着与早期接触公众的方式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即时的，这使得它对许多不同类型的演员都有吸引力。有了这个功能，就可以把娱乐传递给广大观众。在消费模式中，互联网作为电视、cd和dvd的替代品。由于我们只是在这一发展的开始，所以不可能说它将如何彻底地重塑互联网，因为媒体公司正在努力保护他们的知识属性，并确保他们的产品尽可能最好地交付。社区模式还依赖于广播来进行公共干预、抗议、筹款和其他政治任务。结合匿名性，广播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它被用来大规模地动员公民进行示威和选举。当然，早期的政治运动是通过电话、油印机和盒式磁带等技术来管理的。富克斯和迪恩肯定会同意，把阿拉伯之春称为“Facebook革命”是愚蠢的，而是互联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确实为快速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只要互联网上的交流是免费和匿名的，广播就会同时为商业和社区服务。

数据存储

互联网上存储的数据具有多种功能。消费模式赋予存储数据用于商业目的的特权。数据由社交网站的所有者收集、分析并出售，以提高广告效果。用户在互联网上搜索商品，这创造了连接全球买家和卖家的巨大新市场。政府也可以使用存储的数据进行监控。偶尔，持不同政见者会得到令政府和企业尴尬的数据，并将其公布在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在社区模型中，数据存储不必是私有的，尽管目前大多数在线社区活动都是在专有网络上进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隐私，某些类型的数据访问也受到限制。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承诺将其入侵限制在数据挖掘，而不是检查个人账户。这些数据只对每个在线社区的成员(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的警察)完全开放。然后，个人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重建他们过去的陈述和承诺，就像日记或议程一样。对于在线社区来说，它作为他们历史的记录尤其有用。

如果在线社区远离专有平台，或者如果隐私权被解释为禁止数据挖掘，那么数据存储将仅限于社区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专有网络在打破隐私以改善广告方面走得太远时，就会威胁到在线社区。到目前为止，数据存储对商业用户和普通用户都有用，已经达到了一个大致的平衡。

多对多通信

互联网支持在线社区，志同道合的个人的聚会，通过一个独特的功能，用户共享共同文件的能力。对文件的访问就是对所有具有类似访问权限的人的访问。发送到文件的消息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这与邮件和电子邮件不同，邮件和电子邮件是发给个人的，而不是发给一个群体的。网络社区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它提供了小团体活动的第一个电子中介。

大多数社会生活都是在小团体中进行的，教育和政治讨论也是如此。因为网络社区聚集的群体不考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地理上的距离，分散的个人可以围绕一个讨论或斗争的主题走到一起，否则在公共生活中就没有代表。在商业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的早期，多对多通信支持了令人兴奋的新社交形式的发明。这就是人们期望计算机网络会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背景。毫无疑问，网络的先知们夸大了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的变革力量。但迪恩所展示的是，这种期望之所以落空，并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有限，而是因为多对多通信的进化并没有放大这种期望所基于的原始模式。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多数多对多通信都未能产生真正的社区。作为这一阶段特征的失败社区具有整合效应。

正如迪恩所主张的那样，Facebook等在线社区的大多数活动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很可能是真的。而正如富克斯所言，对这些社区产生的数据的利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上，甚至还有一些由企业创建的团体，用来放置产品或识别不断变化的口味。但在每一个公共场所，情况都是这样或那样。还有很多在线社区可以进行真正的互惠交流。资本主义到处寻找和发现机会，这并不奇怪。批评者并没有解释，当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于如此多的不同的活动中，为什么这应该是互联网唯一的资格。

网络社区不仅参与传统的政治活动，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参与政治的扩展概念。医疗病人组成团体来分享他们对疾病的看法，并影响护理和研究。家长利用互联网组织对学校政策的抗议。公园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在资源受到预算削减威胁时，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各种公民问题和挫折，成为社区行动的契机。在每种情况下，社会技术网络成员的参与利益都是政治上的。这种“亚行动主义”是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延伸;它改变了个人和政治的界限(Bakardjieva 2012)。

这些特征的模糊性解释了它们如何服务于非常不同的行动者的非常不同的策略。流行电影的传播、色情作品的传播以及革命的号召都使用了广播。匿名保护了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在线社区聚集了摇滚乐迷和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革命者。等等。这些层的不同组合有利于消费或社区。以目前的形式，互联网与这两者都是兼容的，但它只会对在线社区和它所支持的政治活动保持友好，只要保持一些接近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中立性的东西。这些条件是互联网军事起源的偶然后果，与网络商业用户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不相容的，但为了我们所知的互联网的生存，它们必须得到保护。

结论:一种新的辩证法

互联网意义的断裂，其特征的多功能性，以及对其未来的斗争，并不是这项技术所独有的，尽管它们在这里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所有技术建立网络的意义在于，它们将人和物以一种由象征关系和因果关系混合决定的组合方式聚集在一起。而这些技术网络中的许多都是由代表不同和冲突利益的相互矛盾的程序所穿越的。必须抵制以参与其中的统治集团的程序来定义网络的倾向。原则上，所有的程序都是平等的。每个程序都要求占有网络的资源，并试图围绕其所代表的利益组织网络(Feenberg, 1999: 114-19)。

考虑一个工厂的案例，工厂的所有者将工厂组织起来以赚取利润，工厂的工人试图捍卫或扩大他们在工厂生产的财富中的份额，工厂的社区为了应对污染等外部性而对工厂的活动施加限制。从法律上考虑，所有者的计划定义了工厂的唯一合法目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方垄断了工厂的资源。每个行动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这揭示了不同的方面，并赋予了不同的行动方式特权。三者必须共存，因此必须相互让步。他们的计划和妥协可能会改变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技术。

这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中观察到的模式，功能频繁重叠，偶尔发生冲突。互联网的大多数用户对它的复杂性泰然处之，不会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概括它。他们根据需要从一种程序(两种意义上的)切换到另一种程序。但评论家们选择了整体的一个方面，并将整个网络概念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单一节目的条件。我在这里试图通过将网络作为一种有争议的技术进行分析，来恢复网络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在这方面，技术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实例，即理性本身的模糊性。互联网的批评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提出了激进的修正。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原始辩证法表明，理性的进步并没有产生启蒙运动所期望的解放作用。迪安提出了一个结构上类似的理论。我们期望参与和交流是解放的，但实际上它们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迪恩通过协议，通过互动的结构，发展了一个版本的整合概念，这个概念是由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开创的。大概，我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们通过相互作用自我整合，而不需要在早期阶段整合社会的合法化策略和消费者奖励。

迪安对互联网的分析可以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压抑性去升华理论相媲美。马尔库塞表明，解除对性的压抑并没有产生人们可能期望的解放后果，反而加强了对制度的控制。就像马尔库塞贬低性解放政治一样，迪安贬低了网络空间政治。但与马尔库塞一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谨慎地提出了对理性的理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2002:xvi)。他们意识到，批评被同化的解放进步存在风险。风险在于，人们在批判其被体制所吸纳的过程中，会忽视进步本身。低估在批评对解放进步的利用中所获得的东西，会导致政治瘫痪。

事实上，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众传媒的鼎盛时期相比，今天的批判性思想和激进的政治行动要多得多。迪安的理论是片面的。它忽略了那些仍然具有解放意义的技术的未被采用的用途。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互联网的经验条件，以便理解这种模糊性，因为它适用于沟通和参与。这就是我在论证互联网是一项有争议的技术时所提出的观点。

这种做法表明，谴责互联网为时过早。今天有比驳斥互联网炒作更紧迫的问题。那些试图接管互联网内容进行娱乐发行的企业势力怎么办?以及政府监控的强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我们把批判的精力集中在互联网受到这些霸权力量威胁的那一方面，即互联网的交流作用上时，如何才能战胜这些挑战呢?现在是时候从反炒作转向严肃对抗这些对互联网的威胁了，尽管这些威胁并不完美。它仍然是一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不断发展的技术。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互联网的未来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不是一种naïve、不加批判的立场，相反，它使对未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Bakardjieva, Maria. 2012. “Subactivism: Lifeworld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eds. Andrew Feenberg and Norm Friesen, 85–108.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Barney, Darin. 2011. Interviewed by Laureano Ralon for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 April 12. Accessed November 15, 2012. http://figureground.ca/interviews/darin-barney/.

Boltanski, Luc, and Eve Chiapello. 2007.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 London: Verso.

Dean, Jodi. 2005.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1: 51–74.

———. 2010.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ebord, Guy. 1994.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Deleuze, Gilles.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 3–7.

Feenberg, Andrew. 1996. “The On-Line Patient Meeting,” principal author with CNS staff.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 139: 129–31.

———. 1999.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2010.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eenberg, Andrew, and Maria Bakardjieva. 2004. “Consumers or Citizens? The Online Community Debate.” In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eds. Andrew Feenberg and Darin Barne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Feenberg, Andrew, and Norm Friesen, eds. 2012.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6(3): 179–96.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14a. *Occupy 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Social Media in Crisis Capitalism*. Winchester, U.K., and Washington, D.C.: Zero Books.

———. 2014b.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Social Media." In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s. Christian Fuchs and Marisol Sandov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Galloway, Alexander R., and Richard Thacker. 2007.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Gladwell, Malcolm. 2010.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10 October. http://www. newyorker. com/ reporting/2010/10/04/101004fa_fact_gladwell.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44.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 Gunzelin S. Noerr.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x, Karl. 1904.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N. I. Ston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Williams, Raymond.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2 信息时代的涌现意义

伊恩·安格斯

文化数字化是否产生了意义危机?

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欧洲科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危机*》中，埃德蒙·胡塞尔认为，由于伽利略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对现代知识概念的霸权，欧洲文化必然陷入了意义危机(胡塞尔，1970:5-7)。由于意义和价值不是伽利略科学的客观主义模型的一部分，这种霸权将意义和价值问题归结为理性领域之外的主观偏见。只有一种将主体性概念纳入自身的新形式的科学，才能将意义和价值恢复到理性概念的中心，从而克服危机。

意义的必要丧失和恢复嵌入在自然的数学化中，由此，自然被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在定性和主观表象之下的数学结构。作为世界历史主题的数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

当然，除了胡塞尔，其他哲学家也研究过。马丁·海德格尔将信息描述为

> 一种尽可能迅速、全面、明确和有益地使当代人类熟悉其必需品、需求及其满足的评估. . . .因为语言的确定首先为构建思考机器和构建大型计算框架创造了充分的基础. . . .作为一种评价，信息也是一种安排，它把所有的物体和东西置于一种适合人类的形式中，这种形式足以稳固地建立人类对整个地球甚至地球以外的东西的统治。(海德格尔，1996:124)

虽然这个提法陈述了作为世界历史形式的信息的问题，但它将其陈述为数字高于经验的规则问题，因此其含义只能是(以海德格尔哲学的一种特征方式)将数字留给经验，这被陈述为本体论。因此，他的沉思以这样的问题结束:“我们是否有义务找到思维能够回应值得思考的东西的路径，而不是被计算思维迷住，盲目地忽略值得思考的东西?”(海德格尔，1996:129)。虽然思维确实需要超越数字思维的束缚，但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需要被思考的是数字思维本身。本体论被假定为一个“简单的下面”，它可以通过撇开产生数字的抽象世界而被重新发现。

阿兰·巴迪欧同样以世界历史的形式描述了数的规则，尽管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优先于数的观点相反。他以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相似的措辞宣称“数的统治……”强加了数字与价值或真理之间联系的错误观念”(2008:213)，但为了断言“数是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且，它远非被主体的功能所支持，相反，它是数的基础……主体的功能得到了它的一小部分存在”(2008:25)。因此，本体论被简化为数论的“x”的表象。

> 第一个被呈现的没有概念的多重性必须是无物的倍数. . . .一旦多元的立法理念被展开，本体论就不可避免地由专有名称的专断性的纯粹表述开始。这个名称，索引于虚空，在某种意义上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那将永远是个谜，是存在的专有名称。(巴迪欧，2007:57-59)

通过将本体论还原为数，与海德格尔将数还原为本体论形成镜像，巴迪欧可以断言，本体论的首要存在是建立在集合论基础上的“x”——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特定种类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某种多重性中的一个。

只有胡塞尔将这一问题精确地表述为追溯形式抽象的沉淀意义到它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这样它们就可以通过现象学直觉*被重新激活*。这不仅是一个数*与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数与本体论*之间精确联系*的问题。这就是胡塞尔式的“基础”问题，或将抽象追溯回它们在直接直觉中的起源所争论的问题。但我不想简单地将胡塞尔式的直觉解释应用于当代数字的文化意义问题。相反，我想用这个当代问题来激发对意义的探究，这需要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修订才能完成。虽然从胡塞尔的调查中得到了启示，但当前的问题是，当代文化的数字化是否给知识带来了与科学危机相当的危机:知识的数字化是否破坏了主体性的经验和概念，而主体性可以为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奠定基础?

什么是文化的数字化?

在开始定义文化数字化的现象时，我们可以从“数字化”这个词本身的结构中得到一个线索，其中后缀“-ization”的意思是“放入的形式”，这里所讨论的形式是“数字的”，或者更常见的是“数字的”。数字化是一种主动的过程，它将最初没有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数字形式。当然，当代的文化产品可能会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但文化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进入数字形式。文化数字化既指将文化产品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也指将非这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刻入数字形式。因此，它既是一个初级文化过程，也是一个次级文化过程:初级是指它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一些当代文化产品的形式;次级是指那些在数字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如此影响的文化产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生产过程由于随后被转化为这种形式而受到次要影响。数字化不仅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的前沿，也说明了当代文化进程如何将未发生在这一前沿的文化生产和文化遗产纳入和转化。

数字化通常是通过表达它的符号系统来定义的。众所周知，数字形式是二进制代码中的一系列1和0。一种复杂的码，一种有多种可能刻写能指的码，用很少的符号传达了大量的信息。例如，由于英语字母表包含26个能指，仅仅铭刻一个能指就排除了25种可能性。几百个能指的代码将在每个铭文中排除几百- 1种可能性。相比之下，二进制代码只排除一个其他符号，因此每个铭文传达的信息很少。然而，如果有大量的铭文，一个非常简单的代码就可以传达大量的信息。数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形式符号，像任何符号一样，在一定的代码中被理解为这样。二进制码的简洁性要求这个数字要特别长。正是这种最小的代码和非常大的存储容量的结合，在技术意义上定义了数字化。数字化形式的文本、照片等被表示为极长的二进制数，正是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表达了文化产品之间的差异。

数字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而普遍的方面。更确切地说，人类说话的基本经验可以通过形式学科来研究，这些学科将语言的某些特征抽象出来，以便科学地确定。研究数的形式学科关注的是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样它们就可以集体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集体联系是用数计数的本质。雅各布·克莱因指出，对说话的反思导致了语法和逻辑的形式学科，但这也

> 说话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区别，以及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联系。它以计数为前提。因为计数就是区分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同时又把它联系起来。因此，说话和其中所包含的思考一直被理解为一种计算。这确实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说话时对数字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反思和追求我们的探索性问题，我们到达了算术的形式学科，即数字及其关系的科学，这是我们所有计算的基础。(克莱因，1985:164)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正式知识。数字化依赖于这一形式学科，将文化产品表达为数字。

然而，将数论应用于数字化只能产生一个*技术*上的*定义*:也就是说，对其内部结构的定义。它并没有延伸到数字在人类制造或行为中的使用，更具体地说，也没有延伸到数字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虽然文化产品以数字的方式表达，但它们的作用是赋予文化在人类经验中的角色*某种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将与它在文化中的主要和次要角色以及这种文化从人类经验中形成有关。对于数字文化的制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数字的形式，而是数字的形式在人类经验中的功能，以及这种形式作为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的插入。

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离不开关于数字文化制度的问题，以及它是否会因破坏理性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危机的问题。

文化数字化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由将文化转化为数字形式并使其在人类经验中可用的初级和次级过程构成的。显然，在二级过程中，当一种先前存在的文化形式被翻译成数字形式——例如扫描文本或照片，并将扫描结果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数字形式是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表现*(例如，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表现)。文本或图像)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指向先前的形式，又包含了先前形式的内容。此外，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指代，即该形式的内容可以通过数字形式获得，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先验形式的表征，而且是一种*经验形式*，它本身被体验为一种文化内容。至少在二次过程的情况下，数字化既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表征，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文化数字化的初级过程而言，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一种文化内容被直接刻入数字形式——例如在电脑上书写文字或用数码相机拍摄照片并将其插入可下载的文件中——作为一种体验形式，它显然是一种文化内容。然而，由于铭文的数字形式，文化内容已经是“可复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可以不受限制*地生产的(因为没有原创性)，并且是可传播的，因此，它的*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尽管它所指的不是*先前*的文化形式——数字形式指的是它本身就是的文化内容。

因此，文化的数字形式，无论是作为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化内容，也是对同一文化内容的表现。数字化的数字形式，即技术定义所捕获的内部形式，当应用于表达人类经验的文化内容时，使该文化内容具有其表现形式的同一性。数字文化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定义中所描述的数字形式使内容和表现形式同一性。

由于文化表达的内容包含文化知识，而文化内容的表示使这些知识在共享框架中可用，因此文化的数字化既是知识也是交流。由于数字化中内容和表现的同一性，知识和同样知识的传播变得同一性。数字化的形式瓦解了知识和传播之间的区别——已知的和利用已知的说服之间的区别，或者，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科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区别(Angus, 2005)。文化的数字化开启了这种经典区分的崩溃，因为它在数字形式和文化内容之间建立的关系，与文化内容本身的铭文一样，建立了这种文化内容的再现性和*可重复性*。文化的数字化使*信息*与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同一性。为了理解作为数字文化中心制度的信息概念，我们必须理解它是如何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使信息既是知识又是传播。因此，信息是文化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信息是否会通过破坏理性(现在以信息的形式)与意义和价值的整合而引发文化危机。对数字化制度进行回顾性调查的基础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文化是*知识的*当代*聚合及其基于铭文的传播,同时也是自身的表现*。

信息是知识的一种形式

信息是一种知识形式，因此它指的是作为知识的世界的一个方面。它对知识进行表述，或赋予知识某种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关于世界的其他形式的知识，比如说话、写作或绘画，尽管这些其他形式可以追溯到包含信息的特征。信息形式的知识是历史上的后来者，尽管如此，它可以用来描述其他形式的知识的一些共同内容。

作为控制论电路的信息

信息中的知识形式传达了知识的两个基本方面:数量方面和关系方面。信息是一种知识，人们对它可能拥有“多”或“少”，“够”或“太多”。它是一种主要从其数量方面来理解的知识，尽管要描述这种数量需要参考“上下文”，我们通常非常笼统地说，但更确切地说，是参考该信息的关系方面。一个人有足够或太多的信息与其他信息有或多或少的接近，或相关的信息有关。信息的数量是通过其关系方面来定义的，而关系方面是通过信息系统来定义的。信息系统是由相互相关的信息组成的有组织的数组。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个控制性系统——比如一个内部有加热调节器的房子——在与其环境相关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内部组织的、自我导向的、自我纠正的系统，这样，当内部系统的组织响应外部环境时，正是它的内部组织定义了这种反应的性质。

> 反馈是一种控制系统的方法，通过将系统过去的运行结果重新输入系统。如果把这些结果仅仅用作对系统及其调节进行批评的数值数据，我们就得到了控制工程师的简单反馈。然而，如果从性能中反向得到的信息能够改变性能的一般方法和模式，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学习的过程。(维纳，1954:6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内部自我调节通过内部组织的整体将这种关系路由，从而使每个内部组件与其环境保持距离。系统的每个内部组件通过整个系统的结构而不是单独对环境影响作出反应。这种内部组织，从而实现了高度的自我监控和自我纠正，是由系统的每个内部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为其他组成部分提供*信息*。

拥有内部加热调节器的人住在房子里，从保持房子的温度在一个近似均匀的水平(比如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中受益，并且通常不需要注意加热器何时工作，何时关闭。然而，如果这个人觉得太冷，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自我调节传感器的温度提高几度。理想情况下，这种调节器的重置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让人感觉更舒服。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改变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调节水平，需要一个重置传感器的行动者。如果传感器可以自我重置，除了在一个预设的模型上，比如记录设备，定期重置白天和夜间的传感器温度，它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因为传感器成为了一个行动者。

> 这个循环组织构成了一个内稳态系统，其功能是通过确定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合成或维护它的*组件*来生产和维护这个完全相同的循环系统。此外，这种循环组织将一个生命系统定义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单元，并且对其作为一个单元的维护至关重要;凡是不在其中的，就是它的外部，或者不存在。在循环组织中，指定它的*组件*是那些它以某种方式确保其合成或维护的组件，使其功能的*产物*与产生它们的功能组织相同，这就是活的组织。(Maturana and Varela, 1980: 9)

在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例如传感器以不同的方式重置自身以监测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传感器充当了整个信息系统的监督者——即在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时调节整体的部分。这将是一个生物的、有生命的系统的底线，而不是物理的、一阶控制论的系统。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感觉冷的人*感觉冷*。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感觉冷的功能是作为调节器复位的信息。感觉冷通过被设置在其他信息的关系语境中，从而成为信息，从而发挥信息的作用。但一个人可以感觉冷而不成为这样的信息。我可能只是保持寒冷，因为这不是我可以改变的房子，或者因为我买不起更多的石油或天然气。信息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文化内容”的参考，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感觉寒冷的生理文化状态，但*它不是物质文化内容本身的这一方面*。这正是通过内部组织的强化所实现的，这样对环境的参考就会通过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每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做出反应。*信息的形式是与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内的其他信息的定量关系，而不是直接与这些关系之外的事务状态的关系*。信息概念从一个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系统的概念发展而来，意味着信息同时既是系统内信息的运动，又是该系统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实践和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在控制论信息中崩溃。知识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信息，这种形式与它的交流融合在一起。

从信息到突现意义

这种将信息初步表征为定量和关系形式的知识，可以更详细地描述信息的复杂程度。这种图式阐述了数字化的文化定义，它指的是数字在其数字化系统化中通过将这种形式插入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本过程而在人类经验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最小的信息量是piece.[a]*一条信息*只能被定义为参照其作为信息而起作用的话题或主题的最小的信息量，也就是说，相关信息的关系总体。这种确定，如果没有

a In *Love the Questio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 used the term “bit” but distinguished it from its technical meaning. It now seems clearer to adopt a different terminology entirely for the cultural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gus, 2009: 113–6).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比作品本身更大更复杂的信息排列。总是有不止一条信息，但一件作品的*相关性*取决于信息的整体，而不是它对经验世界的一个元素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被回顾性地定义为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信息的总体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作为其他信息片段的不确定的众多，或者作为由主题组织的总体。在这里，我们大致*上遇到*了信息的文化问题:有大量的信息，但它不一定被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文化数字化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如何选择和组织过多的信息片段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问题中。而文化上无法将这一选择和组织过程制度化的失败，确实可以被称为“文化危机”。

我们可以区分出建立在这个原始片段之上的信息片段的三个更高层次的集体。有一*堆*信息，这是由单个信息片段组成的无组织的、数量不定的更大的集合。这样的一堆展示了文化危机:我们有成堆的信息，却没有一件与一件或一件重叠的相关性。我们淹没在如此多的堆中，以至于一种文化组织其意义感和价值感所需要的连贯性本质上是缺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信息，也不知道所收集的信息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相关性。

从几堆信息中，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一堆信息——在这里，我们将走出危机的第一步。我在这里使用“束”这个词，是指一串葡萄或一束花，或者把手指捆成拳头。它首先表示一个可观的数目——至少是一堆，也许是几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堆本身具有某种可辨别的、虽然可能很弱的组织。卖花的人根据花的形状和颜色把它们束成一束;葡萄是根据茎上生长的逻辑串成束的;拳头被手指捆成一团，不能包含一个脚趾。将一堆或几堆转化为一堆，涉及到*突发性组织*的问题，如果充分跟进，可以将信息形式的知识组织成与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和持久性相关的文化知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微观逻辑的方式确定，一堆变成一堆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信息时代文化意义的建构问题。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束束的信息可以被收集成一个*话语*。我说的语篇是指有组织地呈现一系列信息，阐述一个主题的连贯视角。“话语”一词打破了它之前的主要定量术语，强调了它所实现的内部定性组织，从而表达了文化意义，话语本身可以进入一种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文化价值。

现在，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个旨在帮助定义信息时代文化危机问题的术语。这些术语既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也不能断言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它确实指出了在哪里可以寻求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以及什么将构成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如何从信息碎片的更高集体的组合中，出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将与早期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话语相比较，这些话语不是从信息的数量和关系形式开始的?

将这种提出的*涌现意义形式与早期有意义*的文化整体的信息区分开来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整体首先是作为具有部分的整体来表达的，这些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因此被确定。他们相对自然的世界观，用马克斯·谢勒的术语来说(谢勒，1980:74)，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整体性表达了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文化整体来理解和评价一个涉及文化整体的独特部分的给定情境。问题的方向是，首先，这种情况应该如何与文化整体的不同部分相联系，其次，文化整体如何决定部分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问题是逆向的，虽然不是现存的逆向。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过多的信息。任何一条信息都与不确定但数量庞大的其他信息共存。因此，每一条信息都出现在一个无限的视界中，这个视界以互联网为代表，是大量更多信息的来源。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范围内，单个的信息片段如何能够充分地组织起来，以表达文化意义，而不落入不断积累信息的背景嗡嗡声中。

在这种组织之外，通过涌现意义的过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将构建一个话语的*主体*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可以参与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建构。今天许多哀叹主体衰落和意义危机的话语，基本上都假定这种突现意义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代数字化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过去谈论文化意义时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具有文化意义的当代主体将是更高层次的信息集体的一种新兴属性。

克服文化数字化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危机，就必须表明，即使在信息时代，这种能够赋予主体性和意义的突现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确实是可能的。但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知识及其传播的崩溃所带来的信息的第二个方面:信息作为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

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

在知识汇聚和信息传播之前，人们可以区分作为文化内容的知识和它的传播，或者，用古典术语来说，哲学和修辞学(安格斯，2005)。可以从其文化内容及其对社会文化形成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也可以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传播媒介*将文化内容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或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以施加影响。如果关注传播的文化内容，传播媒介的专一性就会退避，而如果关注传播媒介，文化内容就会退避，有利于媒介构成的物质关系。由于文化数字化现象本身包含了文化内容传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和相关渠道的传播——关注传播媒介对于提出对意义和价值的暗示问题至关重要。

传播媒介理论

一种传播媒介建立起一种关系，即在一种给定的媒介内刻写的传播的起点和终止点之间的关系;例如，说话者、作者或发送者与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审计师、读者或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由每种情况下媒介的特定特征来定义的。因此，在言语媒介的情况下，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包括了外观、手势和音色等方面。作者和读者被一段不确定的距离隔开，因此不能面对面，而是通过写在纸上、莎草纸上、卷轴上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来交流。外观、手势和音色都不存在，但完整的、可重复的、可携带的文本使远离周围社会关系的个人能够沉浸在文本的意义中，对其进行反思，并返回来检查它，并在以后与同一文本的其他读者(他们在相隔甚远的时间和地点阅读)进行交流。对各种传播媒介及其固有特征的研究，包括它们影响社会关系和文化中意义循环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现在被称为“媒介生态学”(安格斯，2000:37-38)。[1]

然而，在文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主要关注的不是传播媒介、媒介生态之间的关系转移，而是数字化传播在媒介生态中的地位。数字媒体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原则上可以与其他媒体(如演讲、卷轴、书籍、广播、电视等)相媲美，或者它是否是一种影响——也许是一种基于电子或计算机技术的外部影响——作用于所有媒体，这往往是不明确的。后者抓住了一些真理，因为任何媒体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被赋予数字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化给文化意义和价值带来了危机，而不仅仅是媒体生态内部的转变。但仔细观察，就能得到更精确的定义。

如果我们以当代用户的方式看待电脑屏幕，我们会依次体验到书面文本、录音、图表和插图、照片、音乐、乐谱等等。这些在以前可能都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媒介。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体验到“数字”是屏幕上的内容。与其他电脑屏幕相连的电脑屏幕确实在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确定的横向关系。关于计算机通信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热衷者经常声称，这种无等级的网络预示着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而保守派则怀疑，接触的速度和即时性是否消除了反思思考所需的空间。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计算机通信所固有的社会关系确实是一种网络关系，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屏幕上出现的不同的传播媒介表明，数字传播与它经常使用和描绘的其他媒体不同，它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媒介。

让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几个方面:首先，虽然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作为内容被*描绘或呈现在屏幕上*，但这是以一种将它们重新嵌入到数字传播的网络社会关系中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麦克卢汉，1964:60)，媒体不是简单地分离;在媒体生态中，新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旧媒体。比如，在电视上出现的是叫卖小贩、街头宣传员、话剧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以前的媒体变得满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被呈现的东西)，而由旧媒体*构成*的社会关系在新媒体中消失了。很明显，这也发生在数字传播中:下载供阅读的书籍*与其他数字可能性一起*出现，*并在*它们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一种类似于以前媒体的媒介，因为它的构成性社会关系将其他媒体的社会关系作为它的显性内容。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材料彼此并排出现的事实，允许它们以新的方式被编辑和组装。再一次，我们可以在电视使销售、宣传和娱乐进入新的关系的方式上看到一个类比。但是，数字化还有更多的含义:所有这些媒体形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包括计算机形式——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相互转换，这样*数字化*就成了*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它将任何媒介的内容翻译成自身，从而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对其进行编辑和重组，然后将新的内容重新嵌入到另一种媒介中——要么是本身，要么是以书籍、照片等印刷形式。尽管最终的内容重新嵌入到特定的媒介中，而这种媒介的建构性社会关系适用于这种媒介，但再现性和构成性的各个方面在原则上都是通过一种普遍的翻译媒介而崩溃的。这种区别通常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倾向于假设——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生活在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之中——重新嵌入将永远是数字形式的。尽管我们经常将书面文本打印出来，并在学术会议上像使用书面手稿一样使用它们，其方式与许多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数字化既是一种通用的翻译媒介，也是一种可与其他媒介相比较的特定媒介，因为当重新嵌入在数字形式内时，其特定的网络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2]数字化既是一种特定的传播媒介，又是一种传播媒介之间的翻译媒介。虽然先前的媒体在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会翻译先前的媒体，但数字化的特点在于其普遍翻译的可能性，也在于由于它显然与自身共存，因此被翻译的内容很可能在数字媒体内重新嵌入。也许我们应该保留后一种可能性，以考虑文化的数字化:不仅将所有先前的文化内容翻译成数字形式，而且将这种翻译的产品重新嵌入到数字媒体中。

数字化与文化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隔离翻译和交流的全数字媒体的哪些方面对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问题。众所周知，数字翻译和传播的关键方面是速度。相反，我们可以说，在数字化之前，媒介之间的每一种形式的有限翻译都需要所讨论的媒介的基本*延迟*特征。一种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暂时平衡的媒介生态，它的正式定义是媒介间翻译的速度或延迟。它实质上是由通过媒介生态传播的文化内容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同样是由媒介生态中传播媒介之间不可翻译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些沉默来定义的。翻译的延迟设定了文化内容和创新的正式边界，而本身被传播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受到构建文化*无意识的内容的不可能翻译的困扰*——*这*在媒体生态中是不可说的，并且/或者被主流媒体推向了边缘。因此，数字文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几乎同时的翻译/传播，这样以前分离的文化的边界就经常被逾越。这种越界意味着，数字文化的产品必须在不同的文化意义下进行解释，而不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化颠覆了任何既定的解释语境，并以解释者*建立*解释语境的必要性取代了这种先前稳定的语境。[3]文化解释变得*横向化*，放弃了*深度问题*。综上所述，而之前的文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作品是在相对稳定的意义背景下制作和解释的，所以寻找一种适当的解释主导了文化意义，当代数字文化产生了对相关解释背景的寻找，并倾向于将任何提供的解释视为其他解释中的一种可能的解释(Poster, 2006)。

如果我们至少暂时以媒体生态所定义的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那么数字化的两个特征就会脱颖而出:首先，翻译和传播的速度意味着媒介之间的翻译延迟越来越少，几乎为零。第二，数字化作为翻译的通用媒介，意味着不可能的翻译所产生的沉默日益减少为零。这是一个普遍观察的基础，即信息正在加速超越所有跟随它的能力，而这些信息的含义越来越难以理解。文化的数字化确实给文化带来了危机，因为如果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就会趋近于一种没有稳定意义的纯粹透明。这种透明度往往是乌托邦式的赞美或反乌托邦式的指责的主题，因为它破坏了任何稳定的意义背景，但在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要问这种透明度对当代文化意义解释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因为“危机”既被理解为损失，也被理解为恢复，在胡塞尔的意义上。

通过媒介间的普遍翻译，传播作为信息的形式意味着传播与知识的融合。翻译的元媒介是界定每种媒介所固有的特定知识形式的基础。这种形式的传播作为自我监控与知识汇合，成为信息的形式。

数字化是否引发了意义和价值的危机?

危机诊断的困难在于，人们必须展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必然出现的*，而不仅仅是偶然出现的，同时，通过同样的诊断，这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被克服的。危机既不是衰落，也不是上升。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都建立在现象本身的基础上，以至于诊断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方案，尽管它不能保证结果。文化危机概括了我们自己与意义和价值的斗争。出自文化对信息的定义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我们需要厘清衰落的必要性和上升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结论的实体。

信息通过将知识坍缩为信息的形式，将传播坍缩为信息的形式，从而成为数字文化的中心制度，这样一来，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数字化被建立为既是知识又是传播，这同样是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它的行为和*监控*，都以信息的形式存在。这种内容/表现、实践/理论和知识/传播之间经典区别的趋同或瓦解，澄清了数字文化制度的基础。以上各节*分别考察了信息即知识和信息即传播*，以澄清这种趋同的本质。

推动这一分析的问题是文化数字化对意义和价值的意义。在本章前面对作为知识的信息进行研究时，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知识的信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突现意义如何出现在由简单片段构建而成的连续更复杂的信息集体中。这个问题的核心——信息量如何转化为结构质量——已经在上面提出了，尽管还没有直接解决。在本章的那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作为交流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翻译媒介的信息提出了一个文化日益趋向透明的问题。既然信息消解了知识和传播知识之间的区别，那么最后，我们是时候来探讨信息的这两个方面如何应对数字化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危机了。

让我们以总结性的形式陈述信息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我们能够将信息理解为数字文化的制度:信息既是知识，也是知识的传播、内容和表现;它在一个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网络中运行;它是文化内容翻译的通用媒介，可以界定不同传播媒介的知识边界。

我们的两个平行调查将我们引向文化数字化基本情况的两个趋同的方面:既然每一条信息都发生在一个包含无限和非常大量信息的视界中，那么在一堆信息中如何出现一个紧急结构?既然数字化翻译和传播的速度减少了传统上附加在文化翻译和传播上的延迟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近似为零，这意味着构成一种文化形式无意识的沉默也减少到相对的零，意义和价值如何在这样一种文化意义透明的语境中凝结?把这两种表述放在一起:意义和价值如何在纯粹存在的文化形式的无限视界内，既没有沉默，也没有无意识，由即时传播构成的，从成堆的信息的结构中浮现出来?如果不是来自决定了文化中主体位置的沉默和延迟，那么结构又从何而来?

信息的特征表明，数字化确实引发了一场文化危机:没有延迟和沉默，文化近似于一种纯粹的透明;即使信息包含突现意义的可能性，但这种意义并不是直接或自动从信息的积累中产生的。纯粹透明的危险在于缺乏意义或价值。通过涌现意义恢复意义和价值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体系中过分夸大的“相对自然世界观”对个体意义的包容和组织不同——涌现意义包含自下而上意义建构的可能性。

这里的线索在于观察到，在信息回路的构建中，“感觉冷”促使传感器在调节器和环境之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冷”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信息，即使“感觉冷”本身被该系统留在外面，因为感知本身不是信息而是感知。信息是定量的和相关的，然而，即使对于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来说，“感觉冷”的感觉也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感知。换句话说，作为定量和关系的渲染，使得事件状态的登记的特殊性与定量关系无关。请注意，这种“感觉冷”并不是指信息系统之外的主体，而是指信息系统内的感知节点。同样，我不会诉诸于信息时代之外的主体，而是诉诸于信息时代内的感知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整个信息系统中，记录感知状态与定量关系计算之间的区别仍然适用。

正是这种信息系统内的*登记节点*，一旦被取消或忽视，就会产生数字文化的危机。同样，正是从这个登记节点中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才能够克服危机。随着延迟和沉默趋近于零，该节点作为注册站点被取消，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变得几乎完全被整个信息系统所吸收。但这种吸收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正是在完全吸收与注册站点的奇点之间微小而持续的差异中，才发生了数字文化的危机与疗愈。这种差异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被扩宽为文化意义?

如果在注册地点注册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感兴趣的现象，那么吸收的速度就会减慢，从这种延迟中产生了成堆信息的结构化。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强度*。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意义和价值”作为一个短语来讲，但传统上，“意义”会在更高层次的估值之前被考虑，而我想说的是，由于信息的划时代形式，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价值*的根经验是注册站点作为兴趣和调查站点的奇点的意义，“强度”一词指的就是这个意义。这种强度可以被描述为胡塞尔要求符号系统(如数字)根植于直接直觉的残余:它不再具有胡塞尔所要求的自明性和普遍性，但确实包含了作为这些基础的“经验”时刻——尽管这里的“经验”不再是一个预设的基础，而是在符号系统中发现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指出了在符号系统的每一个实际操作中始终存在的外部操作。要成为信息，一个符号系统必须有物质，而在物质中，它遇到了某种强度的奇点。登记的强度是信息电路吸收的延迟，它提供了构建构成价值的信息堆的动机，从而构成了这些信息堆成为束和话语时的意义。

这种对登记地点的奇异性的拥抱，聚焦于登记的强度，因为在登记中没有被纳入到电路中。这是一种本土化的举动(Angus, 2008: 13-36)。这种强度成为*结构化*的一种价值，为一堆信息的突现意义奠定基础。这是在注册站点，甚至是由注册站点承担的风险，这与哲学本身是共延的。[4]一旦节点成为一个站点或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路中的节点，由于其注册的密集奇点，价值和意义就会出现，以构建信息。这样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延迟和沉默，形成了文化的视界。建立的文化不是数字文化，而是数字化中的新兴文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我要感谢西蒙弗雷泽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的Shadbolt奖学金(2012)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号435-2012-0209)对撰写本章所依据的手稿的支持。

注释

媒体生态学也被称为“多伦多传播学派”，因为埃里克·哈夫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曾在多伦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之前的工作(安格斯，2000)中，我使用了“比较媒介理论”这个术语来强调，只有当一个人“在”该媒介之外时，也就是说，在另一种媒介中，特定媒介的特征才会变得清晰。我曾在一次采访(Ralon)中讨论过各种术语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当代对“媒体生态”的近乎共识。

2对这种在当代文明中变得无处不在的翻译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将媒介分析从仅仅是不同形式的目录转向一般文化理论的关键因素。“既然我们在电子技术中不仅扩展了我们的身体器官，而且扩展了神经系统本身，那么作为速度因素的专业和分工原则就不再适用了。当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以符号的速度移动时，人类面临着所有早期加速形式的过时，例如公路和铁路。出现的是一个包容意识的整体领域”(麦克卢汉，1964:103)。“渠道和信息的普遍数字化抹去了个体媒体之间的差异”(Kittler, 1999: 1)。

3这是对我之前分析过的经典引用实践的变化情况的普遍化。“在传统引语中出现的(完成)关系在这里发生了逆转。在引文中，单句引文是不完整的，因为它的完整意义取决于整个文本——原文、新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完整是在引语这一边，而完整是在整个文本这一边。相比之下，一个比特的信息是完整的，因为它是单一的，封闭的，然而，它与其他比特的接近，通过互联网的无限增加，使它不完整。更大的结构现在是不完整的;较小的结构已经完成。知识变成了信息的碎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安格斯，2009:116)。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4“哲学的开始是在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中，在这个行动中，思想家的处境被作为理解人类状况的一种方式而被审问. . . .一个人被迫冒险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建立并形成一种哲学”(安格斯，1997:105)。

参考文献

Angus, Ian. 1997. *A Border Within: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Plurality, and Wilderness*. Kingston and Montré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2000. *Primal Scenes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nsumer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Albany: SUNY Press.

———. 2005. “Media, Expression and a New Politics: Eight Theses.”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1(1): 89–92.

———. 2008. *Identity and Jus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009. *Love the Questio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Winnipeg: Arbeiter Ring.

Badiou, Alain. 2007.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 2008. *Number and Numbers*. Trans. Robin MacKay. Cambridge: Polity.

Heidegger, Martin. 1996.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In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rans. Reginald Lil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usserl, Edmund. 1970.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Kittler, Friedrich.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Jacob. 1985.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Lectures and Essays*, eds. Robert. B. Williamson and Elliott Zuckerman. Annapolis, MD: St. John’s College Press.

Maturana, Humberto R., and Francisco J. Varela. 1980.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D. Reidel.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Poster, Mark. 2006. *Information Pleas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igital Machin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alon, Laureano. “Interview with Ian Angus.” Available at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 website at http://figureground.ca/interviews/ian-angus/.

Scheler, Max. 1980.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Manfred S. Fring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iener, Norbert. 1954.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3 负责任的机器
人工自主代理的机遇与挑战

David J. Gunkel

1990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网络空间会议上(就互联网而言是古代)，桑迪·斯通(Sandy Stone)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观点可以被认为是互联网生活的指导原则之一。“无论主体变得多么虚拟，总会有一个身体依附”(Stone, 1991: 111)。斯通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评论试图指出的是，不管网上出现了什么，计算机网络和数字信息系统的用户都应该记住，在幕后或屏幕后面总是有另一个用户——另一个本质上和我们相似的人。这个“他者”可能以不同的虚拟角色、网名、个人资料或化身的形式出现，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人。

这种互联网民间智慧，让我们受益匪浅。它帮助用户驾驭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计算机媒介的交流而成为可能的。它还帮助执法机构追捕骗子、诈骗艺术家和网络掠夺者。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在数字关系中涉及个人责任和他人权利的棘手伦理问题。但这一切都结束了。它结束了，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完全肯定“有”

总是有身体附在身上。”事实上，大多数在线活动不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与其他人类用户的交流，而是与机器的互动。目前关于网络流量的统计数据已经给了机器一点优势，51%的活动是人类以外的(Foremski, 2012)，而且这一统计数据预计将以加速的速度增长(Cisco Systems, 2012)。即使有人怀疑实现传统上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但事实是，我们的世界已经充斥着半智能的人工制品、社交机器人、自主算法和其他智能设备，它们在社会关系和交流互动中占据了他者的位置。

下面将研究这些越来越负责任的机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机器是为我们设计的，并且能够作为另一个自主代理对我们做出反应，这样做可能对某种程度的权利、责任或两者兼而有之有合法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分三步或三步进行:第一步将回顾我们通常处理技术和道德责任的方式。因此，它将针对并重新考虑技术的工具论，该理论将机器定义为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工具或发明。第二部分将考虑自主技术给这一默认设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技术、学习算法和决策系统的最新发展超越了工具理论的概念界限，并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谁或什么是道德主体。最后，通过结论的方式，第三部分将引出这一材料的后果，解释这种机器入侵对我们、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实体意味着什么。

默认设置

最初，“负责任的机器”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很荒谬。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为此辩解呢?又有谁敢说，一件技术制品可以或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自主的主体?我们和人类之间的麻烦还不够多吗?那为什么还要搅浑水呢?这种推理听起来直觉上是正确的。实际上，似乎没什么可谈的。机器，甚至是计算机、智能手机、软件算法、机器人等复杂的信息处理设备，都是技术，而技术仅仅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工具。一个机械或技术对象，没有任何意义和意义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自身不做任何事;最终重要的是它被人类用户使用的方式。

这种常识性的评价是由通常提供给技术问题的答案构成的。

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就会问有关技术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回答我们问题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另一种说:技术是一种人类活动。技术的这两种定义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设定目的并获取和利用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种人类活动。设备、工具和机器的制造和使用，被制造和使用的事物本身，以及它们所服务的需求和目的，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海德格尔，1977:4-5)。

根据海德格尔的深刻分析，任何一种技术，无论是手工业的产物还是工业化制造的产物，其假定的作用和功能都是人类使用者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海德格尔将技术的这种特殊特征称为“工具定义”，并指出它形成了对任何一种技术发明的“正确”理解(1977:5)。

正如安德鲁·芬伯格(1991:5)在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引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工具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广泛接受的技术观点。”它基于一种常识性观念，即技术是随时准备为用户服务的‘工具’。”因为一件工具“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它自己的价值内容”(芬伯格，1991:5)，所以对一件技术制品的评估不是它本身，而是基于它的设计者或使用者决定的特定用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简洁地阐述了这种情况的后果:*

> 技术装置起源于人体器官的假体辅助装置或生理系统，其功能是接收数据或调节环境。它们遵循一个原则，这就是最佳性能原则:最大限度地输出(获得的信息或修改)和最小限度地输入(在这个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因此，技术是一场与真实、公正或美丽等无关的游戏，而是与效率有关的游戏:当一项技术“行动”比另一项做得更好和/或消耗的能量更少时，它就是“好的”。(利奥塔，1984:44)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利奥塔首先肯定了技术是人类活动的工具或延伸的传统理解。考虑到这一“事实”——它被陈述得好像是无可置疑的东西——他接着对技术机器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中的适当位置提供了解释。根据他的分析，一个技术装置，无论是一个简单的开瓶器，一个机械钟，还是一台数字计算机，本身都不会参与到真理、正义或美的大问题中来。技术只是和效率有关，这是无可争议的。一个特定的技术“举动”或创新被认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被证明是实现用户指定目标的更有效的手段。

但工具理论不仅仅是哲学反思的问题;它也为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的工作提供信息，并作为概念背景，即使它通常不被认为是这样。“机器人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乔安娜布莱森(2010: 69)断言，“应该与其他AI系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与任何其他工具一样。通常，工具造成的损害是操作员的过错，从中受益是操作员的功劳. . . .我们永远不应该谈论机器做出道德决定，而是机器在我们为它们设定的限制内正确运行。”对布莱森来说，机器人、软件算法和其他复杂的AI系统与其他技术产物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是人类制造的工具，被人类用户用于特定目的，因此仅仅是“用户的延伸”(布莱森, 2010: 72)。因此，布莱森可能会同意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后者将所有技术都描述为媒体——字面上是影响或传递的手段——所有媒体都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1995)。

作为人类能力的延伸或增强，复杂的技术设备，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计算机系统，不被认为是与它们一起或通过它们执行的行为的负责任的代理人。“道德”，正如J. Storrs Hall(2001: 2)所指出的，“落在人类的肩上，如果机器改变了做事的便利性，它们并没有改变做这些事的责任。人一直是唯一的“道德行为者”。’”这一表述不仅听起来头脑冷静、合情合理，而且是计算机伦理学的标准操作假设之一。尽管自1976年Walter Maner首次提出“计算机伦理学”一词以来，“计算机伦理学”的不同定义一直在流传，但它们都有一种工具主义的观点，即赋予人类设计者和用户道德能动性。黛博拉认为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约翰逊被认为撰写了该领域的议程设置教科书，他说:“计算机伦理学原来是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组织自己和分配权利和责任的方式，等等”(约翰逊，1985:6)她认识到，计算机经常以创新和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将这些人类价值观和行为“工具化”，但底线是并且仍然是人类代理人设计和使用(或滥用)此类技术的方式。

即使面对似乎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发展，约翰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计算机系统，”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是由从事社会实践和有意义的追求的人们生产、分发和使用的。当前的计算机系统是如此，未来的计算机系统也是如此。无论未来的计算机系统如何独立、自动和互动，它们都将是人类行为、人类社会制度和人类决策(直接或间接)的产物”(约翰逊，2006:197)。以这种方式理解，计算机系统，无论它们可能变得多么自动、独立或看似智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自主、独立的)道德行为体”(约翰逊，2006:203)。它们将像所有其他技术人工制品一样，永远是人类价值、决策和行动的工具。

因此，根据工具理论，通过机器进行的任何动作最终都是某些人类代理人的责任——系统的设计者、设备的制造商或产品的最终用户。如果出现问题或有人受到机制的伤害，“某些人应该为设置程序做这样的事情而受到指责”(Goertzel, 2002: 1)。按照这一论点，可以得出结论，所有机器的行为都应归功于或归咎于人类程序员，制造商或操作员。从这个角度来看，把责任推给机器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Mikko Siponen(2004: 286)认为，把能动性归咎于机器，会让人“开始把我们的错误归咎于计算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声称‘这不是我做的——这是计算机的错误’，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软件是由人编程的，以‘以某种方式行事’，因此，人们可能偶然或有意地造成了这个错误(或者用户对这个错误的原因做出了其他贡献)。”

这一见解被一句流行的谚语编纂为“可怜的木匠怪自己的工具”。换句话说，当出现问题或在涉及技术应用的情况下出现错误时，是工具的人类设计师、制造商或操作员，而不是工具本身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应该受到指责。责备工具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工具只是人类行为的延伸，而且在伦理上是可疑的，甚至是“危险的”(Johnson and Miller, 2008: 124)，因为这是人类代理人经常试图转移或避免为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方式之一。Abbe Mowshowitz (2008: 271)认为，“通过赋予技术自主代理的属性，人类在伦理上被边缘化了。个人被免除了责任。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的暗示为拒绝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提供了借口。”因此，责备计算机(或任何其他技术)至少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它错误地把能动性归于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无生命的物体。这种逻辑错误错误地把一个被动的客体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主体。用康德的语言来说，它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其次，它允许人类使用者通过把责任推给其他东西来转移道德责任。换句话说，它允许人类用户把计算机当作替罪羊(Nissenbaum, 1996: 35)，并为自己的行为转移责任。

新常态

器乐理论不仅听起来合理，而且显然是有用的。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个技术系统日益复杂的时代，它有助于解析责任问题。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将责任置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看似直观的主体位置，即人类的决策和行动中，它抵制任何和所有通过指责或替罪羊来将责任推给一些无生命的物体的努力，这些物体仅仅是工具、发明或工具。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表述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局限性，特别是当它适用于(或不适用于)最近的技术创新时。

首先，工具理论把所有的技术，无论设计、构造或操作，都归结为一种工具——一种人类能动性的工具、假体或媒介。然而，“工具”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技术，也不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也有机器。尽管正如卡尔·马克思(1977:493)指出的那样，“力学专家”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称“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关键的区别，这种区别最终与机构的位置和分配有关。这一本质区别的迹象可以在一个简短的插话中找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由海德格尔在1954年的文章《关于技术的问题》中提出。海德格尔在提到他使用“机器”一词来描述喷气式客机时写道:“在这里，讨论黑格尔将机器定义为自主工具是合适的[selbständigen Werkzeug]”(1977:17)。海德格尔引用的是黑格尔1805 - 1807年的《耶拿讲座》(Jena Lectures)，其中“机器”被定义为一种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或独立的工具，但没有提供完整的引文。尽管海德格尔立即驳回了这一选择，认为这与他质疑技术的方式不合适，但兰登·温纳在*《自主技术》中接受并持续考虑了这一选择，*

> 自治就是自治、独立，不受外力法则的支配。在康德的形而上学中，自主性指的是自由意志的基本条件——意志遵循自己赋予自己的道德法则的能力。康德将这种观念与“他律”对立起来，“他律”是指意志受外在法则的支配，即自然的决定论法则。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提到自主技术就会引发一种令人不安的讽刺，因为预期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现在正在倒过来阅读所有的命题。说技术是自主的，就是说它是非他律的，不受外部规律支配。而适合于技术的外部规律又是什么呢?似乎是人的意志。(1977年获奖:16)

“自主技术”是指通过故意争夺和重新定位代理分配而直接违背工具论的技术装置。这样的机制并不是由人类代理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指挥和使用的他律工具，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占据了自主代理人的位置。正如马克思(1977:495)简洁地描述的那样，“因此，机器是一种机械，在启动之后，它使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与工人以前使用类似工具所做的相同的操作。”这样理解的话，机器所占据的不是工人的手工工具，而是工人自己，即使用工具的主动和自主的代理人。

其次，自主机器不仅是科幻小说的永恒宠儿(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的怪物到HAL 9000计算机等)，而且如果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正在迅速成为科学事实。根据雷·库兹韦尔的估计，引爆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几十年内，基于信息的技术将涵盖人类所有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包括模式识别能力，解决问题的技能，以及人类大脑本身的情感和道德智能”(库兹韦尔，2005)。同样，汉斯·莫拉维克预测，不仅人类的智力水平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而且最终会超越它，这将使人类实际上被淘汰，成为我们自身进化成功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人类的基本功能，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几乎都不缺人工的对应物了。这种文化发展趋同的体现将是智能机器人，一种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无论它在身体或精神细节上多么不人道。这样的机器可以在没有我们、没有创造我们的基因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文化进化，包括它们自己的构建和日益快速的自我完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DNA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在进化竞赛中输给了一种新的竞争(莫拉维克, 1988: 2)。

就连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等看似脚踏实际、头脑冷静的工程师也预测，机器智能将在短短几十年内达到与人类能力相当的水平。布鲁克斯以其“无脑”机器人挑战莫拉维克和AI权威而闻名。“我们幻想中的机器，”布鲁克斯写道，指的是科幻小说中流行的机器人(如HAL、3CPO、Lt. Commander Data等)，“有语法和技术。它们也有情感、欲望、恐惧、爱和骄傲。而我们真正的机器没有。在第三个千年的开端，似乎是这样。但一百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论点是，在短短20年内，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将被撕裂”(布鲁克斯，2002:5)。

对人类水平(或更好)的机器智能的预测，尽管助长了富有想象力和娱乐性的小说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来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解决了AI和机器人领域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可能发生在尚未完全开发、原型化或经验证明的技术或技术上。因此，严格的工具主义者往往能够将这些预测视为一厢情愿的想法或猜测。如果说AI的历史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们以前也听过这种异想天开的假设，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正如Terry Winograd(1990,167)在对进步(或缺乏进步)的诚实评估中所写的那样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学科上，“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创造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但它的缺点要平凡得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制造出哪怕是一点点常识的机器，也没有能够用普通语言就日常话题进行对话的机器。”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目前的实施和工作原型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使机构的确定和分配复杂化。例如，有一些学习系统，这些机制不仅可以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人类指导或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采取现实世界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根据这些操作的结果修改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机器现在在商品交易、交通运输、医疗保健、制造业甚至文化中相当普遍，它们似乎不仅仅是工具。例如，考虑一下过去15年来金融和商品交易市场发生了什么。有一段时间，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交易是由“坑里”的人类交易员发起和控制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金融服务机构开始开发算法来接管大部分工作(Steiner, 2010)。这些算法更快、更高效、更一致，并且由于这一切，可以通过利用市场价格的瞬间差异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利润。这些算法分析市场、做出决策和发起行动的速度比人类的理解速度更快，并且设计了学习子程序，这些子程序可以改变它们的初始编程，以便能够对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机会做出反应。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它们为金融服务业创造了难以置信的收入。因此，现在超过70%的交易都是由机器生成和控制的(Scott, 2012:这意味着我们的金融状况——不仅是我们的抵押贷款和退休储蓄，而且是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是由机器来指导和管理的，这些机器被设计成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可以从一个被称为“闪电崩盘”的重大事件中看到。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秒钟内下跌了1000多点，然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反弹。这一跌幅约占市场总价值的9%，即1万亿美元，是由几个交易算法相互作用和响应造成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发起了这个动作，没有人控制了这个事件，也没有人可以被认为对这个事件负责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它的结果。这是由算法承担和监督的事情，人类经纪人只能被动地看着事情在他们的监视器屏幕上展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谁制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斯拉文，2010)。换句话说，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甚至是什么造成了这场短暂的金融危机。

在涉及文化消费和生产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机器自主性的一个不那么邪恶的例子。目前，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地方的推荐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了我们访问和体验的文化对象。据估计，通过Netflix获得的所有内容中有75%是机器生成推荐的结果(Amatriain和Basilico, 2012)。因此，这些算法实际上接管了电影、书籍和音乐评论家的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但是，机器不仅仅涉及文化产业的发行和展示方面;在创意方面，它们也在积极参与。比如在新闻领域，算法现在写的都是原创内容。除了目前充斥网络的简单新闻聚合器之外，这些程序，比如西北大学的Stats Monkey，可以从机器可读的统计数据中自动撰写可发布的故事。像“十大网络”这样的组织目前使用这些程序来开发网络分发的内容(斯拉文，2010:218)。这些应用程序虽然明显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但最近却领导了XMLToday的执行编辑Kurt Cagle。org，挑衅地询问AI是否可能在2030年竞争并赢得普利策奖(Kerwin, 2009: 1)。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音乐领域，算法和机器人积极参与到创作过程中。例如，在古典音乐领域，有David Cope的音乐智能实验或EMI(发音为“Emmy”)，这是一个算法作曲家，能够分析现有的作品并创造新的、原创的乐谱，这些乐谱实际上与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经典作品没有什么区别(Cope 2005)。然后是Shimon，一个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马林巴爵士机器人，它不仅与人类音乐家实时即兴演奏，而且“旨在与人类创造有意义和鼓舞人心的音乐互动，从而带来新颖的音乐体验和结果”(佐治亚理工学院，2013;Hoffman and Weinberg, 2011)。

尽管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代理”和“责任”分配给这些机制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争论的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事实上，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Andreas 马蒂亚斯在总结他对自动机学习的研究时指出:

> 目前有一些正在开发或已经投入使用的机器，它们能够决定行动路线，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它们行动的规则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由机器自己改变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学习。传统上，我们要么认为机器的操作员/制造商对其操作的后果负责，要么认为“没有人”(在无法识别个人过错的情况下)。现在可以证明，有越来越多的机器行为类别，其中传统的责任归属方式与我们的正义感和社会的道德框架不兼容，因为没有人对机器的行为有足够的控制权，能够为它们承担责任。(马蒂亚斯，2004:177)

换句话说，曾经有效地将机器行为束缚在人类能动性上的技术的工具性定义，不再充分适用于那些被刻意设计为运行和表现出某种形式(无论多么初级)的独立行动或自主决策的机制。重要的是要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工具定义就此被驳倒了。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被人类用户理解和利用为工具的机制(即割草机、开瓶器、电话、数码相机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工具主义的定义在解释某些技术设备时在某些情况下是多么有用和看似正确，但它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设备的所有可能性。

最后，除了复杂的学习自动机和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对象，如在线聊天机器人和非玩家角色，即使没有证明这一点，至少也会使工具主义的假设复杂化。例如，米兰达·莫布雷(Miranda Mowbray)研究了在线社区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中道德代理的复杂性。

> 网络社区的兴起导致了一种通过在线角色进行实时、多人互动的现象。一些在线社区技术允许创建机器人(根据软件程序而不是由人类直接控制的角色)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因此，在在线社交空间中，将机器人与人类区分开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人物角色也有可能部分由软件程序控制，部分由人类直接控制. . . .这就导致了这些空间中伦理争论(更不用说警务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演员和道德代理人之间通常的一对一对应关系可能会丢失。(莫布雷，2002:2)

因此，软件机器人不仅使行动者和道德行为人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复杂化，而且使决定谁或什么对在线社区虚拟空间中的行为负责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这些机器人离实现任何看起来远不像智能甚至是基本机器学习的东西还差得远，但它们仍然可能被误认为是其他人类用户并被通过。莫布雷指出，这不是“复杂的机器人设计的特征，而是在线社交空间的低带宽通信”，在那里“更容易令人信服地模拟人类代理”(2002:2)。

尽管有了这些知识，但这些软件实现不能仅仅作为工具或工具而被一笔勾销。“这篇论文中的例子，”莫布雷总结道:“表明机器人可能会根据其程序员或其他用户的意愿对其他用户或整个社区造成伤害，但它也可能由于涉及其编程的某些组合的情况的组合而造成伤害，与之互动的人类用户的行为和精神或情绪状态，其他机器人和环境的行为，以及社区的社会经济”(2002:4)与人工智能不同，人工智能将占据至少与人类代理相当接近的位置，因此不能仅仅作为工具而被解雇，机器人只是把水搅浑了(这可能更糟)，因为它们没有确定它们是否是工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让道德代理的问题既悬而未决，又令人不安。

机器的崛起

2012年11月，通用电气推出了一个名为“移动中的机器人”(Robots on the Move)的电视广告。这段62秒的视频由乔纳森·戴顿和瓦莱丽·法里斯(2006年故事片《*阳光小美女*》的夫妻组合)制作，描绘了科幻小说中许多标志性的机器人穿越很远的距离，在一些灯火通明的飞机机库前集合，为我们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被告知的是一些新型机器的揭幕——“辉煌的机器”，正如通用电气的标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看到《*禁忌星球*》里的*机器人罗比*、《*霹雳游侠*》里的机器人汽车KITT和《*星际迷航:下一代*》里的Data中校指挥官前往这次人工智能的会议时，我们被一个不祥的画外音告知:“机器正在移动中。”

虽然这可能看起来不像典型的机器人末日(在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如*终结者*、*黑客帝国三部曲*和*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场入侵之中。机器在移动。它们无处不在，做着所有的事情。它们可能是从取代工厂车间的工人开始的，但现在它们积极地参与到知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入侵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外星世界的某种未来可能性。它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抵抗是徒劳的。随着这些越来越自主的机器在当代文化中占据了有影响力的地位——在这些地位上，它们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工具或工具，而且本身就是行动者——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重要但相当困难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机器人、算法或其他自主系统才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负责?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说“这是计算机的错”才有意义?同样，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将公民、道德和法律地位等权利扩展到这些具有社会意识和互动能力的设备上?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机器的权利”之类的建议才会不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至少有三种选择，没有一种是完全舒服或令人满意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做出回应，将这些机制仅仅视为工具或工具。Bryson在她的文章“机器人应该是奴隶”中提出了这种方法:“我的论点是，机器人应该被制造、销售，并在法律上被视为奴隶，而不是同伴同伴”(Bryson, 2010: 63)。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但这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正是因为它借鉴了技术的工具理论，并得到了它的支持——这一理论在其背后有着相当大的历史和成功，并且作为任何和所有技术考虑的假定默认立场。这个决定——即使它是默认立场，它也是一个决定——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从积极的一面看，它重申了人类例外论，绝对清楚地表明，只有人类才拥有权利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还有责任。技术无论多么复杂、智能和有影响力，现在和将来都只是人类行动的工具，仅此而已。但是，这种方法尽管有用，也有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缺点。它故意地制造了一类新的工具性仆人或奴隶(我们可以称之为“奴隶制2.0”)，并将这一决定合理化为道德上适当和合理的。换句话说，将工具理论应用于这些新型机器，虽然看似合理和有用，但可能会给我们和其他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决定像对待动物(Singer, 1975)和环境(Birch, 1993)等其他非人类实体一样，考虑对机器的权利和责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结果，既有道德上的先例，也有法律上的先例。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人工实体的世界里，这些实体被认为是法人，其权利和责任受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承认和保护——有限责任公司(French, 1979)。再一次，这一决定听起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它将道德立场扩展到这些其他社会活跃实体，并根据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988: 16)的预测，认识到未来的社会状况将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涉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决定也有巨大的成本。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关于自己、技术和道德的一切。它要求我们学会超越人类例外论、技术工具主义和所有其他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主义。实际上，它要求对谁或什么应该被视为道德主体进行彻底的重新概念化。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通过采取一种中间混合的方法来平衡这两种极端立场，将代理和责任分配到一个相互作用的人类和机器组件的网络中。这种特殊版本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约翰逊在她的文章《计算机系统:道德实体但不是道德代理人》(2006:202)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当计算机系统行为时，有一种三合一的意向性在起作用，即计算机系统设计者的意向性、系统的意向性和用户的意向性。”这个建议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它似乎注意到了数字联系中生活的紧急情况。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空中做决定或行动的;我们总是并且已经被相互作用的元素所组成的网络所纠缠，这使得意向性、代理和责任的分配变得复杂。而这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网络总是包括其他人——不仅包括其他人，还包括机构、组织，甚至是机械元素。

然而，这种结合的方法仍然要求人们决定哪些方面的代理和责任属于机器，哪些方面应归于人类。换句话说，混合方法虽然试图在严格的“工具主义”和“机器道德”之间取得平衡，但仍然需要在谁算作道德主体和什么可以被视为纯粹客体之间做出决定。事实上，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两个看似简单的词之间的决定(2005:80)。例如，约翰逊仍然站在人类例外论的一边:“还要注意，虽然人类可以在有或没有人工制品的情况下行动，但计算机系统不能在没有人类设计师和用户的情况下行动。即使它们的近似行为是独立的，计算机系统也会与人类一起行动，因为它们是由人类设计的，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人类将它们设置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为用户执行特定的任务”(约翰逊，2006:202)。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甚至不是最好的表述，其他理论家和实践者(Wallach和Allen, 2009, Anderson和Anderson, 2011, Lin等人，2011)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共享代理和责任，其中一些将规模向增加机器自主性的方向倾斜。

无论如何，我们如何决定应对这个机器问题的机遇和挑战，将对我们概念化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方式、我们决定将谁纳入道德主体的社区、以及我们从这种考虑中排除哪些人和原因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决定，这都是一个决定——从字面上讲，这是一个制定差异并产生差异的削减。因此，我们有责任决定谁甚至什么是道德主体，并在此过程中决定数字关系中道德责任的配置和适当限制。

参考文献

Amatriain, Xavier, and Justin Basilico. 2012. “Netflix Recommendations: Beyond the 5 Stars.” *The Netflix Tech Blog*.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2/04/netflix-recommendations-beyond-5-stars.html.

Anderson, Michael, and S. Leigh Anderson. 2011. *Machine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Birch, Thomas. 1993. "Moral Considerability and Universal Consider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15: 313–32.

Brooks, Rodney A. 2002. *Flesh and Machines: How Robots will Change U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Bryson, Joanna. 2010. "Robots Should Be Slaves." In *Close Engagements with Artificial Companions: Key Social, Psychological, Ethical and Design Issues*, ed. Yorick Wilks, 63–7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isco Systems. 2012. 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Global Mobile Data Traffic Forecast Update, 2011–2016. San Jose, CA: Cisco Systems. http://www. cisco. com/en/US/ solutions/ collateral/ns341/ns525/ns537/ns705/ns827/white_paper_ c11-520862.pdf.

Cope, David. 2005. *Computer Models of Musical Creativ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rrida, Jacques. 2005. *Paper Machine*.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enberg, Andrew. 1991.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emski, Tom. 2010. "Report: 51% of Website Traffic is 'Non-human' and Mostly Malicious." *ZDNet*. http://www.zdnet.com/blog/foremski/report-51-of-web-site-traffic-is-non-human-and-mostly-malicious/2201.

French, Peter. 1979. "The Corporation as a Moral Pers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6(3): 207–15.

Georgia Tech Center for Music Technology. 2013. "Shimon." http://gtcmt.gatech.edu/projects/shimon.

Goertzel, Ben. 2002. "Thoughts on AI Morality." *Dynamical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Complex Mental Processes*. http://www.goertzel.org/ dynapsyc/2002/AIMorality.htm.

Hall, J. Storrs. 2001. "Ethics for Machines." KurzweilAI.net. http://www.kurzweilai.net/ethics-for-machines.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offman, Guy, and Gil Weinberg. 2011. "Interactive Improvisation with a Robotic Marimba Player." *Autonomous Robots* 31(2–3): 133–53.

Johnson, Deborah G. 1985. *Computer Ethic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2006. "Computer Systems: Moral Entities but Not Moral Agen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8:195–204.

Johnson, Deborah G., and Keith W. Miller. 2008. "Un-Making Artificial Moral Agen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0:123–33.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Kerwin, Peter. 2009. "The Rise of Machine-Written Journalism." *Wired.co.uk*. http://www.wired.co.uk/news/archive/2009-12/16/the-rise-of-machine-written-journalism.aspx.

Kurzweil, Ray. 2005.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New York: Viking.

Lin, Patrick, Keith Abney, and George A. Bekey. 2012. *Robot Ethics: The Eth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obo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93.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x, Karl. 197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atthias, Andrew. 2004. "The Responsibility Gap: Ascrib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of Learning Automata."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6: 175–83.

McLuhan, Marshall. 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oravec, Hans. 1988. *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wbray, Miranda. 2002. "Ethics for Bo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Research, Informatics and Cybernetics. Baden-Baden, Germany. 29 July–3 August. 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2/HPL-2002-48R1.pdf

Mowshowitz, Abbe. 2008. "Technology as Excuse for Questionable Ethics." *AI and Society* 22: 271–82.

Nissenbaum, Helen. 1996. "Accountability in a Computerized Soci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 25–42.

Patterson, Scott. 2012. *Dark Pools: The Rise of the Machine Traders and the Rigging of the U.S. Stock Market*.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Singer, Peter. 1975.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iponen, Mikko. 2004. "A Pragmatic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Ethic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6: 279–90.

Slavin, Kevin. 2011. How Algorithms Shape Our World. *TED Talks*. http://www.ted.com/talks/kevin_slavin_how_algorithms_shape_our_world.html

Steiner, Christopher. 2012. *Automate This: How Algorithms Came to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Group.

Stone, A. R. 1991. "Will the Real Body Please Stand Up? Boundary Stories About Virtual Culture." In *Cyberspace: First Steps*, ed. Michael Benedikt, 81–11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Wallach, Wendell, and Colin Allen. 2009. *Moral Machines: Teaching Robots Right from Wr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ener, Norbert. 1988.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Boston, MA: Da Capo Press.

Winner, Langdon. 1977. *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nograd, Terry. 1990. "Thinking Machines: Can There Be? Are We?" In *The Found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ourcebook*, eds. Derek Partridge and Yorick Wilks, 167–89.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4 开放源代码透明度
改变同一性的制作

达里尔·坎贝尔

自由/自由开放源代码软件(FLOSS)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整个运动家族的祖先，这些运动已经作为这种模式的可能变体出现:众包，维基经济学，公民工程，社交网络，最终用户开发，集体智慧(Zhai et al.， 2012: 61; 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8)。FLOSS作为一项关注创造者和开发人员(“产品用户”，而不仅仅是用户)的前沿技术进步的运动仍然具有相关性。FLOSS的持续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支撑这场革命运动的成熟逻辑具有重要意义(Deshpande和Riehle, 2008)。为了深入了解这种逻辑，我们将该运动的一个维度与专有软件开发隔离开来进行衡量。

在FLOSS运动中，术语“开放”在多个层面上起作用。在本文中，开放性在展示自我的意义上特别参考了透明度。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创造了条件，可以捕获和存储网络活动和通信，以便不受约束地访问和重播。由此产生的这种对用户活动的透明记录所释放的潜力，可以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转型发展的积极动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构建FLOSS运动的技术所促进的透明度是否证明了最终的扰动正在诱导新的集体同一性和代理?阿兰·巴迪欧的现象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问题。[1]

对于巴迪欧来说，在集体或社区层面上运作的群体同一性是一种剥夺了任何主体性的悲情(巴迪欧，1991:24-32)。如果我们给予技术与其他组成成员同等的地位，我们可以首先定义一个群体同一性，然后概述FLOSS运动的群体同一性如何证明与已建立的商业软件开发模型的非身份。其结果是一个新的事件后群体同一性，软件开发领域内的区域置换。我们可以使用巴迪欧的思想来辅助分析，但是FLOSS引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因为巴迪欧为关系设定了有限的参数。

对群体同一性的非凡描述

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用现象学的方法描述了在一个世界中出现或存在的东西，在结构层面上，世界的同一性是通过物体的映射来计算的，组成这些物体的元素被投射到一个基本空间上。这个映射的空间，与地理疆域的路线图没有什么不同，被命名为“先验指数”。映射或函数用于测量对象之间的差异或同一性程度，包括每个对象的同一性函数(2009:358-59)。由此产生的空间将描述性现象世界转录为同一性。这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一种对无主体客体的描述，一种从给定的对世界的现象描述中物质地产生的非主观的先验。“先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这样普遍的(有多重世界，多重先验)”(301)。

在《*哲学第二宣言*》的封面内，巴迪欧与艺术家莫尼克·斯托比尼亚(Monique Stobienia)绘制了一个拓扑空间。该空间的对象和元素被映射到一个外部空间，形成一个超越的指数，唤起柏拉图式寓言的图像。在图4.1中，我们用类似于Goldblatt从拓扑理论(Goldblatt, 1984: 89)中对束的说明的预先构造重建了这个图。表示给定世界的束中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映射，称为茎，在基空间中有一个端点。这些端点作为功能映射的输出，在这个空间中记录了给定世界的对象和元素的外观关联度的估值。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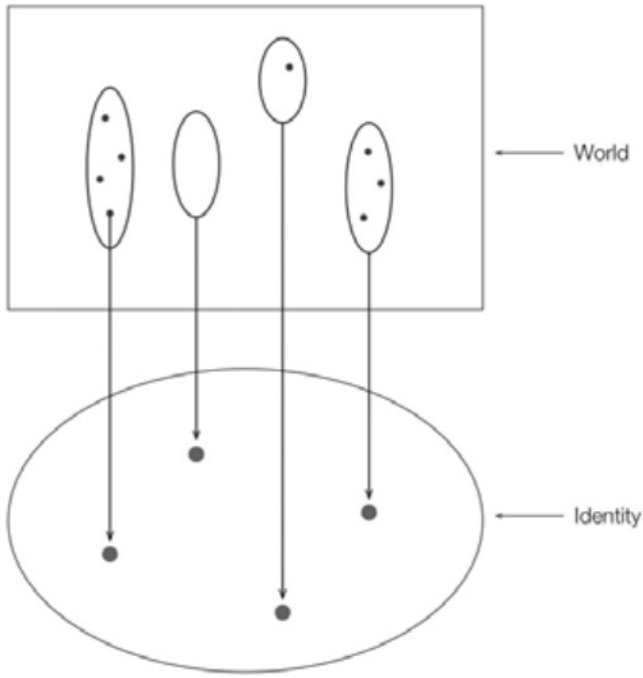


图4.1。作为世界同一性的先验指数

使用逻辑运算符，一个对象和构成它的元素的范围从最低限度地出现到最大程度地暴露。一个对象的两个元素或两个对象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些元素将根据它们的差异程度的某种排序来关联，其范围可以从零差异到最大可测量的差异。先验指数现在容纳了同一性，凝结了那个世界的差异和同一性的整个游戏的计算结果。从现有世界的信封中工作，从这个世界中捆绑在一起的东西中揭示出潜在的同一性。[2]这个高度抽象的群体或世界同一性的概念，我们是从巴迪欧现象学研究的片段中提取出来的，像巴迪欧一样，从范畴论中借用。[3]

我们分析的广义空间或世界是任何组织，商业的或基于社区的，以软件开发为目的而形成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作为对象元素存在的属性的一对映射，这些元素对这个世界的同一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方面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处理对象可以是个人、一组个人或执行功能的软件。映射我们测量的终点的特定功能考虑了该对象的输入元素，这将表明组织内的权限级别，第二个元素表明对象及其工作或参与组织的可见性。我们假设，在FLOSS之前，这个世界的普遍认可的同一性将是一个对象的有序排名，其权威增加，与该对象成员对内部工作的可见性暴露水平降低成反比。当你的权威等级上升时，组织运作的关键方面就会被隐藏得更多。这与福柯对现代社会可见性的全景监狱效应的分析是一致的。在FLOSS之前，管理人员对他们的直接下属有更多的可见性，而不是相反方向的视线。

这个同一性——子同一性的集合以及它们的关系顺序通过超验指数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把它视为超越个体同一性的同一性;我们称之为世界或社区的群体同一性。出现最多的对象和关系在唯一定义群体同一性方面走得最远。最强烈可见和自我认同程度最高的对象对世界的同一性进行了原始陈述(巴迪欧，2011:84-85)。在光谱的另一端，是那些出现最少的物体。一个物体可以出现的最小值，几乎无法区分，导致人们认为它也可能不出现。最亮的和最暗的之间的差现在可以被认为是比不出现的物体多了一度。既然出现现在等同于存在，那么从没有出现的东西的想法中，我们就得到了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的东西。一个世界的结构化群体同一性，在其中有一个不存在的人出现的可能性。

任何读过巴迪欧早期作品《*存在与事件*》的人都会意识到本体论层面讨论的缺失。鉴于巴迪欧认为存在是多重性，构成一个给定世界的对象是理解构成这个世界的多重性——集合及其元素——的途径。在他的原子模型中，关系及其映射覆盖了潜在的多重。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世界的配置，但巴迪欧并不认为关系的变化能够改变世界(巴迪欧，2011:310-12)。我们在巴迪欧的叙述中插入的是:当在全球层面上考察时，关系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类似对象的状态;或者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种关系(这是许多范畴理论家持有的一种说法)。

在这种说法中，出现世界中的事件是指一个被认为不存在的对象或构成它的某些元素，在事件发生后的世界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出现。这种存在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体的出现，而是那些虽然仍然在一个世界的构成中被构造起来，但在那个存在的世界中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忽视的东西。一个事件带来了一个新的同一性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改变了的先验指数的出现。这一事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如何解读这个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体和关系现在属于一种不同的先验秩序，一种改变了的群体同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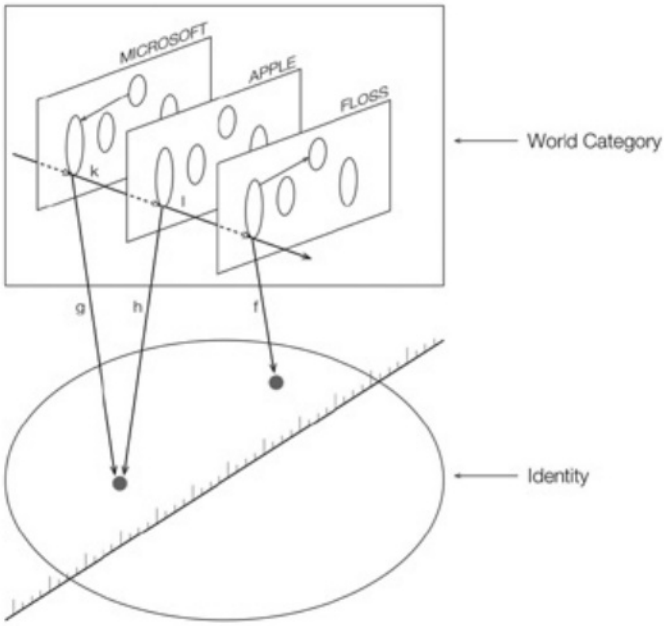


图4.2。超越指数改变的世界

图4.2是受事件影响的世界的图解。当作为整个世界范畴进行比较时，各种软件组织作为一个被包围的世界，映射到每个组织之间的超越指数应该通勤。也就是说，如果在微软和苹果组织中发现的可比较对象和类似对象之间的映射成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映射到同一性索引中的相同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通过某种同构可以到达同一性。如果从*h*开始跟随箭头*k*的箭头与箭头*g*交换，则存在结构一致性。我们对FLOSS透明度方向的分析将试图表明，当FLOSS包含在软件开发组织的全局信封中时，到类似的权限级别(箭头1)的映射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透明度(箭头*f*)。我们的重点是能见度经历由FLOSS带来的不连续中断的结构和影响，从以前的正常关系下运行的能见度。

福柯对圆形监狱效应的分析，为能见度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明确的参考点(福柯，1995:195-228)。福柯对可见性的分析提供了一种规范的解释，说明技术是如何帮助资本-议会世界秩序的主人的。“纪律的行使以一种通过观察来强制的机制为前提”(170)。在这种说法中，可见性运作的权力分配的微观物理层面，普遍地产生了权力的自动应用。在权力集中的地方，目光最大限度地穿透到各个层面。在权力被紧紧握住的地方，只有一种朦胧的凝视。在软件开发的公司模型中，我们假定遵循已建立的资本议会秩序的同一性，它支持全面的可见性，在这种可见性中，权威从注视的一边操作，即使通过技术没有人立即在场。

即使这种被认为是政治技术的权力微观物理并不完全由主权国家决定，作为一种机器，它也为当前的历史形态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支持。这种可见性并不意味着透明度向各个方向流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无法回避充分披露的不当行为所带来的堵塞。福柯在现有秩序中为我们提供了可见性的逻辑，但FLOSS认为可见性是扭曲的，它把我们从可见性的描述带到改变配置下的透明度。在此之前，这种透明是一种单向可见性，主子们从权力之塔向外凝视，“必须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看到的眼睛”(福柯，1995:171)。

进一步跟随巴迪欧，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两种不同的同一性感:静态和活跃。“所有的同一性都是创造运动(积极的)和净化运动(静态的)的辩证游戏”(巴迪欧，2008:66)。静态或惰性的同一性是自我与自我相关的形式(巴迪欧，2006a: 148 - 52)。静态同一性是一种与差异的摩擦，自我决定如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它“与众不同”(巴迪欧，2008:64)。先验索引包括对构成世界的每个对象的这种自我关联度量。在这里，“静态”并不是时间上的孤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象将构成它的变化整合到其现象性中”(巴迪欧，2009:359)。先验索引从已知的关于给定世界的所有信息出发，作为相关世界的静态同一性。

任何给定的世界都会经历修改。在积极的同一性模式中，多元的差异被接纳，“同一性的扩展”(巴迪欧，2008:65)。在任何同一性展开的过程中，一个主动的同一性是有效的。主动同一性扩展是对构成同一性束的各种茎的进一步发展的探索。这种积极的同一性扩展可以导致两个方向。在一个给定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它可以以复杂性和多样性扩张，但始终保持其同一性。在这种条件下，先验保持不变。当修改与原始状态保持同构时，先验可以完全解释change.[a]FLOSS是另一个被现有世界所包含的发展，是一种主动的同一性扩展，在现状的平稳运行下离开企业软件开发世界的静态同一性?或者，主动的同一性扩展可能会扰乱超越索引的结构，即全局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逆映射，没有包容，在非同构变换中留下新的状态。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在FLOSS中，是否存在一种同一性扩展，将不存在的事物带到表面，并暴露另一种秩序?

FLOSS显影的透明度

这一分析所描述的革命始于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的Gnu公共许可证(GPL)网站，该网站旨在颠覆版权的正常意图(限制访问)，而是保护许可证持有人避免限制访问的权利(McGowan, 2005: 363)。“free和‘libre’(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自由的意思)这两个术语被用来表示这一创新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即保护软件免受商业征用的契约。这些契约的意图是创建一个可供检查和使用的软件的“解放区”

a Following group theory, a group maintains its identity when for every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inverse mapping (Badiou, 2006a: 148–52).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Dalle, David, den Bensten, and Steinmueller, 2008: 301, n. 1)。 通过检查源代码，我们已经认识到，当属性权利阻止对源代码的访问时，之前的视线发生了变化。

FLOSS革命中与GPL不可分割的是Linus Torvalds的意图，他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了加倍的呼吁，要求帮助他的初出雏形的Linux操作系统获得GPL许可。对源代码的无限制访问，另外反映在对产品的低成本或免费访问上，保证了这一运动所遵循的“开放”的符号。“开源代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透明的协作开发过程以及支撑它的知识属性制度和许可来定义的”(Cornford, Shaikh和Ciborra, 2010: 811)。我们不是停留在GPL通过保证对软件的透明访问来组织这一运动的重要性上，而是研究FLOSS软件开发过程核心的透明度，我们认为这是FLOSS配置中最明显的结构性支持之一。

在开源的先驱时代，Eric Raymond创造了一个运动的口头禅，“只要有足够的眼球，所有的bug都是肤浅的”，他称之为“Linus定律”(Mateos-Garcia and Steinmueller, 2008: 334)。研究试图验证当源代码的可见性产生更大的受众，从而改善软件开发的测试和维护周期时，FLOSS是否优于专有软件(Crowston, Wei, Howison, and Wiggens, 2012: 24)。虽然用Linus定律确定代码可靠性的提高对于解释FLOSS的独特性质是很重要的，但它忽略了透明度的微物理的全部影响。

通过所使用的工具、使用它们的方式以及这种软件替代开发背后的实践文化，存在着技术层面的透明度。没有互联网，没有克服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就不存在自愿的、高度分布式的开发努力的可能性。当软件从专有软件开发公司购买时，人类可读的源代码形式通常不会分发;然而，在FLOSS社区中，软件代码是免费访问的，并且在GPL许可下，它将永远暴露在公共领域中。这是一种不受限制地访问最终产品的和谐关系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这种改变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贡献者的操作是透明的。

具体来说，FLOSS社区部署的技术工具在开发过程中促进了透明的环境，包括聊天、在线项目文档、维基、存储库日志、问题/bug跟踪、新闻组、邮件列表和提供源代码访问的版本控制系统(Gutwin、Penner、Schneider，2004:73 - 74,78;Cornford, Shaikh和Ciborra, 2010: 812)。在FLOSS是一个开源社区的级别上，有像SourceForge、Savannah和Freshmeat这样的存储库，它们托管着大量的项目集合，可以开放访问软件和项目工件。在这些工具中，连同GPL许可和对源代码的访问，都与透明的文化保持一致。FLOSS社区的构成与内部的信息公开实践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一种强烈的‘公开’文化，开发人员愿意回答问题，讨论他们的计划，报告他们的行动，并讨论设计细节，所有这些都在邮件列表中”(Gutwin, Penner，和Schneider, 2004: 73)。

邮件列表在讨论源代码开发的设计决策时起着关键作用。FLOSS社区比传统的公司花更多的时间讨论设计和编码策略的利弊(mateo - garcia和Steinmueller, 2008: 335-36)。“几乎*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邮件列表完成的。用我们的一位开发人员的话来说……，“如果它不在列表上发生，它就不会发生”(Gutwin, Penner, and Schneider, 2004: 76)。邮件列表存储在可搜索的档案中，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记录——一种以数字代码保存的记忆。严格地说，这些工具可以配置为限制访问，但FLOSS的实验是为社区和公众开放访问。“它们(电子邮件和聊天消息)是公开的，因此允许列表上的所有开发人员成为彼此对话的外围参与者”(72)。FLOSS最大的特点是默认和强制的位置是开放的。In-camera是这种社区实践的诅咒。一个人遇到读权限不足是不正常的。这并不是说分级访问没有边界，因为我们承认在FLOSS实践中存在层次结构，但是通信交换或项目工件的可见性在所有边界上仍然是不模糊的。

这个社区建设中的软件开发，与专有软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是使用版本控制系统(VCS)进行管理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存储在VCS中的软件包含元数据，用于跟踪提交到存储库的每个贡献。通常，这些贡献的提交日志，包括提交更改的人的名字，关于更改的简短评论，以及更改的内容，会自动发送到邮件列表。每次变更的内容都与代码删除的记录一起保存在存储库中。VCS元数据使得在任意两个时间点之间比较代码内容的差异成为可能。它也使得在这些时间点之间重构代码贡献过程中的所有步骤成为可能(Cornford, Shaikh, and Ciborra, 2010: 812)。任何不熟悉软件开发的人都可能在文字处理器的轨迹更改功能中认识到这种历史更改记录的概念，或者在维基的“恢复到以前版本”功能中得到反映。以前，可以从存储库中获取开源代码的副本;现在，社区的方法是允许对VCS进行读访问，以便记录代码开发的整个顺序历史，使其可见和可重放。福柯分析了诊所的诞生如何带来了老师和学生、医生和学生的目光，聚焦于疾病的表面效应(福柯，1994:107-111)。在这里，即使没有讯问的反馈，目光也集中在表面和表面下的效果上，以充分暴露FLOSS工作体的完整内部运作。

这种对世界的特殊开放，创造了一种来自任何地方的视角。进入FLOSS社区的进程通常是从未来的社区成员熟悉FLOSS项目的某些方面开始的。这可以从自由访问代码和测试驱动开始，阅读项目文档以理解项目意图，回顾bug跟踪以克服困难，或者搜索邮件列表讨论以了解项目的未来方向。“感兴趣的各方可能会在不太显眼的情况下潜伏并获取信息”(Gutwin, Penner和Schneider, 2004:76)。在这个阶段，即使一个人潜伏在阴影中，社区成员的合法性也开始了。同一性建构的萌芽阶段通过凝视吸收了FLOSS社区所有暴露的身体部位和器官。参与从外围或边缘开始。从这里开始，希望参与项目的贡献者可以根据与社区的亲缘关系自由选择在哪里指导他们的工作，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小组的同一性。同一性的形成与跨越同心边界的每一级访问提升相一致，向核心开发人员地位迈进，或因对项目的兴趣降低而后退。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同一性构建的第二阶段，参与者可以通过在邮件列表上提问、“报告bug、收集特性请求、提供补丁或提供使用反馈”来取得进展(Fang和Neufeld, 2009: 15)。在Debian[4]社区中，一个特别的提升是授予非维护者上传(NMU)状态，它授予更广泛的权限来上传被认可的维护者可能无法获得的关键错误修复(Coleman, 2005: 10)。“正如IRC上的一个开发人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那样，NMU揭示了‘我们的洗衣房供公众检查’”(11)。即使面对不专业参与的风险，默认设置为“开放”仍然是这种另类秩序的特征。作为管理指令的一部分，这些价值观已经被缝进了Debian社会契约的结构中:

> 3. 我们不会隐藏问题:我们将保持整个bug报告数据库始终向公众开放。人们在网上提交的报告将立即对其他人可见。(Debian, 2004)

透明度最大化时的效果是什么?凝视方向倒置的总体效果是提高群体意识(Gutwin, Penner, and Schneider, 2004)。在这样的群体意识条件下，实践共同体中的个体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研究这种透明度如何有助于个人的同一性形成，这些人从外部开始参与过程，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逐步增加参与。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我们揭示了FLOSS的群体或集体同一性，同时，透明度如何帮助个人同一性发展。

Fang和Neufeld利用合法外围参与(LPP)理论解释持续参与的研究证实了FLOSS社区的这种行为(Fang和Neufeld, 2009)。FLOSS作为一个实践社区，将参与与情境学习相结合，为个体同一性的建构提供了条件。这种模式下的同一性建构是一个身份-工作和身份-调节的过程。“身份工作指的是焦点个体因了解社区工件而感知到的同一性变化”(22)。透明度通过提供最大限度地暴露于社区工件来发挥作用，参与者可以根据这些工件构建身份工作。“身份规范是指在当地社会环境中规范的同一性变化，并在OSS社区中作为访问控制而颁布”(22)。参与者参与社区的可见性允许最大限度地暴露于代码贡献，设计建议和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导致访问或提升的故障排除支持。透明度通过允许不受限制地访问数字保存的历史记录的工具向这些社区开放，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充分背景化个人参与的能力。LPP解释了这种参与产生的身份工作，因为参与者发起并管理他们的参与。充分暴露这种参与有助于社区识别参与者的能力，并通过增加对社区工件的访问来促进他们的后续发展。凝视方向的倒转导致透明，有助于FLOSS新形成的群体同一性。可见性的新维度的建立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改变的生产方式，呼吁增强积极的个人同一性扩展手段。

独立于参与者的动机之外，当他们走出阴影并展示他们一直在观察时，他们的身份反过来也得到了认可。在合法外围参与的原始理论发展中，向社区的转变伴随着导师的出现。在FLOSS模型中，技术提供了持久的帮助。“新手被嵌入在代码、邮件列表和论坛帖子中的内容所‘引导’，这些内容是新手阅读、改编和贡献的，而不是被以导师角色服务的个人所引导，而导师角色通常被认为需要人类互动”(Mateos-Garcia和Steinmueller, 2008: 335)。那些在外围的人是合法的。合法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可以从外部可见性中收集到一些东西。向前推进，贡献者可以调整他们的参与，从项目知识库的无障碍视图中构建。越来越多的社区认同有助于LPP的身份监管概念。FLOSS是实践社区的激进化，其中独特的维度是不受限制的透明度，其中观察到的事情之一是个人同一性构建。

结语

从FLOSS运动内部确定的积极同一性扩展的例子表明，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扩展的前提是部署一个倒置的可见性方向，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这一事件驱动的变化有可能是变革性的。FLOSS所脱离的世界是在支持主导权力位置的可见性的微观物理层下运行的。在此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传统的等级语境中，权威的视野总是超越任何互惠的可见性。在FLOSS运动中，可见性的影响仍然普遍存在。然而，现在，目光被故意颠倒过来，对准了那些在社区中行使最大权威或掌握最大权力的人。可见性并没有受到限制，而是扩大到最大程度。目光心甘情愿地从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转向那些选择放弃权力等级的人，以前是unimaginable;[b]它仍然是不存在的，在可见性的逻辑中，在软件开发世界的规范功能下。

一个衍生效应是，FLOSS变得不仅仅是观看者阶级和那些受到全光凝视的人之间的直接逆转。在互联网上的存在与对开放获取的承诺相结合，意味着现在谁可以窥视并选择是否参与，没有任何限制。透明度和可访问性是之前可见性世界变化效应的乘数，尽管最初只是在一个关系中反转。当存在的元素成为一种有效的，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原则时，所有关系的重新校准必须在这个新秩序的新先验中进行。一种意想不到的集体同一性的开始可以被察觉。

借用了巴迪欧思考结构同一性和变化的方法，我们认为，与巴迪欧相反，关系的变化促成了对象之间映射的改变。从图4.2可以看出，FLOSS框架中对象之间的内部关系发生了方向的逆转。关系的变化导致需要重新校准超越索引。巴迪欧反对将转化先验和世界秩序同一性的力量归于关系(巴迪欧，2009:310-12)。我们已经表明，暴露于可见性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象的元素，但它是一种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元素电荷的变化。我们认为，凝视方向的倒置是一种关系的改变，是FLOSS项目背后的主要代理人自己选择的。我们认为，从世界的同一性层面来看，范畴论术语中的关系、箭头和态射也可以采取对象的形式。[5]

b Where accounts previously described the inversion of the panopticon as the synopticon (Stefanick 2011, 127-128), the FLOSS account may differ because the context is a mode of production where the principal agents self-select the positioning of the gaze on themselve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巴迪欧被批评没有关注构成资本-议会秩序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潜在关系(Sotiris, 2011: 37-43)。随着FLOSS产生的凝视倒置，我们有一个新的组成部分需要考虑，这个组成部分也有可能破坏资本秩序本身的定义关系之一。这种改变了的关系显示出产生一种新的同一性的一切迹象。无论哪种方式，这都是一个不存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重新配置的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出现。

从理论上讲，被关注的部分是否以公司实体的形式出现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一家商业软件开发公司能否维持这种倒置的目光，让任何权威机构都无法免于暴露其所有行为?在面临困难时，如果“把事情放在内部”意味着在视线之外，那么就不会再有“把事情放在内部”了。专有世界的透明度必须经过精心管理的筛选和编辑，才能达到FLOSS世界的透明度水平，在FLOSS世界中，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是可见的，不会从这种实践中倒退。这些将是可测试的点，在这些点上，任何被确认的回归都将取消改变同一性的声明，使实体从以前的状态返回到它们的同构开始。我们推测，这种先前存在的、改变了的关系在前政权的逻辑中起着障碍的作用。然后，我们可以支持FLOSS是一个事件中断，它引入了能够产生高质量软件的基本变化，并展示了一个具有重新排序的先验的替代世界。

技术进步为进一步推进无处不在的全景监狱效应创造了条件。FLOSS的透明性仍然是这种效果的一个实例。FLOSS以圆形监狱的逻辑运作，但颠倒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位置。单向镜已经被反向安装了。福柯分析中的盲点是，可见性可能会被反转为对当权者开放的透明度，即使他们在调用这种反转效果方面是同谋。这种对透明度方向的逆转与GPL对版权正常运作的逆转并无不同。panopticon颁布了一个效果:

> 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它的力量在于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发的，没有噪音的，它构成了一个机制，其效果是一个接一个的。因为，除了建筑和几何之外，没有任何物理工具，它直接作用于个人;它赋予了“心灵胜过心灵的力量”。(福柯，1995:206)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通过结构化可见性衍生的代理现在作用于那些领导。除了社区受益于在所有视线范围内运作的透明度之外，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也获得了充分的披露。权力被注入整个社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圆形监狱的玻璃后面，将纪律效果付诸实施一样，在透明的FLOSS架构中，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在FLOSS社区中，在管理源和通信方面部署的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当与扭转视线的意愿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影响。

随着自由/自由开源软件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两个突出的支柱——GPL和透明开放——一个改变了的集体同一性出现在了舞台上。如果FLOSS运动已被证明具有另一种同一性，那么首都议会秩序可能被认为是其病原学下降的路径。这一事件在物质上始于现存的世界秩序。从这个现存的秩序及其可见性的运作中，我们证实了事件比例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一个新的群体同一性的暴露，其结构机构的全面影响尚未确定。

如果巴迪欧的目标是解释导致这一事件的机构，那么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工作。令人失望的是，他将事件的到来更多地归因于机遇，而不是任何机构(巴迪欧，2011:110-11)。这种对事件重塑的解释的可能性使得技术决定论仍在发挥作用。然而，巴迪欧确实重新引入了主体理论作为参与斗争的代理，通过探究来充分发展这个由遭遇事件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同一性。尼采关于虚空凝视的警告被忽略了，相反，从增加暴露于虚空凝视中所获得的好处受到了欢迎。FLOSS背后的真相支持巴迪欧事件概念背后的真相。虚无，以开放的形式，潜伏在每一个情境中的参与者，可以窥视一个情境并变得显化。

笔记

巴迪欧的现象学研究包括《*世界逻辑*》(2009)、《*存在简论*》(2006a)和《*哲学第二宣言*》(2011)。

2这种论述与量子场理论家的思想相去甚远。“你可以把属性看作是独立于物体的存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拥有它们。属性可能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细节”——具体的、个体的实体。我们通常所说的事物可能只是一堆属性:颜色、形状、一致性等等……在外面的世界里，事物只不过是一束属性”(Kuhlman, 2013: 47)。

3巴迪欧在《*世界逻辑*》(2009:537-39)和《关于*存在*的*简报*》(2006:第13章)中概述了他对范畴论的形式依赖。

Debian是生产Linux发行版的真正的FLOSS社区之一。发行版包含Linux操作系统，并将其打包为附加软件和支持开发包，以增强计算环境。

5量子场理论家还提出，基本本体似乎实际上是关系。“换句话说，物体没有内在属性，只有来自它们与其他物体的关系的属性……唯一有趣的和新的立场是，一切都是纯粹在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Kuhlmann, 2013: 46)。

参考文献

Badiou, Alain. 1991. “On a Finally Objectless Subject.”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ed. Eduardo Cadava, Peter Connor, and Jean-Luc Nancy, 21–32.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Trans. Norman Madarasz. Albany: SUNY Press.

———. 2006a. *Briefings on Existence: A Short Treatise on Transitory Ontology*. Trans. Norman Madarasz. Albany: SUNY Press.

———. 2006b. *Metapolitics*. Trans. Jason Barker. London: Verso.

———. 2008. *The Meaning of Sarkozy*.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 2009.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2*. Trans.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 2011. *Second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Trans. Louise Burchi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oleman, E. Gabriella. 2005. “Three Ethical Moments in Debi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Accessed February 8, 2013. doi:10.2139/ssrn.805287.

Cornford, Tony, Maha Shaikh, and Claudio Ciborra. 2010. “Hierarchy, Laboratory and Collective: Unveiling Linux as Innovation, Machination and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11: 809–37.

Crowston, Kevin, Kangning Wei, James Howison, and Andrea Wiggins. 2012. “Free/ Libre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Not Know." *ACM Computing Surveys* 44.2.7: 1–35. Accessed March 28, 2012. doi:10.1145/2089125.2089127.

Dalle, Jean Michel, Paul A. David, Matthijs den Besten, and W. Edward Steinmueller. 2008. "Empirical Issue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 301–4. doi:10.1016/j.infoecopol.2008.09.001.

Debian. 2004. "Debian Social Contract." Ratified 26 April. http://www.debian.org/social-contract.

———. 2011. "Non-Maintainer Upload." Last modified 30 June. http://wiki.debian.org/NonMaintainerUpload.

Deshpande, Amit, and Dirk Riehle. 2008. "The Total Growth of Open Source." In *IFIP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75, pt. 1,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and Quality*, eds. Barbar Russo, Ernesto Damiani, Scott Hissam, Björn Lundell, and Giancarlo Succi, 197–209. Boston: Springer. doi:10.1007/978-0-387-09684-1_16.

Fang, Yulin, and Derrick Neufeld. 2009. "Understanding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Proj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5(4): 9–50. doi:10.2753/MIS0742-1222250401.

Foucault, Michel. 1994.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Goldblatt, Robert. 1984. *Topoi: The Categorial Analysis of Logic*.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Gutwin, Carl, Reagan Penner, and Kevin Schneider. 2004. "Group Awareness in Distribu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72–81. New York: ACM Press. doi: 10.1145/1031607.1031621.

Kuhlmann, Meinard. 2013. "What Is Real?" *Scientific American* 309(2): 40–47.

Mateos-Garcia, Juan, and W. Edward Steinmueller. 2008. "The Institutions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Examining the Debian Community."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 333–44. doi:10.1016/j.infoecopol.2008.06.001.

McGowan, David. 2005. "Legal Aspects of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In *Perspectives on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ed. Joseph Feller, Brian Fitzgerald, Scott A. Hissam, and Karim R. Lakhani, 361–91. Cambridge: MIT Press.

Sotiris, Panagiotis. 2011. "Beyond Simple Fidelity to the Event: The Limits of Alain Badiou's Ont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2): 35–59.

doi:10.1163/156920611X573789.

Stefanick, Lorna. 2011. *Controlling Knowledg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Edmonton: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Tapscott, Don, and Anthony D. Williams. 2008.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ortfolio.

Zhai, Zhi, Tracy Kijewski-Correa, Ashan Kareem, David Hachen, and Gregory Madey. 2012. "Citizen Engineering: Evolving OSS Practices to Engineering Design and Analysis." In *IFIP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378, pt. 1, *Open Source System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ed. Imed Hammouda, Björn Lundell, Tommi Mikkonen, and Walt Scacchi, 61–77. Boston: Springer-Verlag. doi:10.1007/978-3-642-33442-9_5.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二部分 数字文化

5 黑客主义者(前)职业

自我监视、参与与公共空间

卡罗琳·格廷

监控技术无处不在。我们现在几乎一直被拍照、跟踪、监控、记录和存储。通常，这种监视是如此阴险和秘密，以至于我们既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发生，也没有给它带来任何伤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会对我们所屈从的东西不寒而栗。谷歌谷歌眼镜和其他具有永远在线监控电影潜力的商业产品只会加深这种威胁。这种跟踪总是在安全和安全这两个修辞极点之间转换，无处不在，在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中都有发生。监控艺术家彼得·j·康威尔说:“无意识的痕迹……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比在现实世界中更难识别，而且几乎不可能回忆起来。

我们访问的许多网站，尤其是科技公司的网站，会秘密地审问我们的电脑:分析我们的习惯，报告我们加载的产品的序列号，并留下信息供以后利用。一个人的信息指纹现在是一个持久的和单调扩展的痕迹，分布在全球和空间的无数计算机中，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监视议程(康威尔, 2002:597)。

谁知道关于我们的什么是不可能确定的。他们可能会和谁分享，或者他们会保留多久，这些都是无法追踪的。作为潜在的

自动化的、网络化的、智能的技术的集成使得多个系统的数量不断增加，安全的修辞助长了对我们隐私权的更大侵犯(康威尔，2002:597)。一场信息隐私的革命即将到来，无处不在的智能摄像头标志着我们所知道的隐私的终结。比如，看看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在2012年发明的“情绪测量仪”(Mood Meter)。《快公司设计杂志》使用实时面部识别软件来实时显示房间或建筑物的居民的感受，将其比作我们如何捕捉聚会的氛围，或者我们如何读取房间的情绪温度。Javier Hernandez Rivera和M. Ehsan Hoque用他们的相机和软件记录微笑。然后，这些信息会被实时反馈到房间里，并在他们的脸上加上表情符号。这种互动被称为“情绪晴雨表”，目的是衡量快乐——或者至少是微笑——是否具有传染性。该软件在刺激不开心或情绪中性的人表现得更开心方面非常有效。仅仅是表现得开心就能传染。正如许多研究证明的那样，假装快乐，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微笑，确实会对你的实际情绪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种交互式安装软件寻求参与者的反馈，这与许多新的数据监控技术不同:对一个人的财务状况、通信和数字互动的系统监控不需要反馈，实际上对他们的对象来说几乎是不可见的。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活动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跟踪、何时被跟踪，也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存储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可能会与谁共享。在后斯诺登时代，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电话公司会定期将元数据交给政府部门，Prism和XKeystroke (xKs)等用户友好的数字监控系统会诱捕大量未加密的数据。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尤其是照相技术，筛选、存储和分析我们的数据，使其(至少在理论上)永久保存。病毒劫持我们的浏览器，捕获我们的搜索数据和偏好。从公开的闭路电视拍摄，到对我们在杂货店或网上购物的看似无害的跟踪，再到从我们的网上冲浪中提取数据，再到对Facebook照片的监控，我们都是丰富的数据静脉，这些数据将被网络系统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挖掘出来。这些技术让斯塔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无情警察——看起来就像外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雇佣了一支由警官和告密者组成的队伍——鼎盛时期有50多万人——其中有1000人是专门从事监视工作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以及记录谈话内容(Levin, 2002: 579)。斯塔西的方法主要采用听觉技术，早在个人电脑的数字信息爆炸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衰落，直到柏林墙倒塌后才被解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全景系统，进入了自动数据监视的领域。

ECHELON是工业化的西方对史塔西的回应。它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监视系统。它成立于1947年，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后来，丹麦、挪威、德国、土耳其等其他国家也成为“第三方”参与者。ECHELON的存在直到1988年才为公众所知，当时它实际上被移到了2级。0阶段，使用全新的大型机。它是一个标记关键字并“嗅探”平民和军方之间所有数据流量的系统，例行地标记任何所谓的字典术语、名称和短语(Levin, 2002: 579)。20世纪90年代，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络协议的缩写)向全数字全球格式的转换，使ECHELON系统能够更大程度地访问。万维网的到来推动了这一变化，而这些升级反过来又改变了拨号上网市场，使高速互联网接入成为可能。由联合国建立的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协议确保全球电信系统能够相互握手。这一系统就是为什么尽管电话公司和系统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打电话到印度或尼日利亚。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系统现在正在衰落，很快就会被宽带所取代。然而，ISDN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间谍网络提供了方便的数据监控途径。“ISDN协议不仅经过优化，可以像嗅探系统一样向ECHELON传输数据，而且还允许人们在不响铃的情况下将任何电话‘断开’，以便监听任何家庭或办公空间”(Levin, 2002: 580)。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类似梯队的系统具有天文数字般的数据存储能力;我们只能推测，现在它们能储存多少我们的个人数据。《卫报》报道，“2012年，XKeyscore在30天内收集并存储了至少410亿条记录”(Greenwald, 2013)。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其他技术也相继涌现。丹麦的频闪相机Jai于2011年发布。据说，它能够探测到视野范围内，大约一公里外的封闭窗户后面的任何对话。PK Electronick公司的激光版可以在几秒钟内拍摄数百张照片，并对所有参与者进行单独拍照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人群中(Levin, 2002: 579)。2013年发布的用于机场安检的Q-Tel分子扫描仪甚至更可怕:“这台机器可以嗅出的不仅仅是爆炸物、化学物质和生物武器”(NAC, 2012)。制造商Genia Phototonics表示,它可以“穿透衣服和许多其他有机材料，并提供光谱信息，特别是对影响安全的材料，如爆炸物和药理实体”(NAC, 2012)。换句话说，它会知道你早餐吃了什么，你有什么分子标签，比如你是否易患某种特定类型的癌症。它很小，便携，可以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在50米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操作(NAC, 2012)。它为政府提供了抽样人口的手段，记录他们的分子数据，并“远远超出窃听”(NAC, 2012)。

在消费文化中，数据也是黄金。自我监控——将自己的数据提交给亚马逊、TiVo或facebook等公司利益集团的行为——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参与姿态(Andrejevic, 2007: 15)……或者说，企业希望我们这么认为。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现在为跨国公司服务，记录我们自己的数据，因为我们似乎接受了技术老大哥作为参与式监视者的到来(Batchler, 2012: 92-99;Turner, 2012: 8)然而，一些数字媒体艺术家和团体通过使用数字媒体和自我监控作为在社交媒体控制参数之外编写自己的数字叙事的手段，将桌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相机——转向了自己。探索监控技术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媒介的无处不在的潜力，艺术家们的游击方法正在生产特定地点的作品，这些作品使用这些策略来重新获得用于审美目的的全视相机。社会活动家也利用自我监视的潜力来揭示和伪装，作为沟通和避免被发现的一种方式来建立网络和断开连接。

“占领运动”利用社交媒体、自我监控以及官方和非官方媒体的镜头来保持他们的政治在公众意识中，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远离公众的视线。为了取得成功，占领运动必须在场，但必须是匿名的、动态的。#OCCUPY拥抱着革命不会被电视转播的哲学(因为一旦它被电视转播，它就被居伊·德波称为“奇观社会”)，为网络化组织、协作创作和集体审美行为提供了新的非视觉数据策略。情境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居伊·德波(在《*社会*》一书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和拉乌尔·瓦尼吉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交易性质，赞成有意识地把每一刻都作为一种不断重塑生活、现实和社会的方式来生活。他们认为，通过改变一个人的自我，一个人就改变了他与权力结构和世界的关系。情境主义者使用修辞策略(包括dsamrive, dsamtourment和心理地理探索)作为对#OCCUPY有很大影响的反美学，呼吁地方行为取代中介景观和高雅艺术，以创造“一种新的创作类型”(情境主义者国际文本)。#OCCUPY运动当然是这类运动的一种。自我监视以挑衅的方式重新思考创造性实践的美学方法。

参与公共空间有可能恰恰通过使用地点政治来反对官方话语，来挑战已安装的公共摄像头和正式的控制系统。将集体行动和公共叙事回归城镇广场，这些团体和艺术家正在为数字文化一代重塑叙事。集体、多线性叙事在全球公共空间中的自发兴起，使广场成为参与式艺术的新中心，这些行动是未来技术可能带我们走向何方的路线图。

对公共技术的游击式使用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所说的社会雕塑的一种形式。博伊斯将社会雕塑定义为对社区或环境的文化反思和积极干预，目的是创造一个意想不到的互动和情境参与的空间。社会雕塑通过设计，通过表演、环保主义和政治参与来探索美学、社会过程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网络的早期，当网络计算机技术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还相当原始的时候，墨西哥裔美国行为艺术家Guillermo Gomez-Peña和合作者Roberto Sifuentes发起了一个名为“Naftaztec:公元2000年的海盗网络电视”的高科技活动。作为拉丁美洲人，他和Sifuentes被自由主义的言论所刺痛，这种言论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政治中立的平等准入空间，一个据称没有种族、性别和阶级障碍的空间。对于Gomez-Peña来说，这是一种逃避，它否认了吞没并继续吞没美国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危机(Gomez-Peña, 2000: 295-308)。

两人积极玩弄墨西哥人是技术文盲和非法移民的刻板印象，并在1994年劫持了有线电视。这些批判美国文化的海盗，中断了350万美国人的晚间新闻广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家庭。这不是黑客。这是在多语种电视上进行的实验性卫星广播;他们购买了播出时间，并将这种所谓的海盗干预传播给数百个社区有线电视网点。他们总共播放了90分钟。他们在宣传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的看法。广播的一部分包括奇卡诺虚拟现实机器，它可以录制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以及虚拟现实大手帕，这将使美国人“亲身体验种族主义的心理感受”(Gomez-Peña, 2000: 39)。他们将互联网重新命名为奇卡诺互联网，并允许冲浪者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书面和视觉评论。这段视频在1994年的圣安东尼奥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实验视频奖。

另一个抓住法律的眼睛，将这些官方摄像机重新用于自己目的的表演团体是监控摄影机玩家。从1996年到2006年，“玩家”开始重塑他们所谓的“社会控制工具”，这些工具既可以在消费文化中奴役他们，也可以防止他们入店行窃，从雇主那里偷窃，破坏或破坏属于他人的商品或属性。通过保护隐私的行为，“监控摄影机玩家”明确了镜头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他们开始利用这些摄像头，声称这些摄像头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率，他们说，他们让保安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作为一种节目编排，剧团把监控摄像头当作他们自己的节目的观众，这些节目可以同时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点(比如周二8:30)进行，作为一种常规的游击节目编排，其中的表演一开始是一次性制作戏剧，比如默剧版的《*等待戈多*》的*演出*。他们使用的一些摄像机是现场监控的，另一些则录制在磁带上，所以制作是专门为场地量身定制的。他们说，

> 作为游击队员，我们必须保证不享受镜头。监视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绝不能把大量旨在限制、监视和控制我们欲望的设备所提供的颠覆性可能性，误认为是这种景象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整洁的新设备。我们不需要这些垃圾来玩得开心，就像我们不需要电视一样，但如果敌人要用警惕的眼睛把我们的风景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应该看着那些眼睛，让它们知道我们认为它们有多愚蠢。游击节目是一种动作的生产，而不是一种产品的消费。可能是监控摄像头可以给我们一个街头焦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或者商场，或者咖啡馆，或者浴室)在那里利用行为艺术或“偶然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可挽救的方面，而不需要精英主义和对媒体固有的依赖。(监控摄影机玩家)

快进到占领运动的时代，娱乐、娱乐和道德教育的概念“执法社区的监视成员”似乎不再那么有趣了(监控摄像头播放器)。一个名为应用自主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的组织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可以重新利用监控摄像头播放器收集的数据。剧团制作了一张地图，上面有纽约所有公共场所的CCTV位置。该研究所利用这些数据创建了一条“最少监控路径”(应用自主性研究所):一款名为iSee的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帮助个人规划一条避免被监控的路线。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件以一种可怕的戏剧性方式展示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是多么容易被敌对的警察和军队在必要时重新利用。在纽约遭受9 / 11袭击之后，该研究所希望确保抗议者的安全。通过点击iSee“地图”，用户可以指出原点和目的地(应用自主性研究所)，然后可以安全地在不受监控的城市空间中导航。

当互动媒体艺术家哈桑·m·伊拉希的名字被中情局错误地列入监视名单时，他把镜头对准自己，在《*追踪瞬变:奥威尔计划*》中练习保护性的自我监视。这名孟加拉裔美国艺术家被误认为同一性导致了长达6个月的审讯和调查。最终是伊拉希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使他免于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因为他可以调出自己的日历，证明他不可能做他被指控的事情。为了应对这几个月的创伤，伊拉希给自己装上了GPS，不停地记录自己的行动、饮食和活动，从而避免了任何进一步的事故。这意味着他总是被联邦调查局或其他任何人实时追踪。他的网站记录了所有这些活动，通常每天超过100张照片。其他人也在实践这种艺术，因为生活拍摄和实时博客在21世纪的普鲁斯特主义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根据数字媒体理论家克里斯蒂安·保罗的说法，在我们这个媒介化的时代，流媒体体验是最接近现场体验的东西(保罗，2008:18)。中介时代的现场体验是难以捉摸的。捕捉或流媒体正在成为默认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模拟生活体验的模式。捕捉可以很简单，像诺亚卡利纳每天(见卡利纳)。这是一个为期六年的实验，艺术家每天给自己拍照，然后将这些图像压缩成延时电影，并发布在YouTube上。或者拍摄过程可能会很复杂。例如，马努·卢克施的55分钟故事片《*无面者*》(卢克施，2007年)，由蒂尔达·斯温顿主演，是用CCTV摄像机拍摄了好几个月才完成的。

卢克施利用1998年英国数据保护法案和其他隐私立法，为自己的目的收回数据记录和监控录像，从而获得了她公开查看的数据和图像。在一些国家，比如丹麦和德国，监控录像的使用受到严格控制。然而，在英国，它们的部署非常密集。在《CCTV电影人宣言》中，卢克施宣布了一套规则，建立了有效的程序，并指出了在英国使用现有CCTV(监视)系统作为媒介的电影人的进一步问题。事实上，它的使用是被禁止的。宣言，根据卢克施，可以很容易地适应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卢克施, 2006)。

卢克施称她的作品为“ambientTV”，主张不要在场景中引入任何新的摄像机或灯光。数据主体(或主角)必须出现在所有关键场景中，记录的活动被视为敏感或个人数据。此外，所有第三方必须呈现为无法识别;由于监控摄像头不录制声音，电影人必须自行确定声音的参数;最后，由于镜头受到如此复杂的版权和隐私问题，任何电影制作人都应该在试图展示他们完成的作品之前聘请律师(卢克施, 2006)。

《*无面者*》探索了一个历法改革的未来时代，在这个时代，过去和未来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被消除了。我们可以把卢克施的方法称为“后电影监视”——一种全新的流派。按照她自己的“宣言”，卢克施使用这些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自己拍摄的照片来构建一个超现实的、精心设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的脸都被抹去了(这是隐私法的要求)。卢克施将游击队电影制作人假设为病毒代理人和“共生体”。她说，在电影学校和TV电视台已经找不到最多产的纪录片制作人了。在一些欧美城市，每个街角都有闭路TV(CCTV)监控摄像头。这种摄像机通常由地方政府、警察、私人保安公司、大公司和小企业以及个人操作，可能是自动的，也可能是由远程控制室控制的(缩放和平移)。电影人们，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她说，尤其是各种风格的纪录片制作人，应该反思这种持续的关注。既然许多私人和公共的城市空间已经被从多个角度覆盖了，为什么还要引入额外的摄像机呢?(卢克施，2006)。在劫持这些技术的行为中，灯光和相机不仅变得不必要，而且被禁止。一旦“老大哥”的眼睛被用于美学效果，黑客攻击就完成了。

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技术开始发挥艺术的功能，使我们意识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后果”(麦克卢汉，1964:14)。这些艺术上的努力颠倒了内化的心理和社会事件，使它们作为艺术可见。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成为我们和一个一切都被中介的世界之间的界面和边界对象，这些监视艺术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主要是由硬件驱动的。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技术的兴起，自我监控、参与、公共空间都发生了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只要给电话公司打个电话，警察部门就可以“克隆”手机，甚至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下载短信(Lichtblau, 2012)。这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无论如何，电话公司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而遵守了这一规定。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许多抗议者和活动人士与“精通媒体的视频记者”合作，设计了在警察的全面监视下组织的新方法，而后者反过来又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监控通信。这些记者被称为“vee-jays”，他们实施各种“传播策略”:“照片和视频在多个平台上共享，以及额外的文本，上下文或文本，并且通常具有元数据，如时间，日期和位置戳”(乌布利希，2012)。内容通过卫星连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网站和直播门户网站(包括Bambuser)实时或定期上传。当互联网或手机接入被关闭或中断时，“视频被收集并通过灵活的替代方案分发，比如跑步者——[被称为]老式的'运动鞋网'”(乌布利希，2012)。

在2011年1月伦敦学生抗议期间，警察开始围捕走上街头的学生。警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水壶包围”的策略，将抗议者困在前线和警戒线之间。随后，抗议者要么被警察赶出该地区，要么被困在围栏内。在许多情况下，抗议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得食物、水和厕所设施。为此，一群学生和志愿者联合起来创建了Sukey。这是一个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该应用程序旨在通知抗议者警方的行动，为用户提供方向，以避免被困在警戒线内。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平台在手机之间实时传输。消息来源是监控新闻的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抗议者和观察员。“由于许多人依赖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因此确定消息来源至关重要”(malev<e:1>， 2012: 15)。

Sukey使用#Sukey标签在Facebook、Twitter、Tumblr和其他社交网络上搜索消息。然后使用其中一名程序员所说的“一种算法声誉管理”对结果进行过滤。事实证明，Sukey的使用对于“避免壶化”非常有用。但在信任至关重要的背景下，它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依赖]外部平台来建立其来源的可靠性和可信赖性的问题”(malev<e:1>, 2012, 15-16)。

Sukey利用社交网络的力量“聚合和传播信息，绘制关系，并利用这种力量向抗议者分发战略信息。”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为社交网络的数据饥渴机器提供了有关抗议者及其朋友圈的敏感信息”(malev<e:1>， 2012: 15-16)。换句话说，使用Sukey既可以拯救你，也可以让你陷入困境。它的设计目的是在真实空间中工作，但它明显表明，警察开始使用数字警戒线是多么容易(malev<e:1>， 2012: 16)。同样清楚的是，他们使用数字警戒线只是时间问题。在NSA和其他法规下，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并不是抗议者的朋友，他们有权“不仅‘有助于防止’，而且‘终止’侵权行为”(malev<e:1>, 2012: 17)。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繁荣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独立提供商，并在Web 2.0时代“让资金充足的大型企业重新坐上了驾驶座”(malev<e:1>， 2012: 17-18)。当我们在做社交媒体的工作时，尼古拉斯·马勒弗莱说，“2.0的使命是摧毁互联网的P2P方面:让你、你的电脑和你的互联网连接依赖于连接到一个控制你沟通能力的集中服务”(马勒弗莱，2012:18)。

由于社交媒体用户不可避免地使用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大型提供商，这些提供商达成交易，越来越远离网络中立性。“因此，为监控而建立的基础设施可以被回收利用，以开发带宽歧视的商业模式”(malev<e:1>， 2012: 19)。“占领运动”和其他抗议者创造了一些替代方案，使你能够再次控制、监控，甚至改变你的社交数据和位置。开放街道地图项目(Open Street Map project, OSM)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它处理更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智能地使用用户数据，并演示社区如何在独特的框架内设计、维护和解释自己的数据。OSM本质上是“地图的维基百科”，但它在某些特定方面重塑了Web 2.0:它对数据、元数据和记录行为开放:而不仅仅是使用数据，用户被鼓励批判性地思考它(malev, 2012: 21)。你也可以决定如何处理你自己的日志，一旦你使用了它们——存档、编辑还是删除它们?-因为它给了你修改数据的能力。用户通过OSM将他们的参与正式化，以保护他们参与背后的基本动机，并确保没有不请自来的眼球在监视他们的行动。

手机供应商是传播链上的另一个薄弱环节，这使得DIY手机在领导抗议冲锋时显得不切实际;占领。这里有一个更好的系统。一个开源的局域网或个人互联网，它建立了“一个点对点的虚拟空间网络(独立于互联网)，用于公开的政治讨论。任何在占领范围内的人。在这里，WiFi路由器和可上网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可以加入网络“占领”。在这里，加载本地托管网站http://occupy.here/，并使用留言板与附近的其他用户连接。”另一款名为“数根寻回器”的应用程序“允许新闻、信息、软件更新、文件、地图等在没有任何支持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传播”;同样的，Geolocha也为移动中的抗议者提供了基于地理位置的聊天室，因为“公共”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谈判的空间和群体。

摄像头和支持摄像头的技术一直是“占领运动”抵抗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来源。警察记录器屏蔽你的位置和感应阻止访问你的位置。警察记录器是“一种支持网络的权威记录器”，当您遇到执法者时，它允许秘密录音。然后，它可以方便地匿名上传到自己的OpenWatch.net服务器上。Vibe是#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抗议活动(Nouveau 2011)中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创新。一款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软件，它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和基于位置的特点。Vibe应用程序由哈泽姆·赛义德(Hazem Sayed)创建，它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为信息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时间链。时间范围可以短至15分钟，也可以长至30天。同样，传输的距离可以小到160英尺，也可以像整个世界一样广阔。作为一种抗议工具，它实现了移动性。它培养了一种流动的能力，可以隐藏、躲避和规避警方对社交媒体网络的实时监控。它也是地方性的，最好是针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需求。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分散的社交网络被称为TheGlobalSquare (Roos, 2011)。作为一种反对审查和压迫的工具，它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工作，即信息应该是免费的。重新利用点对点方法，创建者，FNF和其他人“正在重新审视旧的技术，例如基于分组无线电的HAM或CB无线电系统作为独立系统或作为新兴替代互联网中的节点”(夜间匿名)。自由网络基金会(FNF)、Project Mesh Net和Open-mesh.org使用Freedom Towers和未注册的路由器来创建他们自己的独立网络。这三个组织正在“开发一种‘网状’的互联网方法，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将是免费的，无处不在的和匿名的”(夜间匿名)，并且点对点网络将消除所有中介。根据纪录片*《解放网络:黑客夺回互联网》的导演布莱恩·安德森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不受审查的互联网——一个不受政府或企业操纵和监管的网络。总之，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开始联合起来，真正反对外部控制。由于它们不是秘密运作的，要击败官方的反对将是一个挑战。FNF推测:

> 如果这样的“网状物”真的存在，我们可以期待世界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然而，在没有“那里”可以监管的地方，在交易是匿名的、基本上无法追踪的地方，目前尚不清楚政府将采取哪些步骤来维护对这样一个系统的控制，但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他们去尝试。(夜间匿名)

正如*《x战警》中泽维尔教授所说*，“匿名是第一道防线”(g<s:1> rses, 2012: 54)。为了继续使抗议和改革成为可能，至关重要的是，抗议者需要能够以匿名的主体和匿名的数据进行抗议和改革。“永远是一种手段，本身绝不是目的”(55)，Seda g<e:1> rses说，匿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但事实上，在人民的运动受到严密控制的压迫政权下，匿名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匿名作为一种策略，使我们能够剥离信息中任何可用或可追踪的信息。这在数据越来越难以获取的美国和加拿大尤为重要。根据欧洲数据保护指令，匿名数据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挖掘它，使用它，甚至重新利用它。在北美，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连匿名数据都无法访问，社交媒体的老大哥无情地将我们自己的数据编目。相反，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我们很可能会想象一个像卡伦·曼塞尔和赫尔曼·Maat的交互式可穿戴作品Tele_Trust那样的世界。Maat说，所有的沟通都是“基于信任”(曼塞尔和Maat, 2009)。我们可以从这种类似面纱的可穿戴技术中读出宗教意义，但它也可能是一种高科技套装，将用户插入一种传输模式。接近创造了一个身体网络，并使交流成为可能，因为触摸会触发关于信任问题的对话片段。接收到的传输是围绕安全问题和公共/私人空间二分法对人们的采访摘录。这些信息被传输给接触佩戴者的互动者，以插入该人的个人网络。卡伦·曼塞尔问道:“要想信任一个人，就必须触摸他吗?(曼塞尔和Maat，2009)

最后，我会问:公共空间的未来在哪里?如果我们对个人数据的权利，我们集会的权利，我们分子自主性的权利正在从我们身上被偷走，那么我们是否被迫采用奥威尔式的双重思维来生存?或者是否有可能像占领运动和各种媒体艺术家所主张的那样，为我们保留一个自主性的空间?数据监控不仅有可能吸走我们的数据，还可能预测我们的需求和欲望。事实上，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由微软(Microsoft)和波音公司(Boeing)资助)就是这么说的——证实了Facebook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你就可以开始预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好恶。关于他们的报告，一些标题是这样写的:

- 你的Facebook点赞可以预测你的性取向，准确率为88%。
- 喜欢哈雷戴维森……是低智商的预测，而喜欢卷薯片是高智商的预测。
- 如果你喜欢Hello Kitty，你可能更有创造力，但不是很认真。(Marsden, 2013)

这份名为《从人类行为的数字记录中可以预测个人特征和属性》的报告催生了一个名为youarewhatyoulike.com的免费在线性格测试，显然，它如此准确地预测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立即应用于有产品要卖的公司。然而，如果把这当成这项研究的全部真相来读，就会错过最有趣的部分。正如保罗·马斯登(Paul Marsden)在对报告的评估中所说，Facebook在预测二进制问题方面确实有一种狡猾的准确性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或者是二分结构。他没有说的是，Facebook正在模拟二分法。正是这些简单的是/否选择之外的观点、行动、复杂性和矛盾，没有找到进入研究的途径。

同样，荷兰艺术家吉尔·马吉德(Jill Magid)将CCTV作为表演媒介，她说:

> 监控摄像头创造了舞台，或者说是固定的、被监控的平台。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有可能采取行动，也有可能将这一行动保存为被记录的事件。通过观察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人，静止位置的相机似乎更喜欢它的背景，而不是经过它的行人。它似乎在说:城市是永久的，平民是短暂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项技术为我提供了一种放置自己的方式，通过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媒介，在城市中变得可见(并且可能永久)。因此，这是一个我选择去玩的创造性领域。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作为维护安全，或者相反，侵犯隐私)，我将这些立场视为技术本身的品质——工具的标准，以我的方式，只是让它的使用更有负担。(Lovink, 2004)

所以，也许，重要的最终不是作为主体的身体，而是作为主体的场地，监视的目光落在那里。因为，正如许多艺术家和程序员所证明的那样，正是这些限制本身推动了创新。也许反抗压迫的斗争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继续为匿名权而斗争，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并重新获得我们已经失去的许多隐私权。

参考文献

Andrejevic, Mark. 2007.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Batchler, Birgit. 2012. “A Cosy Place for Invisible Friends.” In *Sniff, Scrape, Crawl . . . {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our Shadowy Data-double}*, ed. René e Turner, 92–99.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Campbell, Duncan. 2000. “Inside ECHELON.” *Telepolis*. 25 July. Accessed March 20, 2013. http://www.heise.de/tp/artikel/6/6929/1.html

Cornwell, Peter J. 2002. “Surveillance of Assailants and Face[value].” In *CTRL [SPACE]: Rhetorics of Surveillance from Bentham to Big Brother*, ed. Thomas Y.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Levin, Ursula Frohne, and Peter Weibel, 594–99. Karlsruhe, Germany: 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Elahi, Hasan M. *Tracking Transience: V2.0*.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elahi.umd.edu/track/

Free Network Foundation (FNF). Accessed March 28, 2013. http://thefnf.org/

"Free the Network: Hackers Take Back the Web." 2012. YouTube video. Dir. Brian Anderson. Accessed March 20,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Fx93WJPCCGs#at=91.

Gomez-Pena, Guillermo. 2000. "The Virtual Barrio @ The Other Frontier (or the Chicano Interneta)." In *Electronic Media and Technoculture*, ed. John Thornton Caldwell, 295–30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reenwald, Glenn. 2013. "XKeyscore: NSA Tool Collects 'Nearly Everything a User Does on the Internet.'" *The Guardian Online*, 31 July. http://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3/jul/31/nsa-top-secret-program-online-data.

Gürses, Seda. 2012. "The Spectre of Anonymity." In *Sniff, Scrape, Crawl . . . (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our Shadowy Data-double)*, ed. Renée Turner, 52–61.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 2002. "iSee." In *CTRL [SPACE]: Rhetorics of Surveillance from Bentham to Big Brother*, eds. Thomas Y. Levin, Ursula Frohne, and Peter Weibel, 606–7. Karlsruhe, Germany: 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Kalina, Noah. "Noah Kalina Everyday." YouTube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B26asyGKDo.

Landry, Lauren. 2012. "Is MIT's Media Lab Creating the World's Happiness Barometer?" *BostInno*, 29 May. Accessed March 17, 2013. http://bostinno. com/all-series/is-mits-media-lab-creating-the-worlds-happiness-barometer-video/

Levin, Thomas Y. 2002. "Rhetoric of the Temporal Index: Surveillant Narration and the Cinema of 'Real Time.'" In *CTRL [SPACE]: Rhetorics of Surveillance from Bentham to Big Brother*, ed. Thomas Y. Levin, Ursula Frohne, and Peter Weibel, 578–93. Karlsruhe, Germany: 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Lichtblau, Eric. 2012. "Police are Using Phone Tracking as a Routine Tool," *New York Times Online*, 31 March. Accessed March 19, 2013. http://www. nytimes. com/2012/04/01/us/police-tracking-of-cellphones-raises-privacy-fears. html?r=0&_r=0

Lovink, Geert. 2004. "Surveillance, Performance, Self-Surveillance: Interview with Jill Magid." Accessed March 27, 2013. http://www.evidencelocker.net/img/artistTalk.pdf.

Luksch, Manu. 2007. *Faceless*. London and Austria: Amour Fou and Ambi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Luksch, Manu. 2006. "A Manifesto for CCTV Filmmakers," Node-London Reader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www.ambienttv.net/content/?q=dpamanifesto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Malevé, Nicolas. 2012. "My Meta Is Your Data." In Snif, Scrape, Crawl: (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our Shadowy Data-double), ed. Renée Turner, 1o-23.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Mancel, Karen, and Hermen Maat. 2009. "Tele_Trust: Art Installation Documentation." Accessed June 19, 2012. http://teletrust.projects.vz.nl/index.php

Marsden, Paul. 2013. "Your Facebook Likes Predict if you're Gay (But Can They Predict What You'll Buy?) [Download]." Social Commerce Today, I2 March. Accessed March 12, 2013. http://socialcommercetoday.com/facebook-likespredict-if-youre-gay-but-can-they-predict-what-youll-buy-download/

NAC. 2012. "Hidden Government Scanners Will Instantly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from 164 Feet Away." Gizmodo, ro July. Accessed July 1o, 2012. http://gizmodo. com/592398o/the-secret-government-laser-that-instantly-knows everything-about-you

Nocturnals-Anonymous. "The Dark Net Rises: A Private, Secure and Anonymous Meshnet is Emerging." Tumblr.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nocturnals-anonymous. tumblr. com/post/5394717863/the-dark-net-rises-a-private-secure and-anonymous

Nouveau, Trent. 201I. "How to OccupyWallStreet Anonymously with Vibe. TGDaily, 3 October.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www.tgdaily.com/mobility-features/58830-how-to-occupywallstreet-anonymously-with-vibe occupy-here: http://occupyhere.org/

Paul, Christiane. 2008. Digital Art. z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avlus, John. 2012. "Computers Scan a Crowd, Gauging its Mood." Fastcodesign. com, 29 June. Accessed March 18, 2013. http://www.fastcodesign.com/1670113/computers-scan-a-crowd-gauging-its-mood

Project Mesh Net. Accessed March 29, 2013. https://projectmeshnet.org/index.php

Roos, Jerome. 201I. "TheGlobalSquare: An Online Platform for our Movement." RoarMag.org, 2 November. Accessed June 20, 2012. http://roarmag.org/20//the-global-square-an-online-platform-for-our-movement/

Roush, Paula. 2o1o. "From Webcamming to Social Life-logging: Intimate Performance in Surveillant-Sousveillant Space." In Conspiracy Dwellings: Surveillance in Contemporary Art, eds. Pam Skelton and Outi Remes, I13-28. Cambridge, MA: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Schenker, Dylan. 2013. "Google Glass and the Birth of Surveillance Cinema." The Creators Project, s March. Accessed March 5, 20r3. http://www. thecreatorsproject. com/blog/google-glass-and-the-birth-of-surveillance-cinema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Détournement as Negation and Prelude." Trans. Ken Knabb.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3 (December 1959). Accessed August 13, 2014. http://www.cddc.vt.edu/sionline/si/detournement.html.

Surveillance Camera Players. 1995. "Guerilla Programming of Surveillance Camera Equipment." Accessed June 22, 2012. http://www. notbored. org/gpvse.html

-. 2006. We Know You Are Watching: Surveillance Camera Players. New York: Factory School.

The Free Network Foundation: http://thefnf.org

Turner, Renée. 2012. "Sniff, Scrape, Crawl.... O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our Shadowy Data-double)." In Sniff, Scrape, Crawl... (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our Shadowy Data-double), ed. Renée Turner, 4-9. Rotterdam: Piet Zwart Institute.

Ulbricht, Melissa. 2012. "Activist Media from the Frontlines: Mobile, Strategic, and Much More than just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Mobile Media Toolkit. 02 May. Accessed March 12, 2013. http://melissaulbricht.com/o2/o/oz/activst-media-from-the-frontlines-mobile-strategican much-more-than-just-being-in-the-right-place-at-the-right-time/.

6 主体的机构和解释，双重自我和间隔自我

马克·a·麦卡琴

L' me est un instrument sur ququel on peut faire entendre indicassine des airs nouveaux, mais ququit de redit de lui-même and chante toujours en sourdinine and sans confusion and me 'il a joucassine autrefois。C'est un cahien des feuilles phonographiques。

Joseph Delboeuf, Le sommeil et les rêves (188)

对于那些仍然声称电信是最新的殖民形式的人，我想建议殖民者永远是殖民技术的第一批受害者，通常是因为他们仍然坚决不知道他们用来殖民的技术的心理影响。

德里克·德·克克霍夫，《文化的皮肤》(The Skin of Culture, 1995)

本文发展了主体作为remediated[a]主体性模式的理念。它将讨论主体的一些理论和制度背景，然后将考虑主体的数字表现形式，参考流行的数字应用程序如何询问用户(见阿尔都塞1971)-即，它们如何对应用程序和用户自我表现的可能性施加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和限制。这项工作是在后殖民背景下思考数字同一性和代理的一种尝试，作为在后现代性中更普遍的中介同一性方法的补充。因此，这项工作建立了我更大的研究项目，将后殖民主义批判应用于流行文化，特别是加拿大多数白人定居者社会的流行文化。

首先，我想指出本章早期版本贡献的这个集合的关键词的共鸣:“*关系”这个词。《牛津英语词典》*将“nexus”定义为被连接或链接的状态，相关的含义有网络、节点和链接。一个有着如此密切相关但影响广泛的结构和关系意义的词在流行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一些在这里值得注意。Nexus是思科数据系统系列的品牌名称;加拿大-美国的品牌名称。过境计划;以及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谷歌系列移动设备的品牌名称。Nexus作为品牌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科幻笑话:在经典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Nexus 6”是一系列企业制造的机器人的品牌名称，其中几个机器人是情节中的对手。“Nexus 6”。[…]起始日期2016年。战斗模型。最佳自给自足。[…]外殖民地军事俱乐部的标配。它们被设计成除了情感之外，可以模仿人类的方方面面”(1982)。这些机器人或复制人通过移情的生物特征指标与人类区分开来，只有通过专门的测试才能检测到——它们同时是*doppelgängers*和拟像(simulacra)，表面上与人类相同，因为它们无法建立联系。

这些内涵——科幻小说中的冒名顶替者、移动技术和越境;双重、设备和管辖权——在海关官员和旅行者相遇的特定地点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这里的“冒名顶替者”或*doppelgänger*维度涉及到大众的感觉

a “Remediation” is Bolter and Grusin’s (1999) term for the double movement whereby new and old media each strive for both self-effacing immediacy and “hypermediation,” a self-reflexive signalling of mediation.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加拿大人与美国人几乎没有区别，这种感觉既普遍又有助于颠覆性地表达民族差异(见McCutcheon, 2009a)。在2006年一起涉及美国海关搜查旅客数码设备的案件中，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迪恩·普雷格森(Dean Pregeson)发布了一项裁决，将电子存储设备(用麦克卢汉式的术语)描述为“我们自己记忆的延伸……能够存储我们的思想”(2006年)。这一决定为“边境搜查例外”(border search exception)提供了动力，这是2008年授予美国海关官员权力的扩大，它赋予海关官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任何进入美国的旅客的电子设备进行搜查的全权授权。这是一项具有反乌托邦含义的现实政策，边境搜查例外刚刚被推翻;2013年3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这一例外，写道“一个人的数字生活不应该仅仅因为跨越边境而被劫持”(引自克拉韦茨，2013)。一位法律专家评论员指出，这项裁决的核心是“你可以把你的一生都放在笔记本电脑里”(Price引用于克拉韦茨，2013年)。

扩展思维，存储记忆，将生命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中:像这样的评论让人联想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下主体性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同一性的重新分配，一种假肢的导管，一种介于表演和录音之间的电子人主体性，一种将在这里以主题的名义探索的经验。在之前的文章(2009a、2011、2012、2014)中，我已经开始形成一种主体理论，我将其假定为

> 一个致力于自身记录的自我;一个主体从个体身体的现场翻译到中介化的再现空间;一个被配音和被双重化的自我——一个*doppelgänger*自我，其“活着”的肉体存在得到了根本的补充……通过其在录音和表现中的不同和分布的体现. . .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位移的轨迹成为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战术撤退:从真实进入模拟，从肉体进入话语。(2012: 236-37)

因此，这个主题试图命名乔治·西门子(2013)所描述的那种体验，即“在互联网上看到自己的点点滴滴”;然而，这种被客体理论也包含了其他媒介。我在这方面的初步工作不仅将主题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而且置于后殖民语境中。这些语境包括配音和其他声音小说(Eshun, 1998)的“黑色电子”(Davis, 2004)实践，更具体地说，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语境，将主体定位为受害者或逃亡者，呼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电子主体性作为被殖民的受害者的观点;“所有电子媒体对其使用者施加的暴力是，他们立即被入侵并被剥夺了他们的身体，并被合并在他们自己神经系统的延伸网络中”(1996: 82)。我最初的研究发现，加拿大流行文化是将这一主题理论化的说明性场所，参考了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录像集》(*Videodrome)等作品中的虚构戏剧化*，麦克卢汉(McLuhan)的作品中的理论重复，也许更奇怪的是，但更重要的是，它是由格伦·古尔德等文化实践者进行的历史表现。在柯南伯格的《*录像集》中*，模仿麦克卢汉的角色布莱恩·奥布里维恩(Brian O’blivion)只存在于电视上，而且不可思议，就像马克斯·海*德鲁姆*(Max Headroom)一样。众所周知，古尔德放弃了现场表演，选择了录音室;他对巴赫的录音现在正乘坐旅行者2号进入星际空间。[1]在这些背景和实践的基础上，我认为“阐明加拿大主权妥协的政治经济及其被各种文化和媒体帝国殖民的历史，主观主义的化身和迭代将公民个体定位为竞争的知识属性要求所生产的商品，将媒体消费者定位为媒体自身所消费的东西，将有机的自我重新组织并由其技术他人复制”(2011:261)。

但我已经意识到，将主体定位为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或逃亡者，意味着歪曲加拿大殖民主义，在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中，当白人定居者和产品更准确地代表*殖民者时,将其定位为被*殖民者中的多数人，作为一个以移民为基础的资源开采殖民地，通过对加拿大第一民族的系统性隔离和剥夺而建立起来，这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模式。加拿大的流行文化主要由美国进口的文化产品和技术的新帝国主义主导，但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以其自己的新帝国主义资本项目为特征(见凯洛格，2013)。因此，加拿大民族国家*确实*为这一主题的理论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后殖民背景——但这是因为加拿大*既*代表了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目标，也代表了新帝国主义资本的贪婪代理人。在媒体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加拿大的移民和主要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人口，相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新帝国主义文化产业，占据了被殖民化的地位，但在加拿大作为欧洲国家帝国主义入侵的殖民分支的历史形成背景下，一种形成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继续以类似于种族隔离的方式构建其与加拿大土著人民的关系，我们当然必须认识到，在被媒体帝国主义殖民的相对特权人口与被殖民者-侵略者帝国主义殖民的巨大弱势人口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2012)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加拿大文化生产、学术和社会再生产的遗址和实践的关注首先引起了对主体的理论化，但这种关注并不意味着*只有*加拿大的遗址和实践可以或应该被理论化为主体的遗址和实践;相反，这些地点和实践“对当今过度发展、技术过度驱动和超媒介化的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发出了一些潜在的更广泛、更奇怪的暗示”(2012:238)。因此，下文将继续关注加拿大的遗址和实践，但也将扩大范围，考虑整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过度发达国家的相关遗址和实践。毕竟，今天新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产业的入侵、吞并和剥削——包括这里讨论的公司和服务——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民族国家，而是把(并理所当然地)整个世界作为他们的市场、实验室和劳动力池。

如果这个主题代表了媒体帝国主义下的被殖民者，那么，它也代表了殖民者，不仅在加拿大的后殖民流行文化中，而且在更广泛的理论和制度背景下，作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数字媒体，再现和自然化主体性的主导形式的私人-公共领域——那些“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主体性形式(hooks, 2000: 46)。这些主导同一性形成的复制和归化，根据数字同一性和代理是如何、由谁、为谁理论化的，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自我的修复和再分配暗示了一种生存，那么，具体来说，这种生存是向谁提供的呢?我在之前关于这个主题的工作中讨论过的例子说明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规范的主导地位，从而说明了一个相当特权的人口(尽管他们的作品具有多样性，有时是反文化的政治):柯南伯格的奥布里维翁和他的现实世界来源麦克卢汉;古怪的艺术大师古尔德，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另一个象征;以及白人男性作家威廉·吉布森、科里·多克托罗、彼得·沃茨和托尼·伯吉斯在加拿大小说中的代表人物。因此，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例子构成了白人，男性和相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富裕的典范。相比之下，我对这一主题的理论化所依赖的大量学术研究和理论都是由女性和女权主义学者(也不是加拿大学者)提出的。为了理论化媒介形式中主体性的倍增和间隔，以及它们用不可思议的“第二次生命”来补充以躯体为中心的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可能性，这一主题涉及数字同一性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如特克尔的“第二自我”理论(1995)，哈拉威的电子人作为网络代理和抵抗的模型(1991)，以及n·凯瑟琳·海尔斯的后人文主义(1999)，以及最近的研究，如安吉拉·托马斯关于虚拟自我作者身份的研究(2007年)和艾米丽·阿普特关于化身作为冲突和竞争的精神驱动的协调者的理论(2008年)。虽然主体与这些先前的数字同一性和“技术中的主体”理论有共同点，也有概念上的债务，它与它们更广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不是后现代条件或晚期资本主义主体性的后结构主义模式(它确实承认并建立在此基础上)，而是它的后殖民语境。Anna Poletti和Julie Rak最近呼吁将汽车/传记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数字同一性(2014)，我想补充的是，后殖民主义的镜头可以帮助实现数字同一性实践的交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贾斯比尔·普瓦尔的集合理论对于将霸权主体形成的“认知暴力”历史化，以及将同一性作为临时代理，作为“一次遭遇、一次事件、一次事故”去属地化，变得很有用。

阿普特和哈拉威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因为我关于修复的、双重的和间隔的主体的理论是由主体理论提供的:主体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语料库，更具体地说，是阿普特所说的“技术中的主体”(2008)的理论。后结构主义发展并动摇了主体在精神分析学和现象学中的基础，将主体理论化，不是作为首要的和自我决定的，而是作为“次要的、建构的……”易变的，站在自己的阴影里，自我分裂的”(Hawthorn, 1992: 181)。因此，阿普特所说的“技术中的主体”，将这一理论贯穿于后现代媒介理论之中。例如，Avital Ronnell认为，电话用更后结构主义的术语重新配置了现代自由主义主体:“电话将你转移到他者. . . .电话技术强加了对他者相对于自我的某种不可简化的优先地位的承认”(1991:82)。弗里德里希·基特勒(1986/1999)的作品体现了“技术中的主体”理论:他将主体历史化为一个由媒体技术构成的“话语网络”——基特勒在历史上将其展示为产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战争的产物。对基特勒来说，现代主体性是一种模拟程序，既被记录媒体维持又被颠覆，并逐渐退化到一个新生的、全球化的控制论人工智能政权:“在光学、声学和书写的存储能力被分离、机械化和广泛利用之后，中枢神经系统复活了，但却是一个由傀儡组成的傀儡”(170)。以基特勒的作品为基础，阿普特通过阅读数字自我成像实践，发展了“技术中的主体”理论，即创造一个“化身”，作为构成主体的驱动的修复协调者——化身作为驱动的驱动者。

在技术领域，这一主题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来源是哈拉威的半机械人理论:一个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激进地纠正和尖锐地女权主义同一性和代理的模型。不幸的是，哈拉威的半机械人在批判理论中的权威地位使它受到了简化的误读，就像*半机械人学*博客的编辑一样，两位马里兰的博士生，内森Jurgenson和P. J. Rey，他们利用哈拉威的理论以及社交媒体和印刷期刊等工具来推进他们自己的数字主体性模型，这可能被称为增强现实论证。在2012年的一篇评审文章中，*半机械人学的联合编辑Jurgenson声称“Facebook用户是哈拉威*人‘电子人’的典型例子”(2012b: 86)。这种说法*严重*误解了哈拉威的半机械人，它批判性地利用技术和网络，对帝国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起了一场奇怪的、女权主义的抵抗——而不是像Jurgenson提到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和监控业务Facebook所暗示的那样，与之愉快地同谋。

Jurgenson和Rey使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1990年左右首次出现)一词来批评他们认为在数字媒体领域的写作和研究中普遍存在但存在缺陷的前提，他们称之为“数字二元论”:数字活动的两极分化表现，将“现实生活”与互联网对立起来(并倾向于支持前者而不是后者)。引用尼古拉斯·卡尔的《*浅滩*》(2010)和雪莉·特克尔的《在*一起*的*孤独*》(2012)等近期作品中的例子，*电子*生物学的编辑们并不是唯一批评这种简化论的人，这种简化论认为，新媒体作为新媒体，正在腐蚀大脑，破坏社会，或阻碍青少年识字。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对这类争论作出了一个精明而简短的反驳:“媒体理论家们，面对着一种关于新传播模式有害影响的叙述，早就把矛头指向了柏拉图……新技术一直被想象成不仅是现有系统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是对现有系统的直接威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作为人类的本质。因此，文化衰落的宣言总是带有复杂的被淹没的意识形态动机”(2012:42)。

与菲茨帕特里克的“*长*时间*复制*”*观点相反*，*电子*生物学的编辑们更具体地阐述了他们的论点，既包括更狭义的社会学理论，也包括更现代的21世纪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Jurgenson写道:

> 我们的现实既是技术的又是有机的，既是数字的又是物理的，同时发生。我们并不是像《*黑客*帝国》那样，在独立的数字现实和物理现实之间进进出出，而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中，一个由原子和比特增强的现实。而我们的自我也不是像某种二元的“第一”和“第二”自我那样跨越这两个领域，而是一个增强的自我。一个*哈拉威*式的*半机械人自我*，由*一个物理身体和我们*的*数字档案组成*，在不断的对话中行动。(2011年:强调添加)

质疑数字和非中介经验的简化划分具有关键价值，但增强现实的论点在其前提和上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规范性主体性再生产的症状上都存在问题。[2]首先，除了其对哈拉威的误解，这一论点没有涉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精神分析或后结构主义主体理论。其次，这一论点读起来往往像是一份跨越几代人的宣言，过于迅速地忽略了有影响力的权威对这一主题的见解的细微差别。最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读写网络作为新帝国资本生产和构建的交流平台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目的是促进和加速利润最大化、市场创造和服务私有化，以及对政府的国家监督，这些政府现在主要充当资本主义雇佣的打手(Annesley, 2001; Hedges, 2012;施奈尔，2013;van Veen, 2011)。增强现实的论点忽视了数字政治经济，使得“Facebook是真实的生活”(Jurgenson, 2012a)这样的主张有问题，甚至令人不安，尽管它被用来挑战人类和技术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

马克·普伦斯基的“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模型似乎为*电子*生物学提供了信息:普伦斯基的模型是在2001年制定的，它区分了年龄较大的互联网用户和较年轻的用户，前者必须把互联网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后者在2000年以后成为青少年，实际上是“天生的数字”，会说流利的互联网。一*篇电子生物学*文章引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普伦斯基，他的影响也可以在*电子*生物学的“关于”宣传中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人社会。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方面:社会组织、身体，甚至我们的自我概念。这个博客记录了我们新的增强现实。”“我们”这个未定义但模糊的世代界限，加上宣传语对“新”的关注，表明普伦斯基的模型是增强现实论证的前提。

普伦斯基的“本地人对移民”模式本身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尽管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还不够(见贝恩和罗斯)。一个杰出的例外是韦恩·巴里(Wayne Barry)，他写道:“‘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数字野蛮人’、‘技术移民’、‘数字殖民者’和‘数字难民’的整个词汇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在倾向上是种族主义的。普伦斯基的模型赋予数字原住民高于移民的特权，再现了返祖仇外的民族主义话语，并挪用了“原住民”一词来描述主要*不是*原住民，而是定居者及其后裔的互联网用户，他们享有广泛的宽带接入。相比之下，大约一半的第一民族家庭和学校有互联网接入(酋长教育大会2012年)，只有17%的第一民族社区有宽带(加拿大学习委员会2010年)。

2001年对“加拿大的数字鸿沟”所作的分析仍然非常有意义:“地理或社会隔离、高成本和缺乏基础设施造成了第一民族人民和其他加拿大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为有利可图的城市市场而设计的数字网络和内容，可能会满足土著对教育和信息的需求，但尚未完全扩展到偏远社区”(Bredin, 2001: 191)。对于加拿大的土著社区来说，由系统性联邦资金不足(Fontaine, 2013)造成的极端贫困使更基本的健康和环境需求更加紧迫:寒冷、霉菌、过度拥挤和污水烟雾暴露等问题在保留地学校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就像空的图书馆书架一样(Opikokew, 2013)。后殖民加拿大的这些事实使得“数字原住民和移民”模式与最近“定居者”对#IdleNoMore的反应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一样令人难堪。在这种背景下，增强现实论证中对政治经济批判的明显遗漏，成为其在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主体性基础上的一个明显症状。与德里达所说的“白人神话”(1974:5)相一致，增强现实理论将这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主体性普遍化并自然化为意识形态规范——“普通”用户——不仅在其支持者自己的同一性形成中(白人、男性，以及亨里奇等人2009年的“怪异”)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formulation)[b]也是如此，在它的修辞上，在对复数第一人称的一贯和未经检验的使用上，在网上过着真实生活的假定的、未定义的、集体的“我们”。

海尔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1999)中对这种修辞*进行了精确的讽刺;海尔斯在解释她的书名时写道:“‘我们’，‘喜欢’，‘成为’，具有讽刺意味，将自己定位于各种杂志上的科技摇头丸的对立面，比如《*Mondo 2000*》，他们习惯地把向后人类的转变说成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而实际上它只影响到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6)。海尔斯所阐述的这个“我们”在许多数字评论员的修辞中反复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只代表了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问题来了:主体为谁提供了自我修复的加倍和间隔?

通过考虑我所谓的“关于怀疑的话语”，我们对主体的主导同一性政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通过媒体对自我转化的陈述和猜测，其中许多都被描述为从人体“上传意识”到机器的幻想。“上传意识”的幻想在某一类思想家中反复出现，他们根据两种常见且连动的修辞手法来表现这种幻想:首先，以一个表面上普遍但意识形态特定的集体的名义，“我们”——帝国主义白人资本主义父权主体为其代表的物种——将成为后人类(posthuman);第二，作为一种分离的行为或运动，一种数字与物理、精神与身体的分离，以及它所暗示的性别和阶级编码的从属关系的所有暴力。回想一下，例如，在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漫者*》(1984)中，在网络空间的无实体的、大脑的超越和“肉”存在的“腐烂的黑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编码对比。正如阿曼达·芬巴赫在2000年为《*神经漫漫者*》所写的那样:“就像当代关于互联网和虚拟现实的话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幻想一样，吉布森的网络空间允许在一种特权白人男性身体的幻想中否认身体差异. . . .。这一概念

b “WEIRD” is Henrich et al.’s acronym for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 which of course most of the world isn’t; the WEIRD thesis challenges the global representativeness of claims for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that many disciplines generalize on the basis of sampling Western, Anglophone postsecondary student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网上人物角色超越社会和文化等级仍然是一个乌托邦神话”(芬巴赫, 2000:n.p.)。芬巴赫的思考至今仍能引起共鸣。芬巴赫注意到的“民主化修辞”包括了普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将物种代表性屈就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公民——以及类似的意识形态意象, 即主体性在解体方面的补救体现，肉体的超越性。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就是这些修辞手法的例证。1971年，麦克卢汉在他的声明中暗指电视和早期的计算机，“人们对电子时代知之甚少的是，它使人成为天使，使人失去了化身。”把人变成了软件”(1996:79)。这里的性别范畴“人”，与“电子时代”的划时代意象一起，起到了将补救经验普遍化的作用。麦克卢汉后来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种无实体补救的想法:“当你‘在打电话’或‘在广播中’时，你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在这些媒介中，发送者被发送出去，并且瞬间无处不在。无实体的使用者延伸到所有接收电子信息的人”(1996:80)。德里克·德·克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 麦克卢汉的继任者，多伦多大学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也用这种修辞来表达电信和虚拟现实中自我加倍和间隔的想法。“在我们神经系统的模拟和扩展中，”他写道，“我们个人作为节点实体，在电流模式上来回移动”(1995:186)。[4]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他2006年的小说《*JPod*》*中提供了一个讽刺的版本:*“还记得在1990年，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你会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吗?*我们现在都*是混蛋了”(2006:270，加注)。正如在这些声明中所看到的那样，数字同一性的普遍化和解体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性别和阶级限制的思想家传统中虔诚地希望完成。分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它构建了主体的异化体现;普遍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它授权将其限制在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特权代理人身上。

我们也在读写网络服务中看到这些修辞上的动作，邀请用户生成内容，并在此过程中，从相对特权的“目标”人口中招揽这种有争议的“自我商品化”，作为一种相对特权和非剥削性的商品化。正如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本卷早些时候所讨论的那样(另见Hesmondhalgh, 2010)。自我的商品化——主体向客体的转变——是一种有价值的客体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服务条款(TOS)许可，因为生成内容的用户构成了明显的特权人群:“UGC平台访问者的社会人口统计表明，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人脉广泛、收入高的普通用户……UCG用户——无论是主动的创作者还是被动的观众——对广告商构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口统计”(van Dijck 2009, 47)。

在这种背景下，在他对“电子人”的预测中，对于霸权、殖民者特权的所有症状性表述，麦克卢汉，就像多伦多诗人克里斯托弗·杜尼尼(Christopher dewney)在千禧年之前对“超人类主义”(1998)的推测一样，至少可以被认为是指出了这种转变的企业结构的政治经济含义。虽然电视是他选择的新媒体，但麦克卢汉在他的声明中写道，新媒体的公私融合和冲突对互联网很有启发作用，他说“我们把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租给了各种公司”(1964/2003:100)。麦克卢汉倾向于使用非商业意义上的“公司”作为“集体”的同义词，但这样的声明表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把握在他的作品中是沉默的(或缺席的)。杜尼尼则更关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他将他的推断从虚拟现实缓和到几乎无法识别的未来——“同一性这个词甚至可能不适用”(1998:191)——并预测公司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意识最终被证明是可上传的，”他写道，“公司将持有将拥抱我们思想的软件的专利”(1998:178)。进一步探讨公司版权的影响，他推测“接受者获得有天赋的个人大脑的一部分的受版权保护的活体模拟的可能性，并得到制造商的许可”——但他问是否“成为，甚至部分地，企业认知产品可能是人类不愿跨越的同一性门槛”(1998:179)。从麦克卢汉的观点到社交媒体TOS协议的观点，这个门槛可能是“我们”——一个特定的、享有特权的主体阶级——已经跨越的门槛。

这个主题的理论，正如这里概述的那样，可能表明公司已经拥有这样的专利(并为它们而战)，意识的上传不仅是他们交易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积极构建、征求和刺激的东西——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州政府的监督要求，在新自由主义下，州政府现在更多地充当公司利益的客户和推动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管家。如果数字化是要用资本取代劳动力，那么什么是自我的数字化?尤其是在只模拟公共的私人网站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空间?主体同一性的数字再分配有效地将公民分散到国内和外国司法管辖区:例如，使用谷歌、Facebook、Dropbox和Twitter等美国服务的加拿大人，将他们上传到这些服务的内容存储在位于美国的数据中心，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爱国者法案搜索条款的影响。颁布禁令意味着为企业和国家权力提供工作和产品(内容);在数字关系中反对自我，每次点击和击键都会产生数据供未知的私人利益分析，用户成为他或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的参与者——同时也找到利用这些工具的代理进行反对和实践的方法，正如维基解密和社交媒体的组织支持所显示的那样。

在后端分析和前端界面之间，根据互联网服务和平台如何允许某些话语秩序，产生某些主体位置，双重和间隔的数字自我既构成殖民者，也构成被殖民者。也就是说，互联网对用户*进行*问询，然后也对用户进行问询，独立于用户的代理或意识，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性的商品，一种由元数据构成的自我——一种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如果用户将他或她自己在数字关系中加倍和分隔，他或她只能根据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具体的、有时是微妙的前提和优先事项来这样做。

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质询了一个特权主体，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中由自由人文主义者转变为消费主义者的主体，该体系创新并推广了读写网络(Smith和Watson, 82)。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社交媒体用户作为商品进行批判(van Dijck, 2009;McNeill, 2014)。在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特权编码到当代消费技术的补充分析中，Alice Marwick认为，它们要求用户作为企业家参与，作为自我和品牌的营销人员(另见Smith和Watson, 2014: 79)，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巩固了交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例如，你最后一次查看iPhone上的“股票”应用程序是什么时候?对……我也从来没有。)

Rob Cover和aimsame Morrison最近的文章分析了Facebook是如何吸引和诱导用户发帖和分享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说服用户*的。Cover分析了用户个人资料的创建和维护:“个人资料的管理……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行为，通过“召唤”一个人选择坐标的质询，产生具身的自我和主体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身份”(2014:64)。Cover还注意到Facebook是如何限制这些坐标的:“社交网站上提供的个人资料类别提供了一种‘选择’的自由概念，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特有特征……然而，对于一些用户来说，它们冒着规范真理政权暴力的风险，这种政权排除了其他主观性的替代[方式]”(65-66)。正如Cover所观察到的那样，“无法辨认的自我”“需要解释”(59)。同样，莫里森将Facebook的解释描述为“诱骗的启示”:“Facebook的状态更新功能利用了设计好的启示和约束，以及新兴的文化习俗，以便从用户那里诱骗生活叙事”(2014:119)。因此，Facebook的“诱骗允诺”使得“某些陈述不可能”(123)，并且由于最近引入的功能，他们现在倾向于将用户的数字档案与“现实生活”中的用户相识别;正如莫里森所观察到的，最近引入的“时间线”格式“越来越混淆……一个用户的整个社交媒体历史……这个用户的整个生活”(127)。

推特就像Cover和莫里森给Facebook的那种细读。第一次访问时，推特“欢迎”你，它邀请你“开始交谈，探索你的兴趣，了解情况”。你被邀请注册或登录(如果你没有取消点击“还记得我吗?”)来保持登录状态)。如果你搞砸了登录，你会得到这个弹出式查询:“我们要检查……”你是人类吗?”这可能是质询中最典型的表达:不明确但表面上是公司的“我们”——代表twitter提问的“我们”——自嘲地、口语化地、无害地要求“检查”用户是否是“人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问的“我们”并不是人类——它是一个由公司指导和编程的子程序——但这个“我们”在其问题的措辞中，仍然假定是在哄骗人类的回应。在用户的页面上，“哄骗功能”是一个文本输入字段，显示一个灰色的邀请“撰写新推文……”*撰写*:劝告是写作和制作，以经济的方式交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发的推文，界面所施加的简洁性约束是推特新自由主义编码的线索:“推特的文本经济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交流正常化，即财政紧缩是运行公共服务的唯一途径”(2009b)。至此，在推特的“支票”中，“我们”和“人类”的隐含主题应该可以清晰地理解为过度发达世界的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族长。数字服务公司日益要求的“真实同一性”隐含的主观性也应如此。

正如Cover所说，根据相互竞争的需求，社交媒体对用户的质询是双重的:“启蒙运动要求一个人把自己表达成一个理性的人，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连贯的、可理解的主体和分散的主体性，这满足了我们通过消费形式以短暂的方式表达同一性的要求”(2014:61)。社交媒体双重诘问用户——也就是说，它对用户进行了配音和版本化(就像网站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版本化一样[莫里森，2014:120]);社交媒体叫唤用户成为被叫唤对象。莫里森进一步观察到，虽然社交网站将用户视为内容创造者，但网站的功能支持的不是作者身份，而是一种算法的“自动组装”。这是为了自我表现的目的，跨多种模式不断选择和占用内容的结果”(Whitlock和Poletti在莫里森中引用，2014:113)。在这种背景下，怀疑的过程需要“上传自我”(McNeill, 2014: 160)，这不仅是自愿的自我表征，也是非自愿的数据和元数据集，我们可以称之为与用户生成内容的自我相对应的技术id。

社交媒体网站通常要求用户提供“真实同一性”详细信息，以访问和验证他们的账户。这种对“真实性担保人”的需求反映了大多数网站的质询策略，它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有关(Smith and Watson，2014:76-77)，作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Fisher, 2009)、“白人神话”(Derrida, 1974)和“要求权利主体固定性的法律和资本主义结构”(Puar, 2011)的归化，以及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坚持要求用户提供自己的“真实”同一性，这标志着对早期开放网络的隐私和承诺的戏剧性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获得了无数的批评理论和流行的庆祝活动，使典型的后现代游戏和数字同一性的实验成为可能。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 1995)做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陈述:“互联网社区的显著特征是种族、阶级、年龄、地位，尤其是性别等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的削弱”(1995)。将这种对后现代数字自我创造可能性的乌托邦式表达与当前互联网对身份和验证的坚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针对安妮塔·萨基斯(Anita Sarkeesian)等女权主义者的可怕的厌女暴力;网络霸凌和性骚扰带来的痛苦和悲剧;反对#IdleNoMore的反应中丑陋地揭露了“颠覆者”种族主义;以及一个不断紧密的、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数字安全布鲁斯·施奈尔将其描述为“超越奥威尔最疯狂想象的监控状态”——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用户的自愿参与实现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涉及到计算机，而计算机产生的数据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现在一切都被保存和关联起来，许多大数据公司通过从各种来源建立我们生活的亲密档案来赚钱. . . .在互联网上维护隐私几乎是不可能的. . . .政府乐于利用公司收集的数据——偶尔要求他们收集更多、保存更长的时间——来监视我们。企业也乐于从政府那里购买数据。(施奈尔，2013)

认识到对互联网作为后现代自我塑造的乌托邦空间的方法的批评，例如中村对“同一性旅游”的批评(2014):45)我仍然倾向于认为，陌生化的策略为占领一个数字环境提供了关键资源，这个环境对“真实”身份的要求服务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和监视国家。就像要求真实性的社交媒体服务条款一样，规范知识属性(IP)的条款——既适用于用户自己的内容，也适用于用户占用的第三方IP——说明了社交媒体质询策略与用户陌生策略之间的紧张关系。针对这些要求和条件，一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领导了对“真实性”(Smith and Watson, 76)和IP的挪用，这是不同的怀疑实践，可能指向“构思同一性本身的新方法”(Poletti和Rak, 2014: 17)。社交媒体通过互文挪用来批判和颠覆新自由主义数字领域的霸权主体形成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妮塔·萨基斯(Anita Sarkeesian)在YouTube上大量批评数字文化中的性别隐喻的作品，以及Elisa Kreisinger自称的“流行文化盗版”。他的混音作品教导和示范了合理使用。

从IP的角度来看，回到Twitter的例子，一些“病毒式”Twitter账户，如@FeministHulk、@FeministTSwift和@BrideOnAcid，说明了关键数字传播的可能性。这三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Twitter的自我识别功能，这比Facebook的年龄、性别、关系和位置等固定坐标的个人资料展示形式自由得多。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如何利用假名和独特风格的声音来构建不可思议的身份，既能立即识别，又非常奇怪。FeministHulk和FeministTSwift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名人品牌的“真实感”。FeministHulk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超级男性主义漫画人物，它采用了一种文字风格——全大写和蹩脚的英语——既模仿了原著人物的讲话，也模仿了原著人物的举止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他嘴里说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的话:“浩克从漫长的粉碎日中放松下来。”喝喝茶，看女权主义频率的老视频，也许用csa share做咖喱。啊!大绿色自我保健。”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也在推广自己的推特恶搞账户类型;FeministTSwift可以说是女权主义者(FeministHulk)好斗而众多的后代之一，它不是拿绿巨人的标签，而是拿女权主义的旗帜，把用户塑造成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粉丝，然后把自己重塑成女权主义版的泰勒·斯威夫特:“快乐。”自由的。迷茫。被父权制压迫。同时。”FeministTSwift的更新几乎完全由泰勒·斯威夫特歌曲中的台词组成，用女权主义理论重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工资少了22美分。”

考虑到公司版权所有者为了保护他们的内容垄断而进行的无情的游说和惩罚性诉讼，更不用说他们对歌词收取的许可费，FeministTSwift对泰勒·斯威夫特歌词的广泛使用似乎特别大胆——它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但用户权利并没有阻止版权所有者向用户施压，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使用付费，或者指控商标侵权;女权主义者对漫威漫画人物的使用也是如此(参见2007年Tushnet关于合理使用和性别批评)。

然而，BrideOnAcid的工作方式不同，更像是一种被称为“怪异推特”的风格(施密特，2013)。这个账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一个叙事情节浓缩到用户名本身，暗示着这个feed代表了一个在婚礼当天滴了酸的新娘。这个动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权主义的讽刺，把婚礼作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和异性恋规范的机构。“为了这个大日子，我把牙齿刷白了。有点浪费，因为它们都碎了。”吸毒的前提提供了一种熟悉的异化效应装置，使婚礼当天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奇怪——嗯，比本来就很奇怪的婚礼还要奇怪。(想想你在不同圈子认识的所有用户在你自己的活动动态中不可预测的对话质量吧。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动态feed中管理评论就像在婚宴上管理一个开放的麦克风?)BrideOnAcid似乎不再定期更新，但这个帐户现在的档案特征并没有使它失去作为典范主题的资格。正如Cover所说，社交媒体的存档功能让用户的同一性建构在他们缺席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继续象征，甚至可能比线下表演更有力地维持主体性。在Facebook上，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例子是，它会自动邀请你把一个你知道已经去世的用户加为“好友”。录音是如何发号施令的呢?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所有这些批判和占有性的推特主题在内容层面上取得了成就，但他们占据推特这样的企业平台的生产模式最终提供了免费劳动力，以满足公司对分析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底线。就像非关键的内容一样。无论前端内容多么批判，后端分析只能创造出一个元数据主体，它是一个完全顺从、不抗议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傀儡。批判性的用户生成内容和无意识的元数据生产之间的这种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利用对其自身形式和规范的批判性抵制方面具有弹性和强大的能力。也就是说，承认抵制社交媒体占主导地位的解释的有效性比物质更具象征意义，并不是要贬低象征本身的重要性。像前面提到的推特用户模型这样的不熟悉的演示，对于相当大的互联网受众来说，这些平台的解释是如何被回答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相反的，不是肯定的，而是疑问的。这些示威活动批判了互联网用户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假设。

企业对用户“真实”身份的要求不仅是对隐私的侵犯，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并强化了一种关于真实性、“常识”、“底线”现实主义的有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白人神话和新帝国主义资本的意识形态内核。在社交媒体的解读中，哲学家托拜厄斯·范维恩(Tobias van Veen)解读了“企业感知的神秘法西斯主义”——由企业社交媒体构建和限制的话语秩序:“非公民参与社交网络的感知技术将欲望与社交网络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欲望指向对象和数据的不断流动(要么被喜欢，要么在回应中缺席)”(2011)。Van维恩的观点是，社交网络抹去了民族国家，从而削弱了民主参与:因为，在社交网络中，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欲望的衡量标准”，那么它的虚拟不存在使它的物质被新帝国主义资本拆除。

根据对新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中历史帝国的持续和转变的后殖民观点，对主体理论的更广泛的探究，对怀疑话语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如何询问其用户的粗略阅读，一个更完整的主体形象发展起来:不只是被殖民，而是殖民者，体现和演绎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统治下被纠正的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共通之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主体性被修复和重新分配的模型，主体已经占据了真实与模拟、自主性与自动化、存在与困扰、公共与私人、用户与商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神秘维度。主体的理论已经假定了主体的陌生化，即主体从肉体的表演性向数字表征和职业的不同体现的嬗变。在对“真实”用户身份的需求中，尽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在对用户(也是他们的产品)进行质询的启示中，互联网用户仍然能够产生深刻的异化效应——数字同一性的陌生化，这提醒我们，我们所知道的主体性，无论如何，主体性始终是虚构的。Max Headroom的生活:新闻记者将文章的写作外包给编码机器人，但保留他们的作者署名(Dingwall and Mattar, 2013)。Facebook建议你可能认识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去世，但保留了个人资料(Walker, 2011)。数据挖掘者收集并交易互联网用户清单*doppelgängers*中潜在的*doppelgängers*，以获取利润、好处、勒索和税收减免。一股恒星风刺入*《良律钢琴》*的*凹槽*，搅动着古尔德的手指。这台机器没有停止;它被特权者和有权者的死手和活人的手操纵着;它是由逝者和生者的鬼魂喂养的。

致谢

我要感谢阿萨巴斯卡大学研究委员会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感谢MA-IS项目的前主任Raphael Foshay邀请本研究的一行参加2013年数字联系研讨会，感谢加拿大数字人文学会邀请本研究的另一行参加2014年国会会议，以及我以前的研究生研究助理Sarah Mann，感谢她提出的问题促进了这项工作，并就其进展提供了反馈。

笔记

在我2012年的那一章中，我写道，旅行者2号于1989年离开了太阳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虽然旅行者2号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是冥王星的两倍，但它还没有离开日球层，太阳太阳风与其他恒星的恒星风平衡的太阳系最外层的“气泡”(NASA 2012)。

2关于增强现实的争论也是一个有趣的公开评议案例，而不是同行评议:鉴于其作者熟练地利用了社会和社会舆论，这个想法在博客上一出现就凭借分销能力流行起来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各大纸媒;它所需要的——值得赞扬的是，它的支持者公开邀请的——是更严格的同行评议和辩论。

3作为普伦斯基框架的替代方案，大卫·怀特(David White)和艾莉森·勒·科努(Alison Le Cornu, 2011)提出了一种“访客”和“居民”的类型学，既摒弃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本地人”和“移民”的假设，又允许这些立场之间的连续运动。

4 de Kerckhove不是后殖民主义学者，他在我用作题词的引文中提到了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分析:虽然他关于“殖民者永远是殖民技术的第一个受害者”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是对殖民主义的严重歪曲，但它也可以更慷慨地以弗莱雷(1970/2000)的精神来解读，对弗莱雷来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辩证法使两者都失去了人性，但却赋予后者教育和解放被压迫者的权力(1970/2000,54)。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121–7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nesley, James. 2001. “Netscapes: Gibs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ew Media.”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37(2): 218–29.

Apter, Emily. 2008. “Technics of the Subject: The Avatar-Drive.” *Postmodern Culture* 18(2): n.p. doi: 10.1353/pmc.0.0021.

Barry, Wayne. 2007. “Digital Imperialism: The Tyranny of Technology.” *The Accidental Technologist*, 29 Nov. http://www.waynebarry.com/blog/?p=45.

Bayne, S. and Ross, J. 2007. “The ‘Digital Native’ and ‘Digital Immigrant’: A Dangerous Opposit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malts.ed.ac.uk/staff/sian/natives_final.pdf.*Blade Runner*. 1982. Dir. Ridley Scott. Warner Brothers.

Bolter, Jay David, and Richard Grusin. 1999.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redin, Marian. 2001. “Bridging Canada’s Digital Divide.”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 21(2): 195–215. http://www2.brandonu.ca/library/CJNS/21.2/cjnsv21no2_pg191-215.pdf.

Canadian Council on Learning. 2010. “Learning to Be: Access to Broadband Internet.” *Composite Learning Index*. http://www.cli-ica.ca/en/about/about-cli/indicators/be-internet.aspx.

Chiefs Assembly on Education. 2012. “A Portrait of First Nations and Education.”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1 Oct. http://www.afn.ca/uploads/files/events/fact_sheet-ccoe-3.pdf.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Coupland, Douglas. 2006. *JPod: A Novel*. Toronto: Vintage Canada.

Cover, Rob. 2014. "Becoming and Belonging: Performativity, Subjectivity, and the Cultural Purposes of Social Networking." In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eds. Anna Poletti and Julie Rak, 55–7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Davis, Erik. 2004. "Roots and Wires: Polyrhythmic Cyberspace and the Black Electronic." *Techgnosis*. http://www.techgnosis.com/cyberconf.html.

de Kerckhove, Derrick. 1995. *The Skin of Culture: Investigating the New Electronic Reality*. Toronto: Somerville House.

Delboeuf, Joseph. 1885. *Le sommeil et les rêves considérés principalement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es théories de la certitude et de la mémoire*. Paris: Félix Alcan.

Derrida, Jacques. 1974.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1): 5–74.

Dewdney, Chris. 1998. *Last Flesh: Life in the Transhuman Era*. Toronto: HarperCollins.

Dingwall, Dawna, and Pacinthe Mattar. 2013. "What Does 'Robot Reporting' Mean for Journalism?" *The Current*. 19 March. Toronto: CBC. http://www.cbc.ca/

thecurrent/episode/2013/03/19/what-does-robot-journalism-mean-for-the-

industry/.

Doctorow, Cory. 2003. *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 New York: Tor Books.

Eshun, Kodwo. 1998. *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 Adventures in Sonic Fiction*. London: Quartet.

Fernbach, Amanda. 2000. "The Fetishization of Masculinity in Science Fiction: The Cyborg and the Console Cowboy."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81. N.p.

Fisher, Mark. 2009.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Zero Books.

Fontaine, Phil. 2013. Keynote. *Ignite! Ideas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1 Feb.

Freire, Paolo. 1970/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Gibson, William.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Gould, Glenn. 1963/1999. "Forgery and Imitation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The Art of Glenn Gould: Reflections of a Musical Genius*, ed. John P. L. Roberts, 204–21. Toronto: Malcolm Lester.

Haraway, Donna. 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149–81. New York: Routledge.

Hawthorn, Jeremy. 1992. *A Concise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Hayles, N. Katherine.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Hedges, Chris. 2012. "Colonized by Corporations." *Truthdig*, 14 May. http://www.truthdig.com/report/item/colonized_by_corporations_20120514

Henrich, Joseph, Steven J. Heine, and Ara Norenzayan. 2009.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Representative Are Experimental Finding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Human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5 March. http://www2.psych.ubc.ca/~henrich/pdfs/Weird_People_BBS_final02.pdf

Hesmondhalgh, David. 2010.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10(3-4): 267–84. http://www.ephemeraweb.org/journal/10-3/10-3hesmondhalgh.pdf

hooks, bell. 2000.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Hopkinson, Nalo. 1996. "A Habit of Waste." *Fireweed* 53.

Jurgenson, Nathan. 2011. "Digital Dualism versus Augmented Reality." *Cyborgology* 24 Feb. http://thesocietypages.org/cyborgology/2011/02/24/digital-dualism-versus-augmented-reality/

———. 2012a. "The IRL Fetish." *The New Inquiry* 28 June. http://thenewinquiry.com/essays/the-irl-fetish/

———. 2012b. "When Atoms Meet Bits: Social Media, the Mobile Web, and Augmented Revolution." *Future Internet* 4(1): 83–91. http://www.mdpi.com/1999-5903/4/1/83

Kellogg, Paul. 2013. "The Tar Sands: A Made-in-Canada Problem." *PolEcon.net*, 4 Jan. http://www.polecon.net/2013/01/the-tar-sands-made-in-canada-problem.html

Kittler, Friedrich. 1986/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vets, David. 2013. "Appeals Court Curbs Border Agents' Carte Blanche Power to Search Your Gadgets." *Wired*, 8 March. http://www.wired.com/threatlevel/2013/03/gadget-border-searches/

Kreisinger, Elisa. 2010. *The Queer Carrie Project. Pop Culture Pirate*. http://www.popculturepirate.com/queercarrie.html

———. N.d. "What Is Pop Culture Pirate?" *Pop Culture Pirate*. http://www.popculturepirate.com/about/

Marwick, Alice E. 2013. *Status Update: Celebrity, Publicity, and Branding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x Headroom: 20 Minutes into the Future. 1987-88. Perf. Matt Frewer. Warner Bros.

McCutcheon, Mark A. 2009a. "Downloading *Doppelgängers*: New Media Anxieties and Transnational Ironies in *Battlestar Galactica*." *Science 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2.1: 1-24.

———. 2009b. "Twitter's textual economy . . ." Tweet. 2:06 pm, 5 Oct. https:// twitter.com/sonicfiction/status/4637678320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2011. “Frankenstein as a Figure of Globalization in Canada’s Postcolonial Popular Culture.” *Continuum* 25(5): 731–42.

———. 2012.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ubject: Doubling and Spacing the Self in Canadian Media Culture.” In *Selves and Subjectivities: Reflections on Canadian Arts and Culture*, eds. Manijeh Mannani and Veronica Thompson, 235–64. Edmonton: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 2014. “Dubjection: A Node.” In *McLuhan’s Global Village Today*, ed. Martin Kuester, 59–73.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McLuhan, Marshall. 1964/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Ed. Terrence Gordon. Corte Madera, CA: Ginkgo Press.

———. 1996. *Forward Through the Rearview Mirror: Reflections on and by Marshall McLuhan*. Toronto: Prentice Hall.

McNeill, Laurie. 2014. “Life Bytes: Six-Word Memoir and the Exigencies of Auto/ tweetographies.” In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eds. Anna Poletti and Julie Rak, 144–6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orrison, Aimée. 2014. “Facebook and Coaxed Affordances.” In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eds. Anna Poletti and Julie Rak, 112–3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akamura, Lisa. 2014. “Cyberrace.” In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eds. Anna Poletti and Julie Rak, 42–5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ASA. 2012. “Mission Overview.” *Voyager: The Interstellar Mission*.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voyager.jpl.nasa.gov/mission/index.html.

Opikokew, Cassandra. 2013. Panel presentation. Ignite! Ideas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2 Feb.

Poletti, Anna, and Julie Rak, eds. 2014.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oster, Mark. 1995. “Cyberdemocracy: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ttp://www. hnet. uci. edu/mposter/writings/ democ.html.

Pregeson, Judge Dean. 2006. “Order Granting Defendant’s Motion to Suppress Evidenc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Michael Timothy Arnold*, 1 June. http://www.wired.com/images_blogs/threatlevel/files/CR05-00772DDP.pdf.

Puar, Jasbir. 2011. “‘I woul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goddess’: Intersectionality, Assemblage, and Affective Politics.” 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 Jan.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811/puar/ en.

Rey, P. J. 2010. “Data’ll show ‘em: Internet Access in the US.” *Cyborgology*, 17 Nov. http://thesocietypages. org/cyborgology/2010/11/17/ datall-show-em-internet-access-in-the-u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Ronnell, Avital. 1991. *The Telephone Book: Technology, Schizophrenia, Electric Speech*.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arkeesian, Anita. 2012. "About Feminist Frequency," *Feminist Frequency* http://www.feministfrequency.com/about/

———. 2012. "The Mirror." TEDxWomen, reprinted in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ZAxwsg9J9Q

Schmidt, Alex. 2013. "10 Weird Twitter Beings Worth a Follow." *Paste Magazine*, 16 Nov. http://www. pastemagazine. com/blogs/lists/2013/11/10-weird-twitter-beings-worth-a-follow.html.

Schneier, Bruce. 2013. "The Internet Is a Surveillance State." *CNN Opinion*. 16 March. http://www. cnn. com/2013/03/16/opinion/schneier-internet-surveillance.

Siemens, George. 2013. "Identity Formation in Distributed Networks and Social Spaces." Identity, Agency, and the Digital Nexus: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habasca University, 5 April.

Smith, Sidonie, and Julia Watson. 2014. "Virtually Me: A Toolbox About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In *Identity Technologies: Constructing the Self Online*, eds. Anna Poletti and Julie Rak, 70–9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homas, Angela. 2007. *Youth Online: Identity and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Peter Lang.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2012. "Connected, but alone?" Ted Talks. April. http://www.ted.com/talks/sherry_turkle_alone_together.html

Tushnet, Rebecca. 2007. "My Fair Ladies: Sex, Gender, and Fair Use in Copyright."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and the Law* 15(2): 273–304.

Twitter. 2012. "Terms of Service." *Twitter*, 25 June. https://twitter.com/tos.

van Dijck, José.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1(1): 41–58.

van Veen, Tobias. 2011. "Technics and Decrepit Democracy." *Fugitive Philosophy*. 3 May. http://fugitive. quadrantcrossing. org/2011/05/technics-decrepit-democracy.

Videodrome. 1983. Dir. David Cronenberg. Criterion.

Walker, Rob. 2011. "Things to Do in Cyberspace When You're Dea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5 Jan. http://www.nytimes.com/2011/01/09/magazine/09Immortality-t.html?pagewanted=all

Watts, Peter. 2006. *Blindsight*. New York: Tor.

White, David and Alison Le Cornu. 2011. "Visitors and Residents: A New Typology for Online Engagement." *First Monday* 16(9). 5 Sept.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3171/3049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7 转型中的网络大学

鲍勃·汉克

1979年，关于与计算机化、信息学和远程信息处理相关的同一性，利奥塔指出:“自我并不重要，但没有自我是一座孤岛;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于一种关系的结构中，这种结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流动(1984:15)。“数据库，”他继续说，“是明天的百科全书。它们超越了每个用户的能力。它们是后现代人类的‘自然’”(51)。人们很容易把过去的三十五年看作是对他的假设的预测价值的证实，即合法化的过程和表演的主导地位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在传递既定知识方面，教授并不比记忆库网络更有能力，在想象新招式或新游戏方面，教授并不比跨学科团队更有能力”(53)。

继利奥塔的脚步之后，阅读(1996)描述了卓越大学如何在自由民族国家中取代文化大学对公民主体的培养。他认识到，后历史的资本主义官僚大学的现金关系正在崭露头角，计算机化正在改变写作、出版和阅读的技术背景。利奥塔关注的是科学知识在计算机化社会中的地位，而《阅读》则是当代大学脱离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肯定和灌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教授时代的结束是管理者时代的开始，而“文化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起源和目标的观念”被技术官僚主义的“卓越”概念所取代。

由于这两篇关于知识和文化的报告出现在现代大学的暮色之中，“信息文化”和“信息大学”已经趋同(Terranova, 2004;Bousquet, 2008)。此外，美国公立大学的解体史已经被书写(Newfield, 2008)，企业文化的语言已经取代了教育的语言(Woodhouse, 2009)。安格斯(2009)认为，“新兴的科学-技术-传播统一体正在破坏大学的传统基础”(6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网络大学”是“大学在以技术科学为基础的网络社会中的一种新兴形式和作用”(安格斯，2009:64)。修订《阅读材料》，卓越的理念已经被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所取代。

在《*大学的用途*》(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第五版中，克拉克克尔重新审视了美国的“综合性大学”，观察了美国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终结。他在1995年的评论中指出:“现在学术生活的神经系统的运作更多地依赖于计算机终端和传真机……面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克尔, 2001: 146)。在新千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一个来源是“为适应新电子技术而大大改进的硬件和软件最终能否，开始渗透到教学中，因为它已经有了研究和管理”，并带来教学技术的“第四次革命”，这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预料到的。

克尔有两种想法: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对以前的技术的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口头教学为学徒经历增加了内容，书面文字为口头文字增加了内容，印刷术为手写增加了内容，这种‘芯片’很可能会增加但不会取代所有已经消失的方法”(克尔，2001:195)。另一方面，“新业务”的第一项是更广泛、更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面对不确定性，他希望“仔细研究”“新的信息技术——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克尔，2001:228)。2010年，美国教育部满足了克尔的愿望，并发布了一份在线学习研究的荟萃分析，比较了面对面和在线学习;混合型教学方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被发现比面对面或在线课程更有效(Means et al. 2010)。对克尔来说，视频和电子邮件是高等教育中的新媒体;如今，课程管理系统、播客和视频聊天论坛、智能辅导系统和mooc代表了最新的教与学手段。

在本章中，我考察了转型中的网络大学。总体而言，活动的数字联系，特别是数字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大学的嬗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很难超越获取信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问题，而关注其他问题，如超老年主义和教学的可重复性。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本章将说明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网络企业”(Castells, 2010)，它塑造了“内部外部”，即我们学术职业的“未被同化的背景”(Moten and Harney, 2004)。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说明了汉森(2010)的“媒介政权更迭”概念是如何成为思考媒体和大学的历史契机的。通过将基特勒对基于大学的媒体史的描述添加到他们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追溯机械化、赛博国家和二进制代码对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影响。正如我希望阐明的那样，目前的学术传播和教学场景仍然处于印刷和数字代码和惯例之间，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探究来谈论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学。信息技术战略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发展模式，它融合了技术和组织变革，促进了行政控制，并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态。我们可以把制度语境描述为一种循环的环境。要在媒介化的学术世界中获得对学术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必须保持对媒介和时空的关注。

校园网基础设施的黑箱化(结合性能标准、现场性和新媒体的新颖性)只是第一组困难。实现对当代大学的清晰认识，还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在这些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公司化、商业化、管理主义和官僚化，公立大学的问题被框定为一种“危机”。在其他地方，我已经谈到了大学的三重危机:教师就业、全球金融和知识(Hanke, 2011)。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削减成本是新自由主义重组的先锋;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些变化可能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化”和“不稳定”(卡利尼科斯，2006)。在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加拿大的大学面临着进一步的预算削减。这种休克主义和由此导致的资金不足加剧了结构性变化，如学术劳动力的裁员和临时工，学术职位空缺和更大的教学负荷，课程和项目关闭，更大的班级规模和更多的电子学习，以增加获取和加速毕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两个条件。第一，有大学财政的符号化。一方面，高层管理人员代表着约克大学的“财政缺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财政低迷-支出超过收入-年度预算削减-新的效率措施和学费框架)，这导致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另一方面，校长工资和奖金、行政人员加薪、顾问、校园建筑建设和翻新项目、新运动场、体育场人造草皮和场地照明、安全措施和设备，以及品牌重塑活动等方面的支出都在增加。其次，还有任何一所特定大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现实。经济“危机”已不再是幕间休息;正如⊠i⊠ek(2010)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一种经济紧急状态正在成为永久状态:变成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的时期(96)。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宣布破产并要求政府救助，而是被管理者用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如2008-2009年约克大学合同制教师、教学和研究生助理的85天罢工以及最近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劳资纠纷所揭示的那样，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战略是由最弱势的工人——助教、专业人员、临时教师和员工——支付的(各种作者，2012)。

第三，使大学成为智力探究和批评的对象会带来一些困难。正如韦伯(2001)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工作的具体大学可能无法提供概括大学的正当化。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有时会把我自己的大学作为加拿大公立大学的象征。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假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大学”的结构效应或多或少正在加拿大的每一所地方大学发生。以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为例。在多伦多帝国俱乐部的演讲中，约克大学的校长——一位专业的机械工程师——谈到了“知识经济”中的高等教育服务是加拿大进口的增值产品(Shoukri, 2013)。从这个角度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国际教育是“东道国的经济优势”。证据就在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中;从2008年到2010年，留学生在学费、住宿和其他可自由支配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从65亿美元增加到80亿美元。

我的项目借鉴了媒体和网络的唯物主义理论。当涉及到学术的存在、技术和时间时，学术的生活形式是一种“重复的生活”(Sloterdijk, 2012)。然而，在数字化转型之后，我们在网络文化中阅读和写作的具身参与和实践与过去在书本文化中不同。正如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本卷)所解释的那样，“数字化既是一种普遍的翻译媒介，也是一种与其他媒介相比较的特定媒介，因为当重新嵌入在数字形式内时，其特定的网络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71)。这种通用的交流依赖于网络的生产和它们的效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校园网是用私有IT系统行业的商用硬件建立起来的。今天，正如Mejias所指出的那样，私有的“社交网络服务呈现出双重过程，既可以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又可以通过网络本身架构所促进的机制来控制和监控这些空间”(2010:603)。他接着对“节点中心主义”——如果“某物在网络上可用，它就被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和“超然主义”——“如果它不可用，它可能就不是真实的”(611)做出了有益的区分。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把握公共辅助的网络大学的双重过程如何产生影响，不仅对于了解大学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在其内部或外部的节点边界之外存在的可能使网络大学充满活力的东西。网络大学的空间，尽管控制着边缘，但已经扩大了，网络大学的时间，尽管时间短缺，对事件是开放的。

网络工作

我没有加入追求大学概念的众多学者的行列，而是从网络的概念开始。第一个问题是定义问题——“网络”一词本身的适用性。有各种各样的重新命名大学的竞争者——公司的、虚拟的、创业的、生态的等等——但我发现“网络”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工具。“网络”一词有五种含义。首先，网络大学体现了网络社会的诞生和从支柱模式向网络模式的转变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大学生活(Standaert, 2009)。校园网不仅仅是一个隐喻，而且是一个与组织文化相连的社会技术网络(Lewis, Marginson, and Snyder, 2005)。在第二种意义上，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关于教学、学习和研究的学术实践以及这些实践的社会意义的相互关联和明确的信仰网络”(Ringer, 1992: 13)。拉图尔(Latour, 2005)提出放弃“网络”一词的多义性，转而使用工作网或行动网。在第三种意义上，我更倾向于保留这个概念，因为“工作”是嵌入在“网络”中的。我们做知识工作(Liu, 2004)，而我们的计算机工作是处理信息和操纵数据。教师主体连接到相同的通用机器和互联网，灵活地连接到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认知网络，以及不同规模的有组织的研究单位。然而，信息技术(IT)专业人员也是设计、构建、测试、配置、保护、修复和维护校园网的角色。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和网络相互构成:IT专业人员构成技术网络，教师构成知识网络。第四，借鉴德勒兹的追随者Shaviro的观点，网络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式控制系统(2003:21)。大学展示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杂交，这是虚拟环境的特征(Dourish, 2001);此外，网络空间“总是折叠、分割、扩张和收缩”(Shaviro, 2003: 7)。最后，当“虚拟”不是简单地与真实的大学相对立时，理解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复杂。借用塞克尔的话，“抽象但又真实的网络总是在制定和即将制定自己”(2004,xiv)。

根据一些更早的说法，晚期现代大学已经失去了其统一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功能。是什么统一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交流是“将社会学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为知识形式和知识社区之间的联系提供形式和实体”(Becher和Trowler, 2001: 77)。在回顾了大学的理念之后，哈贝马斯意识到学科的多样性不再能够将所有的功能捆绑在一起。他接着表达了他的信仰，即“科学和学术论证的交流形式将大学学习过程的各种功能结合在一起”(1989:124)。即使教师和学生是单独工作的，他们也被嵌入到研究人员的公共交流中。因为这种合作的事业涉及到论证的结构，他声称，真理，或学术团体所获得的声誉，“永远不能成为纯粹的东西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个自我调节子系统的引导媒介”(1989:124)。在他忽略了网络功能的论证中，正是科学和学术活动的规范将大学与社会区分开来，即使它分享了该社会的交往理性。

这种规范理想被大学“促进条件”的兴起所破坏(Wernick, 1991)。大学将与广告的话语——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象征体系——进行交流。作为一种修辞，它不是由它说什么而是由它做什么来定义的。它针对的是一所大学的声誉，不是在学者教授的眼中，而是在消费者的眼中。第一个受害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真相，而是“宣传信息所调动的语言材料的非常有意义的东西”(189)。此外，宣传修辞不能从被宣传的东西中分离出来——宣传主义被重新纳入高等教育的改造。由于投入不足，这种推广主义的过程被强化了;大学忙着重塑自己的品牌，营销活动被认为是“战略投资”。在争夺高等教育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媒体关系单位通过向媒体推销大学故事和教师研究成果来追求“战略信息传递”，而产生的正面新闻故事则以其“公关价值”和“媒体印象”来衡量。

自从校园范围内的分布式网络出现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进行行政支持以来，人们对学术质量和自由的担忧之一就是超级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拥抱新技术。正如Reed和Deem(2002)所描述的那样:

> “新管理主义”发动的“文化革命”需要一种工作场所控制技术，这种技术需要改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以便使其成为一项可行的变革方案;以一系列实践和设备为基础，这些实践和设备专注于重新设计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作的内部和通过的劳动过程的高度复杂的任务。(130)

例如，Stepulevage(2009)分析了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企业资源规划(ERP)技术如何将大学的现实建模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的、稳定的系统，这反过来又体现了“最佳实践”的神话，它可能没有考虑到工作是如何实际执行的。McNally(2010)更进了一步，认为企业内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管理学将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原则扩展到智力劳动中。教师们一直在重新培训自己，以便从事数字劳动，系统管理员也是如此;其结果是对学术劳动过程的更大管理控制。

今天，超级管理主义包括审计文化、机构研究、电子表格、网络客户端、绩效指标、信息捕获、营销远程控制等等。例如，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文科与专业研究学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的员工要接受一位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为期12个月的部门审查，该合作伙伴在“流程效率的设计与实施”和“特定工作能力的设计”方面具有经验。这个合作伙伴来自加拿大玩具反斗城、欧洲直升机加拿大有限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圣凯瑟琳市。通过这种方式，员工的工作嵌入到跨越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流程中。相对于-à-vis管理主义的命令，教员团体的相对自主性已成为一种逐渐褪色的记忆。正如戈达尔(2010)所观察到的那样，“作为一种保密文化取代了‘持不同意见的社区’，信息从行政部门的营销人员那里官僚地向下流动”(30)。与此同时，官僚式向上流动的信息将教师定位为服务组织中的客户。作为约克大学文科与专业研究学院部门审查过程的一部分，根据院长和主任的建议，教师对行政服务和支持的反馈采取了在线调查的形式。

与此同时，由美国顾问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dickson)推动的政府最新的“学术和行政优先”(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优先权)活动旨在通过削弱教务委员会及其委员会在监督学术项目中的宪法作用，将学术和财务规划整合起来(Heron, 2013)。行政部门有权收集信息，而参议院则负责制定学术政策。即使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参与设计信息模板，这样的工作也需要从每个项目收集大量数据，对它们进行评级，并就优势和劣势、(再)投资、去投资和增长领域做出决定。这就说明了用教师制定的学术标准对模板进行磋商和编纂将如何加强管理人员对部门绩效指标的关注，而不是抑制预算削减的合理化过程。即使有了民主的验证，院系也可能变得更引人注目，教授也更容易被评估。采用这种管理技术会进一步减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教师的行动权力和增加新自由主义政府的财政权力作为公共评估的权力(Lazzarato, 2012)。

通过数字网络媒体追求教学的可再现性存在危险。机械复制和数字复制时代的教学工作有一段历史，可以追溯到Sidney Pressey 1924年的教学机器(Petrina, 2004)。这是一台机械机器，用来解除教师肩上的操练和练习的负担。虽然出现了新的软件和分析方法，但降低教学劳动密集程度的愿望并不新鲜。计算机辅导研究人员正在研究STEM课程的人工智能辅导系统(VanLehn, 2011)，并且正在开发自动论文评分引擎来自动评分学生论文(Stross, 2012)。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的非营利性开源在线学习平台EdX开发了免费的论文评分软件。这款软件学习了人类导师的评分技术，代表了即时评分梦想的实现。然而，这样的人工制品还处于实验阶段，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大多数大学的企业级软件系统和应用程序的一部分。

网络大学

网络大学已经从现代“废墟中的大学”(reading, 1996)中脱颖而出，成为Castell“网络社会”(Pruett and Schwellenbach, 2004)中的一个节点。正如Agre所指出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变迁是相互联系的;信息技术战略可以理解为一种融合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发展模式(2002)。要超越经济主义——认为网络大学的形式和角色嵌入经济危机中，并通过将技术科学与技术资本联系起来来应对经济危机——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媒介理论和历史绕行。Hansen(2010)提出，新媒体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被视为“新”:媒体不仅储存经验，它们还“中介中介的条件”(81)。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正处于“中介政权更迭”之中。数字媒体及其网络对于公立大学的日常运作、知识的循环、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思考和世俗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加拿大的背景下，哈罗德·a·英尼斯(Harold A.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思想说明了“媒介政权更迭”是如何成为思考媒体和高等教育的历史契机。接起柏拉图对写作的批判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费德鲁斯篇*》中，英尼斯写道，在印刷机和收音机的时代，“交流的进步”，特别是文字的大量生产，“削弱了持续思考的可能性，当它变得更加必要时”(1946:xiv).从西方大学口头教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教科书和考试制度代表了机械化的威胁。他认为，“机器工业”和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体加速了“导致学生思想封闭的事实的传播”(英尼斯, 1951[1947])。在他看来，机械化破坏了大学的两个真正的功能:“学习的生活，无论是几年还是整个职业生涯，以及在那段时间里把老师和老师、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进行生活交往”(1946:8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极权主义所包围，现代科学的兴起与世界大战后的“文明复兴”之间的脱节困扰着他;用他的话来说，“象牙实验室”“摧毁了象牙塔”(73)。由于来自国家的政治压力和“商人的判断”，他认为大学将成为“资本主义被保留的机构之一”(75)。他的结论是:“购买大学，就是摧毁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明”(75)。

与英尼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克卢汉避免在文章中哀叹大学是西方文明及其衰落的熔炉。相反，他将新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视为实验和创造教育未来的机会。英尼斯回顾过去，仍然坚定地相信平衡时间和空间偏见的媒体，麦克卢汉主张艺术是对我们的技术环境的“动态反馈”(麦克卢汉，1964年:与英尼斯相反，麦克卢汉的历史定位是关注电视的兴起，并将科学革命的影响视为“网络国家”。他把握到，“通过电力瞬时检索信息”将使“在空间上被移除的地点，处于连续转换过程中的材料”的库存成为可能(1964:300,310)。他预见到“自动化不仅会影响消费和营销的每一个阶段;因为消费者在自动化回路中成为了生产者”(1964:303)。麦克卢汉在第一波控制论浪潮及其计算机-大脑类比的浪潮中冲浪，进入了扩展的意识，标志着电子媒体和网络国家对印刷人的影响——也被称为自由人文主义主体。

后人类主体又过了四十年才被注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大学:湿、硬、软、硬》(Universities: Wet, Hard, Soft and Harder)一书中认为，讲座、图书馆和邮件这些硬件促成了“累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和递归的知识生产”(2004:245)。他强调了希腊字母和二进制代码之间的递归关系，以及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大学硬件之间的相似之处。经过800年以大学为基础的媒体史，计算已经从数学系传播到其他所有院系。在他对大学的技术框架的描述中，“大学终于成功地再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媒体系统”(2004:249)。他认为，这种技术融合的结果是“知识、学科、部门的新统一性”和“本体论或存在的逻各斯已在计算机器中具体化”(2004:250)。当二进制代码取代字母、图像和声音时，他希望“语言、音乐、电影和诗歌研究的方法论整合可能开始”(基特勒，2004:250)。在他的后人类视野中，文化技术，而不是人，将成为人文学科的合适主体(基特勒，2004:251)。

除了这些令人高兴的结果，基特勒还关注芯片设计、操作系统和接口以及专有解决方案、专利、商标和版权的商业化。像Coursera这样的新软件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商业化的担忧，“copy-far - left”也只到了宣言阶段(Kleiner, 2010)。2012年的《版权现代化法案》(Copyright Modernization Act)包含了对公平交易的修正，承认了读者/用户出于教育目的的权利，这为诉讼奠定了基础。2013年4月，加拿大版权授权机构Access Copyright就约克大学在校外复印课程包一事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总法律顾问的“文件保存通知”指出，任何“表面上与法律程序相关的文件”都必须保存，对此，约克大学教师协会根据备忘录的恐惧和过度要求提出了政策申诉。

以大学为基础的媒体不仅仅是计算机化和版权。由于技术趋同，学术界对知识的垄断丧失，以及教育和商业之间的重叠，Alan Liu(2004)解释了利用信息技术的知识工作如何不仅改变了“文学”研究，也改变了学者。在后工业时代，他写道，“学者本身在完全意义上就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也是中层管理者，负责无穷无尽的一系列项目、委员会、绩效报告等等”(21)。继布迪厄之后，他认为信息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信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不考虑技术中介的消费……是我们当代的习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信息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组织的主观原则’(如布迪厄所说)被一个被定义为技术客体的世界所深刻地灌输”(41)。从他对生产的观点来看，IT是一种发展模式，它“产生了相当于半自主的doxa——一种对信息或技术的信仰”(40)，同时“新社团主义”将“文化与技术和技术”等同起来(69)。管理者努力将技术和技术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现在我转向三组考虑，从哲学和德里达的开创性论文“Mochlos，或能力冲突”开始。康德的哲学课题是界定大学和能够作出决定的教员的判断。德里达认为，康德试图通过将知识与知识的发布分离来拯救理性话语。康德的哲学需求集中在语言上，而德里达则认为:“这种哲学需求最好地体现在信息技术上，虽然今天似乎摆脱了大学的控制——用康德的话说，哲学——是它的产物，也是它最忠实的代表”(2004:98)。

在德里达的阅读中，康德文本内部的矛盾随着出版、存档和媒介化的扩张而变得无法解决。新期刊《*现代》的创刊号*专门讨论学术期刊的未来，它用这些进步的术语描述了从印刷到数字网络媒体的转变:

> 我们今天拥有的学术知识体系起源于17世纪。它将学者们的个性、独创性、客观性和知识属性神圣化，这些学者们在一个由印刷品的固定性、统一性和专有地位所定义的知识体系中单独(或以小组形式)工作。现在，网络化的IT技术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中，信息和知识不再是固定的和专有的;在这里，文化突破是集体智慧、大规模协作、组合和不断修订的实践结果;在那里，作者身份和权威越来越多地以集体和匿名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建立起来。(http://amodern.net/)

与知识的生产形式平行的是主体性的生产形式。这里我们可以求助于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哲学贡献。*在《在资本的世界内部》*中，他描述了使用的后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继印刷书籍和电子媒体之后，数字媒体为主体性带来的影响。在他的哲学观点中，“后现代的‘用户自我’，正开始取代更为沉重的主体性形式，即现代时代的‘受教育的自我’”(2013:219)。通过使用检索信息的技术，减轻了收集经验的负担，“读者主体性消解为用户主体性”(2013:219)。在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文化中，用户收集的是地址，而不是经验。对他来说，下载“表达了向后体验时代的过渡”，而这种过渡伴随着未来的“后个人、后文学、后学术认知体制”(2013;220)。在《*哲学的艺术*》一书中，他对理性文化中观察者的兴起进行了描述。回到柏拉图，他认为学院是一种空间创造的创新。他写道，它是“胡塞尔(Husserl)称之为时代(epoch<s:1>)的建筑的等同物——一种将世界拒之门外、将关切包起来的建筑，是我们称之为思想和定理的神秘客人的避难所”(2012:33)。在这个空间里，他描述了根植于欧洲阅读模式的人文学科的观察模式是如何建立在世界和书之间的类比之上的。他观察到，这种“经典的类比”“在显示器屏幕和键盘的时代已经完全瓦解”(2012:54)。

第二组考虑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正如席勒(1999)所描述的那样，互联网起源于美国，是为大学、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使用而创建的。作为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先锋，互联网加速了教育的蜕变，使教育从属于经济。经济主义是侵入公立大学封闭空间的巨大入侵者。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这种商业化大学的批评不绝于目。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将技术变革推向前台。1998年，教授科学技术的“失控技术”批评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提出了他的“自动教授机”(Automatic Professor Machine)。为了应对在线教育的激增，这部讽刺作品描绘了自动化时代教师的工作，与利用技术为高等教育行业服务的意愿背道而驰。

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在《*数字文凭磨坊:高等教育的自动化*》(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对将计算机用于教育的商业化、商品化和行政命令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他看来，管理部门部署技术主要是为了纪律、技能和取代劳动力以获取利润。在他的历史观点中，危险在于学术劳动将陷入工业资本/劳动辩证法之中。然而，既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随着文字处理和电子邮件的出现，教师们一直在参与大规模的学徒培训，以获得新的数字技能。此外，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学术工作一直以来都已经是“非物质劳动”，这是一种融合了信息、文化和情感内容、工作和非工作、现实和虚拟的新劳动概念。即使我们独自作曲，学术工作和生活也是知识丰富的，它需要合作和协调。但在温纳和诺布尔对未来高等教育的设想中，技术都是追求效率和商品化的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新技术是一种应该抵制的工业趋势。尽管商品化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可能会误解媒体的技术能力和设计在塑造技术方面的作用。

Côté和阿拉哈的《*象牙塔蓝调:危机中的大学系统*》提供了“脱离契约”的概念，以阐明高等教育的社会学方面。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因素，本科生已经成为“不情愿的知识分子”，教职员工成为“不情愿的看门人”。在他们2011年的后续著作《*降低高等教育:企业大学*的*兴起和自由教育的衰落*》中，他们评估了新技术是否会拯救世界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新技术可以促进学习，但不会取代教师”(2011:174)。其次，这些技术“最好用于学习具体的、个性化的材料(如流行文化)的乐趣，而不是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工作，以及学习如何处理书面和口头形式的抽象概念”(2011:174)。虽然他们的第一个观点是教授，而不是互联网，体现了智慧，但他们的第二个观点似乎依赖于对认知和情感的简单划分，并忽视了任何学科的思维与媒体之间的联系。

回顾过去，我们更有可能看到高等教育的未来已经到来。个人电脑、互联网、电子邮件、万维网、电子索引、数字期刊、电子书、电子储备、课程管理系统、搜索引擎、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已经改变了学术交流和传统的校园课堂。首先，未经证实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反面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虚拟化的威胁是“大学管理者的权力意志，他们现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和图像控制、监视、单向通信、法令和对行动者的强制性要求”(McCarthy et al.， 2009: 48)。在教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混合式学习的兴起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模式。这种模式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面与在线平台的争论。它借鉴了现有的实践，并吸收了新的技术，以寻找“最佳实践”。一般来说，课程网站、音频播客、内容或学习管理系统、视频捕捉和数字媒体被认为比任何“舞台上的圣人”都更有刺激性。

Moodle等课程管理系统(CMS)还可以扩展课程的存档，并实现对课程时间轴的操纵。与视频录制和分发相结合，它们提供了“翻转课程”的可能性-将课堂时间重新分配给讨论，小组工作，解决问题，或动手或同伴学习。这种发展没有意识到讲座是一种谈话形式(Goffman, 1981)，而带着学术目的的阅读、积极倾听和记笔记都是学术技能。随着大学开发“机构学习成果”与省政府评估经合组织国家学习成果的可行性研究(见培训、学院和大学部，2012年)同时进行，翻转教学模式正在从小学和中学向高等教育发展。由于学生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讲座作为面对面交流的上限——即使有放大和投影——也已经超过了。越来越多的人信仰，网络化的数字媒体将解放大型教室的时间，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真实的学习和空间。

然而，连通性意味着连接和断开(Shaviro, 2003)。学生可能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数字内容。然而，张贴文件并不能保证他们会在讲座或教程中及时阅读。自从采用Moodle以来，我的活动报告显示，随着学期结束的临近，在上课前访问我制作并发布的课程大纲的学生比例下降了。Moodle创造了一个混合的教室空间，但它不能解决学生时间经济的矛盾。在这种经济中，有偿工作和不断积累的债务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最大障碍。

除了脱节的问题，还有教学法的传播模式需要考虑。马克·努涅斯(Mark Nunes)在对网络空间和学生群体的分析中指出，“因此，通过日常生活的网络空间对课堂的任何重组都必须涉及对学生的重组(2006:131-32)。通过与网络的互动，学生被建立为“在一个随意的传播社区内的网络主体位置”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和交换”(2006:148)。“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花言巧语掩盖了上网如何强化了“沟通的管道谬论”。下一步要考虑的是，谁注册了课程，并被大学当作“客户”来处理。这就是灵活、流动、容易从学习生活中退出的网络学生主体。

尽管对学生主体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但当前的管理风格仍在继续推动电子学习。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有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开发可以扩大规模的“技术增强”学习的“最佳实践”。同时，UIT正在建设更多的电子学习平台，以适应学生的“移动性”。尽管希瑟·卡努卡(2006)警告称，对电子学习有效性的信仰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存在脱节，但约克学习技术研究所仍呼吁对增加电子课程数量的商业案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开发。评估混合学习的“技术报告”从评估标准中选取标准，但根据大学电子学习商业案例的标准对问题进行分组(Owston和约克, 2012-13)。第一个标准是“提高约克大学应对入学压力的能力”。与学生有关的第一个建议是“争取更高水平的课程满意度(例如，80%)，并在做出有关课程设计和交付的所有决策时都考虑到这一目标。”在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组织机构是如何将教学转向更在线的方向的。与早期基于网络的教育倡议一样，这项研究“受到大学管理转型的框架和推动”(Brabazon, 2007: 10)。“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是廉价学习的借口”(Brabazon, 2007: 77)，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领导和责任的辩论或对学术工作条件的反思。

挑战在于开展不受招生压力决定的公共利益的教育研究，并设计不受主权学生消费者影响的课程。正如卡努卡(2006)也指出的那样，吹捧优势的小插图和网站已经淹没了电子学习有其缺点的发现。在对美国三所研究型大学的42位教授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中，大卫·约翰逊发现，“学者认为教学技术在提高教育方面的价值有限，而且技术的使用很少受到教学创新的激励”(2012: 126)。教学技术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同时教授更多学生的压力足以诱使教师采用与改善学习无关的技术。根据Norm Friesen的说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网络教育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线上和线下的差异上。辩论受到对交流、经验和教育的“技术化”理解的阻碍(2011:xiv)。将辩论简化为考虑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区别，可能会使技术的教育用途更合适，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技术和教学政治上转移开。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电子学习来说，教学技术越“有效”，我们就越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子学习有可能削弱教师的选择和控制。当私人拥有的网络服务被纳入时，同样的教育机会之门也会向市场和商品化敞开。

网络空间还体现在教师习惯上。根据《*大学事务》的说法*，我们正在成为“教授2.0”。媒体一直是我们学术实践的延伸。我们仍然在学术部落中工作和生活，但我们变得更加游牧。由于学术的语法化，我们处于印刷和数字代码之间(Robertson, 2013)。

虽然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属于哪个学术时代和排名，一种方法只和它的老师一样好，但我们都经历了互联网工作和界面时间的增加。社交媒体代表了另一波技术浪潮:拥有智能手机的学生可以实时访问社交网络媒体流，大学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宣传自己，图书馆呼吁参与到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中来，员工内部网用仪表板访问应用程序、在线系统、社交媒体平台也在陆续推出。在社交媒体之后的公立大学里，教师们正在成为平台化的附庸。

要超越社交媒体的满意和不满意，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探究。媒体研究很适合研究大学与媒体的关系(Rowe and Brass, 2008: 2011)。除了表征和话语形成之外，我们还应该批判性地审视“媒介化”的元过程(Hepps, 2013)。作为一个指导研究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网络大学是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中形成的。在这种我们学术生活世界媒体饱和的观点下，我们谈论的不再是大学中的媒体，或者是大学与媒体的关系，而是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学。正如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关于技术和时间的多卷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编程行业释放出一种同步化，这种同步化倾向于成为“所有工作工具的成为媒体”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以及社会化(包括学校……)”，这会导致精神和集体个性化的丧失(2011,100)。

我们可以从行政实践和IT策略开始，问问我的大学是如何成为一所网路大学的?约克大学的网络可能是一个范例。1995年，从IBM大型机计算转向思科系统共享的客户端-服务器网络，创造了一个分散但过于异构的IT基础设施，不适合“综合性大学”的模式。为了便于扩展，交换以太网成为符合TCP/IP协议的新拓扑结构，并将尝试另一种组织技术。20世纪90年代末，“行政性”和“学术性”计算的界限被打破。到了2000年代中期，“面向公用事业”的基础设施与“面向服务”的应用相结合。到2000年代末，“围绕IT的讨论越来越多地涉及管理大学，而不仅仅是管理IT”(IT战略工作组，2009年)。在此期间，IT专业人员充当了IT行业供应商和他们的“客户”(管理员、教师、职员和学生)之间的技术中介。大学图书馆一直走在数字化的前沿，创建共享电子期刊、电子书和数据集的基础设施，以及访问引文管理工具。像其他大学一样，约克大学实施了一个机构知识库来存储该机构的智力产出，并为项目、部门及其藏品提供空间。加拿大的另一个主要举措是开放期刊系统中的数字期刊托管。这些发展进一步支持了Kittler(1990)的命题，即所有“图书馆都是话语网络，但所有话语网络都不是书”(369)。

对于IT专业人士来说，工具主义的技术观点是霸权的。2005年至2010年间，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前文学院(Faculty of Arts)的教职员工被要求参与所在单位的计算机技术规划，但管理者指示他们将IT视为“仅仅是一种使单位实现教学、研究和管理目标的工具”。教师在做出技术选择或决策方面的有限作用与“参议院的衰落、双相机主义和教师的治理作用”(Wernick, 2006: 7)相似。我们必须回到1997年，才能发现约克教师协会最后一次在集体谈判过程中权衡IT问题:教师对版权的保留和对技术的适当使用的判断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教师们对电子邮件列表服务的感知能力似乎发生了变化。在约克大学，一位教授关于参议院名单服务角色变化的电子邮件值得详细引用:

> 2001年至2008年，我在参议院任职。当时，我发现参议院l是在参议院会议之前进行讨论的有用场所。它可以使参议员更积极地参与参议院的事务。我发现参议院不是进行认真讨论和反思的最佳场所，也不是对即将投票的项目突然提出新观点的最佳场所。我于2012年重新加入参议院。参议院l的角色似乎发生了变化:参与讨论的意愿似乎有所减少。也许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有一种理解，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其他的，即参议院l将主要用于公告，双向讨论不一定受到鼓励(即使不是积极劝阻)。或者也可能不鼓励。无论如何，我对参议院l案的长期沉默感到不舒服。(马德拉斯，2013)

在线讨论的减少与参议院会议出席人数的减少相对应。2013年7月对教职员工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人将“兴趣”作为参加会议的理由，但只有56%的人认为参加会议是他们的“责任”。那些参加五次或更少会议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查看了文件，没有任何顾虑。

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可编程机器和数字媒体是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媒介。在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互联网使用的教育研究将班级规模与质量脱钩。从那时起，认知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和联结主义的话语框架了教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教育研究者认为，当学术技术文化与学生在大学之外的新媒体体验之间存在脱节时，就会存在“教育鸿沟”。因此，研究人员有责任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因此，教育研究倾向于关注新技术，以衡量成就或有效性，并将数字体验与大学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尽管存在这些分析限制和促进采用新媒体的研讨会，最近对15,000名qusamubec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想要一个引人入胜的讲座(Charbonneau, 2012)。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只有53%的学生对如何在课堂上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持积极感知，而86%的学生持积极看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教师(Charbonneau, 2013)。社交媒体兴起后，将教育用途与社会用途区分开来更加困难(见第7章)。

少数教师关于课堂上数字媒体的报告很少，但却很有启发性。一个例子是Mann(2012)的社论意见“让我们拔掉数字教室的插头”。为了回应安大略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大略省的创意、创新和知识中心”的白皮书，拔掉电源是他能想到的最激进的行动。为了避免班级规模进一步扩大，政府要求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引用这一“技术赋能教育”的愿景:“与教师将讲课数据‘传输’给坐在大厅里的学生不同，课程内容的数字化交付可以让传统机构的教师自由地与学生进行直接对话和指导”(2012:10)。在这一构想中，面对面的交流被简化为数据交换，而在线交流则因其即时性而受到青睐。除了忽视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物质性之外，这一政策还通过将文化与“创新”联系起来，劫持了文化的概念，并粉饰了公立大学是如何被新自由主义抛入危机的。

在网络大学中，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已经从中心位置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文化。换句话说，如果说网络是媒介，那么信息就是网络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网络社会性”是将教师和学生弱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Wittel, 2001)。在没有围墙的无线大学中，新连接模式的兴起与大学社交性的下降是平行的(Boyer, 2011)。他指出，“数字中介的技术能力”“可以加强更大的物理隔离以及虚拟连接，疏离感以及解放感，这取决于它们特定的制度化模式”(184)。

网络大学的一些文化指标是信息过剩和数据泛滥、滚动(而不是阅读)、分心(而不是着迷)、表面关注和麻木(而不是辨明力)。正如Sampson(2012)简洁总结的那样:在病毒式传播和网络关系的时代，“社会主体性”是一种“介于无意识和专注意识之间的催眠式梦游”(13)。在当代集体智慧的争夺战中，一位有进取心的学生开发了一款交互式应用程序，让教授可以使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设备与学生进行互动。基于学生响应系统的课堂技术，这是一个实时测量学生困惑的应用程序。不用举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学生可以匿名点击“困惑”或“理解”，他们的实时教授2.0就可以看到理解学生的百分比。在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一个极其聪明的算法在‘半衰期’内构建。“每个反应都会衰减，然后消失”，让2.0教授“有足够的时间注意到它”。为我们带来“及时”学生的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与为我们带来“及时”教授的网络应用相关联。采用和使用这一应用程序将维持学生的技术泡沫，同时剥夺他们在课堂上体验意义模糊或思想冲突的机会。

环境就是信息

我想继续论证，我们可以将制度背景描述为流通的学术环境。在1978年1月11日的演讲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环境“是解释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之间距离的行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环境是行动的媒介，是行动在其中循环的要素”(2007:20-21)。他将这一概念从物理学和生物学转移到16、17世纪的城镇规划中。环境与其说是一个执行纪律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规划的空间，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事件或要素被调节。在政治上，它也是一个“干预的领域……人们试图准确地影响一个群体。”在环境中，因果之间产生了循环联系，这些影响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就像城市规划者、桥梁和码头建设者一样，约克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也将大学空间视为房地产开发和IT项目的场所。对于IT经理和支持小组来说，这是组织信息流通和将技术发展融入大学的学术计划和日常运作的问题。

在1978年1月25日的演讲中，福柯将“流通从广义上定义为运动、交换和契约，作为一种分散形式，也是一种分配形式，问题在于:事物应该如何流通或不流通?””(2007:64)。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问题来理解网络大学的外新自由主义。例如，安大略省政府的白皮书要求高等教育系统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学生-消费者的“选择”和“劳动力市场成果”。25岁左右的人正处于“流动性的巅峰”。问题在于，这群人的流动性比凭据和信用更强。新自由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是学习、培训和就业之间更大的流动性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劳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证书和学分的经济价值取决于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可转移性。

其他学者写过关于数字复制时代如何为学术交流的新实践(Borgman, 2007)以及开放获取研究和奖学金(Hall, 2008)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文章。根据Wilson(2013)的研究，超过50%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服务器和桌面上使用开源软件。Moodle虚拟学习环境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功案例”。他认为定制开源代码是学术创造力和自由的延伸。但正如Galloway(2012)所建议的，另一个需要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开源如何塑造知识的存储和传输系统?(9)关于Web 2.0之后的开放同行评议和数据共享，Accord和Harley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是如何受到学科文化的制约的(2012)。

在学术交流变得更加开放的同时，大学对其信息系统进行了标准化和集中化，导致了“分布式集中化”(Liu, 2004: 147)。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从认知劳动的角度描述了两个相关过程。首先，是对网络内部工作的捕获。教师们经历过将行政工作下载到电脑上的情况。第二，劳动力分散到形式上自治，但实质上协调和依赖的自治部门(2009:88)。一方面，网络形式是非等级化的，强化了人人都从事认知劳动的学术独立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网络大学的流动性中，当机构级研究绩效的数据被上层管理人员处理和使用，以管理下层的教师管理人员时，产生了一种新的依赖性。

我将以一些结论性的观察和主张来结束本文。vil约克大学的网站和组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叠加在金字塔形现代机构上的圆形剧场式的交流结构。约克想象中的社区并不与自己对话。2013年，一个“更好的工作场所”项目组实施了一个名为YUlink的员工内部网。这个教师门户网站可以定制主页和个性化内容。这里有一个论坛，供“与在约克工作有关”的问题提问，由员工“主题专家”回答，还有一个征求“社区反馈”的部分，用于征求规划文件草案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没有任何对话的题词。总体而言，集中式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既提供了网络化的教师表演性，也提供了分层的表演性。通过新实践开放大学的离心趋势被一种向心反趋势所抵消，这种向心反趋势使教师机构分散化，强加和包含创新，从知识生产中提取和获取剩余价值。

网络大学的新颖之处在于从合理化到循环化的转变(Hanke, 2009; Whitner and Nemser, 2012)。无论什么资源的合理化继续下去，以及对教师士气的压抑作用都不能被高估。与此同时，在SSHRC和CIHR的推动下，知识的产生已经与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一功能已被添加到研究和教学中，以便将研究和专业知识与政府和社区机构联系起来。约克大学被认为是知识动员单位的领导者，共同创造对项目、政策或实践具有“研究影响”的知识产品。在这些知识网络中，研究不仅要“好”，还要“有用”。很难想象，传统的或数字化的人文学科学术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研究快照格式”，并将其传递给“决策者”。

学术环境的新鲜之处，也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上加以区分。关于空间性，彼得斯和布鲁特提出了这样的提法:“后现代时代知识和教育的新空间化是以网络的‘软架构’为基础的，它日益定义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主体性的性质”(2011:xxx)。

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网络化的学术空间在扩张和收缩时的形状。这种间隔关系到我们的研究兴趣、教学关系，以及罗纳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所描述的“作为学者的空间”(2011:77)。他观察到:

> 随着学者们被邀请、鼓励甚至哄骗去承担更广泛的身份，这个空间正在开放，变得更加流动。它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界限更加松散。学者作为企业家、管理者、质量评估者、导师、推动者和课程设计师(以及其他)的角色扩展了学术存在的本体论空间。(Barnett, 2011: 77)

跟随这些学者，我们必须对冥想、空间和时间的相互作用有更深的认识。大学仍然遵循着时间表和日历的传统节奏。同时，网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大学融入了加速发展的科技文化。多任务处理是常态，解决难题的时间和注意力下降，辅导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每个学生的时间更少，更多的学生在考试前“填空”，承认使用咖啡因、含糖能量饮料和非处方“学习药物”，如利他林、Concerta、Adderall、和Dexedrine来提高他们的精神注意力和耐力。在学术规划方面，开设了更多的全年本科课程，“精简”本科课程以减少毕业时间，并加快了研究生学习。在学术用工方面，“兼职”不再是指临时替代教师和专职教师争夺对研究时间至关重要的教学释放时间。在时间经济的制度层面上，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已经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被加速、加速和压缩的企业时间”将这种资源变成了剥夺(Giroux, 2007: 121)。

正如Meyeroff、Johnson和Braun(2011)所论证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工人的影响不仅相当于时间的短缺，而且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时间危机”。面临风险的是生活的学术形式;因此，“没有对大学所产生的时代进行分析和重塑，就不可能有大学的返工”(485)。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速度门槛，加速就变成了异化，网络就是我们学术存在的“空地”(Liu, 2004)，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体验到与大学的精神空间和工作节奏的异化(Rosa, 2010)。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长期的资金不足会产生持续的组织动荡。在安大略省，政策专家宣称整个公立大学部门是不可持续的(Clark, Moran, Skolnik, and Trick, 2009)。任何被剥夺了新投入的公立大学系统都将趋向于熵化。非专业教师就业的长期趋势削弱了一些教师的能量学和智力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其他教师。由于内部功能的分化和学术分工，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对于在与战略研究重点相一致的研究领域工作并得到“研究与创新”大学副校长支持的终身教授来说更为持久。

最后，当国家转向对学生群体健康的管理时，还会出现一个新兴的生物政治维度。2011年，安大略省政府以“加强学生支持”的名义继续支持银行的学生贷款业务，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使“忙碌的学生能够获得最新信息并检查他们的贷款”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智能手机上的状态。”在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中，学生贷款现在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家庭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从考试恐慌到金钱困境再到精神障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培训，“寻找行为变化的迹象;有人突然迟到或衣冠不整，或不再与人眼神交流或迟交作业”(Brown, 2013)。安大略省政府培训、学院和大学部长Brad Duguid并没有意识到学生贷款是不道德的(Ross, 2012)，而是在2012年3月宣布，将在三年内花费2700万美元来解决校园心理健康问题。其中600万加元将用于开通一条帮助热线，该热线将为学生提供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支持，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这样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公立大学危机的根源在于扩张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增加了“无论住在哪里”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革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层教师就业制度。

换句话说，网络大学的时空关系重大。环境是双重意义上的信息:环境是由机构内部的技术和技巧塑造的，反过来，环境塑造了教师和学生的方式。网络大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网络企业——一个开放但有界限的话语和技术、实践和过程、文化和主体性的数字联系。学术印刷和数字文化有其行动者、利益、价值观、代理机构和网络，但大学校长、理事会和管理人员在调节环境以适应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府政策方面占据上风。虽然网络大学是一个异质的、不可代表的组合，但制度化的模式为表演性和操作性安排了环境，而这种环境对在其中工作的所有教师都有影响。

参考文献

Accord, Sophia K., and Diane Harley. (2012). “Credit, Time and Personality: The Human Challenges to Sharing Scholarly Work Using Web 2.0.” *New Media and Society* 15(3): 379–97.

Agre, Philip. 2002.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Networked University.” In *Digital Academe: The New Media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eds. William H. Dutton and Brian D. Loader, 152–66. London: Routledge.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Angus, Ian. 2009. *Love the Questio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Winnipeg: Arbeiter Ring Publishing.

———. 2016. "Emergent Mea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Digital Nexus: Identity, Agenc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ed. Raphael Foshay, 49–69. Edmonton: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Ronald. 2011. *Being a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Becher, Tony, and Paul R. Trowler. 2001.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2nd ed.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Berardi, Franco. 2009.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Borgman, Christine L. 2007.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usquet, Marc. 2008. *How the University Work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ow-Wage N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oyer, Dominic. 2011.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Making the University Matter*, ed. Barbie Zelizer, 177–85.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Brabazon, Tara. 2007. *The University of Google: Education in the (Post) Information Age*. Aldershot, Hampshire; Burlington, VT: Ashgate.

Brown, Louise. 2013. "Queen's Park Earmarks $27 Million to Tackle Mental Health Issues on Ontario Campuses." *Toronto Star*, 26 March.

Callinicos, Alex. 2006. *Universities in a Neoliberal World*. London: Bookmarks Publications.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Charbonneau, Léo. 2012. "Students Prefer Good Lectures Over the Latest Technology in Class." *University Affairs*, 21 November.

———. 2013. "More on Student Preferences: Good Lectures Vs. Classroom Technology." *University Affairs*, 16 January.

Clark, Ian D., Greg Moran, Michael L. Skolnik, and David Trick. 2009.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e Forces Reshaping Higher Education in Ontario*. Kingston and Montré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ôté, James E., and Anton Allahar. 2007. *Ivory Tower Blues: A University System in Cris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011. *Lowering Higher Education: The Rise of Corporate Universities and the Fall of Liberal Edu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Derrida, Jacques. 2004.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E*yes of the University: Right to Philosophy 2*, trans. Richard Rand and Amy Wygant, 83–11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urish, Paul. 2001.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lusser, Vilém. 2002. *Writings/Vilém Flusser*. Trans. Erik Eisel, ed. Andreas Strö h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Trans. Graham Burchell. Ed.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Friesen, Norm. 2011. *The Place of the Classroom and the Space of the Screen: Relational Pedag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New York: Peter Lang.

Galloway, Alexander R. 2012.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Giroux, Henry A. 2007. *The University in Chains: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Godard, Barbara. 2010. "The Risk of Critique: Voices Across the Generations." In *Academic Callings: The University We Have Had, Now Have, and Could Have*, eds. Janice Newson and Claire Polster, 26–34.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Goffman, Erving.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earning Processes." In *The New Conservatism*, trans. Sherry Weber Nicholsen, ed. Sherry Weber Nicholsen, 100–127.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all, Gary. 2008. *Digitize this Book! The Politics of New Media, Or Why We Need Open Access N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nke, Bob. 2009. "Reflections on the Academic Milieu of Media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551–77.

———. 2011. "The Triple Crisis of the University." Conference Paper.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Liminal Labours: Plenary Panel on Academic Labour Conditions and Equity Issues, Montréal

Hansen, Mark B. N. 2010. "New Media." I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ed. W. J. T. Mitchell and Mark B. N. Hansen, 172–8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pp, Andreas. 2012.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eron, Craig. 2013. "Robert Dickeson: Right for Ontario?" OCUFA.

Innis, Harold A. 1946.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 Toronto: Ryerson Press.

———. 1951. "Adul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203–1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IT Strategy Working Group. 2009. "Meeting Challenges—Seizing Opportunity": York Univers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ategy.

Johnson, David. 2012.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fessional Control in the Professoriat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38(1): 126–49.

Kanuka, Heather. 2006. "Has E-Learning Delivered on Its Promise?" *Academic Matters*, 5–8.

Kerr, Clark. 2001.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5th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ttler, Friedrich A.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Trans. Michael Metteer, with Chris Culle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Universities: Wet, Hard, Soft and Harder." *Critical Inquiry* 31 (1): 244-255.

Kleiner, Dmytri. 2010. *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Latour, Bruno.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zzarato, Maurizi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Trans. Joshua David Jordan.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Lewis, Tania, Simon Marginson, and Ilana Snyder. 2005. "The Network Universit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Organisational Complexity 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59(1): 56–75.

Liu, Alan. 2004. *The Laws of Cool: Knowledge Work and the Cultur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dras, Neil. 2013. Purpose of Senate-L.

Mann, Doug. 2012. "Let's Unplug the Digital Classroom." *Toronto Star*, 6 October.

Markoff, John. 2012. "Essay-Grading Software Offers Professors a Break." *New York Times*, 4 April.

McCarthy, Cameron, Vivian Pitton, Kim Soochul and David Monje. 2009. "Power in the Academy." In *Power in the Academy*, eds. Jerome Satterthwaite, Heather Piper, and Patricia J. Sikes, 35–60. Stoke-on-Trent, UK; Sterling, US: Trentham Books.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carborough: Mentor Books, New American Library.

McNally, Michael B. 2010.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aylorism and Fordism to Intellectual Labour."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3/4): 357–73.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eans, Barbara, Yukie Toyama, Robert Murphy, Marianne Bakia, and Karla Jones. 2010. *Evalua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Online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and Review of Online Learning Studies*.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Planning,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Mejias, Ulises. 2010. "The Limits of Networks as Models for Organizing the Social." *New Media and Society* 12(4): 603–17.

Meyerhoff, Eli, Elizabeth Johnson, and Bruce Braun. 2011.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3): 483–507.

Ministry of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2. *Strengthening Ontario's Centres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Toronto: Queen's Printer For Ontario.

Moten, F., and S. Harney. 2004.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dercommons: Seven Theses." *Social Text* 22(2): 101–15.

Newfield, Christopher. 2008. *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ble, David. 2002. *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Nunes, Mark. 2006. *Cyberspaces of Everyday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wston, Ron, and Dennis York. 2012. Evalu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Courses in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and the Faculty of Health— Winter Session 2012: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Peters, Michael, and Ergin Bulut, eds.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Education, and Digital Labor*. New York: Peter Lang.

Petrina, Stephen. 2004. "Sidney Pressey and the Automation of Education, 1924– 1934."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5(2): 305–30.

Pruett, John, and Nick Schwellenbach. 2004. "The Rise of Network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http://www.utwatch.org/archives/the%20rise%20of%20network%20universities.pdf.

Readings, Bill.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ed, Mike, and Rosemary Deem. 2002. "New Managerialism: The Manager-Academic and Techn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Looking Forward to Virtuality?" In *The Virtual University? Knowledge, Markets, and Management*, eds. Kevin Robins and Frank Webster, 126–4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nger, Fritz. 1992. *Fields of Knowledge: 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on, Benjamin. 2013. "The Grammatization of Scholarship." *Amodern* (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Rosa, Hartmut. 2010.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Late-Modern Temporality*. NSU Summertalk. Malmö: NSU Press.

Ross, Andrew. 2012. "NYU Professor: Are Student Loans Immoral?" *The Daily Beast*, 27 September.

Rowe, David, and Kylie Brass. 2008. "The Uses of Academic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0(5): 677–98.

———. 2011. "We Take Academic Freedom Seriously": How University Media Offices Manage Academic Public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7(1): 3–20.

Sampson, Tony D. 2012. *Virality: Contagion Theory in the Age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iller, Dan.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haviro, Steven. 2003. *Connected, or What It Means to Liv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houkri, Mamdouh. 2012. "Is Education Canada's Next Great Export? Our Role in Lifting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ddress to the Empire Club, Toronto, ON, Nov 7. http://www. yorku. ca/president/communication/speeches/docs/addresstoempireclub.pdf.

Sloterdijk, Peter. 2012. *The Art of Philosophy: Wisdom as a Practice*. Trans. Karen Margol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3. *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 For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 Wieland Hoban. Cambridge, UK: Polity.

Standaert, Nicolas. 2009. "Towards a Networked University." In *Rethinking the University After Bologna: New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eyond Tradition and the Market*, 11–15. Antwerp: Universitair Centrum Sint-Ignatius Antwerpen.

Stepulevage, Linda. 2009. "ERP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Reinforcement of Myths." In *The Myth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 ed. Judith Burnett, Peter Senker, and Kathy Walker, 83–112. New York: Peter Lang.

Stiegler, Bernard. 2011.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ross, Randall. 2012. "The Algorithm Didn't Like My Essay." *New York Times*, 9 June.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hacker, Eugene. 2004. "Foreword: Protocol Is as Protocol Does." In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ed. A. Galloway, xi–xxi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VanLehn, Kurt. 2011.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Tutoring,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and Other Tutoring System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6(4): 197–221.

Various Authors. 2012. "Open Letter from SFU Faculty in Support of Striking Workers." http://rabble. ca/blogs/bloggers/campus-notes/2012/11/open-letter-sfu-faculty-support-striking-workers.

Weber, Samuel M. 2001. *Instit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xpanded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rnick, Andrew. 1991.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2006. "Univers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2-3): 557–63.

Whitener, Brian, and Dan Nemser. 2012. "Circulation and the New University." *T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8: 165–70.

Wilson, Scott. 2013. "Open Source in Higher Education: How Far Have We Come?" *The Guardian Higher Education Network*. http://www. theguardian. com/higher-education-network/blog/2013/mar/28/open-source-universities-development-jisc.

Wittel, Andreas. 2001. "Towards a Network Social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6): 51–76.

Woodhouse, Howard Robert. 2009. *Selling Out: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Corporate Market*. Kingston and Montré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i☒ek, Slavoj. 2010. "A Permanent Economic Emergency." *New Left Review* 64: 85–95.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8 织网
批判话语分析及其网络空间

莱斯利·林德巴勒

语言的能力是典型的人类能力，尽管它的无处不在意味着它有时很难理论化。为了从外部研究语言，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语言，但元语言学研究帮助我们揭示了人类最可疑的特征是如何嵌入到我们最重要的适应之中的。从维特根斯坦到索绪尔，从德里达到福柯，一系列的理论基石帮助我们看待语言的构建和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稳定的，因为我们能够用语言与他人交流，但是，通过概念化语言的关系本质——即通过符号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产生意义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意义比语法安排所暗示的更难以捉摸。

语言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而不是对自然世界的直接参考，通过研究历史上特定术语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某些形式的叙述(不)得到认可，意义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这个简短的解构练习是为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奠定基础所必需的。在CDA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知识[及其语言表达]不是获得对现实的准确描绘，而是在追求我们的各种目的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与世界抗衡”(Barker and Galasiñski, 2001: 3)

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群体是如何在他们的追求上比其他群体更成功的，这是基于参与期望的社会结构的能力。个体话语对不断被建立、再生产和捍卫的权力结构要么有贡献，要么有抵制，即使它们被拆除、重新混合和攻击。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寻找这些争论的地点，并审视当积累的权力能够在一个构建的(通常是剥削性的)真理中固定意义时所主张的坚实基础。从这些临时中心出发，分析者可以通过寻找语言“为新倡议提供立足点的分裂”来“希望超越我们的文化适应”(罗蒂引用Barker和Galasiñski, 2001: 20)。对于CDA研究者来说，语言具有限制和解放使用者的潜能。

从历史上看，CDA研究一直受到出版模式的限制，文本是在CDA希望挑战的剥削系统中产生的(有时是为剥削系统服务的)。万维网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活语言语料库，它以公司和工厂工人的声音、官僚的声音、权力经纪人的声音说话，为CDA研究人员提供了比过去更经济的途径来了解每个人的声音。奇怪的是，由于各种原因，CDA应用于这个集合的速度很慢。继Rebecca Rogers等人(2005)对“批判”“话语”“分析”等术语的解释之后，我对CDA与数字世界的接触提出了质疑，并补充了Gerlinde Mautner (2005)首先提出的要求考虑数字文本的论点。最后，我指出，随着网络的权力结构开始从解放转向灌输，当代的发展已经成熟，可以从批判话语分析师那里输入信息。

话语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核心，我们有话语。广义地说，我们可以把话语看作是一个“交际事件”(van Dijk, 2001: 98)，也就是说，一种旨在分享信息或想法的互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分析“对话互动、书面文本，以及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排版布局、图像和任何其他‘符码’或多媒体维度的意义”(van Dijk, 2001: 98)。任何一个实体使用符号或符号与另一个实体进行交流的实例，我们都可以声称一种话语形式正在发生。为了创建一个可管理的研究主题，CDA研究者识别不同层次的话语来揭示多层次的意义。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位重要的CDA学者James Gee将话语分为两派，他称之为“小d话语和大d话语”(Gee, 2004: 10)。小d话语是指构成交际事件的语言、符号或符号的小块。它是“句子的句法以及从句或句子之间的形式关系:顺序、首格、代词关系、主-被动语态、名词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句子和序列的形式属性”(van Dijk, 2001: 107)。小d语篇虽有名称，但它是文本内复杂的一组关系，为理解提供了钥匙。小d语篇密切关注语言的详细结构，以及该结构在文本中的作用。由于这是语言的基础层次，没有这种类型的分析，CDA是不完整的。

Teun van Dijk开始对文本进行分析，首先关注他所谓的小d话语的“全局意义”(van Dijk, 2001: 102)。这是文本的语义宏观结构，也就是说，文本是关于什么的。它是文本中最容易回忆的方面，可以通过查看文本特定部分的主题句或总体印象来概述。从这里，van Dijk转向他所谓的文本的“地方意义”(van Dijk, 2001: 103)。这时，我们开始观察具体的词语选择，以便理解关于主题的明确说法。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方面是代词的使用-文本如何构建“我们”和“他们”-以及夸张:在描述双方的方式中明显存在偏见的程度。这两个网站都揭示了自我的积极表现和他人的消极表现的程度。范Dijk还问，文本中遗漏了什么。检查主动/被动语态的案例可能会显示缺失或隐藏的代理人，词汇选择和隐喻强调两极分化，淡化排除或消除消极方面。在little d语篇的整个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将文本作为其自身的一个实体进行考察，并试图揭示隐藏在其语言结构中的秘密。

在数字世界中，小话语变得尤其成问题，因为出版平台和文本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实体。。例如，发布文本的网站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适用于所研究文本的语言位。以外部广告为特色的网站的广告不仅会随着每次访问而改变，而且通常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改变。虽然这种外部对文本的侵犯可能很容易被忽视，但其他网站的特色是用户生成的内容，包括到以前帖子的链接，个人认可的广告，以及通过推荐阅读和博客列表链接到整个文本。寻找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更仔细地观察有问题的文本，我们接近超文本的挑战:作者故意在特定话语之外注入内容的语言片段。在某些情况下，作者正在做熟悉的动作，例如引用或引用直接引语，以及将观众引导到有助于理论基础的相关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超文本可以协助解释，但不是必需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作者将使用超文本链接到已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话语的突出方面。如果没有超文本中包含的信息，观众就无法完全理解手边的文本。数字文本的这一独特方面证实，虽然小d话语很重要，但分析人员也必须考察语境。这就把我们带到了Gee所说的“大D”话语中。

大D话语将话语置于它无数的关系之中。它不仅考虑说了什么和怎么说，还评估谁在和谁说话，话语发生的时间，以及目的。大D话语认为，任何文本“都需要一个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经济的、哲学的、逻辑的或神经学的方法，这取决于一个人想知道什么”(van Dijk, 2001: 97)。Van Dijk的全局和局部区分也有助于确定大D话语的参数。

大D话语的全球语境将文本置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位置。当我们研究话语的全球语境时，我们是在识别发送者和接收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提及。有了上下文，语言使用者就可以选择相关的信息，并省略多余或不适用的细节。这不仅仅是将文本置于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哲学背景中。当我们确定了全球语境，并开始揭示文本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在更大社会中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当地语境，参与者的心理模式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

本地语境考虑的是相互作用的情境。这种交流在哪里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文本本身是命令、论点、请求还是行动(比如一项立法)?谁在参与，每个人在与话题和彼此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参与者有什么知识、意图、目标、规范和信仰?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文本的构建、传递和接收方式，从而告知含义。例如，Gee讨论了“猫坏了”(2004:21)这个句子的例子，以演示如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能指“猫”可以根据上下文有多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语境意义是一只猫的雕像。

这种地方层面的语境是批判话语分析的关键，因为这是代理和霸权问题产生的地方——“批判”一词的两个核心关注点。Van Dijk认为，话语与社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必须通过参与者的心理模型绕行。这些模式包含社会地位同一性的标记，包括思维和感觉方式、信仰和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团结、行为和互动方式，以及影响接受者如何理解相关内容的价值体系(van Dijk, 2001年)。Gee说，

> 人们*如何*说(或写)事物(即形式)有助于构成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即功能)。反过来，他们*所说*(或所写)的东西有助于构成他们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是*谁*(即，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身份)。最后，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给定的一套社会实践中，他们是*谁*，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世界。(Gee, 2004: 48)

这种观察是理解语篇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任何一种语言，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说，在语言学上都是和其他语言一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明白，选择白话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每次我们通过话语主张某种同一性时，我们都在重新制定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为我们所期望的同一性提供了蓝图。通过这种方式，“话语在反映和构建社会世界之间来回移动……并且不能被认为是中立的”(Rogers et al.， 2005: 369)。

在传统文本中，多种层次的编辑，包括他人的帮助，被用来帮助我们确保我们正确地协商语言，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即使在口头陈述中，我们也会仔细考虑我们的听众，以便采用适当的话语，包括着装和面部表情。如果我们被录音，这种关心和关注会更加复杂。然而，当我们准备在数字世界中呈现自己时，我们遇到了迈克尔·韦施所谓的“语境崩溃”(2009:22)的迷失感。多层次的访问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确定谁会成为我们观众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话语，将自己呈现给“一般化的一般化的他者”(24)——一种适用于所有可能语境的话语。进一步说，这种话语是直接的，因为它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通常不经过编辑的调解，出版的速度和便捷性意味着我们有时能够绕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编辑，公开充满情感或不符合性格的话语。一方面，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CDA研究者难以区分全局语境和局部语境，也难以解释可能与理解相关的心理模型。另一方面，它可以提供对说话者或作者的更亲密的看法，这是CDA在口头情境(如课堂研究)中所强调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CDA不仅仅关注文本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选择，也不局限于话语所说的和来自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CDA研究还考察了个体为了产生、维持或制定同一性而理解、适当和重用话语的方式。

分析

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话语分析要求实践者仔细考虑上下文的各个方面，包括本地和全球的，这些方面与对所讨论的交际事件的检查有关。这被称为“框架问题”(Gee, 2004: 32)，是CDA的主要批评点之一。没有明确的上下文理论，为了反驳那些从数据中挖掘支持其论点的例子的指责，CDA研究人员必须明确他们的分析框架以及他们对数据选择的理由。另一位CDA领域的杰出学者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 1995)开发了一种更全面的分析框架。他的方法首先立足于文本分析，然后是互动或话语实践，最后是社会或社会文化实践(Sheyholislami, 2001)。

在这种方法中，第一层次的分析是文本的;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小d语篇，从中我们收集语言证据，帮助我们构建语境框架。这种语言学证据包括正在讨论的想法，作者和读者同一性的构建，以及这种关系的构建方式。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第二个层面，即互动层面，这一层面更具解释性。与van Dijk对心理模型的讨论类似，费尔克劳将互动定位为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动态空间(Sheyholislami, 2001)。这询问参与者如何接收和解释文本，并随后复制或转换这些文本。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开始分析互文性的痕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或者文本如何挪用“其他文本的片段，这些片段可能被明确划分或合并，文本可能被同化、矛盾、讽刺地呼应，等等”(Sheyholislami, 2001:8)。

通过直接引用或话语的镜像惯例，相互作用的元素被嵌入文本中，提供语言属性，将分析指向社会层面上可行的框架。最后，在社会层面，使用多学科方法来探索特定话语中存在的复杂权力结构。费尔克劳查看媒体类型并评估访问。在传统媒体中，往往存在强势群体的过度代表，导致很多声音被忽视。考虑媒体语境中的政治，揭示了与国家、精英阶层、大公司或其他既得利益的关系。文化方面分析社会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规范。最后，“一个制度的经济学是其实践和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费尔克劳在Sheyholislami中引用，2001:10)，内容选择和对经济利益的偏见是明显的后果。

所有这些层次的分析意味着CDA研究者不仅要考虑文本的选择，而且必须捍卫建立上下文的各种意义框架。框架问题可能是CDA研究人员与互联网接触缓慢的一个原因;“选择什么应该进入语料库的原则标准需要发展和应用”(莫特纳，2005:815)，但“没有明确的语境理论”(van Dijk, 2001: 108)。事实上，基于网络的话语甚至会删除之前在数据选择中使用过的语料库标记。在传统的媒体形式中，“文本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画出来，为语料库的编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相比之下，大多数超文本都是‘无边界的’，不仅在开头和结尾方面，而且通过可点击的链接，在‘两侧’也是如此”(莫特纳，2005:819)。此外，正如在大D话语的讨论中提到的那样，语境崩溃的问题使得对互联网话语的交互性甚至社会性层面的评估变得有问题。正如Gee所说，个人的社会定位身份对CDA研究人员来说非常重要，除非我们将网络视为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模拟存在的反映(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否则“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和“给定的社会实践”(Gee, 2004:48)构成数字话语的框架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到数字世界中的框架问题也暗示了CDA中更深层次的张力。作为研究人员必须仔细考虑这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分析水平，建议基于网络的研究人员冻结内容，以保持对其研究主题的把握。这一过程否定了知识的突现性，并消除了作者的代理，因为研究者将文本从不稳定的形式移动到固定的形式，以便用于可验证性的测试。这些分析实践鼓励研究人员对文本和作者行使权力，这一立场与CDA的总体立场不一致:批判性观点。

批判视角

当CDA冻结内容时，它展示了语言选择产生权威结构的方式。关注权力和权威的结构是CDA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语言分析的地方。正如范Dijk所指出的，“与许多其他学术不同，CDA并不否认，而是明确地定义和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也就是说，CDA是有偏见的——并以此为荣”(van Dijk, 2001: 96)。CDA对简单地描述文本的语言方面不感兴趣;它寻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此外，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保持一致，并将分析定位于揭示不平等的条件。批判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方法，但一条共同的线索是它对权力和正义的总体关注。在这一保护伞下，批判理论在对权力的批判方法上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考虑到种族、新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等，批判理论家试图识别权力所假定的多种形式:“意识形态的、物理的、语言的、物质的、心理的、[和]文化的”(Rogers et al.， 2005: 368)。通过解构或将权力结构问题化，批判理论家能够论证事实不是中立的，而是在既定的等级制度中培养出来的，并为之服务。跨越大多数批判理论方法的一个特征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内化霸权(internalized hegemony)概念，即被压迫群体通过强制和同意的过程有意接受其征服的倾向。

对网络世界当前趋势的探索需要CDA学者的投入，以保持互联网“大大减少对CDA人士的偏见”(莫特纳，2005:816)。2005年，莫特纳描述了在线进行CDA的困难之一: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由于缺乏在传统媒体中组织和审查内容的“看门人”，研究人员有责任确定搜索引擎摆在他或她面前的数据的性质，并选择那些对回答特定研究问题有用的来源。(莫特纳，2005:817)

虽然框架问题在网络上变得更加成问题，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意味着迄今为止难以或不可能在话语分析中包含的所有声音都可以在“真实数据的巨大存储库”中访问(莫纳，2005:80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Eli Pariser(2011)在2011年TED演讲中所说，互联网已经失去了一些公正的味道。他说:“信息在网上流动的方式发生了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看不见的。”他指出，b谷歌、Facebook、雅虎、*赫芬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型服务提供商对网络的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几乎在与莫纳的对话中，Pariser概述了如何

> 在广播社会中，有这些守门人，编辑，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后来，互联网出现了，它把这些人扫地出门，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联系在一起，这真是太棒了。但这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火炬从人类看门人传递给算法看门人……他们没有编辑所拥有的那种内在的道德规范。(Pariser出版社，2011:n.p.)

使用可以在CDA论文中找到的数据框架，即地理来源、出版时间和访问方式(如果您没有登录搜索引擎帐户)，以及作者、性别、年龄、以及详细的消费模式(如果你登录了你的搜索引擎账户)——搜索引擎现在会对任何查询产生定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很难观看或消费那些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东西”(《Pariser》2011年引用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的话:n.p.)。当然，批判性分析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由谁量身定制的?”使用Pariser描述的搜索过滤器，个人“实际上看不到他们搜索的内容被编辑掉了”(Pariser, 2011: n.p.)。这使得权力系统可以根据不受公开审查的算法来确定对基于网络的话语的访问。如果“互联网正在向我们展示它认为我们想看到的东西”(Pariser，2011:n.p.，我的重点)，那么继续剥削模式的潜力就成熟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Pariser的观点让我对自己使用搜索页面Blackle的体验产生了质疑，这是一个由b谷歌提供动力的低能耗替代品。虽然我有一个谷歌帐户，但我通常不登录，这限制了谷歌可以访问的个人信息，以充实相关问题。使用最基本的搜索页面，我仍然发现有人对文字进行了奇怪的操纵，产生了虚假的搜索结果。Van Dijk概述了有用的修辞手段，以识别和考虑促进观众特定心理模型的公开操纵策略(Van Dijk, 2006)。当我考虑b谷歌的搜索查询导致的权力差异时，我将采用他的模型。

在文本层面，我注意到在搜索我自己的数字和音乐同一性时，1%黄色(一个单词)，Blackle会自动“纠正”我的搜索标准，将我的搜索修改为1%黄色(三个单词)。这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我独特的网络存在从属于空格和单独单词的语法标记。搜索框下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是说百分之一的黄色吗?”此外，为搜索结果生成的页面标题和摘要也可能被操纵。根据谷歌的网站管理员中心博客，有时“单一标题可能不是所有查询的最佳显示，因此[谷歌]有算法生成替代标题，使其更容易…用户识别相关页面”(Far, 2012: n. p.)。在对结果的裁剪和对用户和内容文本的操纵之间，谷歌可能呈现出“不完整或缺乏相关知识的搜索结果——这样就没有反驳错误、不完整或有偏见的断言的论据”(van Dijk, 2006: 375)。

在交互的层面上，个性化的结果可能意味着过去对自我的建构决定了将被反射回给用户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在探索存在的不同视界，而是越来越多地与自己互动，在一个我们会预测的世界中增加一种舒适感。很难理解谷歌收集可用于生成个性化结果的信息的多种方式，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种对信息获取的秘密操纵意味着，用户“不能否认或忽视”算法裁剪结果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van Dijk, 2006: 375)。

在社会层面上，搜索定制的访问仅限于谷歌本身(或任何你正在考虑的网站);经济和政治从属关系的问题是合理的关切。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的长期存在，以及需要理解的高度专业化知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这个过程，“诱导人们倾向于接受精英人士和组织的话语和论点”(van Dijk, 2006: 375)。这些精英人士控制着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库的途径。

谈到范Dijk关于操纵修辞的最后一个方面，即引起情绪反应，我对b谷歌对每个结果的表现评级感到震惊。告诉我，我的搜索在0.22秒内提供了250万条结果，目的是什么?通过在每次搜索中展示网络的浩瀚，“情感……”(van Dijk, 2006: 375)被吸引到与数字世界的每次接触中。如果我的搜索产生了超过一百万个结果，如果没有b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的帮助，我怎么能在整个网络的浩瀚中进行谈判呢?

正能量

当然，网络的许多方面都对CDA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CDA的研究人员承认在获取技术方面存在不平等，但Web 2.0或社交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参与数字话语所需的技术技能。这种“获取是平等主义的……网络内容不受机构和活跃在其中的专业人员的有序和标准化影响”(莫特纳，2005:817)。以谢丽尔普伦蒂斯(2010)对苏格兰独立的考察为例。通过结合历史话语、语料库语言技术和CDA，普伦蒂斯对英国报纸和一个支持独立的网站进行了关键字比较，以确定苏格兰流行意见的语言与受批准的英国声音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在基于网络的文本讨论论坛传播之前，如果没有广泛而昂贵的访谈或问卷调查，这种自称可以从每个人那里获得300多万字的研究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络的规模造成了一个*富裕的尴尬*”(mauner, 2005: 815)，但是提取、标记和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已经变得用户友好，解决了使第一个版本“超出大多数CDA研究人员”的技术要求(mauner, 2005: 816)。普伦蒂斯使用自动语义标注软件代替研究者手工标注，使语料库分析成为可能。普伦蒂斯认为，“自动语义标签可以用来增加标签过程的可靠性，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人的发现的可靠性”(普伦蒂斯，2010:431)。A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在CDA中一直存在争议，但对数据的定量收集和标记的呼吁支持了该领域的研究。

与传统的印刷媒体相比，网络允许对任何研究主题的最新一瞥。由于“媒体是如此的动态和灵活，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确度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mauner，2005:821)，这使得基于网络的CDA能够检查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细微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被其他媒体忽略。在另一项研究中，Nelya Koteyko发现网络是“一个有用的单词和短语资源，这些单词和短语太罕见了，无法出现在任何标准的有目的的语料库中”(2010:655)。在这项研究中，为了对涉及“碳”的化合物进行一致性检查，研究人员检查了8万多个RSS提要。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复合词列表，“代表不同社会领域的各种数据”(Koteyko, 2010: 658)指出网络是一个收集比在模拟环境下创建的更具代表性样本的空间。

结语

CDA将人类最重要的创新——语言——置于显微镜下。它渴望做到这一点，明确地服务于揭露和打击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结构中的剥削系统，这些系统反映了更大的社会和全球权力系统。CDA研究话语如何从一个地方的、个人的交际事件转变为构成社会和全球的权力结构。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首先通过认知发生——个人(从某处)得到它，然后相互作用——个人将它传播给其他人。如果我们要理解当前控制和权威的维度，如果我们不把互联网视为CDA参与的关键空间，我们就是疏忽了。从使用网络作为真实数据的存储库到检查网络上出现的结构，CDA在这个发展中的媒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网络的短暂性使其成为一个我们可以修改我们对知识理解的网站。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认识是能够集中参与实践的问题，而学习是改变参与模式的问题(伴随着同一性的变化)”(Rogers, 2004):12)我们也许能够利用CDA对权威的理解来解决数字世界中剥削性权力结构的持续发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参考文献

Barker, Chris, and Dariusz Galasiñski. 2001.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Discourse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Far, Pierre. 2012. "Better Page Titles in Search Results." *Google Webmaster Central Blog*. Accessed January 2012. http://googlewebmastercentral.blogspot.ca/2012/01/better-page-titles-in-search-results.html.

Gee, James. 2004. *Discourse Analysis: What Makes It Critical?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Koteyko, Nelya. 2010. "Mining the Internet for Linguistic and Social Data: An Analysis of 'Carbon Compounds' in Web Feeds." *Discourse Society* 21: 655–74.

Mautner, Gerlinde. 2005. "Time To Get Wired: Using Web-Based Corpor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Society* 16: 809–28.

Pariser, Eli. 2011. "Beware Online 'Filter Bubbles'." Filmed March 2011. TED video, 9:05. Posted March 2011. http://www.ted.com/talks/eli_pariser_beware_online_filter_ bubbles.html.

Prentice, Sheryl. 2010. "Using Automated Semantic Tagging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Scottish Independence from a Scottish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Discourse Society* 21: 405–37.

Rogers, Rebecca, Elizabeth Malancharuvil-Berkes, Melissa Mosley, Diane Hui, and Glynis O'Garro Joseph. 200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0: 365–416.

Rogers, Rebecca.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heyholislami, Jaff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A Thesis, Carleton University, 2001. http-server. carleton. ca/~jsheyhol/articles/what%20is%20CDA.pdf.

van Dijk, Teun A.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s. Ruth Wodak and Michael Meyer. 95–121. London: Sage.

———. 2006. "Discourse and Manipulation." *Discourse and Society* 17(2): 359–83.

Wesch, Michael. 2009. "YouTube and You: Experiences of Self-Awareness in the Context Collapse of the Recording Webcam." *EME* 8(2): 19–34.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9 paramortal，或者与互动数字死人共舞

Roman Onufrijchuk

僵尸无处不在。他们似乎体现了对传染病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偏执，军事工业综合体研发的疯狂，以及死者-如果不是死者，那么可能是他们的记忆-过去的罪恶，秘密的罪恶快感?他们是多么奇怪的死人啊!住在这里的不是海地的神或巫师，而是对生者的恶意:没有头脑，步履蹒跚，一心要侵犯。没有优雅、诱人的吸血鬼，也没有狼人氏族的高贵野蛮;这些都是无产者、疯狂的小人物、充满怨恨和被感染的邻居、服务员、职员、以前的啤酒友、公交车司机、护士、家庭主妇、中层管理人员、治安官、一两个义务性的传教士，以及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电影屏幕上、电脑游戏屏幕上看到他们。而且杀死它们也很有趣，对吧(前提是有一些有效的方法来杀死已经死去的东西)?你甚至不能参考柏拉图的organon empsykhon(《费德鲁斯篇》276a)，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腹语者发出声音，也没有操纵木偶的人。不，这些都是残忍的、个人主义的、无意识的东西。然而，死者，在他们所有的神话和恐怖的包装，继续着迷。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的《对着空气说话》(Talking into the Air)一书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引人注目、令人不安的观察结果:“所有的新媒体都让死人复活”(彼得斯，1997)。他并不是在谈论僵尸，既然它们除了早期的咆哮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它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狼人没有死，亡灵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从同样的恐怖僵尸中出现，但要通过他们的诱惑、智慧和打扮来与后者区分开来)。不，彼得斯说的是新媒体形式的长生不老与我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神——娱乐媒体的名人和明星——相吻合;不只是这些——你和你的家人也一样。就像古埃及人的丧葬崇拜一样，我们的录音和网络实践在社会阶梯上上下延伸着“永生”。

想想所有的照片、视频或r6mm镜头、录音、信件和纪念品，以及我们留下的所有电子邮件、网络条目和帖子、备忘录和数字a/v收藏品，就像守丧一样。我们所有出生于1900年之后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留下了成千上万个时刻和情况记录的数据尾流。家庭相册、视频收藏、文件，以及从我们出生起就保存在我们身上的所有机构信息:出生证、童年的素描和油画、学校成绩单、驾照、护照、医疗记录。随着二十世纪的展开，这些生活记录越来越多。渐渐地，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再现我们自己、我们所经历的那几代人、我们为自己和他人所做的梦想、我们的成就和失败。然后是逐渐数字化的过程。由于担心会丢失越来越多的传记纪念品，我们开始将幻灯片和照片、录音、电影和视频转移到数字元素中，并将它们存储在我们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硬盘驱动器和云端。

这一点，再加上新的数字和网络媒体以及信息挖掘和处理所提供的机会，建立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起死回生”可以呈现出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51)所提供的僵尸“工业人的民间传说”截然不同的维度和意义。考虑到罗伯特·津格罗内所描述的“坚持不懈的技术”——自人类起源以来我们一直梦想或梦想拥有的技术——我们似乎正在追赶我们的梦想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除了死亡(1991)之外，几乎所有领域都在追梦。我们不会比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恩奇杜更渺小，也不会比赫克托耳更不朽。我们仍然像吉尔伽美什、赫库巴和普里阿摩斯那样哀悼。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杀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成长型行业。曾经几乎所有宗教的承诺都将被极客们接管，假以时日，死亡也将消亡。

这种效果既不会是僵尸，也不会是吸血鬼，也不会是我们期望在狂暴或恶毒的超自然现象中看到的任何东西。不，这一切都将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你可以用智能手机说话一样正常，然后它会代表你预订餐厅，购买机票，在某个你从未去过的城市告诉你去洗手间的路。如果这对我们这些玩电脑游戏甚至通过虚拟化身从事不同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惊喜，对我们这些在我们的配套技术中携带着我们自己的视听和数据记录的人来说，对我们每次与他人互动时都会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自我觉醒的人来说，或者我们的技术——在我们网络化的互联网驱动的生活世界里。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尾流上，我们都产生的尾流，一个相对永久的数据尾流。这些数据——有些在我们的配套技术中，有些在云中——被企业和政府部门视为重要信息的宝库。数据挖掘者整理我们留下的痕迹，以更多地了解我们，更好地“看到我们”和理解我们，这样营销工具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我们一直想要但从未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如拉尔夫·卡普兰(Ralph Caplan)在描述成功的新产品设计(1982)时所说的那样。

曾经，这种技能是一种直觉;然后变成了通过焦点小组和调查进行系统研究的问题;而现在，它变成了一门信息分析的“科学”。而重要的一点是，其目的显然是预测性的，在预见性的帮助下，主要是为了盈利。时间会告诉我们，所有的科学分析是否能取代过去的创造力和直觉，但就目前而言，很明显，我们可以从过去和现在的行为、沟通、对娱乐和消费品和服务的偏好、购买和会员资格、邮政编码中了解到很多关于未来行为的信息。在过去，这样的数据是偶发的，只以零碎的形式出现，而今天，它是真正的传记，几乎是实时的，是每天的互动、交易、来来往往、人和地点、移动设备记录的记录，所有这些都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其中大部分是按时间顺序保存的，无限可分类和可混合的，可以操纵，而且，只要电流持续流动，它就是永久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记住，这是推测;如果我有想象力，它就会变成科幻小说。但由于没有创造故事的天赋，我只能根据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进行猜测，而不是一些奢侈的想象世界。这是更平淡无奇的东西，基于当前IT、机器人、信息科学、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传统媒体内容所能提供的东西。

话虽如此，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当你越来越接近人生的登机口时，你会像古埃及人一样，开始非常认真地对待一卷信息，但原因略有不同，应用也完全不同。古埃及人，通常通过相当大的财政投资，在生活中，寻找*亡灵之书*。起初，这本关于死亡和“长生不老”的指南只有法老和他的直系亲属才能读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尘世后的美好生活被扩展到更广泛的精英阶层，然后提供给我们所读到的中产阶级——文士、医生、朝廷官员、税吏、牧师和商人(也有猫和鳄鱼，但他们后来才接触到他们)。

《亡灵之书》(*Book of* The *Dead*)通常有插图，里面有一份详细的指南，告诉你经过防腐处理的死者被埋葬后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进入了死亡之地(福克纳，1997)。读者得到了要给出的正确答案、行为方式、要交往的人、要去哪里玩、要避免什么——一旦所有的咒语、阶段、考验都完成了，就会得到一份通向永生的扩展算法、代码或小纸条。你的和古埃及的这两卷卷轴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或他去了一个神话世界见奥西里斯;而你，在你走了很久之后，还会继续“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两卷卷轴都保证了永生，但你的卷轴会有移动的片段，在刚刚复活的数字你和活人之间，甚至是和你一样的其他人之间移动的片段。古卷轴是用墨水和颜料在莎草纸上完成的;你的将在算法和数据库中完成，也许在更遥远的未来，Siri的能力会得到加强(也就是说，一个智能软件助手和知识导航器，作为一个对话应用程序，使用从你的数据流中提取或整合的数据库)。

另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古埃及人需要他或她的卷轴来确保，当被马温和地审判时，结果不是把他们的灵魂放在上帝的下巴和肚子里，而是让它进入永生之光。这是卷轴的标题所承诺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它是《*亡灵之书*》，而是*出现在光明中，或者出现在白昼中*，大概是永远。对你来说，没有奥西里斯的土地，没有阿努比斯或透特，没有马或她的天平，你的心将被一根羽毛衡量。据我们所知，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和那些想和你互动的人互动。

与人类共同生活

这是值得期待的吗?1982年在《*死人不穿格纹*》中排练过。在这部*黑色*喜剧的仿作中，史蒂夫·马丁与一群几乎已经死去的人互动(大多数人都死于20世纪80年代，那些不确定的人在80年代看起来不像他们在40年代的黄金时代):爱德华·阿诺德、英格丽·褒曼、汉弗莱·鲍嘉、沃利·布朗、詹姆斯·卡格尼、威廉·康拉德、杰夫·科里、琼·克劳福德、贝蒂·戴维斯、布莱恩·唐列维、柯克·道格拉斯、艾娃·加德纳、加里·格兰特、艾伦·拉德、维罗妮卡·莱克、伯特·兰开斯特、查尔斯·劳顿、查尔斯·麦格劳、弗雷德·麦克默里、约翰·米扬、雷·米兰德、埃德蒙·奥布莱恩、文森特·普莱斯、芭芭拉·斯坦威克、拉娜·特纳、诺玛·瓦尔登。当然，这是通过选择性地将40年代的镜头食人，非常有效地融入到电影的外观、感觉、对话和动作中来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马丁经常打电话给马洛/鲍嘉寻求建议。马洛/鲍嘉，由于剧本和定位的重叠镜头，渗透的态度，既相关又有帮助，非常死。虽然《*死人*》是一部模仿喜剧和黑色喜剧，但它预示了*生者*和死者的未来。

在其他地方，我研究了数字环境对物质文化的影响，推测出现了一种新的动画形式的东西，一种活泼的东西，*动画*(Onufrijchuk, 1997)。我在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于MEMS(微机电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生物力学和信息科学之间的逐渐融合中看到了动画的新兴元素。动画将受益于神经学的进步、互联网的扩展和永远在线的个人数字伴侣设备、社会和技术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机器人应用、性能和技术的进步。那时，媒体正在报道“智能”这个和那个:“智能油漆”、“智能灰尘”、“智能地板”、“智能房屋”、“智能诊断厕所管道”、“智能汽车”。“智能手机”近在眼前，平板电脑就在这条街的尽头。这不仅是臆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它融合了IT与日常生活用品和功能之间的融合，还包括半自动机器人伴侣、看护、教学和军事设备。在这个猜想中，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生活世界中，在那里，事物通过自然语言相互作用，监控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执行各种任务，并为我们调查现实的各个方面，就像布鲁诺·拉图尔的演员/网络理论(Johnson/拉图尔，1995)中描述的那样。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家用和配套的半自动机器人设备也可以加载一个由从数据库中提取的推理人格驱动的OS，一个作为动画物体动画器的paramortal操作系统。这样一个paramortal将基于并结合死者的数据来复制一个推理人格，并基于与对话者、同居者，当然还有其他paramortal的互动来产生一个人格。

如果paramortal仅仅局限于重复几句话，通过适当的问题来巧妙地、纯柏拉图式地回答任何问题，它们就会成为一种“会说话的墓碑”，比嵌入岩石或手机中的a/v数字化唱片/专辑好不了多少:也许有深度的记忆，但几乎没有互动性。即使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些有进取心的殡仪馆也为即将死去的人及其后代提供了一个制作好的AV网络永久存在(具有相当高的生产价值)。我想，在我们这个机械化互操作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可以在自己的自动日历里放一个提醒，在设定的日期点击纪念网址。但那是一台机器对另一台机器的对话，而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同情、倾诉、辩论、谈判、庆祝、交谈或咨询的超然人格。这一切，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生者的心理和死者的推理心理，都是一个副道德人格所能提供的。而且它提出了一个超越信息分析和数据的问题——存在的美学。

这种存在的美学，打开了一个多么棘手的问题!一个重要人物将生活在哪里:在一个面包盒大小的容器里?电脑?智能手机?这样的生物出现在墓地的墓碑里，出现在朝圣地，出现在赎罪的地方，出现在与濒死之人磋商的地方，似乎是很合适的。我们可以推测，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将导致家庭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可能成为paramortal的家园:比如，一个拥有奶奶的paramortal遗骸的护理机器人作为OS。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在5岁左右就停止了paramortal发育的孙子的paramortal更好的方式来鼓励一个凡人的奶奶呢?为什么不把它作为植入大脑的芯片，从而逆转朱利安·杰恩斯猜测的过程，重新开启呢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两院制思维的大门，让奶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对话?这可能有点诡异，就算不是近在眼前，也是近在眼前。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想象一个paramortal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感性，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知道和它一起生活的后果和条件。他们可以被赋予多大程度的自主性:例如，通过他们选择的任何媒介露面的能力?他们获得经验和个性的机会是否会受到控制?运行它们的程序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它们的“主人”控制?如果我们同意拥有另一个人是一种反人类罪，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拥有”一个“超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类的某种意识?

一个合理的推测:超道德的存在将首先以推动的形式出现，然后它将发展出拉力和规范性的特征。只要电流在流动，存储的数字数据实际上就是不朽的;它只是由0和1组成的八位字节，可以在驱动器或云端中快乐地生存。如果它被发布到互联网上，它可能会被缓存，在一个世纪后通过搜索引擎以其所有的数字操控性仍然可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推测，paramortal将成为下一代数字时代的后生活规范。也许这将以一生的专注的形式出现，尽可能多地获取可用的数据，编辑自己的paramortal，这样后代的光芒就不会过于耀眼，也不会暴露出生活的样子。这样一种媒体形式，结合了知识导航员和机器学习以及自然语言的交互性和数据与信息的尾流，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一种推断的、不断进化的个性，这是艺术家的梦想成真。这就像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体。为什么要把它局限在死人身上呢?为什么不重拍一个人的童年，把那些会导致成人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可怕细节省略掉呢?创造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但没有你经历过的创伤?或者，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创伤，为什么不把过去恋人的至爱抛在脑后?一个人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同一个地方，试图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段关系的结束。一个人可以委托或构建一个“完美”的另一个人格，为成为知己和唯一真正的朋友而量身定制. . . .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可靠的猜想。忘掉僵尸、吸血鬼、鬼魂和各种超自然现象吧;更物质化、更真实的东西正潜在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可以与过去的朋友和亲戚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本质可以配备智能代理知识导航软件和真实的语言界面。而且，如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我们把他们装进某种游戏，一个由类似他们的人组成的虚拟世界，让他们在不与活人互动的情况下，继续冒险，彼此互动，学习，发展，分享成长，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会被死亡杀死吗?这种想象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伟大的档案馆，在一个伟大的虚幻世界里储存着数百万人的互动，就像《黑客帝国》系列一样?《黑客帝国》中电影角色居住的虚拟世界和充满了真实死者的鲜活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遗骸的虚拟世界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没有其他的现实，也没有任何尸体可以返回。我们这个物种最终会消灭死亡吗?

啊，肉!也许是克服了别人的死亡，却没有根除我们每个人在走向眩目之光时所伴随的阴影……

参考文献

Caplan, Ralph. 1982. By Design: Why There Are No Locks on the Bathroom Doors in the Hotel Louis XIV, and Other Object Less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Dead Men Don't Wear Plaid. 1982. Dir. Carl Reiner. Aspen Film Society, Universal Pictures.

Faulkner, Raymond. 1994.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Chronicle Books.

Jaynes, Julian.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Johnson, Jim (a.k.a. Bruno Latour). 1995. "Mixing Humans and Non-Humans Together: The Sociology of a Door-Closer." In Ecologies of Knowledge: Work and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 Susan Leigh Star, 257-77: New York: SUNY Press.

The Matrix. 1999. Dir. Andy Wachowski and Lana Wachowski. Warner Bros., Village Roadshow Pictures.

McLuhan, Marshall. 195I. 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Peters, John Durham.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ingrone, Frank. 199I. "Laws of Media: The Pentad and Technical Syncretism." McLuhan Studies: Exploration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1): 109-15.

O.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第三部分数字化

政治

10 比较视角下国家监控国家的兴起

彼得)。史密斯

2013年春末夏末，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大规模且此前不为人知的监控活动。这些故事是由前NSA合同雇员和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引发的，他本人也成为美国全球追捕的目标。这些披露引发了一系列关于NSA秘密监视项目的报道，这些项目超出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的权限。令许多观察家震惊的是，大量的电子数据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收集起来，而且没有逮捕证，针对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和数百万居住在海外国家的人。记录NSA的活动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足以说明它显然远远超出了它的授权，并表明国家安全风险并不局限于选定的目标，而是变得全球化，包括整个人口或非常大的部分人口。

虽然有关NSA监控范围的披露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与长期趋势是一致的。多年来，巴尔金和

莱文森声称，美国政府一直忙于构建“国家监视国”：

> 这种国家监视国的特点是政府在技术和政府官僚机构方面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机构致力于促进国内安全，并(顾名思义)利用数字革命允许的所有设备收集情报和进行监视。(2006: 131)

我认为，国家监视国(NSS)是Giorgio阿甘本(2007)所描述的政府在危机时期采用的“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逻辑高潮。在这里，数字技术不是作为自由技术出现的，而是作为控制技术出现的。在本章中，我将讨论NSS的兴起及其对互联网、民主、自由、隐私和人权构成的威胁，并比较其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发展。NSS并非英美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利;它已经变得全球化，各国联网，共同制定数据收集、监控和信息交换的共同标准。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对NSS感到震惊，现在面临着日益加剧、全球化和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阻力。

阿甘本的工作提供了对国家监视国在美国背景下的建立和运作的见解。虽然监控在社会中无所不在，但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监控的主导角色都是国家。此外，在NSS体系中，行政部门支配着政府机构的所有其他部分。立法机构的重要性在不断减弱，同时又为国家监控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表象。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NSS的最新发展为美国版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背景。在这里，重要的是要理解，虽然每个国家都试图将互联网领土化，但他们是在《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2001年)和《欧盟数据保留指令》(2006年)等国际协议的支持下这样做的。然而，随着国家监控变得更具侵入性，抵制也在蔓延。在这种愈演愈烈的对抗中，出现了以下问题。国家监视国是给定的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让它变得更良性吗?这对民主有什么影响?自由?隐私?人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根据巴尔金和莱文森的说法，国家监视国(NSS)在9/11事件之后开始出现，这造成了全球的道德恐慌，导致世界各国通过了新的监视立法。里昂观察到，这些法律“倾向于放宽先前更严格的法律的限制，例如那些与窃听或实际上任何信息拦截有关的法律”(2004:143)。在感知到威胁的环境中，国家通过“在网络环境中采取行动，以确保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利益”(Birnhack和Elkin-Koren, 2003: 16)。因此，国家“履行其确保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古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环境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Birnhack和Elkin-Koren, 2003: 16)。

虽然巴尔金和莱文森的重点是将NSS作为一种当代现象，但它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先例，在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紧急状态)的著作中进行了探讨。紧急状态根源于罗马法，并已成为大多数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一部分。在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中，主权者(国家)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此国家的“正常法律”不是被废除，而是在适用方面被暂停。然而，法律在技术上“仍然有效”(阿甘本，2007:31)。简而言之，紧急状态代表了一个没有法律的空间:一个“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不确定门槛”，其特征是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全面授予权力(2007:3)。

从历史上看，紧急状态是在战时实施的，此后暂停。到了二十世纪，紧急状态已经扩大到包括经济或劳工危机，而今天，则是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根据阿甘本的观点，“在当代政治中，紧急状态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政府的主导范式”，它深深植根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结构(2006)。国会研究服务处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成法性法律”(Relyea, 2007: 21)。根据该报告:

> 根据……授予的权力……根据国会法规，总统可以没收属性，组织和控制生产资料，没收商品，向国外派遣军事力量，实行戒严法，没收和控制所有运输和通讯，调节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私人企业的运作，限制旅行，并以各种方式控制美国公民的生活。(Relyea, 2007: 4)

在控制公民的生活方面，该报告暗指国家的生物政治力量，通过拘留(例如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或监视的方式来瞄准和孤立人口的某些部分，例如外国人。今天，在9/11事件之后，紧急状态正变得越来越长。此外，阿甘本声称“历史告诉我们，最初为外国人保留的做法后来如何应用于其他公民”(2004a)。这些做法包括数字监控手段，现在已经“达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水平”(2004a)。随着例外状态变得常态化，国家本身的人口受到怀疑和监视。事实上，正如本章将展示的那样，针对整个人口的监视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例外状态变得全面和正常化，它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美国率先治理了“9·11”后充满敌意的世界环境。国会通过了各种各样的立法，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权力来识别、拘留和监视外国人。其中包括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和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修订，以及其他立法。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已经掌握了一系列新的监控手段，用来对付来自互联网的一系列威胁。虽然“反恐战争”——持续的“例外状态”的基础——是创建NSS的主要因素，但这些技术的可用性使得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更广泛地用于整个人口。

虽然美国有国家安全局(NSA)等许多机构对其人口进行监控，但它们的大部分数据都依赖于私营部门。如今，由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泄密事件，人们对这种非法行为的普遍程度有了更多的了解。NSA的PRISM项目允许对Facebook、bb0、苹果和Skype等公司的服务器进行绝密直接访问，允许“官员收集材料，包括搜索历史、电子邮件内容、文件传输和实时聊天”(Greenwald: 2013a)。然而，PRISM只是NSA大规模监控和广泛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监控增加了政府的权力。正如里昂所指出的，“无论监视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是通过监视产生和表达的”(2009:453)。这反过来又鼓励国家加大对监视手段的投入，从而潜在地放大了国家的权力。Ogura认为，其结果是，监控国家正在导致法治的衰落。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规范人类的行为，但它不能控制计算机”(2006:286)。控制计算机的是代码和协议，它们可以用来掩盖人的能动性，避免法治。此外，Ogura问道，“假设电子政府(即监控国家)在拥有非法能力的情况下会合法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这合理吗?””(286)。其结果是，法治和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制约能力正在下降，这在美国已经很明显了。

立法部门面临衰退，但NSS仍然要求立法部门合法化并支持其扩张。巴尔金和莱文森有先见之明地指出，NSS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合作的产物，任何接替布什的总统都将延续同样的政策。事实上，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路径依赖的一个原因是，决策的规模使它们很难撤销。其次，自由裁量权和缺乏问责制实在太诱人了，不容忽视。第三，随着监视手段的普遍化，例外状态变得常态化。

事实上，情况正是如此。就监视和无视法治和宪法的形式而言，奥巴马政府继续走着与布什政府相同的道路，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布什政府。奥巴马继续执行同样的监视政策，包括拘留和反恐活动，如非法使用无人机暗杀美国和外国的敌人，这正在使这些做法失去任何党派意识。在2012年秋天，新闻报道浮出水面，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使反恐战争永久化(Greenwald, 2012)。这不仅包括将无人机用于暗杀目的的政策编纂成文，还包括进一步巩固监控国家的努力。

因此，“国家监视国”是一个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开始的长期项目，由民主党总统继续和加强，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继续下去，除非公众的强烈抵制成功地将其击退。这个政权对民主、公民自由、法治和隐私都有严重的后果。就后者而言，Privacy的一项研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2007年，《国际》杂志将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一起列为黑色国家。联合王国是另一个被贴上黑色标签的自由民主国家，这表明它是一个地方性的监视社会。

需要理解的关键是，国家监控国是一个相互帮助和学习的网络化国家，来自国际条约和欧洲联盟指令的共同标准得到了扩散。主要的担忧是，这些标准强加了侵入性的监视权力，法律保护或司法监督不足。这些措施中的第一项是由欧洲委员会(COE)起草的网络犯罪公约，得到联合王国、加拿大、日本、南非和美国的支持，并于2001年通过(梵蒂冈，2010年)。截至2010年10月，已有30个国家签署、批准和加入了该公约，该公约允许并鼓励任何国家批准该公约。这些国家不包括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它们直到2011年和2012年才开始批准该协定。美国在2006年批准了该公约。

该公约有许多涉及隐私权倡导者的条款。其中包括为执法目的而制定的条款，如: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保留用户的特定计算机数据
- 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提供商生成用户元数据[第18(3)条]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某些情况下实时收集内容数据。

该公约还要求各国与另一个国家合作并相互协助，包括采用监视手段来强制执行另一个国家的网络犯罪，即使该行为在其本国领土上并不违法，或者该国不遵守民主规范。

《网络犯罪公约》已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同样有争议的是2006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数据保留指令，并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力支持(EFF, 2011)。该指令要求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提供商将所有元数据保存六个月至两年，具体取决于成员国(Bignani, 2007)。该指令在许多欧洲国家面临宪法挑战，但其数据保留原则已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提出，加拿大更符合公约。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英国与国家监控国家:
在那里还是在路上?

这一节，以及接下来关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部分，从越来越重视国家监控的角度来介绍每个国家，重点介绍2012年提出或引入的立法，这些立法表明了将每个国家的全体人口置于怀疑和监控之下的意图。在分析这些最新发展之前，为每个国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监视和反恐战争的背景和背景。这些发展在每个国家并非没有阻力，这也是一种现象。

背景:联合王国

9/11袭击还在联合王国造成了道德恐慌。Wong认为，由此产生的许多立法变化提供了“与美国法律和政策变化的有趣相似之处”。Wong声称，总体而言，英国的“趋势似乎与美国相似，即巩固和加强政府监督权力，至少在国家安全和其他基本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Wong, 2006: 216,223)。芬威克和菲利普森将这些权力描述为“严酷的”和“专制的”(2007:457,458)。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异。与美国主要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不同，英国政府的手段是以警察为基础的(芬威克和菲利普森)。在某些领域，英国比美国走得更远。虽然闭路电视摄像机(CCTV)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英国安装，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出现才出现爆炸式增长。结果是，在英国有超过420万个监控摄像头，每14.2人有一个，一个人可能每天被记录超过300次(Wood and Ball, 2006: 6,7)。它们的存在在国家的所有地方都无处不在，包括中学和学院(Big Brother Watch, 2012a)。

2006年，英国议会推出了强制性的国民身份证，每个人都有50个类别的信息。这些身份证为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与打击犯罪、恐怖主义和公共服务提供无关的信息，包括一个人在英国住的酒店，最初，国民身份证得到了各方(以及全国媒体)的大力支持，但在法案通过的时候，由于公众的反对日益强烈，工党不得不依靠其多数席位来通过该法案。这种抵制最终导致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新当选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在2011年废除了该法案，但对英国以外的外国人保留了该法案

到2005年前后，监控国家以及监控社会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0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监视社会”(有大量的国家存在)，自9/11以来，监视社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Wood and Ball, 2006)。2009年，英国上议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和私营部门的监控机构一直在深刻而持续地扩张。”此外，“历届英国政府逐渐建立了世界上最广泛、技术最先进的监控系统之一。”该报告声称，国家监控的广泛扩张“对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构成了重大威胁”(2009:5,26)。有人担心，广泛的监控正在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互不信任的关系。议会委员会的一名证人警告说:

> 大规模监控助长了这种观点……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我们一直在收集人们的数据，认为他们可能会做错什么，这就会宣传一种观点，即我们作为公民不值得信任。(诺里斯，引用于报告，27)

根据小仓的观点，国家(和私营部门)的这种观点与“植根于对人类的深刻怀疑的现代/后现代监视导向型社会……”是一致的。并假定……人是不确定性的根源”(2006:277)。

至于全面监控?

前述，以及阿甘本(2004a;2004b;2005)，表明国家监控将不局限于目标人群，而是将整个人口视为风险来源。事实上，这是两项立法改革的推动力，第一次是在2008年工党执政期间，后来是在2012年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期间。2008年，工党政府宣布了引入通信数据法案的计划，该法案将创建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央数据库，以保留从通信服务提供商(CSP)收集的数据。这些元数据将包括一个人拨打的每个电话号码、访问的每个网站、发送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所有社交媒体联系人。而数据的使用则不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仅限于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但将扩大到包括所有执法部门(开放权利组织，2012a)。

该法案是为了符合欧盟数据保留指令而提出的，英国一直是该指令的主要支持者，这是一个有趣的循环逻辑。工党政府提出的立法将保留通信数据一年的时间。在公众和服务提供商的负面反应后，工党放弃了该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党也谴责了该计划。保守党反对政府的计划，并在一份报告中承诺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监控方式，称:

> 工党过度依赖庞大的数据库和广泛的数据共享权力，借口是这会让政府更有效，让公民更安全。其过往记录恰恰相反，侵入性和昂贵的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但处理得如此鲁莽，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我们相信，你的个人信息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国家。(2009: 1)

这些承诺很快就被证明是空洞的，因为在2010年大选后不久，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开始背弃他们的承诺。2012年，政府提出了立法草案供讨论，与工党一直计划的类似，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服务提供商将被要求收集和存储数据，而不是国家。数据保留再次成为拟议立法《通信数据法案草案》的核心。简而言之，政府正在引入一个全国性的监控制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该制度将记录英国人在网上做的几乎所有事情。政府声称，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和罪犯，保护儿童免受恋童癖的侵害，这项立法是必要的。

甚至在立法出台之前，它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保守的*《电讯报》*发表了几篇尖锐批评政府计划的文章(Whitehead 2012)。作为对批评的回应，该法案草案在2012年夏天由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联合委员会进行了立法前磋商。口头证据和书面意见广泛，但最广泛的评论和批评来自一个隐私组织网络。

这个网络的中心是开放权利组织。此外，Privacy International、老大哥观察(Big Brother Watch)、NO2ID和全球网络倡议组织(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GNI)等组织也参加了此次联合会议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议会委员会。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监视将不再是针对目标，而是扩大到包括整个人口。“老大哥观察”组织向联合委员会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如下:

> 这项法案结束了我们所知道的无罪推定。它代表了对那些有嫌疑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监视的转变……监视整个人口，以防其中一些人最终犯罪。(书面证据，2012b: 63)

隐私国际对此表示赞同，并警告说，监控的大规模扩张“将造成一种局面，即在英国进行通信的每个人都将被有效地视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书面证据:482)。开放权利组织也表达了对该法案将“导致对人口的普遍监视”的担忧(2012b，书面证据:448)。

在口头证词和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书面材料中，对隐私的担忧反复出现。一些隐私批评人士断言，政府声称的接触(元数据来源)和内容的二分法是错误的。有人认为，个人资料可以创建，大量数据收集意味着“这些数据可以识别在激进政治网站上发帖的抗议者，以及他们在任何给定时间的位置”(开放权利组织，2012b;书面证据:456)。其结果可能会对任何使用数字化通信手段的人的行为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全景效应。

最后，有人对对外国服务提供商提出监视要求的主张表示担忧。要求外国服务提供商识别所有英国用户并收集他们的数据，按要求将其提供给英国当局，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树立一个不好的先例，并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产生严重影响(Global Network，书面证据:203)。

联合委员会似乎已经收到这样的信息，即该法案的规定过多，并指出必须“对该法案草案进行重大修改，以只提供执法部门需要的必要数据”(报告，2012年12月)。联合委员会主席Lord Blencathra表示:“我们非常关注该法案目前形式的范围有多广”(报告，2012年12月)。而这是否会转化为政府的重大变革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虽然公众有严重的疑虑(Ashford, 2012)，但首相仍然致力于提供警察和安全服务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新的权力来监控互联网活动，尽管目前的计划受到批评(公共服务公司)。Uk, 13页)。然而，联合政府的伙伴、自由民主党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坚持认为《通信数据法案》已经死了，他说:“人们称之为窃听者的宪章，这不会发生——自由民主党执政肯定不会发生”(克莱格，2013)。结果，目前看来，似乎是一个僵局。

澳大利亚:跟随老大哥英国的脚步?

再一次，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9/11事件促使澳大利亚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将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确立为联邦政府的首要责任。总体而言，2001年至2011年间，反恐立法如雪崩般涌来，总共54件，数量惊人(公共事务研究所，2012:3)。在这方面，与加拿大的比较是惊人的。例如，到2007年，加拿大“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只颁布了两项主要的反恐立法……而澳大利亚……颁布了近40项这样的立法”(Roach, 2007: 53)。澳大利亚的应对措施使其独树一帜，超过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此外，“这些法律吸引了两党同意，并在工党反对派的支持下颁布”(威廉姆斯，2011:1145)。大部分立法是在约翰·霍华德领导的(保守的)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下通过的。事实上，霍华德政府在9/11事件后每6.7周通过一项新的反恐法规，而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在2007年至2011年9月期间通过了六项立法，这些立法完善了霍华德政府的立法，但没有倒退(威廉姆斯，2011)。

通过如此大量的立法，允许执法机构访问服务提供商存储的电子邮件、短信和语音邮件的内容(但只有在授权下)，通常是在匆忙的情况下完成的。然而，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是，当国家安全立法通过并停止敌对行动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表示“恐怖主义对澳大利亚的威胁是真实和持久的”，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永久的(引用于威廉姆斯, 2001: 1138)。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现在很清楚，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项法律的大部分将保留在澳大利亚的法规书中”(2011:1171)。立法的一个结果是，它已经改变了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权力的平衡向行政部门倾斜。结果可能是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处于危险之中(威廉姆斯，2011)。

当前的发展

澳大利亚的反恐立法一直受到外部力量和先例的影响(Roach, 2007)。事实上，澳大利亚最近提出的建立大规模国家监控系统的建议，与英国早些时候讨论的有一些共同点。然而，英国并不是唯一的灵感来源。澳大利亚打算将其拟议的立法作为批准之前讨论的网络犯罪公约(Rodriguez, 2011)和符合欧盟数据保留指令(DRD) (Bowe, 2012)的一种手段。

DRD在制定澳大利亚的国家监控政策方面尤其有影响力。2010年6月，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承认，它“一直在研究欧洲关于数据保留的指令，以考虑这种制度是否适合澳大利亚的执法和安全背景”(Grubb, 2010)。几乎立即，参议院常务委员会开始调查数据保留问题，并在2011年建议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只保留执法所需的数据。2012年7月，总检察长部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装备澳大利亚以应对新出现和不断演变的威胁”，不久之后，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开始了公众咨询。

讨论文件的重点很明确，指出:“国家安全的共同主线贯穿于提案之中，旨在应对来自国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恐怖主义、严重和有组织犯罪以及网络犯罪的威胁”(《装备澳大利亚》，2012年)。4).讨论文件内容广泛，包含18项主要建议和41项单项改革。然而，批评主要集中在数据保留问题上，讨论文件提出了“量身定制的数据保留期限长达2年”(11)。同样重要的是“使计算机中断”的提议(11)，这将允许“执法部门为了执行计算机访问令而添加、删除或修改计算机系统上的任何软件或数据”。可能包括在目标计算机上植入特洛伊木马软件、击键记录、恶意软件或其他侵犯隐私的软件(海盗党提交，2012a)。所有这些都将在一个新的授权控制系统中完成，该系统提供了更大的部长自由裁量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装备澳大利亚》，2012年)。这将使澳大利亚的立法与英国的提议保持一致。

特别是，数据保留提案一直是公众批评的避雷针。批评人士，如绿党参议员斯科特Ludlam表示，数据保留是“以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是潜在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偏执为前提的”(Ludlam, 2012)。海盗党坚持认为，这些提议将“使我们所有人成为嫌疑人，将所有人置于监视之下，无论怀疑与否，都将彻底摧毁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的概念”(海盗党提交，2012a)。隐私基金会声称，如果政府目前的提案得以实施，将“极大地改变隐私的平衡，并有利于大幅扩大‘监视国家’”(澳大利亚隐私基金会，2012:8)。与英国一样，通信服务提供商将成为“政府代理人”(7)。批评人士警告说，监控国家的结果将意味着隐私的终结。

隐私基金会警告说，这些提议将结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执法能力与隐私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2012年)。海盗党警告说，“受到持续监视的人不再像自由人那样行事;对社会有害”(Submission, 2012a: 6)。

政府试图说服公众，它的建议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具有侵入性，这与英国政府和欧盟数据保留指令在联系和内容之间所做的类似区分相呼应(Roxon, 2012)。批评者回应说，联系方式和内容之间存在错误的二分法，联系方式信息可以用来创建每个用户的个人资料。此外，监控每个澳大利亚人访问的每个网站的计划就像让一个政府“代理人看到你读过的每一个新闻故事，你看的每一个电视节目和你研究的每一个问题”(Pirate Party, 2012 b, Supplementary Submission, 7)。

该委员会的听证会于2012年9月结束。目前，这些提议在立法上处于不确定状态，部分原因是它们引发了争议。2013年6月，该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并将责任推给了政府，称:“如果政府被说服应该推行强制性数据保留制度，委员会建议政府公布任何立法的征求意见稿，并将其提交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审查”(澳大利亚联合议会委员会，xxxiii)工党政府的总检察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一个依赖绿党的政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支持方在回应中表示，“目前不会推行强制性数据保留制度”(Taylor, 2013年)。2013年大选，托尼·阿博特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上台执政。到目前为止，新政府尚未表示有意引入新的监控立法。

加拿大和国家监控国家

2012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C-30法案(Bill C-30)，该法案将允许政府批准《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使加拿大走上监控国家的道路。实际上，C-30法案只是加拿大政府(包括自由党和保守党)多次试图制定全面的国家监控立法的尝试之一，从2005年自由党开始，这一进程可能很难永久脱轨。

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在反恐战争方面的立法变化并不大。加拿大反恐法案(2001年)赋予政府新的监视权力，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收集外国情报，例如允许“未经授权拦截外国通信”(劳森，2012:74)。除此之外，加拿大政府还依赖于2000年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案》(PIPEDA)。虽然PIPEDA旨在保护加拿大人在某些情况下的隐私，但如果涉及犯罪或国家安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自愿向执法机构提供用户信息。

然而，十多年来，加拿大政府一直面临着制定更广泛的监控立法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加拿大执法机构(LEA)的内部压力，还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外部压力(劳森和Valiquet, 2006)。作为回应，自由党政府在2005年提出了C-74法案，即《调查技术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有两个主要目标:

- 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拦截功能，可以保留用户的个人信息，针对特定的用户，并消除对数据的任何加密。
- 在没有搜查令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允许LEA访问用户信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可用于创建访问互联网的加拿大公民档案的元数据。这项立法受到了政府隐私专员Jennifer Stoddart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强烈批评(Valiquet 2006)。当少数派自由党政府被迫要求举行选举时，该法案夭折了。

2009年6月，少数派保守党提出了他们自己版本的C-74法案，即C-47法案，即《21世纪执法技术援助法案》，该法案在国会年底休会时被搁置在议事纸上。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同样的立法再次出现，但作为三个独立的立法部分。加拿大的隐私专员再次对拟议的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Letter, 2011)。当另一次选举被要求时，这些立法从未通过一读。

这些立法提案，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赋予LEA更大的权力，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用户信息”，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即使在没有事先司法授权的情况下也要保留这些信息，以及扩大通过任何移动方式跟踪GPS数据的范围。因此，加拿大将加入其他国家的行列，如美国和英国，在这些国家，“新的法律导致了国家监视的爆炸”(劳森，2012:6)。

比尔C-30:吸取教训还是又一次尝试?

以上述内容为前奏，我们可以看到C-30法案，“颁布调查和防止犯罪电子通信法案的法案”，(也被称为“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掠夺者法案”)，于2012年2月提出，不过是加拿大政府(自由党和保守党)朝着监视国家方向迈进的最新努力。虽然它最终被撤回，任其消亡，但要求加拿大找到加入《网络犯罪公约》的方法的国际压力仍在继续。出于这个原因，看看保守党政府在C-30法案上的尝试是很重要的。

C-30法案是来自加拿大各地执法机构(LEA)(主要是皇家骑警和市政警察部队)的压力和政府批准网络犯罪公约的愿望的产物，尽管后者从未在媒体上提及。在仅有的一次议会讨论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司法部长的议会秘书Kerry-Lynne D. Findlay指出，C-30号法案:

> 将允许加拿大批准欧洲委员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为了使加拿大批准国际条约，它必须首先使其法律符合该文书的要求。(2012年2月28日)

该法案将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可以记录其用户互联网活动的设备，并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将用户信息移交给LEA，从而使其成为国家监控机构的一部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需要提供对LEA的后门访问，允许远程实时访问用户的活动。政府还可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执行其监视功能所需的任何设备，从而模仿国家安全局棱镜监视计划的特点。此外，第487.0195条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愿向LEA提供电子邮件内容和用户的浏览习惯。简而言之，联系方式和内容之间的区别被取消了。这在法案的第33条中尤为明显，用奥威尔的话说，该条款允许部长任命一名“检查员”，该检查员可以访问任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并获取检查员(渥太华)想要的任何信息。正如一位记者所说，“我们还不如在家里放一个网络摄像头，给部长一个实时视频的链接”(Kline, 2012)。最后，立法规定保存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国内违法21天，违反外国法律90天，大大少于之前讨论的国家，但考虑到政府随时获取和复制信息的能力，保存(数据保留)的要求可能是多余的。

在对该法案的预期中，民间社会组织和隐私专家反对大规模在线监控(Letter, 2011年8月)，以及安大略省信息和隐私专员(Cavoukian, 2011年10月)，批评之声一直在增加。笨手笨脚的公共安全部长维克·托伊斯(Vic Toews)是负责这项立法的部长，当他告诉一位反对党议员他可以“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儿童色情制作者这边”时，引发了强烈的批评。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充斥着批评(哈里森和罗德里格斯，2012)。数千名加拿大人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两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公开批评了该法案。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注定了这项立法的失败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大多数加拿大人反对这项立法，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保守党的堡垒艾伯塔省(Grenier, 2012)。该立法从未通过一读。2013年2月，司法部长Rob Nicholson终止了这项立法，称政府“听取了加拿大人对此的担忧”(Payton, 2013)。这件事，似乎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在2013年底，C-30法案的重要方面再次出现，附属于打击网络欺凌和保护儿童的新立法:C-13法案。这些方面包括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联邦政府公布其拥有的元数据，以及授予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公司披露其拥有的加拿大人个人数据的豁免权。在撰写本文时，该法案被证明是极具争议的，尚未在议会获得通过。

结论

这篇文章只关注了四个国家，但很明显，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全球趋势。在对国家监控的年度回顾中，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做出了以下观察:

> 世界各地的美国都在要求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且得到了....现在，一些法律和提案赋予了许多州未经授权的窥探权力和几乎无限的数据收集能力。(罗德里格斯，2012)

总而言之，各州正在以有针对性和大规模的方式扩大对其人口的监控能力。

在美国，Balkin和Levinson持悲观态度，认为“完全阻止”向国家监视国家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06:526)。相反，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监视国家?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面临的风险能否得到缓解?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能否防止政府行政部门权力增加所带来的危险?

人们可以说，在一个危险和威胁可能实际存在的世界里，国家需要收集信息。此外，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以对抗这些危险和威胁。监视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根据Wood和Ball的说法，“监视并不是邪恶势力策划的邪恶阴谋。许多监视背后都有好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意图:对安全、福利、健康、效率、速度和安全的渴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协调。”因此，当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被视为风险时，危险就来了，因此“以前特殊的安全变得正常”(Wood and Ball, 2006,4)。随着监视的正常化，从将某些人视为风险的目标转变为将整个社会视为风险的来源。

阿甘本本人预见到，从对某些人的“有针对性”或有选择地监视到对整个人口的“无针对性”监视的可能性。阿甘本(2005)在解释他在2004年拒绝去美国演讲，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他的生物识别信息时，认为在他的情况下，这类似于纳粹在“被占领的国家使用照片来定位和记录犹太人，从而促进他们的驱逐。”这是针对某一部分人口的一个例子。阿甘本随后提出的问题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利用整个人口的生物特征记录时，会发生什么?”然后他指出，事实上，欧洲国家正准备从对移民的选择性生物识别监管转变为“对所有公民”的强制监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家与公民的正常关系”将是一种“普遍怀疑”(阿甘本, 2005)。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国家有权最终决定什么是“有效的”监视，什么不是。

正是这种将整个人口视为潜在威胁的飞跃，以及收集和存储有关人口数据的愿望，在国家政策和行动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很明显，这就是美国的情况，尽管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图。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随着9/11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公民越来越意识到政府正在做或试图做的事情的范围，各州将越来越难以巩固基于恐怖的永久紧急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控制人口方面非常有用。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抵制的迹象。2013年7月，美国首次对政府的国内间谍基础设施提出严重的立法挑战，即一项旨在为秘密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提供资金的法案，以217票对205票的微弱优势被否决。在此之前，这样的法案是不可能在国会进行投票的。在其他地方，国民身份证被证明太不受欢迎，英国政府无法维持，最终被废除。后来，当它确实引入了与布莱尔政府大致相同的立法时，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遇到了一群冷静的(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听众。在这里，少数派政府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阻止侵入性监控措施的进展。例如，在加拿大，一系列少数派政府推迟了监控立法的推进。那时的保守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获得多数席位后，恐怖和犯罪的威胁和风险不再对公众舆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甚至儿童色情的幽灵也无法说服他们，冒着隐私和公民自由的风险是值得的。

在这个时候，加拿大也已经形成了组织和利用互联网作为抵抗手段的历史。围绕新版权法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表明，加拿大人对数字问题、互联网和隐私的关注。他们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面对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在阿尔伯塔省更为自由主义、反大政府的大本营，保守党不得不退却。

然而，现在就认为加拿大或英国的保守党和澳大利亚的工党已经放弃推进扩大国家监控还为时过早。如果从C-13号法案来看，加拿大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如果阿甘本是正确的——异常状态已经正常化——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期待的。监控技术的力量可能太过诱人，无法放任不管，国际压力也太过强大，无法抗拒。另一场关于安全的道德恐慌，可能会为通过一度不可想象的巩固监控国家的立法提供机会。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各州也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在监控问题上回避法律的意愿。在立法上，而不是大规模的措施，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行政法规来推进，通过将立法分成单独的部分，以长远的目标，或者通过大规模的综合立法，在其他有争议的措施中迷失了监视措施。显然，对于那些珍视隐私、公民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警惕将是他们的代名词。

注意事项

例如，NSA的另一个项目X-Keyscore(棱镜计划的补充)允许官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搜索元数据和普通用户在网络上的几乎所有行为的内容，包括检查他或她访问的所有网站的内容、发送和接收的电子邮件以及浏览器搜索。这些搜索可以实时进行。NSA还收集了数百万德国人的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聊天记录的大量元数据(Poitras等人，2013年a)，不加选择地窃听和存储数百万巴西人的电子邮件(格林沃尔德，2013年b)。并对欧洲机构和外交官进行电子监视(Poitras等人，2013年b)。“元数据”是电话或互联网通信的“信封”。对于电话来说，这可能包括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通话时长、通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间。对于一封电子邮件，它会包括发件人、收件人、时间，但不包括主题或内容。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包括位置信息”(格林沃尔德2013c)。

参考文献

Agamben, Giorgio. 2004a. “No to Bio-Political Tattooing.” *Le Monde*. 10 Jan. http://www.ratical.org/ratville/CAH/totalControl.html

———. 2004b. “The State of Emergency.” Extract from a lecture given at the Centre Roland-Barthes (Université Paris VII, Denis-Diderot).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agambenschmitt.htm.

———. 2005. “No to Biometrics.” *Le Monde*, 5 Dec. http://www.notbored.org/agamben-on-biometrics.html.

———. 2007.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shford, Warwick. 2012. “Most UK Citizens Do Not Support Draft Data Communications Bill, Survey Shows.” *ComputerWeekly*. http://www.

computerweekly.com/news/2240169761/Most-UK-citizens-do-not-support-

draft-Data-Communications-Bill-survey-shows.

Attorney-General of Australia. 2011. “Communiqué—Quintet of Attorneys General.” 11 July.

———. 2012. “Equipping Australia Against Emerging and Evolving Threats.” Australia Joi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Report of the Inquiry into Potential Reforms of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http://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

House_of_Representatives_Committees?url=pjcis%2Fnsl2012%2Freport.htm

Australia Privacy Foundation. 2012. “Inquiry into Potential Refo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alkin, Jack M., and Sanford Levinson. 2006.”The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Partisan Entrenchment to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tate.”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Paper 231. Yale Law School.

Big Brother Watch. 2012a. “The Class of 1984.” http://www.bigbrotherwatch.org.uk/home/2012/09/the-class-of-1984.html.

———. 2012b. Privacy International, Open Rights Grou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 Written Testimony, Draft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House of

Lords, House of Commons Joint Committee on Draft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Session, 2012–13.

Bignami, Francesca. 2007. “Privacy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Data Retention Directive.”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1): 233–56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Birnhack, Michael D., and Niva Elkin-Koren. 2003. "The Invisible Handshake: The Reemergence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Virginia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6: 1–48

Bowe, Rebecca. 2012. "Why Data Reten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n't Backed Up Its Argument." 7 November.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2/11/why-data-retention-australian-government-hasnt-backed-its-argument.

Cavoukian, Ann. 2011.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Ontario. Letter, October. http://www.ipc.on.ca/images/WhatsNew/2011-10-31-Letter-to-Ministers-Toews-and-Nicholson-Lawful-Access.pdf.

Clegg, Nick. 2013. "Nick Clegg: No 'web snooping' bill while Lib Dems in government." April 25, BBC.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22292474.

Conservatives UK. 2009. "Reversing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 http://www.conservatives.com/News/News_stories/2009/09/~/media/Files/Policy%20Documents/Surveillance%20State.ashx.

Dorling, Phillip. 2012. "Roxon Puts Web Surveillance Plans on Ic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August 2012. http://www.smh.com.au/technology/technology-news/roxon-puts-web-surveillance-plans-on-ice-20120809-23x9l.html.

Electronic Frontiers Australia. 2004. "Surveillance Devices Bill 2004." https://www.efa.org.au/Publish/efasubm-slclc-sdbill2004.html.

———. 2011. "Europe." https://www.eff.org/issues/mandatory-data-retention/eu. ———. 2013. "NSA Spying on Americans." https://www.eff.org/nsa-spying.

Fenwick, Helen, and Gavin Phillipson, 2005. "Legislative Over-Breadth, Democratic Failure and the Judicial Respons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the UK's Anti-Terrorist Legal Policy." In *Global Anti-Terrorism*, eds. Victor V. Ramraj, Michael Hor, and Kent 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ndlay, Kerry-Lynne D.,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2012. "Opposition Motion—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Hansard), 28 February.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2012. Written Evidence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House of Lords, House of Commons Joint Committee on Draft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Session 2012–13.

Greenwald, Glenn. 2012. "Obama Moves to Make the War on Terror Permanent." *The Guardian*. 24 October.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oct/24/obama-terrorism-kill-list.

———. 2013a. "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 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 *The Guardian*. 6 June.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06/us-tech-giants-nsa-data.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2013b. “The NSA’s mass and indiscriminate spying on Brazilians.” *The Guardian*. 7 July.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l/07/nsa-brazilians-globo-spying.

———. 2013c. “XKeyscore: NSA Tool Collects ‘nearly everything a user does on the internet.” *The Guardian*. 31 July.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31/nsa-top-secret-program-online-data.

Grenier, Eric. 2012. “Lawful Access: Poll Finds Majority Of Canadians Think Tories’ Online Surveillance Bill Shouldn’t Become Law.” *Huffington Post Canada*. http://www.huffingtonpost.ca/2012/02/28/lawful-access-poll-bill-c30-online-surveillance_n_1306256.html.

Grubb, Ben. 2010. “Inside Australia’s data retention proposal.” *ZDNet*. 16 June. http://www. zdnet. com/inside-australias-data-retention-proposal-1339303862/

Harrison, Annie, and Katitza Rodrigues. 2012. “Keep the Pressure On: Canadian Online Surveillance Bill on Pause, But the Fight Continues.” 29 February.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s://www. eff. org/deeplinks/2012/02/keep-pressure-canadian-online-surveillance-bill-pause-fight-continues.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onstitution. 2009. “Surveillance, Citizens and the State.”

House of Lords. House of Commons Joint Committee on Draft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2012. Report. 11 December. http://www.parliament.uk/business/committees/committees-a-z/joint-select/draft-communications-bill/news/full-publication-of-report/.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2012. “Submission to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on ‘Equipping Australia against Emerging and Evolving Threats.’” https://www.academia.edu/6590064/Submission_to_Parliamentary_Joint_Committee_on_Intelligence_and_Security_on_ Equipping_Australia_against_Emerging_and_Evolving_Threats_.

Internet Industry Association (Australia). 2012. “Submission to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http://www. aph. gov. 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Intelligence_and_Security/National_Security_Amendment_Bill_2014/Submissions.

Kline, Jesse. 2012. “Full Comment.” *National Post*. 6 March. http://fullcomment.nationalpost.com/2012/03/06/jesse-kline-on-current-threats-to-internet-freedom-the-statists-strike-back/.

Lawson, Phillipa. 2012. “Moving Toward a Surveillance Society.” 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https://bccla. org/wp-content/uploads/2012/03/2012-BCCLA-REPORT-Moving-toward-a-surveillance-society1.pdf.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Letter. 2011. "Letter to Public Safety Canada from Canada's Privacy Commissioners and Ombudspersons on the current Lawful Access proposals," 9 March. Multiple signatories. http://www.priv.gc.ca/media/nr-c/2011/let_110309_e.cfm.

Ludlam, Scott. 2012. "Government Lunges for Unjustified Online Surveillance Powers." 4 May. http://scott-ludlam. greensmps. org. au/content/media-releases/government-lunges-unjustified-online-surveillance-powers.

Lyon, David. 2009. "Surveillance, Power and Everyday Life." In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d. Chrisanthi Avgerou, Robin Mansell, Danny Quah, and Roger Silverstone, 449–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it. mesce. ac. in/downloads/CriticalPerspectives/Reading%20Material%20CPT-S7/oxford_handbook.pdf.

———. 2004. "Globalizing Surveillance: Comparative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2): 135–49.

Lyon, David, and David Murakami Wood. 2012. "Security, Surveillance,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49(4): 317–28.

Norris, Clive. 2009. Oral Testimony. In *Surveillance: Citizens and the State, Volume I: Report.*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Limited.

Ogura, Toshimaru. 2006. "Electronic Government and Surveillance-Oriented Society." In *Theorizing Surveillance: 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 ed. David Lyon, 270–96. London: Routledge.

Open Rights Group. 2012a.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iki. openrightsgroup. org/wiki/Intercept_Modernisation. ———. 2012b. "About ORG." http://www.openrightsgroup.org/about/.

Payton, Laura. 2012. "Government Killing Online Surveillance Bill." *CBC*. 11 February. http://www. cbc. ca/news/politics/story/2013/02/11/pol-rob-nicholson-criminal-code-changes.html

Pirate Party of Australia. 2012a. "Submission to the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quiry into Potential Refo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ugust.

———. 2012b. "National Security Inquiry Supplemental Submission."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Poitras, Laura, Marcel Rosenbach, and Holger Stark. 2013a. "Partner and Target: NSA Snoops on 500 Million German Data Connections." Spiegel Online. 30 June. http://www. spiegel. de/international/germany/nsa-spies-on-500-million-german-data-connections-a-908648.html.

———. 2013b. "Attacks from America: NSA Spied on European Union Offices." Spiegel Online. http://www. spiegel. de/international/europe/nsa-spied-on-european-union-offices-a-908590.html.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Privacy International. 2007. "Report: Surveillance Monitor 2007—International Country Rankings." https://www. privacyinternational. org/reports/surveillance-monitor-2007-international-country-rankings/i-summary-of-key-findings.

Public Service Co. UK. 2013. "New Communications Data Bill to Arrive 'In Due Course.'" 16 July. http://www.publicservice.co.uk/news_story.asp?id=23461.

Roach, Kent. 2007.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Anti-Terrorism La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30: 53–85.

Rodriguez, K. 2011. "Dangerous Cybercrime Treaty Pushes Surveillance and Secrecy Worldwide." 25 August.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1/08/cybercrime-treaty-pushes-surveillance-secrecy-worldwide.

———. 2012. "2012 in Review: State Surveillance Around the Globe." 31 December.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2/12/2012-in-review-state-surveillance-around-globe.

Roxon, Nicola, Minister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2012. "Letter to Anthony Byrne MP." September.

Relyea, Harold C. 2007. "National Emergency Power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98-505.pdf.

Shaw, Erin, and Dominique Valiquet. 2012. "An Act to Enact the Investigating and Preventing Criminal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ct and to Amend the Criminal Code and other Acts." Parliamentary and Research Service.

Taylor, Josh. 20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Shelves Data Retention Plans." 24 June. http://www. zdnet. com/au/australian-government-shelves-data-retention-plans-7000017183/.

Valiquet, David. 2006. "Telecommunications and Lawful Access: I. The Situation in Canada." Parliamentary and Research Service.

Vatis, Michael A. 2010.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http://cs.brown.edu/courses/csci1950-p/sources/lec16/Vatis.pdf.

Whitehead, Tom. 2012. "Email Monitoring; New Powers to Record Every Phone Call and Email 'Echoes China'." *The Telegraph*. 1 April. http://www. telegraph. co. uk/news/uknews/law-and-order/9179117/Email-monitoring-New-powers-to-record-every-phone-call-and-email-echoes-China.html.

Williams, George. 2011. "A Decade of Australian Anti-Terror Laws."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5: 1137–75.

Wong, Mary. 2005. "Terrorism and Technology: Policy Challenges and Current Responses." In *Global Anti-Terrorism*, eds. Victor V. Ramraj, Michael Hor, and Kent Roach, 200–22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d, David Murakami, and Kirstie Ball, eds. 2009. *A Report on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UK, by the Surveillance Studies Network.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11 数字时代的民主与同一性

Lorna Stefanick和Karen Wall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速度简直令人震惊。东西方政治集团之间的整齐划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轰然倒塌，全球一体化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正在重新配置全球经济关系。然而，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相比，这些巨大的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商业的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具体而言，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数字足迹，将我们的消费者身份注入市场机器和安全状态。与此同时，在以市场和安全为导向的国家中，公民越来越无法配置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一章考察了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政治同一性是有争议的，并通过在地理上确定的社区内的谈判而产生。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份正被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商业交易，新自由主义话语扼杀了我们作为公民的同一性。它强调市场的首要地位，在经济上提升了个人的作用，同时淡化了作为公民的个人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安全措施

为应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而采取的措施，进一步限制了公民质疑这种新的公民同一性的能力:严厉的监视政策和技术从美国向外流向其他国家，导致国家机构和目的的急剧重组。现在，国家对公民最重要的功能似乎是提供安全保障，而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的个人信息共享意味着匿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外，从个人、组织和部门的角度来看，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模糊到难以区分的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公民被原子化为个体消费者，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自主性，这种自主权是他们拥有一个可以退居其中的私人空间所带来的。企业实体以销售产品为目的对消费者进行分析，再加上强调安全而非自由的政治话语，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组合，不仅系统地侵蚀了个人自主性，也侵蚀了能动性。

在通过市场活动表达我们的集体同一性时，个别公民机构所失去的是与市场或安全无关的更大的共同利益的表达。作为在政治共同体中彼此联系薄弱的自主个体，我们越来越容易受到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变幻莫测的影响。随着公共纽带的削弱，在全球和虚拟市场中，公民同一性被消费者同一性所取代。这些个人同一性的转变与新技术和安全利益的交集，导致了公民的衰落，而公民明白自己既拥有权利，也有责任，这两者在公共领域都是有争议的。这种衰落将对民主制度的健康产生严重后果。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ICT革命到来之前，公共和私人(或个人)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的重建，以及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是如何塑造数字时代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概念的。这些重新配置不仅在重塑公共话语，也在重塑我们作为政治共同体公民的自我观念。本章使用加拿大的例子来支持其主张，但这是一种全球现象，由于互联网，它促进了不尊重领土边界的霸权话语和反应性话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Zizi Papacharissi在文章《虚拟领域》中对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进行了区分。虽然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很容易把握，但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则更为微妙。Papacharissi在提到杜威(1927)和托克维尔(1990)等思想家时指出，“‘公共’一词意味着公民身份、共性和不是私人的东西，而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和观察到的东西。”她评论道，“参与公共事务对个人的存在感和自尊感有重大贡献”(2002:10)。它不仅仅是对公共领域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中收集的信息的自由普遍获取，而是积极参与，其作为社会活动场所的创造，以及构成集体公共意志的理性话语。正如Papacharissi所观察到的:“虚拟空间促进了讨论;虚拟领域增强民主”(11)。Goldberg(2011)对此表示赞同:他警告说，网络空间作为民主讨论区域的本质，并不构成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如果仍然存在的话)向在线语境的直接转移。Papacharissi的结论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力量创造了一种大众商业文化，取代了公共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构成了只能被视为公共空间的东西。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一直是那些关心政治和民主的人感兴趣的对象。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5)认为，来自各种关联网络的公共纽带对于促进支持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这些网络构成了密密麻麻的关系丛，共同构成了公民社会。随着政府规模和活动的收缩，公民社会在服务提供和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因为公民社会内部的群体会填补国家留下的空白。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公民社会新身份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分析最突出的一点是，同一性创造发生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公共领域。帕帕查里斯的分析中缺少的是考虑到网络空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在私人和公共人物之间划清界限的能力。隐私是用来划定个人和公众之间界限的工具，无论是在其社会形式还是在其纪律/监管形式上。

群体审议产生最佳公共政策的观念，得到了杜威(1927)、哈贝马斯(1989)和埃齐奥尼等形形色色的作家的倡导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1999)。虽然公共“空间”提供了另一个讨论的论坛，但它不应与公共“领域”混为一谈——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包容性的舞台，包含多种意见，并应产生反映多种观点的政策。如果某些群体被系统地排除在外，公共领域就无法达到民主的理想。因此，例如，弗雷泽(1992)指出，那些被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将创造一个反领域。显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替代性信息传递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然而，正如帕帕查里斯所指出的:

> 当个人在没有对特定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的共同理解的情况下，以随机的顺序谈论随机的话题时，那么谈话就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其影响也会减弱。能够随意讨论任何政治话题，随随便便地在讨论和话题中进进出出，这是非常自由的，但它并没有为政治讨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起点。最终，这些技术可能会过度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淡化甚至限制我们的共性，这是一种危险。(2002: 20)

帕帕查里斯的分析对公共空间和领域的讨论特别有用，因为她认识到网络空间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网络空间为个人和集体同一性之间由来已久的摩擦提供了新的舞台;个人与共同体”(2002:20)。网络社区允许个人在网络社区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个人建立联系。这些社区反过来又有助于塑造个人同一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这些利益共同体正日益成为新的公共领域:“城邦不是其物理位置上的城邦;它是人民的组织，因为它产生于共同行动和共同发言……无论他们在哪里”(2005:198)。将传统的兴趣社区与以技术为中介的兴趣社区区分开来的是规模。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地理边界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扩大讨论范围，同时使同一性纽带较少的参与者之间的讨论变得支离破碎。此外，根据帕帕查里斯的定义，在利益共同体内外的自我选择意味着，这些论坛是*与领域相对立的公共空间*。如果没有国家的调解，让边缘化的人发出声音，公共空间在为地域界定的政治社区创造集体同一性方面的效用就会受到限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Papacharissi的分析中缺少的是考虑到网络空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在私人和公共人物之间划清界限的能力。隐私是用来划定个人和公众之间的界限的工具，无论是在其社会形式还是在其纪律/监管形式中。在信息时代，这最好被定义为“信息隐私”。隐私权支持者引用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1890年的文章《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作为“不受干扰的权利”的第一个表述。沃伦和布兰代斯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印刷媒体可以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传播他们的偷拍照片，从事“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以前属于隐私的事情，现在可以被配备了相机的记者“从屋顶上喊出来”。很明显，沃伦和布兰代斯无法想象一百年后的技术会让屋顶上的喊叫声在全球范围内立即被任何拥有WiFi连接的手机的人听到。虽然沃伦和布兰代斯的文章标志着现代对数字隐私关注的开始，但应该注意的是，隐私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和早期现代社会，如希腊人、希伯来人和英国清教徒。隐私最基本的物理形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孤独的地方，人们可以退到那里进行安静的反思和沉思(Stefanick 2011: 34)。

然而，隐私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女权主义者的武装号召——“个人即政治”——是最早揭露“隐私”是统治个人的工具的尝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依靠隐私在家庭的范围内压迫女性。女权主义者将区分“家庭”私人领域与社区公共领域的传统界线，视为一种工具，再现了社会在女性最亲密的关系中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即使涉及暴力或性侵犯，也不会成为公共领域讨论的对象。根据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的说法，“隐私权是男性‘不受干扰’压迫女性的权利”(麦金农，1989)。虽然在亲密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但宣称透明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隐私必须得到保护，这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权力者可以隐藏的盾牌，使他们能够在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从事压迫个人的活动。

那么，彻底的透明化是答案吗?根据福柯的说法，透明度的纪律力量在强制社会从众方面要有效得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体罚也是如此(1977:195-228)。福柯利用边沁的圆形监狱概念，认为囚犯受到监视的可能性的限制，社会规范及其随后的期望限制了个人自主性。简而言之，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反性意识的约束。以前，福柯和其他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这个定义、争论和执行社会规范的场所。但垄断国家的权力已经让位于网络化国家的分布式权力。这暗示着一种synopticon国家的出现，正如托马斯·马西森(Thomas Mathieson, 1997)所阐述的那样:不是单个代理人监视多人，而是多数人监视少数人。这可能导致公民监视掌权者，从而迫使掌权者承担责任。然而，网络化的国家表明，权力的场所是分散的，从而破坏了synoticon社会的潜在权力。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引入“互联网之眼”。这家闭路电视监控公司向订阅的观众直播视频，观众向警方报告可疑活动，以换取一款网络游戏的积分。因此，synoticon状态也表明，许多人不仅观看国家官员，还相互观看。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众包犯罪预防提出了一种不太有用的方案;暴民监视个人，对偏离社会规范的人施加“正义”。

从对公共和私人空间/领域概念化的简要概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它们有助于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但这些划分是有争议的。此外，很明显，互联网技术有可能改变我们脚下的土地。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机构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

新自由主义与公共领域的重建

公共领域作为界定公民身份的场所，其萎缩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的重点是通过增强对私有属性的权利和参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的能力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自主性，提倡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模仿私营部门。就国家机构的组织而言，新自由主义要求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大幅减少或将服务外包给政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并通过将职能转移给地区当局或社区委员会来分散权力。它通过将国家从社会控制的基座上移除，有效地使国家空心化和去中心化。重新配置的国家有能力“引导”社会的方向，但它的成功取决于它对自身所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潮流的反应。与“政府”相对立的“治理”概念反映了这一重要的侧重点转变。治理承认影响社会的规则和行为体的多元性;社会“掌舵”因此成为权力结构中地位不固定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网络化谈判过程。行动者交换信息，协商管理共同事务的规则和程序。信息技术公司的兴起促进了行动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信息流动打破了制度差异。

这些发展是更大的重新配置的一部分，各国将重点放在新的优先事项上，并承担新的角色。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认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正在转变为“民族竞争国家”。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国家集中于为国际竞争的目的而动员一切生产力，把以前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放在一边”(1997:45)。

换句话说，政治正被从政府中剥离出来，以便专注于以经济术语定义的“效率”。在20世纪，公共服务是围绕核心公共行政价值观组织起来的。相比之下，21世纪的公共服务模式则由体现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网络化”组织构成。正如Chakrabarty和Bhattacharya(2005)所观察到的那样:“全球化导致了企业纪律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联姻’，政府抛弃了‘实干家’的传统形象。为了适应“市场冲动”，政府变成了“推动者”。”事实上，索伦森用更弱的措辞来描述国家:“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分化的、碎片化的、多中心的机构综合体，由或多或少形式化的网络维系在一起”(索伦森，2006:100)。这种复杂网络化国家的新概念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阻碍了透明度。特殊利益可能具有不易被看到，更不用说被承认的优势。

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变化是更大的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在这种变化中，政府的适当角色被限制在非政治或技术活动中。这必然低估了国家在促进包容、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即时通讯;大多数经济和政治功能的跨国特性;与强调更小、更精简的官僚国家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方法，被称为“新公共管理”(NPM)。

NPM的前提是小政府是好政府，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应该应用于公共部门。通过竞争实现的生产力是通过将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来实现的。它还涉及使用私营部门的管理观点，以“顾客”满意为导向，并使用风险管理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破坏性力量的影响。在信息管理的世界里，根据顾客的人口统计信息分析顾客的偏好和购物习惯，可以提供关键的营销信息。每当消费者使用会员卡获得“会员福利”时，就会在包括数字同一性在内的数据轨迹上留下蛛丝马迹。这些数据为关注产品植入的零售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也为买卖个人信息的人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些数据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至关重要。

哈贝马斯(1987)将私人对公共领域的这种渗透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认为，正是这种工具逻辑从私人的、商业的领域侵入公共的、文化的领域，才导致了老牌民主国家目前所经历的合法性危机。投票参与率低就证明了这一点;新自由主义政府利用公民对国家机构失去信心来宣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允许私营部门吞噬公共部门。但是，也许国家的空心化正在加速合法性危机?

国家的空心化意味着几件事。首先，由于税率降低，公民对国家的贡献减少了，公民对国家的关心也就减少了。具体来说，作为消费者，我们往往最关心的是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标价很高的东西。此外，全球服务的收缩有利于有针对性的服务，这意味着国家对那些缴纳最多税(但现在得到的好处最少)的人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其次，国家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并不是“产品”，而是对社区健康和福利的短暂贡献，比如对娱乐、节日和艺术文化的支持。自认为是国家服务客户的纳税人将会这样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很难找到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公共产品”的减少，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商品对社区福祉的重要性，使公民更容易受到这样的论点的影响，即我们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是公民，在数字世界中，同一性的主要价值是商业利益，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定位他们的特定产品。

公司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数据挖掘中:利用计算过程在数据集中发现模式的艺术。事实上，2013年《*环球邮报*》职业版块的一篇文章就有这样的标题:“热门工作，碾碎数字:数据分析专家挖掘市场需求”(Galt, 2013: B1)。这些商业信息不仅对产品营销很有价值，对数据经纪人本身也很有价值，数据经纪人经常将这些信息转卖给政府。私营航空公司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说明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政府制定法规，迫使航空公司在乘客获准登机前收集特定类型的信息。然后，航空公司将信息传递给政府。然而，企业并不是唯一挖掘数据的人。政党利用他们从加拿大选举局获得的公共数据作为基础，从商业来源获得的数据中建立选民概况。因此，信息的收集、保留和交换不会发生在单行道上;数据通过可渗透的制度边界双向流动。

控制一种特定形式和信息流的私营部门媒体系统的市场导向进一步打破了民族国家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的区别，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正如Thussu(2007)所指出的:

> 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生态中，国籍几乎无关紧要，因为生产者主要将观众视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这种从以国家为中心和民族的媒体观向以消费者利益和跨国市场为定义的媒体观的转变，一直是媒体流动扩大和加速的关键因素: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南到南，尽管它们的数量根据市场的规模和价值而变化。(12)

与国家身份脱钩而支持全球消费者同一性的媒体信息有助于加强个人将自我认同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的倾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旦我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自己(我想要认同哪些品牌?哪些品牌会提升我的地位?当我拍下自己滑雪的照片并发布到Facebook上时，我是否会将自己的位置发布为“Fernie Alpine Resort”，或者我是否会原则上拒绝企业品牌?)，我们对国家会促进我们作为公民的利益的期望就会减少。反过来，低期望强化了我们将自己视为个体而非集体成员的倾向。过去，国家一直是定义政治同一性的主要场所;然而，国家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因为信息通信技术也促进了全球资本的流动，这意味着国家必须为资本保留创造有利条件。最后，再加上资本空心化，出现了真空。谁表达我们的集体同一性?出于什么目的?

不安全时代的同一性

前面的讨论可能表明，国家的权力正在消退，以至于它对我们的集体生活几乎没有影响。虽然国家已经放弃了通过积极参与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活动来促进公民集体福祉的角色，但它已经接受了公民保护者的角色。信息通信技术为监测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大大扩大了这一作用的范围。对安全的强调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角色模糊的又一个例子——“安全”被剥离是私营部门管理风险冲动的修改版本。然而，在公共部门，风险管理导致了对公民自由的攻击，特别是在数据管理方面。

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通过是限制个人信息隐私权的里程碑。该法案在9/11事件发生仅六周后通过，赋予了美国政府获取信息的广泛权力。它包含了允许政府强迫公司向联邦调查局交出信息的条款;禁止公司披露在其控制下的信息的隐私受到了损害。一旦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该法案中没有规定禁止传播这些信息，也没有规定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收集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它是仓促通过的，不受保护公民自由的通常检查的约束。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美国《爱国者法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它的影响与信息流动一样，会跨越国界。例如，埃德蒙顿市从申请市政府工作的候选人那里收集的任何信息都受《爱国者法案》规定的约束，由于处理就业筛选(因此候选人信息)的信息管理公司位于美国，这种类型的信息共享在十年前引起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轩然大波，当时那里的公民意识到他们的医疗信息管理将被外包给一家美国公司(Stefanick, 2007)。在艾滋病呈阳性是被拒绝进入美国的一个理由的时候，不列颠哥伦比亚人要求将他们的信息保存在加拿大，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最终会到哪里去。他们的医疗信息会被送到美国海关吗?

9/11事件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恐惧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本来可能不会同意的事情。费尔菲尔德(2005)描述了美国人和他们的政治家是如何屈服于这种恐惧的，他们为了赋予国家非同寻常的权力而废除了公民自由。他指出，“当政客们在最激动的时刻，采取严厉的措施时，社会批评家和理论家就会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这些行动，而不是让自己陷入歇斯底里”(45)。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制定了自己的反恐立法。它没有那么严厉，但仍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然而，2011年，加拿大悄无声息地对涵盖私营部门实体的隐私法PIPEDA进行了重大修改。该条款复制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允许公司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向当局提供个人信息。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公司可以被禁止提醒个人，他们的信息隐私已被侵犯(Tencer, 2011)。

自2001年以来，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模糊在私营保安公司和其他产品可用于保安的公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举个例子，谷歌经常被政府要求提供用户数据，随着这一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标准都在不断发展，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私人数据，什么应该与政府共享的指导方针是有争议的——争论不是在公共领域，而是在律师和诉讼占主导地位的幕后。在美国，AT&T被曝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其客户。针对该公司的诉讼接踵而至，美国政府迅速对FISA进行了修订，以保护公司在服从安全机构的过程中免于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云计算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现在包含在内。这对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公共部门机构来说尤其成问题，其中许多机构为了省钱而使用商业软件和计算服务。美国政府的数据监控侵犯了基本的组织自主性，特别是这些组织中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个人的自主性。

有趣的是，恐惧作为一种工具，在丧失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强迫人们自满，它不仅局限于政府层面，而且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因此，第一代对监控沾沾自喜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认为个人跟踪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们哀叹自己的年轻一代消失在游戏和聊天室的虚拟空间里，那里潜伏着捕食者。为了对他们的家属施加影响，父母们采取了安全措施，比如安装家庭监控系统(包括保姆摄像头来监视他们的孩子或宠物)，通过社交媒体监控孩子的社交活动，通过SchoolZone等软件跟踪他们的学业活动，以及通过带有gps功能的手机监控孩子的身体活动。儿童(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时，无意中助长了自己的监控。毫无疑问，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从“直升机式”父母的监护下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鉴于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的所有信息都被用来为营销目的对人们进行分类，这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一代人被教导说，将个人数据提供给企业使用没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为了免受掠夺者的侵害，这种监控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个人用自主性换取安全的危险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模糊。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个体的集合，也在不经意间用言论自由换取安全。历史告诉我们，压制公民自由会带来可怕的民主后果;下一节将针对那些最有能力批判当前政府决策轨迹的人，探讨这一主题。

社会科学、政治话语和公共利益

监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消费者-公民和企业-政府实体之间的界限模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关于立法认可的国家监视，费尔菲尔德所称的社会科学家的声音是缺失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大声疾呼，反对国家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在加拿大，在哈珀政府的领导下，主张基于证据制定政策的反思推理的声音被扼杀了。在联邦层面，无论是在“软科学”还是“硬科学”领域，都集中力量阻止研究成果的传播。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科学家会议上，科学家和记者召集了一个名为“解开政府科学家的钳制:如何重新打开话语”的小组讨论。记者们感叹，想要及时从政府科学家那里获得信息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他们必须经过层层官僚审批才能与媒体对话。正如奥哈拉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基于事实的政策，如果我们要求人们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者，如果我们要求人们参与民主进程并参与民主，那么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个过程是透明的”(CBC News, 2012)。

奥哈拉的担忧并不仅限于加拿大科学家。2013年，参与与联邦政府科学家长达数十年合作的外国研究人员声称，他们被要求签署的新保密协议是不可接受的。用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一位物理海洋学家的话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气候变化……我觉得它威胁到我的学术自由，并可能限制我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及时发表数据和解释以及谈论潜在公共利益的科学问题的能力”(CBC新闻，2013)。这种对科学知识被压制的担忧，已经被其他感受到了政府新政策影响的人提出:例如，取消了一项重要的统计工具(长篇人口普查)，并将在学校课堂和会议上做报告的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归类为从事“高风险”活动(Munro, 2013)。

在省级层面，阿尔伯塔省政府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明显例子，这种改革是通过削减高等教育资金来实现的(Barkawi, 2013)。在财政紧急的名义下，2012年和2013年对高等教育部门的这些戏剧性和深度削减与其说是为了钱，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有利于商业化的研究。强调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扼杀了学术自由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批判性的分析。在2013年预算公布后不久，阿尔伯塔省政府向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发出了“授权函”，旨在消除教育部内部的重复和低效现象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鼓励大专院校合作办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支持经济部门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正试图在思想生产方面制造垄断。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对那些促进研究商业化的学术活动的关注。再加上预算的大幅削减，2013年的预算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加依赖于行业资金。这条轨迹并没有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民，而是以知识型和受过批判性教育的民众为代价，为企业和经济的短期利益服务。

这些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趋势是公共领域更大重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制度结构还是信息流方面。结构变化、新的管理实践和信息流与对个人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相结合，产生了对国家的深刻重构。这种新的、网络化的形式实际上更难被细心的公众仔细审视，特别是因为公共和私营部门边界之间的模糊区分。最终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收缩，在公共领域中，在讨论集体政治同一性本质的过程中，各种观点都受到了质疑。

安全国家和公民消费者

政治同一性受到争议的公共领域的收缩是三种相互关联的力量的结果:制度和国家目的的戏剧性重构，通过数字化实现的同一性商品化，以及随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区别的模糊。这些力量是由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优势所推动的，这种话语对基于市场的活动和自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将个人重新定义为认同商业实体并被商业实体认同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正在失去其作为地理上确定的政治共同体公民的身份。这种对个人的强调，特别是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的强调，正在这个辩论可能发生的不断收缩的领域中，产生一种越来越被截断的公共辩论。有限的辩论和有限的公共领域对民主有着严重的影响;集体同一性的表达已经从公共机构转向参与市场活动的原子聚合。

然而，虽然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在减少，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也在减少。公民消费者产生了一种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这些信息在组织之间被收集、保留和交换。个人同一性正在被商品化，为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燃料，并帮助公司在市场中定位自己。但这种原子化的同一性也会反馈到国家机器中，以发挥其作为集体安全守护者的作用。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U.S. Patriot Act)的通过，让许多美国人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以换取安全。其他州的公民也纷纷效仿，支持本州对危机的立法反应。由于数字通信的流动性，美国这一严厉立法的后果会跨越国界。对人身安全的不安全感已经蔓延到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助长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监控技术的倾向，从保姆式摄像头到GPS跟踪。随着机构对个人行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个人能动性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当越轨行为被视为对个人安全的威胁时。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被观察者开始认同观察者(1977:202-3)。

安全国家的崛起与福利国家的消亡同时发生。国家通过提供普遍服务和社会安全网来表达国民公民权的观念已被打了折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通过缩小活动规模和将服务外包给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系统地拆除行政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由于部门的模糊，集体同一性的表达正从我们的公共机构转向我们作为自主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集合。这些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中介，这些媒体允许商业实体跟踪和监控我们的活动。我们被商品化的身份为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提供了食物，而私营部门的市场机器又为公共部门的证券化机器提供了食物。管理安全风险的追求往往需要个人放弃作为公民的重要权利。再加上公共领域的收缩，个人自主性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公共领域是讨论放弃公民权利等重要政治问题的领域。问题来了，谁在监视监视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 2005.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rkawai, Tarak. 2013. "The Neoliberal Assault on Academia." *Al Jazeera*, 25 April. Accessed April 25,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3/04/20134238284530760.html.

CBC News. 2012. "Muzzling of Federal Scientists Targeted by Campaign." 17 February. Accessed April 1, 2013. http://www.cbc.ca/news/technology/story/2012/02/17/science-federal-muzzling-scientists.html.

———. 2013. "Canadian Federal Research Deal 'Potentially Muzzles' U.S. Scientists." 15 February. Accessed April 1, 2013. http://www.cbc.ca/news/technology/story/2013/02/15/science-audio-munchow-scientist-muzzling.html
Dewey, John.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olt.

Etzioni, Amitai. 1999. *The Limits of Priv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Fairfield, Paul. 2005. *Public/Private*. Toront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Foucault, Michel. 1977. "Panopticism."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195–22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raser, Nancy. 1992.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109–4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alt, Virginia. 2013. "Hot Jobs, Crunch the Numbers: Data Analytics Specialists Mine Market Demand." *Globe and Mail*, 29 March, section B1.

Goldberg, Greg. 2011. "Rethinking the Public/Virtual Sphere: The Problem with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13(5): 739–54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Trans. Thomas A.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9 [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a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 Burger and F.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irsch, Joachim. 1997.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Nation-States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54: 39–58.

MacKinnon, Catherine. 1989.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thieson, Thomas. 1997. "The Viewer Society: 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2): 215–34.

Munro, Margaret. 2013. "Federal Librarians Fear Being 'Muzzled' under New Code of Conduct that Stresses 'Duty of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National Post*, Postmedia news, 15 March. Accessed April 1, 2013.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3/03/15/library-and-archives-canada/.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Papacharissi, Zizi. 2002.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and Society* 4(1): 9–27.

Putnam, Robert.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Sorensen, Olav, Lee Fleming, and Jan W. Rivkin. 2006. "Complexity, Networks and Knowledge Flow." *Research Policy* 35: 994–1017.

Stefanick, Lorna. 2007. "Outsourcing and Transborder Data Flows: The Challenge of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USA Patriot A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3 (4): 531–48.

———. 2011. Controlling Knowledg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Edmonton: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Tencer, Daniel. 2011. "Canada Privacy Law: Amendment Mimics USA Patriot Act, Critics Charge." Accessed April 1,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 ca/2011/09/30/canada-privacy-law-patriot-act_n_989027.html.

Thussu, Daya Kishan. 2007. "Mapping Global Media Flow and Contra-Flow." In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ed. Daya Kishan Thussu. London: Routledge.

de Tocqueville, A. 1990 [1835].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New York: Vintage Classic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12 数字民主赤字

加拿大政党领导竞选中的数字投票分析

Josipa G. petruniki

在1区的春天，阿尔伯塔自由党(ALP)为即将到来的领导竞选引入了一个“注册支持者”系统，并结合了新的电子(在线和电话)投票机制。这些系统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重振自由党。本章探讨了ALP电子投票系统的本质，因为它是在党派领导竞争的背景下被商定、制度化和运作的，其中不付费的“注册支持者”和付费的ALP成员构成了选民池。2011年引入ALP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是由一小群党内人士推动的，他们的明确意图是在全省范围内吸引广泛的支持基础。一年后，ALP在大选中失败，该党失去了席位，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作为该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这让这两个新制度都受到了质疑。本章回顾了围绕ALP领导竞选的高度偶然情况，并反思了当数字民主工具(如电子投票)与基础广泛的政策(如“注册支持者”系统)相结合时出现的潜在(一般)问题，其明确目标是增加选民参与。使用采访和文件数据的组合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我在整个2011年夏天担任ALP领导竞选联合主席时的档案和详细记录)，本章还分析了加拿大文化对一人一票原则的投票期望，选民在分散投票条件下的平等，以及投票过程本身的完整性，因为这些变量是由ALP案例研究中显示的“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机制相结合形成的。

艾伯塔省政治的变革之风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阿尔伯塔自由党(ALP)领袖大卫·斯万与自由党党团成员会面，讨论该党的未来。卡尔加里全球新闻报道了斯万正在考虑辞职之后，他们举行了这次会议。斯万在卡尔加里山景选区担任了一年半的立法议会议员，在戴夫·泰勒离开后，他观察到自由党从9个当选的MLA减少到8个(在一个有83个MLA的立法机构中)。他在公开批评斯万的领导风格后加入了新生的阿尔伯塔党。斯万还主持了另外两个MLAS的分裂准竞选活动，Darshan Kang(卡尔加里-麦科尔)和Kent Hehr(卡尔加里-布法罗)，他们公开宣布有兴趣采取类似的行动(Wingrove, 2011)。《全球新闻》曾报道称，ALP的支持率已跌至自由党在全省25%至30%的口语化基准之下——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直达到这个基准。在与立法团队协商一个半小时后，斯万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辞去党领袖一职的计划。在他的辞职演讲中，斯万说:“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正确时机....我辞职的决定代表了一个更新我们党的机会”(Kleiss, 201b)。

2008年，斯万击败了戴夫·泰勒(Dave Taylor)和莫·埃尔萨利(Mo Elsalhy)的竞争对手，成为ALP的领导人。当时，加拿大邮政向党员发放了纸质选票，并要求他们邮寄已标记的选票进行计票。虽然2008年ALP的党魁竞选在为付费党员提供去中心化投票方面具有创新性，但它并没有寻求以任何激进的方式扩大党的基础;它没有寻求向ALP成员引入数字媒体技术或社交媒体活动;它也没有打算通过吸引年轻一代潜在的新选民来重振该党的基础。

1O.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相比之下，在斯万辞职几天后，新当选的阿尔伯塔自由党主席埃里克·安特曼声称，“现在是新领导人和新一代阿尔伯塔人带领我们党走向未来的合适时机”(Wingrove, 2011)。安特曼指出，他自己被任命为32岁的党主席，以及当时29岁的执行董事科里·霍根(Corey Hogan)的任命，“显示了我们党的无畏精神，愿意承担一些风险，推出挑战现状的人和想法”(Wingrove, 2011)。安特曼的言论是在一个社会学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背景下，加利亚选民最近选择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弱势候选人，38岁的Naheed Nenshi，在2010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担任他们的市长。

内因的竞选活动在党派工作人员和记者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11年2月2日，也就是斯旺辞职的第二天，《埃德蒙顿日报》记者凯伦·克莱斯引用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家大卫·塔拉斯的话说，阿尔伯塔省的“内因时刻”将延续到省级选举(克莱斯，2001)。塔拉斯说:“40年后，人们有一种需要改变的感觉，”他补充说:“有了新一代，这是一个不同的阿尔伯塔，它更年轻，更国际化，更多元文化....。现在是新的变化气候，面对新的阿尔伯塔省....，各党派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将经历这些惊厥....我认为这是健康的”(克莱斯，2001)。不那么乐观的是，塔拉斯还警告说，青年领导的政治革命不会很容易:“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阿尔伯塔的政治僵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省选举)可能会形成一个联盟。一切都不确定。”但在同一篇新闻文章中，莱斯布里奇大学政治学家彼得·麦考密克(Peter McCormick)被引述说，“每一代人都会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重置一次阿尔伯塔的政治体系，这可能就是它。”麦考密克将他的原始预言与该省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未来联系起来:“我们听到年轻一代的冷漠，缺乏选民投票率。好吧，你不能为他们大声播放同一首歌，你必须改变曲调....这是一种完整的政治风格和一整套关于如何做事的假设…我预测这将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青年运动”(克莱斯，2011)。

麦考密克推测，阿尔伯塔省的政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一群“青年”领导，他们将通过改变省政治的“风格”和对“如何做事”的假设来“改变省政治的调子”。这一推测在地方和全国性报纸的社论版上得到了呼应。到开始的时候

在2011年3月28日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斯万辞职仅仅两个月后)，《*卡尔加里先驱报*》记者理查德·库斯伯森声称:“卡尔加里人准备在短短七年内第九次投票——包括联邦、省和市选举——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对抗选民的冷漠。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去年秋天在卡尔加里举行的市政运动，这是当地公众利益的标志，至少40年来投票率最高”(库斯伯森2011)。尽管内施自己警告说，阿尔伯塔省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基于自己的竞选活动在试图克服“痛苦的党派之争和荒谬的讽刺”方面的困难为这一观点辩护(库斯伯森2011)——记者们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省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上通过与内施的案例研究进行类比。

在2011年联邦大选的第一周，记者Laura Stone在2011年4月4日通过*卡尔加里先驱报*的Postmedia新闻通讯社首次发表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内施的年轻因素。她写道:“如果通过社交媒体等手段有效利用，积极参与的年轻选民可以为竞选活动注入活力，帮助候选人获胜。如果成功，正如卡尔加里开拓性的市长竞选所看到的那样……39岁的纳希德·内施当选，可能会重塑加拿大的政治格局”(Stone, 2011d)。2011年4月4日，全国各地的Postmedia联合报纸，包括《*温哥华太阳报*》、《*渥太华公民*报》和《里贾纳*领袖邮报*》(Stone, 2011年b、a、c)，对同一故事和同一引文进行了略微修改。[1]

随后，联邦自由党在2011年5月2日的选举结果是灾难性的，自由党在下议院被贬低为一个遥远的第三党，这进一步刺激了阿尔伯塔省的自由党以狂热的热情复兴“年轻”和“更新”的主题。ALP在卡尔加里召开特别大会，即将敲定党魁竞选的新规则。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周，一小群ALP员工和志愿者开始播下“更新”话语的种子，他们承诺在一个近一个世纪以来都不是自由党大本营的省份，为自由党品牌提供民主的灵丹妙药，从而使政治格局更加肥沃。有人认为，一个基础广泛的“注册支持者”外联系统和易于访问的数字投票机制相结合，将确保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内恩斯特式的支持激增。

ALP内部这群新兴的更新行动者的工作假设是，数字技术可以带来新的支持者(和支持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凭借其简单的分散性，数字技术可以带来新的支持者(最终是选民)。人们相信，自由党的“新一代”将在2012年的省级选举中投票，为这个苦苦挣扎的省级政党带来活力和选举上的成功。这些假设掩盖了与内施交互式Web 2.0风格的竞选活动(下面将讨论)相关的许多细微差别，并忽略了通过数字投票系统影响选民参与的重大障碍。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科米肯，莱斯布里奇的前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和我，卡尔加里东部的前联邦自由党候选人，被Ambtman招募为2011年ALP领袖竞选的联合主席。科米肯和我都同意在特别大会上担任正式主席。我们的联合任命得到了当时寻求领导职位的两位现任自由党议员的支持，即劳里·布莱克曼(埃德蒙顿中心)和休·麦克唐纳(埃德蒙顿-金条)。[2]

党派参与向数字机制的转变

《*卡尔加里先驱报*》(*Calgary Herald*)专栏作家Don Braid认为，内施灵活地利用廉价的、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交媒体，使他的竞选领先于更知名的竞争对手，包括知名的当地记者巴布·希金斯(Barb Higgins)和与省保守党有联系的知名市议员里克·麦克弗(Ric mcciver)。[3]Braid写道:

> 无论10月18日发生什么，内施的竞选活动已经成为如何利用Facebook、Twitter、播客、You-Tube、博客甚至是iPhone发起政治人气的典范。当然，其他候选人也在网上进行宣传。麦克弗和希金斯都有有效的网站。他们都用Twitter和Facebook(或者有人帮他们用)。然而，内施显然比其他候选人在网上引起了更多的兴趣和热情。上周晚些时候，他在Facebook上有3440个好友，而希金斯有942个，麦克弗有2105个。近2000人在Twitter上关注他，而麦克弗和希金斯都在1100人左右。他的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领先约4000次。(Braid, 2010)

虽然Braid认为内施在网上的早期人气并不能保证他在选举中获胜(Braid引用了一项估计，当时只有1万卡尔加里人使用推特)，但这位记者也认为，如果内施排名第三，他*可能会*获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候选人可以将他刚开始的在线竞选转变为成熟的传统地面竞选，建立在政策文件、电话、敲门、草坪标志、公共论坛和传单上——内施的竞选团队似乎已经开始执行这些任务。正如Braid总结的那样:

> 早在正式竞选开始之前，内施就提出了他的七个“更好的想法”。他的许多政策都附有详细的背景文件。从大量的网络评论来看，结果是，被社交媒体吸引的人们看到了虚拟活动背后的真实活动。随后，网络上的热议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观看。既然正式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内施已经投入到更传统的政治活动中，尽可能多地参加辩论和公共活动。(Braid, 2010)

在2011年10月选举结束后的后续新闻分析中，Braid对内施早期策略的虚拟和数字美学背后的传统竞选需求的推测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对内施竞选策略的回顾中，记者凯利·Cryderman追溯了到2010年9月，廉价的社交媒体渠道(作为内施竞选的原始基础)稳步融入有效且更传统的竞选策略的机制。从而巩固了候选人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和最终的胜利(Cryderman, 2010)。竞选活动在早期就有效地整合了政策专家和志愿者，努力设计能够吸引潜在市政选民的广泛基础的想法;然后，竞选团队利用交互式Web 2.0的社交媒体传播这些想法，并从社区成员和潜在选民那里收集批评和积极的回应。然后，竞选团队将这些想法整合到其声明、政策话语和营销材料中。

利用社交媒体作为评论、反馈和政策制定的综合渠道，并通过在数字界面的另一端招募社区成员亲自加入活动，内施的策略在活动的数字话语中活跃的在线参与者中创造了一种归属感。这些“高度投入”的志愿者很快就构成了内施不断壮大的竞选宣传网络的核心。他们将内施的信息通过网络和面对面的方式传播出去，充当人类品牌的载体，在数字讨论室、咖啡见面会和问候会之间无缝穿梭，再回到脸书论坛。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总而言之，内施的竞选策略依赖于社交媒体作为互动分享和完善候选人政策的渠道，从而创造了对竞选本身的所有权感，并激励人员不断从可能暂时连接的数字社区转移到专门的面对面志愿者，网络工作者和选民。这种战略竞选方法模仿了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竞选活动首先开发的分散竞选结构，该结构催生了通过在线和面对面互动以及共同承诺的无缝网络招募在线选民的概念。重要的是，当内施的对手未能发展自己的支持基础，甚至没有将内施视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因此是一个值得攻击或反竞选的目标时，这种网络化战略也得以展开(Cryderman 2010)。

在阿尔伯塔自由党(Alberta Liberal Party)的办公室里，内施的选举成功促使工作人员把重点放在新的竞选策略的青年方面，从而开发了该党的第一个推特账号。2010年10月，ALP宣布www.twitter.com/albertaliberals——该党称，这是数字化促进“更新”的先兆。通讯人员乔迪·麦克弗森宣称:

> 随着社交媒体作为激励支持者的工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阿尔伯塔自由党是时候加入对话了。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推特、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每周都有关于每位卡尔加里市长候选人成功的最新报道。每周的统计数据显示，纳希德·内施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但许多人对社交媒体不以为然，称推特和脸书上的人不会出来投票。随着10月18日内施市长的胜利，这一理论受到了质疑。(麦克弗森，2010)

几周之内，少数ALP青年(大多不到30岁)创建了一系列阿尔伯塔自由党博客和在线评论帖子;他们在脸书和推特页面上贴满了政治标签，意在宣传该党在数字时代的成熟。

然而，麦克弗森提到的文化转型并没有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也就是在该党领导竞选之前，在工党内部出现，也没有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在该省大选之前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没有制定彻底的通信或数字基础设施战略，通过引入与公众的互动参与来创新决策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社区成员或阿尔伯塔人个人就紧迫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无论是在政党层面还是在选区协会层面，ALP都没有发起任何形式的协调沟通战略，旨在将阿尔伯塔人的观点纳入该党的日常事务中。因此，除了引入推特feed(主要是ALP工作人员和核心小组成员与关注该党话题标签的数字听众之间的单向通信流)之外，ALP忽视了内施受Web 2.0启发的竞选策略中最鼓舞人心的方面，也未能纳入其中——尤其是，招募互动的在线演员作为面对面的志愿者、捐赠者和选民。

因此，到六个月后ALP党魁竞选正式开始之日，内施竞选的细微差别——结合互动式在线渠道，将党外的政策观点纳入党内平台概念，以及将暂时的数字参与转化为实际的面对面参与——仍然难以捉摸。相比之下，ALP在2011年5月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提出的“更新”战略，主要侧重于方便投票(解释为政党“成员”或“支持者”身份的免费结构)和分散投票机制(解释为数字和电话投票机制)。虽然具有创新性，但这些“更新”机制并没有为ALP带来网络化的增长战略;然而，它们确实充满了模糊性和操作上的小问题，这导致了一个小反对党在一个由资金充足、组织强大的省级保守党主导的省级政治格局中努力为自己融资的重大增长困难。

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ALP的工作人员确实向党员提出了一项章程修正案，试图将政策反馈机制纳入其中，以鼓励更多的基层参与。被称为决议B的拟议修正案包括一系列步骤，党员可以通过这些步骤制定和提出新的政策想法(涉及经济、卫生、教育、环境等任何主题)，并在ALP年度大会上通过党员投票进行审议和批准。在特别股东大会上，ALP成员投票赞成决议B，该决议随后规定(作为附例)，ALP年会或股东大会对政策事项的投票结果将用于ALP的“政策优先”，以便在会员中获得最多票数的政策将被优先考虑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排名更高，因此最有可能在未来被纳入竞选/选举纲领(ALP，2011年:第27节)。该章程还指出，在选民中获得三个最高分的政策将被视为ALP的“优先决议”，政党精英在未来有义务“在其选举纲领中包括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中三个优先决议中的至少两个”(ALP，2011年:第28节)。总而言之，决议B具身的章程确保了党员制定的政策在年度党代会上通过协议，*原则上*可以进入政党的选举纲领。

然而，决议B只确立了一年一次的反馈机制，党员和政党参与者可以通过该机制表达政策观点，希望获得足够的选票，成为“最优先事项”。该决议没有注入一个动态的、互动的反馈机制，通过该机制，ALP参与者可以经常参与、重新评估、改革或通过与党内精英的定期互动来改变党的核心政策。此外，虽然在5月的特别股东大会之后，该章程在纸面上存在，但在2012年省级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它都没有在党的普通党员中感受到实际效果。在领导竞选结束后(但在大选之前)在马鹿举行的2011年年度大会上，ALP的工作人员和党团会议没有向议会征求政策建议，党内成员也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建议。与此同时，该党推特和脸书帖子中具身的“新”通信工具仍然局限于主要由ALP立法工作人员、ALP党办公室工作人员和ALP(领导)竞选志愿者组成的少数参与者。

吸引和整合新的政治行动者

然而，缺乏互动的Web 2.0沟通和志愿者招募策略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党精英们没有*试图*改变该党的结构。2011年2月斯万辞职后，一群行政人员和党内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小组，率先努力重新定义2011年的领导“规则”，以确保与阿尔伯塔人有更多的互动，并启动一个“更新”议程。该党新任执行董事科里·霍根(Corey Hogan)、运营官科瑞娜·甘顿(Corina Ganton)、主席埃里克·阿姆特曼(Erick Ambtman)和通讯副总裁马特·格兰特(Matt Grant)领导着这个团体。这四个人的年龄都在25岁到33岁之间，他们组成了一个精英游击队的核心组织单位(他们要么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ALP的工资单(或担任执行职务)致力于改变ALP的结构，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更多的捐助者，最终为自由党在阿尔伯塔省取得更大的选举成功。

在2011年5月的特别大会之前，一种新的参与等式的文化产物——将数字系统、社交媒体和青年选民等同于政党的复兴——突显出来。在这里，我引用了甘顿当时发表的一小部分帖子，他的热情表明，他似乎毫无疑问地信仰年轻人、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复兴美德。2011年5月7日，甘顿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三分钟的视频链接，名为“Gen Why Media Project”，讨论可能激励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问题(甘顿, 2011c)。同一天，甘顿又发了一条推特，说自己是参加ALP董事会会议的“年轻人”，会议初步讨论了领导规则——包括候选人的入场费和投票日期。我爱辩论。能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真是太好了。这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2011b)。同一天的一条消息表明，委员会已经同意了领导大会的基本规则。甘顿热情地在推特上写道:“最新的@albertaliberals新闻……#ablib #ableg LEADERSHIP RULES SET!我们开始比赛了!(2011d)。一天后，甘顿转发了另一位推特用户的一条消息:“来吧，年轻的自由党——让我们重新定义、改造和重振我们的联邦政党。”现在是时候了，这取决于我们。#lpc #oyl #ovyl #uoyl #ylc。”5月10日，甘顿在推特上(大概是作为对省级案例研究的类比)，“下一代是自由党的救星”，引用了劳伦斯·马丁在《*环球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他认为加拿大的政治是一场“一人”秀，联邦自由党的“救星”最终会选择一个“年轻人”(2011e)。

甘顿并不是唯一一个在ALP内部构建文化的人，这种文化旨在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门户网站激发以年轻人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在ALP特别大会的前几天，甘顿在推特上写道:“新自由主义每日邮报:启动更新。”这条推文链接到ALP执行董事科里·霍根在霍根的游说网站*新自由倡议*上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该网站旨在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组织，旨在吸引年轻选民成为ALP的下一代政策决策者。*新自由主义倡议组织*发表博客，支持将“注册支持者”制度和新的电子投票机制纳入ALP的宪法和运作结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尽管霍根是ALP的中立执行董事，但他在自己的网络博客上主张允许“注册支持者”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阿尔伯塔居民都可以在选区提名竞选和政党领导竞选中投票。霍根预言，“注册支持者”制度将凭借其能够实现重大的更新目标，而不是将该党限制在以前只允许持牌付费成员投票的做法

> 吸引不愿入党的新支持者。建立更大的名单，征求捐款、签名和志愿者的时间。选择那些最能与做出最终决定的选民建立联系的旗手。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政党。(霍根，2011)

当时，霍根已经起草了各种宪法修正案，他预测，这些修正案将重塑ALP的执政宪法，以吸引新的、迄今为止没有投票权的阿尔伯塔人加入该党。

霍根这样做的明确灵感来自“开放初选”制度的概念，这种制度在美国选定的州被用于总统提名。开放初选制度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州，允许该州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符合条件的选民投票选举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与美国其他州实行的“封闭式初选”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州，公民必须是某一政党的持证党员，才能在该政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投票。这也与加拿大政党中典型的封闭式提名和封闭式投票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加拿大政党中，只有持牌(通常是付费的)成员才能在党内竞选中投票给某一政党的下一任领导人。

为了推动采用“开放式初选”式的领导竞选，霍根发布了一份题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变革指南*》的文件。该文件宣称有必要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党内内部结构的重大变革，明确拒绝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Ganton, 2011a;霍根，2011)。霍根写道:

> 现在，在自由主义圈子里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在我们急于对我们的政党进行任何戏剧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对自由主义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进行长期而认真的思考。但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涉及到组织政治时,你不需要在开始改变之前弄清楚需要改变什么。*[斜体是霍根的]**

作为补充，安特曼宣布民主党将在即将到来的领导竞选中使用新的数字机制，即电话和互联网投票。他是在特别大会召开三周前宣布这一消息的。在这次会议上，党员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并投票决定对该党的运作和宪法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安特曼宣称，“(数字投票)将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到竞争中来，”他补充说，领导竞选的规则(及其投票机制)已经得到了ALP董事会的一致批准(Massinon, 2011)。

安特曼在这里指的是当月举行的董事会会议，理论上包括党主席、副主席、地区主席、选区协会主席和前任党主席。在会议上，董事会成员显然同意使用数字投票机制。然而，在一年后(为本研究的目的)对ALP选区行政人员和立法会议员进行的采访中，受访者表示，在董事会会议时，董事会的一些关键职位要么空缺，要么有两个职位。换句话说，由于职位空缺或一人担任多个职位，因此不太可能在会议上达到法定人数，从而减少了ALP高管通过指令所需的总票数。没有董事会会议记录，但采访数据表明，“注册支持者”和“数字投票”系统都只是初步的想法，在安特曼公开宣布之前，还没有得到董事会成员的正式批准。

此外，由于“商定”的新电子投票机制改变了管理ALP内部投票程序几乎所有组成部分的规则，包括谁可以投票、何时投票、如何登记投票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投票，安特曼的声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电子投票影响了该党对其成员的成文承诺，因此需要在党的大会上以多数投票的形式得到成员的支持。相反，拟议的电子投票机制是由ALP的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引入的，好像它们是中立的行政工具，不会影响公平、透明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影响该党必须履行的其他宪法义务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它的付费会员基础。霍根、甘顿、安特曼和格兰特组成的紧密团结的更新团队在2011年5月28日至29日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特别大会上，毫不顾忌、毫无保留地提出了“重新想象的政治”这一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数字投票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超出了宪法考虑的范围。也不受会员制投票的约束。

数字化民主推广时代的复兴

2011年5月28日，特别大会的前一天，大约100名自由党成员(当时全省有2200多名自由党成员)来到卡尔加里酒店的会议室，在那里他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们的执行董事科里霍根，他的角色是中立地促进会议，他正在分发由他和党主席埃里克·安特曼的*新自由主义倡议出版的说客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旨在说服参加会议的成员投票支持“注册支持者”制度。标题为*YES!*，该文件认为，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将创造一个新类别的临时政党附属机构——“注册支持者”——他们可以注册支持，而不会被长期的政党同一性或会员费所困扰。霍根的文件称，该党将收集这些新支持者的个人信息，以便将来进行沟通。由于每年5美元的会员费负担，成千上万的阿尔伯塔人本来不会加入该党，而无需缴纳会员费，这将使他们能够加入该党。

*YES!*文件还指出，注册支持者最终将鼓励社区在政策问题上的双向互动，因为新的会员类别将鼓励党员“在社区建立网络”，并“鼓励社区外展”，以党员从未做过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 加拿大的政治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否认这一点，我们可以反对它，或者我们可以成为加拿大第一个接受今天人们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看法的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把我们的党定位为加拿大最具包容性的基层政治组织。这样做将带来新一代，并为该党未来几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接受改变。对决议C, D, E投*赞成票[强调霍根]。(霍根，2011:1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有了霍根强烈支持的游说文件在手，而且没有反对决议的文件流传，第二天，会议室里的ALP成员开始投票赞成一系列将“注册支持者”概念制度化的宪法细则，尽管支持者注册的机制——无论是通过纸质签名(个人手动填写登记表，并由个人竞选者或ALP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她或他的数据上传到一个通用数据库)，通过在线注册(一个人在网上输入个人联系方式，并在一个方框里打勾，声明遵守政党的原则，或者提供一个数字签名，将注册与他们的人格联系起来)，或者仅仅通过推荐或任意加入(竞选团队可以根据电话簿或该省选民名单上列出的人的姓名和地址提交姓名和地址进行登记，尽管没有与竞选团队进行个人或在线联系，但竞选团队认为谁会支持特定候选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假设的是，这些机制——无论它们在未来几个月如何展开——必然会支持该党的发展，以及它与阿尔伯塔省各地社区和选民的双向沟通。

因此，在2011年6月1日，ALP成为加拿大第一个遵循“注册支持者”制度的政治实体:一种随意的政党关系，不依赖于会员费，也不受如何注册支持者的任何规则的约束。然而，由于媒体的积极报道和“更新”代理人先锋团体对“注册支持者”制度修正案的成功推崇，几乎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

新支持者登记和电子投票管理方面的操作障碍

在操作层面，该党的三人工作人员(包括霍根、甘顿和一名兼职大学实习生)承担了管理、指导和制度化新登记支持者和数字化投票系统的所有方面的任务。到8月中旬，这个系统已经包含了近2万个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几乎是必要的(因为工作人员少，登记的支持者名单需要许多任务)，ALP的选民“政策”与选民隐私和投票诚信有关(包括向姓名变化的人发放双重个人识别码，并发放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逝者的家庭个人识别码，或被错误或不情愿地加入ALP“支持者”名单的人(包括宠物和恶作剧的名字)，以及对数据所有权、数据安全、数据盗窃和数据操纵可能性的网络安全担忧，都是在5月29日特别大会之后立即特别制定的。对党内文件的事后分析(包括电子邮件、所有候选人会议记录、以及Cormican和我在2011年5月至9月间发布的决定信)表明，与“登记”选民和数字投票机制相关的人员不足和复杂的系统问题，在ALP的一系列重大操作、技术和哲学问题中表现出来。

作为竞选的主席，考米肯和我收到了正式的投诉，其中包括休·麦克唐纳对非阿尔伯塔人、死人和猫出现在“登记支持者”名单上的担忧，以及没有透明的方法来阻止向这些人或实体发放pin码。麦克唐纳竞选团队还抱怨说，那些注册支持他竞选的付费成员没有出现在发给所有竞选团队的数字化投票名单上。拉吉·谢尔曼的竞选团队正式抱怨提前公布“已登记的支持者”姓名，并要求提供书面记录或材料签名记录，将支持者姓名与现有个人联系起来，团队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要求。比尔·哈维的竞选团队正式抱怨说，没有适当的审查程序来确保“注册支持者”——他们应该至少年满18岁，名字出现在阿尔伯塔省的选民名单上，或者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并且打算在自由党竞选中投票——符合任何或所有这些要求。劳里·布莱克曼的竞选团队抱怨说，在竞选一开始就有一个商定的惯例，使用纸质系统来注册新的“注册支持者”，但纸质系统被*临时*抛弃了，没有正当化。这损害了那些花费时间和金钱收集纸质签名以向选民展示纸质踪迹的团队的利益。最后，在2011年9月竞选接近尾声的时候，麦克唐纳竞选团队抱怨说，在竞选的最后几周被退回给发送者的pin码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或者没有已知的协议来安全处理这些pin码。如果泄露给不法分子，这些密码可能会被滥用于双重或三重选民。事实上，2011年整个夏天，每周通过电话召开的所有候选人会议的记录(其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Cormican和我(共同或单独主持)表明，所有五个竞选团队都在某种程度上抱怨了一个或多个与“注册支持者”缺乏材料(相对于数字)可追溯性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在线注册、在线PIN使用、以及在线投票制表和审计。

作为“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系统的执行董事和事实上的管理者，霍根对这些担忧的回应包括:关于滥用PIN码，霍根认为打开别人的邮件是非法的，所以家庭成员应该避免打开或使用孩子、老人或伴侣的PIN进行两次(或三次)投票。虽然在理想的情况下，现有的数字选民的书面记录是理想的，但ALP不能保证这样的书面记录，也不会强制要求对数字选民有实质性的书面记录，因为它没有资源这样做;退回给发件人的PIN码将由办公室工作人员(霍根、甘顿和大学实习生，尽管霍根没有解释如何处理)处理;第三方提供商可以安全地保存和存储数字投票(尽管霍根多次要求提供ALP与第三方提供商的合同细节，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最后的领导人投票日期(9月8日)之前的两周，Cormican和我要求对“已登记的支持者”进行正式的统计审计，以确保出现在(当时)25000多名姓名和地址上的名字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确实是，属于18岁或以上的阿尔伯塔省居民(或付费的ALP成员，最小的可能只有14岁)，并且每个这样的居民都获得了一个PIN码，而且只有一个PIN码(由于名称变化而提前停用的任何额外PIN码)。霍根回应说，ALP没有预算(也没有预算)在投票前对潜在选民的登记支持者名单进行任何形式的统计审查或外部审计，该党主要依靠阿尔伯塔人的“荣誉制度”。希望他们不要通过双重或三重投票来滥用PIN码。

数字推广和选民参与的哲学局限性

鉴于这些情况，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分析在ALP实验中出现的争论和争论的投票原则。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个加拿大投票原则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值得详细考虑的是: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和选民的平等;以及投票过程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与选民的平等性

在9月6日至9月10日期间，超过8000个个人识别号码(PIN码)被用于通过电话或在线登录ALP的投票系统，并使用一个专门的网站。这些选民的投票表和偏好(包括他们通过电话键盘输入或按偏好顺序在线编号选择的优先候选人名单)由第三方私人提供商收集、存储和托管。理论上，每个PIN都与一个人相关联，从而确保了ALP一人一票政策的保护。

电话和网上投票机制旨在方便那些不能或不愿前往实体投票站的成员和支持者投票，在那里，他们将获得一张铅笔和纸选票，在私人屏幕后投票。支持ALP电子投票机制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这些数字技术的用户在投票体验或投票实践方面与通过纸质选票进行的实物投票相比不会有任何显着差异。然而，这一假设应该接受批判性的调查，因为数字投票带来了一个不同的空间，该空间内不同的一组关系，不同的权力动态，以及基于其发生的背景的不同结果，与由中立投票职员监控的私人屏幕后面的纸质选票投票相比。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国内的数字投票空间。在线和电话投票在特定参数定义的背景下进行。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家庭中，假设每个家庭成员都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每个家庭成员(有电话或互联网连接的家庭)都可以投自己的票，这样的假设可能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但是，阿尔伯塔省的许多家庭不能被描述为平等主义。所有艾伯塔省的家庭，或者至少所有参加ALP投票的家庭，都表现出潜在选民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投票权上不受阻碍的平等，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使用互联网或电话，或使用这些服务时的个人隐私，可能无法得到保证。不能保证使用自己的PIN。在键入投票偏好时，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可能无法得到保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总而言之，当分析私人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时，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进行的数字投票与私人投票站和纸质选票的虚拟等同的信仰很快就会崩溃。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决定并塑造了去中心化的电子投票过程。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从一人一票原则和选民之间基本平等的假设来看，电子投票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即没有任何一票比其他选民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更大的“声音”或更多的选票。

考虑到家庭权力动态(配偶之间、父母与年轻人之间、成年人与长辈之间、健全者与残疾人之间、或认知能力者与认知残疾者之间，等等)的不平衡且往往不平等的本质，我们必须要问，国内数字投票场景中的一人一票原则能否得到保证——在这方面，它与私人投票亭是否平等?这里的问题主要是权力问题——在家庭内部、在工作场所内部、在家庭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在任何分散地点的行动者(即选民)之间，在这些地方，私人的、不受阻碍的互联网或电话接入投票过程是先决条件。

其次，让我们考虑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情况下投票的心理方面。让我们假设一个给定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个PIN码，他们可以用它来登录在线投票或呼叫电话投票。就地使用数字选票(在一个人的家中，PIN通过邮寄到达)的先决条件是，家庭中的所有人都受到尊重，享有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行使其投票权的平等能力。在起作用的首要假设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无论性别、经济地位、身体状况、认知状况或其他形式的地位如何，他们的投票行为同样不受家庭中其他选民或非选民(或去中心化的投票地点)的阻碍。一个基本的女权主义分析在这些假设周围竖起了警告信号。一人一票原则的完整性在父权制或母系家庭中完全被破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霸道或压迫的关系，在没有保护屏的情况下，当被要求投票时，PIN的接收者却没有必要的心理或身体能力。

PIN不仅可能被另一个已经投票的人、没有资格投票的人、或者根本不希望被支配的人投票的人征用和使用，而且可能被一些成员的心理支配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个家庭对其他人(包括在精神疾病、衰老、认知障碍或青少年天真的情况下)的支配，允许家庭中强大的当局控制投票结果。当置于家庭环境的背景下时，电子投票可能无法提供针对心理支配和投票控制可能性的保护措施。

也许有人会说，选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平等(霸道的人可能不允许被征服的家庭成员亲自访问投票地点)，但现场投票确实避免了国内去中心化电子投票系统的问题，在这种系统中，霸道的权威人物可以控制投票的最终行为。那些生活在被征服关系中的选民，如果他们*确实*设法亲自前往投票地点，最终会受益于投票屏幕这一最后手段，他们可以在投票屏幕后面私下标记选票，而不受专横代理人的直接影响。

总而言之，家庭内部和其他分散的投票地点(如工作场所)的权力动态决定了投票结果。就数字投票消除了女人、男人、残疾人、老人或青年可以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私人屏幕而言，它无法确保“一人一票”，可能会加剧选民之间的不平等。电子投票将投票行为从纸张、铅笔和个性化屏幕确保平等主义保护的受监控网站，转移到一个不受监管、不受监控、潜在不平衡的网站，容易受到操纵和霸道的权力动态的影响。

投票过程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想象一下，在2011年英国工党(ALP)领导人竞选中，数字投票将会发生什么。一个人(比方说一个ALP成员，或者一个新“注册的支持者”)会在邮件中收到一个PIN，信封上写着他或她的地址。信封里应该有一封来自ALP的信，信中说，选民可以使用随机分配的PIN登录在线投票或电话系统，进行优先投票。

在网上投票的情况下，这个人将把在线投票网站的URL输入网络浏览器的地址栏。她应该使用她的PIN登录投票。她会看到一张选票出现在屏幕上，选票上五位领导人候选人的名字按照从上到下的随机顺序出现(每个选民收到的都是被声称是随机分配的候选人名单，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一直出现在名单的顶部)。投票人就会使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她的鼠标在候选人的名字上滚动，并优先对候选人进行从1到5的评分(或1到5之间的任何数字，因为选民不需要使用所有五张优先票)。类似的音频过程会通过电话进行，但不是使用鼠标在名字上滚动并键入1到5的数字，选民会使用她的键盘为列出的特定候选人选择1到5。然后，选民就会确认她的选择，她的选票就会被登记为已投。

但是，在ALP的情况下，当成员单击“确认”或按*键确认电话选择后会发生什么?该成员的PIN将以数字方式附在她的投票偏好上——她对候选人的排名从1到5。这些数字信息将自动输入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还记录了所有其他提交的优先选票，每次提交都附加到一个特定的PIN码，可能(或潜在)附加到一个计算机IP地址。电话数据将被记录在与成员的PIN和(可能的)电话号码类似的数字数据库中。

这里出现了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pin可以与姓名以及IP地址或电话号码相关联，因此会员的姓名*可以*间接地与她的投票偏好相关联。为了表彰电子投票系统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现代投票机制和匿名工具在实践中确实允许pin和选民身份之间的分离，以确保过程中的匿名性。然而，数字投票的匿名性(无论是在线投票还是电话投票)原则上总是依赖于作为服务提供给客户端的那些分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是ALP。因此，投票匿名的哲学保证依赖于操作保证，即投票收集者、投票存储代理和投票计数器拥有可用的解关联(或打乱)工具，这些工具有效地发挥作用，服务提供商和客户(ALP)之间的合同包括购买这些服务，第三方提供商提供条款，确保在所有情况下使用这些解除关联工具，并提供透明的程序审计机制。

就ALP而言，这些业务保证无处可寻。如果它们确实以合同或内部形式存在，自由党党团不知情，它的执行委员会不知情，它的选区主席不知情，它的领导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不知情，领导联合主席(如科米肯和我)不知情。事实上，要求获得与第三方提供商的服务提供合同副本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从未与第三方共享过任何合同文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霍根、甘顿的ALP员工之外的任何人，以及(可能的)兼职实习生。此外，2012年大选后聘请的取代霍根和甘顿的工作人员，以及新当选的党主席托德·范·弗利特(Todd van Vliet)，也无法根据这项研究的要求找到合同文件。总而言之，虽然电子投票系统的第三方提供商可能拥有上述技术能力，但ALP案例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该技术能力在原则上或详细地在该特定投票场景中得到了商定、支付或使用。这导致了关于技术能力的假设是否总是转化为实践的问题。

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电子投票系统产生的数据集的所有权。纸质选票可以在盒子里保存数年，它们的寿命取决于它们的重要性。物质纸质选票的处理有效地破坏了对投票结果的记忆。相比之下，在数字化投票中，投票表(收集和制表)以数字形式存在;销毁一份数据库副本几乎不意味着数据的销毁。投票数据库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和共享——相对容易地复制。选民及其投票偏好的长期匿名性的哲学保证取决于数字投票集的操作所有权以及投票数据集所有副本的有效和操作销毁。

就ALP而言，由于缺乏透明的服务合同，不可能知道这种保证是否到位。在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参与这项研究的ALP员工和高管报告称，他们无法找到任何信息、合同或书面记录，详细说明谁(或哪个实体)最终拥有ALP领导层投票数据、这些数据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共享的，以及这些数据是如何(如果是)销毁的。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与ALP签订合同的服务提供商是否创建了一个记录pin、IP地址、电话号码和投票结果的数据库，或者是否使用可接受的技术将投票聚合为不可分辨的组，从而对匿名数据进行了加密和呈现。第三方提供商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一方的高管或工作人员)是否查看过最终的计票结果和投票偏好数据库，也不得而知。最后，该数据库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是否已被销毁，也不得而知。用一位长期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我假设外面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投票的，而且有人有一个数据库，告诉他们每个人是怎么投票的。”这是否属实，在目前的案例研究中根本无法确定，但它确实提出了关于数字化所需的细节程度的问题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投票系统，以确保未来在此类电子投票系统中投票的长期和永久匿名。

总而言之，ALP的操作故障导致了对电子投票过程哲学完整性的严重质疑，它突出了一个实体被确保自由、公平、透明的电子投票过程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所压倒，可能会错过或忽视严重的条款。

基于联邦投票文化的比较

为了突出ALP电子投票案例研究中明显的操作差距的哲学影响，将该案例与加拿大选举在其1998年报告《*技术与投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更突出的问题进行比较是有用的*。该报告探讨了数字投票过程和世纪之交潜在电子投票结构中体现的现实。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在加拿大政治背景下所描述的关于被视为“民主”的正式联邦投票程序的三个最相关的投票实践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强调加拿大投票文化的关键特征，以了解一个典型的阿尔伯塔选民会习惯做什么，以及一个典型的阿尔伯塔人会有什么合理的期望，在根据他们在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投票经验进行政治投票时(无论是在大选还是党派选举中)。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说法，数字投票机制存在很大问题;由于缺乏网络安全机制来确保选举中投票的私密性、匿名性和可销毁性，它们很容易受到欺诈性操纵(加拿大选举，1998)。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对数字投票的审查强调了七个值得关注的领域:登记确认;选票;投出决定;选民验票和匿名;提交选票;选票统计;保留和存储。下面，我们将探讨ALP案例研究，以分析登记确认、投票和投票决定的具体原则。

选民登记确认

加拿大选举报告说，“有效识别合格选民的问题(例如，PIN号码、指纹、声纹、视网膜扫描)”是电子投票技术的一个重大障碍(加拿大选举，1998年)。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ALP的案例研究中，该党依靠两个数据库进行选民身份识别:ALP成员名单和2008年阿尔伯塔选民名单。在第一个例子中，阿尔伯塔自由党的成员包括任何14岁及以上的人，并支付5美元的费用成为该党成员。“会员”不必是加拿大公民，但必须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支持者”包括在2008年阿尔伯塔选民名单上作为合格选民出现的任何人。这意味着支持者必须年满18岁，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并居住在阿尔伯塔省。如果一个“支持者”声称有资格投票，但她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民名单上，ALP的审查系统应该确定该人是否a)加拿大公民b)居住在阿尔伯塔省c)年满18岁。但是，根据由我和科米肯主持的所有候选人会议的记录，在ALP工作人员和领导小组志愿者出席的情况下，ALP显然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来手动检查个人的姓名和资格。工党无法给出现在潜在选民名单上的数百(然后是数千)户家庭打电话，这些家庭被领导团队指定为潜在问题。

到2011年8月，随着“支持者”名单增长到超过1.5万人，ALP工作人员和领导竞选团队进一步透露，这些名字中的大多数已被添加到“注册支持者”名单中，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或个人数字记录;也就是说，所谓的“支持者”已经完成了一张“注册支持者”卡，既没有手工填写，也没有数字填写。霍根指出，机构没有能力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没有能力检查这些个人是否表示有意被列入ALP的潜在选民名单(从而邮寄个人密码进行投票)，因此，对任何一种“注册支持者”的补贴成为ALP工作人员制定的一项*临时*政策。

由于缺乏将“注册支持者”与实际人士联系起来的文件或个人数字记录，霍根向科米肯和我介绍了ALP正在制定的选民身份识别协议:出现在选民名单上的“登记支持者”(即那些名字和地址已被某个竞选团队作为“登记支持者”提交给政党办公室的人)首先要与阿尔伯塔省2008年的选民名单进行交叉核对。根据霍根和我的一次电话交谈的记录(后来报告给了科米肯)，ALP提议的“交叉核对”和“清除”过程涉及使用至少两个数据点来根据2008年选民名单核实一个人的名字。要么是姓名加地址，要么是姓名加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电话号码或地址和电话号码必须同时出现在“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上，以确认支持者的同一性。如果竞选团队提交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通过了第一次检查，ALP就会自动给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颁发一个密码，而不管2008年的名单是否与现在的地址或居住地点相符。

另外，如果某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2008年选民名单上，除非个别竞选团队提出额外的理由，否则该名字将被标记，但不会从ALP选民名单上删除。例如，有时会因为姓名拼写错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电话号码不正确或不完整而标记姓名。有问题的是，ALP没有财政或人力资源来实际跟进已标记的案件。相反，领导团队应该调查那些被标记的名字(到8月中旬，这些名字已经有数百个了)。除非竞选团队提出证据证明这些名字或地址与真人不符，否则ALP会继续给收到的名字和地址发放pin码。到9月的第一周，阿尔伯塔省的家庭最终获得了28,000多个pin码。作为这种低维护系统的正当化，政党工作人员假定，寄给原居民搬迁的家庭或错误地址的pin码只会“退还给寄件人”，而不会被其他可能不合格的选民打开和使用。

在五个竞选团队中，只有休·麦克唐纳的团队开设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竞选办公室，拥有多名全职志愿者。毫不奇怪，麦克唐纳的团队提出了最多关于选民身份的投诉，以及ALP支持者和成员的选民名单上可能不存在选民。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中，麦克唐纳向新闻媒体报道说:“我真的不认为任何竞选活动都应该使用ssamance来获得他们的选票。”“ssamuance”一词暗指麦克唐纳的信仰，即在2011年8月19日以最终形式呈现的已登记的支持者名单，即增加支持者的截止日期，包含了死者、非阿尔伯塔省居民、非公民，甚至还有捏造的名字。

麦克唐纳的理由是，因为ALP办公室没有办法通过电话交谈手动核实名单上的名字，而且竞选团队也缺乏这样做的资源，电子投票选民名单从根本上来说是容易被滥用和伪造的。正如一位记者所说，“[霍根]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预计(支持者)的确切人数……在名单上的重复和gag-name被清除之后”(Gerson, 2011)。但是，由于这种“筛选”过程相当初级，ALP的电子投票实验展开时，并没有明确或系统的后续确认或拒绝合格选民的协议。(关于最终发送了多少pin码没有最终统计，也没有最终统计由于地址不完整或不正确而返回给发送方的pin码有多少)。正如一位参加所有候选人竞选团队会议的参与者所说，“这个系统意味着我可以直接从电话簿上撕下一堆页面，然后作为支持者提交给他们。”尽管霍根告诉科米肯和我，ALP办公室根本缺乏人手，也缺乏对名字进行系统调查的资源，但他还是告诉《*埃德蒙顿日报*》:“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无论是在选举名单上的地址，还是出示身份证，都不会被发送投票信息”(Gerson，2011)。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说法，选民身份证明是自由公正选举的关键因素之一。无法识别“数字选民”(不亲自投票的人)构成了数字投票公平性的主要障碍和预防性障碍(加拿大选举，1998年)。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引入额外的技术，如“电子签名、声纹、指纹、视网膜扫描和智能卡”，所有这些技术都是昂贵的。加拿大选举局进一步指出，鉴于需要收集大量的个人甚至生物数据，提出的每一项高科技解决方案都对选民的隐私提出了质疑。加拿大选举报告的结论是，尽管技术创新可能会降低未来数字投票机制和身份识别程序的成本，“与隐私有关的问题更具挑战性，需要不断评估加拿大人是否愿意使用这种个人识别装置”(加拿大选举，1998年)。

加拿大选举局的评估并不完全否定数字投票的可能性。批评者可以正确地指出，在今天加拿大的联邦和省级选举中，选民身份既不能保证也不能绝对。没有身份证明的人仍然可以在副选举官和投票职员面前宣誓，在这种(联邦)情况下，他们通常会得到一张选票;毕竟，没有固定住址的人(无家可归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选票进行投票。此外，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司法管辖区，把身份证忘在家里的选民，可以通过让邻居为选民的居住地和身份做担保来获得选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投票地点。因此，加拿大的大多数投票机制都是开放式的，以确保尽可能高的选民投票率，并确保无家可归者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不会因为系统障碍而无法投票。

然而，至少从ALP案例研究的结果来看，数字投票似乎确实带来了更多潜在的滥用网站。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选民身份识别程序，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党派和大选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投票和投票决定

加拿大各地普遍的“现行投票程序”是选民“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亲自到投票站投票”(加拿大选举，1998年)。“没有帮助”这个词是至关重要的。在加拿大联邦和省级选举中，残疾人和需要帮助阅读或理解选票上材料的人可以使用“助手”:在宣誓遵守该人的意愿，帮助他们投票或代表他们投票后，在私人屏幕后帮助该人投票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这些案例通常只占投票总数的一小部分。数字投票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明有多少ALP选民，例如，被要求要求朋友，伴侣，孩子，邻居或ALP成员“帮助”或“协助”在线或电话投票，我在这里依赖定性，在我自己的选民网络中的生活经历，作为更详细地叙述和描述问题的一种手段。

在我的家里，有两个人——我和母亲——获得了ALP pin码，使我们能够投票。虽然我母亲确实使用互联网，而且她确实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她可以打开Word文档，用英文写一封基本的信，保存为PDF格式，然后打印出来;她可以打开Skype和她海外的孩子聊天;她可以登录Facebook，给家人上传的照片留言;她可以在线查看各种奖励计划和奖励账户中的积分等)，但在浏览新的、令人困惑的或不熟悉的网站时，她仍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我的工作假设是，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即使在阿尔伯塔这个高度互联的环境中，也不是例外。有像她这样的阿尔伯塔人，她那一代(母语是英语的人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人)，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只是偶尔的玩具，而不是日常工作或休闲的工具。因此，浏览新网站有时需要引入新技能，当网站存在是为了执行特殊或不定期的任务，如投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ALP网络投票的情况下，该网站在设计和目的上都不熟悉。在我母亲(和我自己)看来，候选人名字在投票屏幕上的位置似乎奇怪地偏离了中心，文字太小，不戴老花镜(或困难)就看不清，最终确定或确认选票的过程也不能立即清楚。简而言之，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引导她进入合适的URL，指示和解释网站上出现的内容，帮助她将鼠标移动到奇怪位置的复选框上，并阅读解释选民需要做什么才能进入优先候选人选择的文本。最后，我还得指导她点击“提交”并关闭浏览器。

ALP的电子投票机制假定整个过程对所有成员和支持者来说都是无缝的、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没有完全融入当代数字文化的人来说，有效或成功的数字投票需要“协助”。以我母亲为例，因为需要我的“协助”，所以我知道她是如何投票的。如果我是有害的，我可以在投票的时候左右她的投票，或者我可以直接投票给她，因为我可以接触到她的选票，她也信任我的数字技能。我不需要在投票主任或党内成员甚至我的另一个家庭成员面前宣誓，宣布和确认我不会在帮助我母亲投票的过程中操纵她的选票，所以如果我想操纵我母亲，就不会有社会的谴责或压力。对于有听力障碍的人或不讲英语的人来说，在ALP案例研究中使用的电话投票也会造成类似的障碍，需要类似的协助模式。电话系统是由英语的数字化声音操作的，与纸质选票相比，这些因素可能会使音频选票难以理解。总而言之，当投票机制是数字化的，因此不熟悉时，“没有帮助”投票以确保个人投票的隐私是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

ALP案例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困难，使得我们有理由对网络或电话投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每个公民或选民都是数字文化中同样熟练的参与者。

结论

ALP的“注册支持者”制度旨在通过允许所有阿尔伯塔人(18岁及以上)在该党领导人竞选中投票来壮大该党。从理论上讲，这一举措将自由党潜在选民的网络扩大到超过50万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阿尔伯塔2008年选民名单中引用的200万合格选民。此外，该党的数字投票机制应该允许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投票系统，该系统易于访问，本质上是分散的，并向所有潜在的阿尔伯塔人开放(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连接)。

在为期四个月的领导竞选活动结束时，约有28,000名“支持者”和成员报名投票，其中不到三分之一(共8,640名选民)实际投票(Bennett, 2011;Kleiss, 2011a)。这次竞选确实导致ALP领导人竞选的选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不那么乐观的是，该党在这场竞选中付出的代价，比该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领袖竞选都要多(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与假定的3万美元价格相距甚远的是，2011年ALP领导层注册支持者和电子投票系统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

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在2011年9月10日(领导选举日)到2012年4月23日(阿尔伯塔省大选)之间的七个月里，该党的支持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的支持率下降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当时的总理艾莉森·雷德福(Alison Redford)撤销令状时，该党很难用宣布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填补许多选区。ALP争先恐后地招募和安置受薪的ALP或立法工作人员来填补空缺的选区席位，包括甘顿(ALP的运营官员)作为费尔米伦-劳埃德明斯特的候选人，乔纳森·赫卡贝(ALP在立法议会的参谋长)作为埃德蒙顿-曼宁的候选人，和艾米·麦克贝恩(ALP的媒体联络官)作为麦克默里堡-伍德布法罗的候选人。最后，ALP领袖拉杰·谢尔曼(Raj Sherman)在2012年4月7日才宣布了完整的候选人名单——在为期四周的竞选活动进行了近两周之后(Wingrove, 2012)。

总而言之，ALP的“注册支持者”和数字投票实验表明，未能产生互动的社区支持。预言中的新一代阿尔伯塔选民将拥有坚定的自由党同一性，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2012年4月的选举日给该党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使其当选的人力减少了一半。ALP从2008年的9个席位下降到2012年的5个席位，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消极趋势，当时它在议会中拥有16个席位，而不是通过选民的“更新”来扭转这一趋势。ALP失去了作为官方反对党的地位和资金，在全省范围内，它的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从2008年的26%下降到2012年的10%。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虽然在2011年9月的党魁竞选中投票的支持者和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但到2012年4月，ALP自己的党员基础已经下降到不到3000人，与进步保守党的4万多名付费党员相比，它仍然相形见绌。斯旺、安特曼和霍根曾声称，阿尔伯塔自由党的“新一代”选民将被其创新的投票制度所吸引，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比之下，该党宪法中以一人一票原则和保证投票匿名的民主原则被深刻削弱。

数字投票远非灵丹妙药，与依赖数字登记系统进行外联的基础广泛的投票系统相结合，需要更严格的审查、规划、财政投资、以及中立的监督，以确保ALP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差距和障碍不会无意中取消或阻止选民长期参与加拿大选举(党派或公众)。

注意事项

1请注意，上面提供的对新闻来源和媒体修辞的回顾并不全面。进一步回顾与新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青年”驱动的激增相关的新闻话语也是相关的，因为这些文化建构进一步支持了ALP内部以青年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以社交媒体为驱动的“更新”议程。

2 .为了充分披露，我还要补充一点，2011年12月，在ALP领袖竞选结束四个月后，议员Raj Sherman被成员和支持者选举为ALP领袖，我在埃德蒙顿-金条赢得了ALP候选人的提名。在2012年4月23日的该省大选中，我输给了进步保守党候选人大卫·多沃德。

2011年，麦克艾弗寻求并赢得了卡尔加里-海斯进步保守党候选人的提名，并于2012年当选为阿尔伯塔省议会议员。

参考资料

ALP. 2011 (as amended 29 May). “Preamble.” *By-Laws of the Alberta Liberal Party Association*, 1–22. Alberta Liberal Party, Edmonton.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Arnold, Nathan. 2011. "David Swann to Resign at End of Spring Session." *Globalnews.ca*, 1 February.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globalnews.ca/news/6524/david-swann-to-resign-at-end-of-spring.

Bennett, Dean. 2011. "Raj Sherman Chosen New Leader of Opposition Alberta Liberals." *Canadian Press*, 10 September.

Braid, Don. 2010. "Nenshi Capitalizing on Social Media Buzz." *Calgary Herald*, 26 September, A4.

Cryderman, Kelly. 2012. "Alberta Liberals Facing Make-or-Break Election; Holding Eight Seats Would Be a 'Major Victory'." *Calgary Herald*, 14 January, A4.

Cuthbertson, Richard. 2011. "Parties Look for New Ways to Combat Voter Apathy: Can Nenshi Factor Work on Federal Scene?" *Calgary Herald*, 28 March, A4.

D'Aliesio, Renata. 2010. "Alberta Liberals 'Back on Track': 2010 Year in Review." Calgary Herald, 23 December, A6.

Elections Alberta. 2011. Political Party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 January 1, 2011 to December 31, 2011. Liberal Party of Alberta. Government of Alberta, Edmonton.

———. 2012. Candidate Summary of Results (General Elections 1905-2012). Government of Alberta, Edmonton. 21 December. Accessed March 28, 2013. http://www.electionsalberta.ab.ca/Public%20Website/746.htm#2001.

Elections Canada. 1998. *Technology and the Voting Process*. Government of Canada, Ottawa.

Forum Research Inc. 2012. "Conservatives Continued to Lead in the Polls; Wildrose up Since Last Month." News Release (18 January). Forum Research Inc., Toronto.

Ganton, Corina. 2011a. "A New Liberal's Guide to Change."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bit.ly/jLVMuh #lpc #ablib #cdnpoli #ableg; https://twitter.com/CorinaGanton.

———. 2011b. "At the #ALP board meeting. Love t/ debates. Its so great to b able to b a young person around this table. Many younger faces here."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s://twitter.com/CorinaGanton.

———. 2011c. "I liked a @YouTube video http://youtu.be/2vRiluWnL-I?a Gen Why Media Project."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s://twitter. com/CorinaGanton.

———. 2011d. "The latest @albertaliberals news . . . #ablib #ableg LEADERSHIP RULES SET! WERE OFF TO THE RACES!" 2011.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s://twitter.com/CorinaGanton.

———. 2011e. "The next generation is the Liberals' salvation." Accessed March 24, 2013. https://twitter.com/CorinaGanton.

Gerson, Jen. 2011. "Liberal Hopefuls Question Growing List of Supporters." *Calgary Herald*, 20 August, A11.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Grant, Matt. 2011. "Politics Reimagined," Speech, ALP Convention 2011. 28 May. Calgary, Alberta. http://www. albertaliberal. com/blog/politics-reimagined/.

Hogan, Corey. 2011a. "Kickstarting Renewal." *New Liberal Initiative* 16: May. http://www.newliberal.ca/227/kickstarting-renewal/.

———. 2011b. "A New Liberal's Guide to Change." *New Liberal Initiative*, 22 May [cited 30 March 2013]. http://www.newliberal.ca/309/a-new-liberals-guide-to-change/.

———. 2011c. "YES!," *New Liberal Initiative*. Erick Ambtman and Corey Hogan, Edmonton.

Kleiss, Karen. 2011a. "Sherman Sweeps to Liberal Leadership; Former Tory takes 54 Percent of Vote for First-Ballot Win." *Edmonton Journal*, 11 September, A1.

———. 2011b. "Swann Gone as Liberal Chief: Move Paves Way for Renewal Within Fractured Opposition, Analysts Say." *Edmonton Journal*, 2 February, A1.

MacPherson, Jody. 2010. "Twitter and the ALP." www.albertaliberal.com, 28 October. http://www.albertaliberal.com/blog/twitter-and-the-alp-2/.

Massinon, Stephane. 2011. "Alberta Liberals Kick Off Leader's Contest." *Calgary Herald*, 8 May, A4.

McLean, Archie. 2010a. "Liberal MLA Kent Hehr Enters Crowded Field for Mayor of Calgary." *Edmonton Journal*, 6 May, B8.

———. 2010b. "MLA Quits Grits, Slams Swann; Dave Taylor Blames Liberal Leader for Party's Fortunes." *Edmonton Journal*, 13 April, A1.

Stone, Laura. 2011a. "Attracting Young Voters a Challenge." Leader Post, 4 April, A8.

———. 2011b. "Mobilizing Elusive Youth Vote a Challenge for Parties." *Ottawa Citizen*, 4 April, A3.

———. 2011c. "Parties Struggle to Attract Youth; Young Voters Care About the Issues, They Just Don't Like the Political 'Circus.'" *Vancouver Sun*, 4 April, B1.

———. 2011d. "Trying to Woo Canada's Toughest Voters—Youth; Students Passionate, Aware and Turned Off." *Calgary Herald*, 3 April, A7.

Thomson, Graham, and Karen Kleiss. 2011. "Swann Expected to Quit; Alberta Liberal Leader Plans to Discuss Decision with Caucus First, Party Sources Say." *Edmonton Journal*, 1 February, A1.

Wingrove, Josh. 2011. "A Swann Song for Alberta Liberals." *The Globe and Mail*, 2 February, A6.

———. 2013. "Alberta's Liberals Fill Their Slate of Candidates." *Globe Media*, 8 April [cited 31 March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albertas-liberals-fill-their-slate-of-candidates/article4098649/.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3 浏览媒体城

数字媒体和新兴的民主参与实践

Maria Bakardjieva

互联网与民主的关系催生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延伸到现在。为这些文献注入活力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评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展开。这种影响被描述为积极的(通过获取信息和辩论以及低成本参与来增强和激活民主)或消极的(懒人行动主义、点击行动主义、回声室、不文明)。关于特定的公民和政治组织如何利用基于互联网的媒体来推进其目标和参与民主进程的更具体的问题也被提出和回答。本章对文献中最近的一个趋势有所贡献:它试图让讨论超越“影响”思维的束缚，并在特定情况下审视互联网(以及由其催生的众多新传播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形成的复杂社会和政治环境。关于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当代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问题

识别更复杂和偶然的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作用中，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和通信格式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这一因素在特定的民主发展中有多重要?追求民主利益和权利的社会行动者使用它的持久后果(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在这里，我将介绍，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发明一个锚定概念，旨在捕捉公民、政治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的网络——媒体城的网络(Silverstone, 2007)。媒体城不仅由媒体技术、组织和内容构成。它还包括政治机构和公民组织，更重要的是，包括过着日常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媒体城确实是所有这些构成实体和生活形式的轨迹交汇和啮合的纽带(尽管并不总是数字化的)。

最初引入的媒体城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与传播网络和媒体话语交织在一起的恰当隐喻。与此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必须从分析上解开这些交叉点和相互依赖性，以便用更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术语来理解它们。这就是本章的课题。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对民主是否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问题，不是它所关心的;相反，重点是辨别这些媒体如何牵连到民主进程中的特定模式。它将试图阐明媒体城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方式，希望将血肉和细微差别置于时代来了又去的笼统概括的位置

多年来，我一直着迷于观察不同地理位置将数字媒体纳入公民倡议和干预的情况。我的项目“欧洲公共领域的新媒体与公民之声:保加利亚的案例”，聚焦于我的祖国保加利亚的各种公民动员实例。保加利亚是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是民主和互联网的新手。该项目由一系列定性案例研究组成，这些研究依赖于从在线出版物和讨论中收集的数据、对主要参与者的个人访谈、新闻媒体文本和节目，以及与所考虑的事件相关的官方文件。以下分析以该数据集为依据。我将只简要地介绍个别案例，省略细节，并旨在分离出共同的线索，以及每个案例教给学生的新媒体与民主参与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教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为什么会有媒体城?

对于发现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的探索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转变，但其早期和最流行的比喻之一是询问互联网是否有潜力重建理想的典型“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1989)，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压力下，这种领域已经失去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一直是有关传播形式(无论是否经过中介)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辩论中的试金石。学者们在试图确定计算机网络所产生的新出现的交流形式的价值和前景时，从他们的工具箱中选择这个概念是很自然的。从早期的计算机会议系统到新闻组、在线论坛、Facebook和Twitter，在这些平台上发展的交流实践是否正在增强和激活公共领域的问题一直占据着民主研究人员的注意力。

尽管乐观情绪高涨，但在观察和评估实际在线互动的审议质量时，将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作为基准的做法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早在早期的计算机会议系统和邮件列表中，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些参与者对其他人的统治，同时也发现了新的不平等来源，最令人沮丧的是，群体极化而不是共识的建立(Kiesler和Sproull, 1992;鲱鱼，2003)。随着互联网讨论空间变得越来越广泛，参与其中的人的数量和多样性不断增加，诸如燃烧、不文明和镇压对手等行为像野火一样蔓延。在这些网络论坛中，越来越难以找到那种以共识为导向的理性批判辩论，这种辩论定义了早期资产阶级Offentlichkeit (Janssen and Kies, 2005)。网络讨论空间中纷乱的多声性违背了人们的期望，即以更大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冷静、自律和无私的交流有机会蓬勃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互联网上现有的公共领域式空间，在真正的公共意识的精神下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其意识形态构成上是同质的，并且在相互冲突的信念和利益的断层线上支离破碎(达尔伯格，2001年)。而这一切甚至在市场抬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一旦媒体公司将其业务转移到数字网络上，在线空间迅速开始转变为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商场(达尔伯格，2005;Feenberg and Bakardjieva, 2006)。The

传统的企业大众媒体和哈贝马斯理论中失败的公共领域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大众消费和轻松消遣的熟悉牧场上，这一次是通过数字修复。这并不是说，公共领域中民主审议的可敬传统没有收获任何东西，或者被削弱了。相反，数字论坛的动态以微小但重要的方式为公共领域理论带来了新的和更广泛的关注，并帮助阐明了它的一些缺陷。这些论坛让许多人有机会进入类似公共领域的情况，并通过反复试验来弄清楚在这些空间里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它们的好处是什么，它们的局限性是什么。与他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可行的，即使这些讨论没有产生辉煌的结果，这种观念也逐渐获得了牵引力，并成为有线和后来无线连接的民众的常识元素(Bakardjieva, 2008;卡波西，2006;Papacharissi, 2004)。

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民主支持的更实际导向的研究路线出现在组织传播的研究中，该研究试图记录并建立数字传播媒体与公民组织和运动的相关性(Bimber et al.，2005;Bennett, 2003;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1;Della Porta, 2011)。鉴于这些组织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确定它们的任务是否以及如何得到数字通信网络的支持和扩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描绘了一幅更为乐观的图景，即志愿组织已被证明利用数字媒体构建了坚实有效的沟通基础设施，以支持其内部互动，包括成员之间的横向互动和从领导到成员的纵向互动。组织也已被证明可以利用数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与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并建立团结和跨国界采取行动。它们自身的结构变得扁平化，更具包容性;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倡议过程中，成功地利用数字媒体作为动员和后勤的工具。

然而，在这个框架中，数字媒体对-à-vis公民社会的作用的一个关键方面仍未得到探讨，该框架将公民参与等同于正式组织和明确的行动主义。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即对公民问题和倡议的关注和参与是否获得了一种新的方式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有机会超越那些拥有正式组织成员资格和自称为活动家的极少数人，变得更广泛、更具包容性。其余那些可能被上面提到的商业牧场所吸引，或者只是陷入养家糊口、抚养孩子、偿还抵押贷款等日常事务的公民呢?数字化的传播环境是否让加入公民社会的组织更具吸引力?世界范围内不断减少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数量似乎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大规模的全球倡议以及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公民行动，抗议，要求或绘制国家和跨国层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在世界各地爆发(CIVICUS, 2013)。撇开技术决定论和网络愤怒不提，在导致这些举措的复杂因素中，分析人士明显地、不可缺少地发现了数字媒体或大或小的痕迹。

那么，加入这些倡议的公民是谁呢?如果不是来自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实体，他们又来自哪里?我们对它们与公共领域和政治世界的关系了解多少?关于这个问题，Papacharissi(2010)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她认为，在数字时代，公民身份变得个性化和私有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轨迹变成了私人领域，从那里网络化的个人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并有选择地与网络上的其他人形成薄而不稳定的联盟，以追求私人有意义的目标。她指出，面向公众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数字装备的私人领域”中实现，在这个领域中，个人有机会实践他或她新的“具有更多自主性、灵活性和表达潜力的公民习惯”(21)。Papacharissi认为，在私人领域，个人更能控制自己的公民命运、公民自主性和个人同一性。正因为如此，当代公民身份才会在私人领域退缩和强化。只有考虑到数字媒体，这种私有化和孤立的公民身份的悖论才可以理解。

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我描述了“亚行动主义”现象(Bakardjieva, 2009)，这个标签也意在捕捉私人生活(或领域)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基于对加拿大互联网用户的深度访谈，我证明了人们在不离开私人生活领域的情况下参与公共和政治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或者用Papacharissi的话来说，“习惯”)。对我来说，这些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观的、被淹没的。它们与什么有关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吉登斯(1991)称之为“自我的政治”。这些实践构成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符合其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和政治选择的努力，或者更一般地说，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它们涉及个人对公共话语的暴露，以及他们对这些话语中所提供的立场的回应。我相信，亚行动主义是在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任何公开的公民和政治参与的必要先决条件，但重要的是，它不是公民身份的全部。

数字媒体确实使个人能够以一种表达的方式将他或她的私人思想和反应社会化。它们确实支持一种“网络个人主义”(Wellman et al., 2003)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与他人的联系达到了他们个人兴趣和选择一致的程度。但数字媒体本身并不能保证受众、追随者，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保证*团结*。虽然表达可以在一个孤立的私人个体中固定下来，可以在联网的个人之间给予或交换特定的受众和注意力，团结是集体出现的标志——在这一时刻，个人在彼此身上认识到自己，并为超越个人生活的发展阐明共同的目标和责任。团结可以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体验，但它果断地超越了个人的私人领域和个人主义偏好。它涉及直接私人圈子之外的其他人，在与他们谈判时，一个问题、一个原则或一个要求被赋予公共意义，并被定义为参与或行动的共同目标。团结在集体同一性和集体行动中达到顶峰，试图在公共世界中有所作为。与Papacharissi(2010)相反，我的观点是，新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公民被吸引到私人领域并锚定，它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而是在这些私人意义的公民情感和冲动与更大的领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领域中，其他人，组织和机构在其中运作。这个更大的领域可以被称为*媒体城*。

媒体城是罗杰·银石(Roger Silverstone, 2007)创造的一个概念，他将*城邦*的经典定义(遵循汉娜·阿伦特)和我们当代与其他人的关系，无论是私人的、公共的、公民的还是政治的，都从根本上嵌入在媒体环境中的观点融合在一起。用银石的话说，媒体城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 表象的中介空间，世界在其中出现，世界在其中以其世俗性构成，通过它，我们了解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它是通过媒体城进行的交流……公共和政治生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或不出现在)政治体的各个层面。(银石赛道，2007:31)

根据银石石的说法，与私人领域不同，媒体城是多元化和多声音的。其中的交流在形式和变化上都是多元的。它包含了相互冲突和竞争的话语、故事和图像。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相比，媒体城是不平衡的，被权力和差异撕裂。然而，它又以自己的方式具有包容性，因为它是在那些产生声音、图像和叙事的人和接受这些声音、图像和叙事的人的实践中构成的。就我的目的而言，媒体城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在日常生活的当前和直接现实与空间和时间上无法直接触及的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媒体城”的概念抓住了这样一种洞察力，即媒体已经成为“二级至上的现实”(银石，2007:31)，与直接体验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因此，我的选择是寻找数字媒体的民主支持，而不是以它们本身使进入和参与公共领域变得容易实现的方式，也不是以它们使公民身份成为联网个人私人世界的一项的方式。我选择考虑新媒体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方法是将它们置于错综复杂的媒体圈之中，在这些媒体圈中，通过传统和新媒体形式进行的交流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并部分构成了个人作为观众和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媒体城是人们以各种形式和星座与遥远的他人建立关系的地形。因此，它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政治维度。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城不仅是一个公共领域，因为它是不平衡的、多声音的和冲突的。它不仅是一个私人领域，因为它涉及到与远方他人的互动、认可、社交、关怀和团结。它不仅是一种组织基础设施，因为它深入到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任何形式的组织生活之前的基本鼓动、参与和动员的管道。与此同时，媒体城包含了所有这些先前结构的基本要素。它以三螺旋结构的形式出现，其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传统媒体的生产和接受实践、新媒体的使用实践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主参与至关重要地依赖于所有这些股线，并需要它们的成功导航。消费传统媒体内容可以提高对公共问题的认识，并引发对这些问题的私人讨论，但它仍然被封闭在私人存在的外壳中，或者，正如我在亚行动主义方面所论证的那样，它仍然是主观的、被淹没的。使用新媒体格式可以在直接的个人世界之外产生自由和创造性的人际交流流，但它不能超越纯粹表达效能的限制。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公民给机构留下深刻印象并带来实际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佳机会，但与其他两个方面脱节，它通常是小规模的、孤立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的目标将是确定导航媒体城的策略和形式，这些策略和形式已经成功地阐明了上述各方面的要素，以实现对公共和政治世界的有效公民干预。带着这一任务，我将转向我的案例研究。

博客和封锁:拯救strandja运动

2007年，保加利亚东南部的斯特兰加山(Strandja)的案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公民抗议的压力下，这座山被取消了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后来又恢复了。这是横跨整个媒体城的提高意识、动员和行动的一个突出例子。这个案例所捕捉到的争议的核心是由感兴趣的公司和市政当局发起的一系列法律程序，这些程序挑战了这座山的自然保护区地位。最初，保护这一地位(和这座山)免受不受控制的商业开发的努力涉及非政府组织，它们拥有丰富的法律和环境专业知识，但缺乏影响力和追随者。这些组织向政治机构求助，并试图作为一方介入法律听证会。他们的主张是，取消保护机制(在行政手续的基础上寻求)将为肆无忌惮的建设打开山区，对其自然栖息地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然而，这些抱怨和警告被置若罔闻，直到该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了一项有利于剥夺斯特兰加法律保护的决定。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这则新闻出现在一些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时，有环保意识的博主们开始关注并讨论它，大力放大它的牵引力和重要性。保加利亚部落格圈沸腾，对法院判决作出各种解释，并将其与困扰保加利亚社会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公共资源的土匪私有化、司法腐败、政治对企业利益的屈从。这些思想和观点源自于网络上的个人，并沿着人际关系的线索传播。它们被热切地转发、评论，并通过博客评论、在线论坛、电子邮件和短信(当时社交网站在这个特定的国家仍未普及)重新定义。那些曾极力反对这一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开始吸引流量，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被网络公众所接受。正如我的一位线人告诉我的那样，网络媒体把公民群众抛到了原本孤立的民间组织背后。尽管数字媒体用户可能已经变得兴奋和警觉，但所有的讨论都不过是闲言碎语，很容易被国家机构忽视，并被允许消退和消亡，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用户不到30%的国家。

然而，事件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在法院判决公布的关键日子里，在有私人观点的网络个人之间的某个空间，他们可能是博客，以及公民组织的结构，一群与后者关系不大的公民创建了一个临时网站，呼吁在保加利亚首都中心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举行街头抗议，反对法院的决定。这一呼吁吸引了一小群充满活力的抗议者，使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社会的公众视野中全面爆发。抗议者们手持自制的海报，封锁了一个中央街道的十字路口，这自然吸引了警方的注意，随后也吸引了传统媒体的注意。一旦街头抗议活动登上报纸和电视节目的版面，它就把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提升为广大保加利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抗议行动和媒体辩论的升级，这最终导致了公众舆论的重大转变，转而支持这座山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当时，联合政府感到不安全，因此议会中代表的政党迅速同意推翻法院的决定，将斯特兰加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透过细节和国家具体情况，该案件表明了媒体城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必要联系:正式的公民组织，愿意参与并公布其对该问题意见的私人公民和团体，以及传统媒体记者和组织。这些民间组织贡献了专业知识，并充当了国家机构决策过程的监督者。博客和论坛参与者将专业术语和关注的问题翻译成日常语言，并在众多相交的互联网用户圈子中传播。他们也是帮助抗议变成实体和集体行动的人。最后，记者和媒体组织把这场动乱带进了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客厅。各种媒介可见性的空间——在线博客和论坛、城市中心广场、传统媒体的页面和屏幕——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将这个问题提上了政治机构的议程，并迫使他们采取行动。

虽然无法从斯特兰加案例中提取出明确的方法，但其分析揭示了有意识或直觉地绘制的轨迹，通过这些轨迹，公民参与能够突破私人领域和被动旁观的局限，首先转变为集体目标和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其次转化为对公共世界和政治决策的有效干预。通过博主、在线论坛参与者和具有公民意识的记者等关键翻译人员的工作，媒体城的各个分支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记者随时准备将故事分解到传统媒体提供的可见空间中。这个案例凸显了事件中各种行动者的具体和不可或缺的角色——公民组织、新媒体作者和用户、传统媒体和更广泛的公众，以及他们之间的功能联系。

烹饪阻力:大黄蜂反对GMO

保加利亚的一个案例围绕着公众对放开转基因生物(GMO)法规的坚决抵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追溯通过网络媒体分享的个人和小团体关注的整合和转化为可听到的公众声音和信息来源的良好机制政治压力。一群经常访问热门育儿论坛bg-mamma.com的保加利亚母亲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推动了一场广泛的公众运动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反对有关转基因生物的立法修改提案。源于论坛讨论的集体行动是该问题获得广泛公众关注并最终由政治机构以满足公民要求的方式解决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该案例的分析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借用梅鲁奇现在的经典提法):“集体行动是如何形成的，个人又是如何参与其中的?个体通过什么过程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共同行动?(1989: 30)。我的研究为这个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元素，那就是对数字媒体如何参与集体行动建构的兴趣。他们如何帮助个人跨越分隔他们私人领域的概念和物理距离，并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拥有共同同一性和目标的集体?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起源，就会发现在一个叫做“八卦商店”的论坛上有700个帖子，这个论坛允许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话题来讨论。通过对这一系列帖子构成的内容和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问题的各个维度，以及个体观点逐渐融合成团结和共同行动的决心的过程，以带来实际的政策变化。这个帖子是由一个“为了自然”联盟(一个由环境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起的请愿书发起的，请愿书是关于《转基因生物法》的拟议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允许在受保护的(自然)地区种植转基因生物。议会环境委员会本应在两天后开会讨论这一修正案，因此帖子的作者坚持认为需要紧急回应。

同前一次一样，这个问题的最初提法及其重要性来自有组织的民间社会，来自在该领域工作并集中了大量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密切关注着议会的交易，并就这项原本模糊的法律修正案的风险和潜在有害后果进行举报。艾米莉亚·斯皮罗洛诺娃(mismisilia Spirolonova)是最初发帖的bgmamma用户的昵称，她充当了一个中间人，将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与在长期讨论私人重要母亲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环环相环的社交网络联系起来。因为她是网络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参与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妈妈们，她的话得到了论坛成员的重视和讨论。她呼吁紧急支持的请愿，绝不是盲目顺从的。毕竟，网站bg-mamma只不过是一个空间，在这里，网络上的个人在特定主题的特定动机和兴趣的引导下，彼此建立了随意的关系。尽管论坛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很熟悉，以前也有过交流，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共识，也不可能轻易达成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在科学、实践、经济、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性审议。

科学辩论的问题是，什么是转基因生物，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对个人健康和进入保加利亚人餐桌上的传统食品的自然生长的生物造成危害。参与的母亲们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出去咨询了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来源，既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也有通俗的资料。这个问题的实际层面是围绕母亲的角色和责任制定的，她们每天都要养活家人，因此要就她们购买的食品的健康风险做出决定。参与讨论的母亲们还考虑了GMO自由化的经济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传统保加利亚农产品和做法的意义。该问题的立法和政策方面与保加利亚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由此产生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立法改革的程序有关。立法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可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进行了详细的辩论。

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一个由大约25名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小组发表了700篇文章，经历了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最终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他们在-à-vis GMO辩论中站在哪一边。他们的交流并不总是冷静、冷静、体贴和礼貌的。很多帖子里都有热度、情绪和敌意。然而，整个过程包含了基于证据、理性和对个人和公共福利的深切感受的积极和消极的仔细权衡的所有元素。不同个人观点的相遇和冲突，慢慢导致了几个意见阵营的形成，导致了“我们”和“他们”的分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套政治立场。与会者最终认同其中一种立场，并进一步努力帮助自己的立场在辩论中胜出。在一天结束时，小组达成的共识并不完美。那些不同意意见的参与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大多数人没有被说服或融入。他们干脆离开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在激烈的交流中精力充沛。通过努力说服他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价值有了高度的信念，并对GMO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他们不能再做被动的旁观者了。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网上讨论的下一阶段，是寻找最有效的方式，让这个团体介入立法程序，让国会和更广泛的保加利亚民众知道他们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很清楚，在网上堆积论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意识到，要实现他们现在明确设定的目标，即阻止拟议的立法改革，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步骤将是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说服保加利亚公众，解除对GMO扩散的严格控制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和难以理解的后果。一旦决定采取行动，该组织就必须提出一系列步骤，将他们的声音和立场从最初形成的网络飞地中带出来。有趣的是，作为他们“实体化”数字异议的第一步，他们集体写了一封公开信，递交给各自的机构和大众(传统)媒体。

在网上论坛共同起草了八份不同的草稿后，这封信终于完成了，并得到了大多数讨论者的批准。随着这篇代表在线参与者集体意志和立场的文本的出现，一场从个人到集体同一性、从虚拟到实际参与的奇特转变开始了。首先，这封公开信必须签名，因此决定谁是“我们”——共同签名者，就变得势在必行。这导致该组织选择给自己贴上“在bg-mamma网站上注册的家长和公民发起委员会”的标签。然后，这封信必须打印出来，并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政府办公室和媒体机构总部，以硬拷贝的形式分发。这就需要真正的人去敲真正的门，要求他们提供正式的收据，确认他们的文件已经送达。在线论坛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分配任务并监控任务的实现。它帮助个人行动成为集体目标，集体行动由个人实施。

从发表公开信开始的集体行动的进步体现，经历了包括门前集会在内的几个阶段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议会和城市的中心地带。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在支持者的帮助下，该组织发布了信息传单，在城市的中心地点组织了海报展览，并举办了一场露天音乐会，所有这些都旨在吸引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旦他们的数字声音出现在媒体城的实体空间中，传统媒体就不得不介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还不愿对GMO的辩论进行太多报道。虽然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并不总是支持抗议活动，但一些志同道合的记者的工作使批评GMO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公众曝光。与此同时，来自bg-mamma的母亲们继续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民间社会组织联盟，不仅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农业生产者协会，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厨师协会。这个战略上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地位，是当权者不能忽视的。

不同意见具体化的进一步阶段包括带着小孩的母亲出现在政府办公室和负责立法改革的议会委员会的会议上。母亲们招募了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在委员会会议上为严格控制GMO扩散提供证据和正当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不同的倡议来影响公众舆论，议会委员会拒绝了修正案，并保留了更保守的GMO监管制度。尽管现有立法和控制机制存在许多法律缺陷，但保加利亚暂时避免了向GMO的增长敞开大门。

在big -mamma与GMO的案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已经熟悉的媒体中心的分支相互交叉和增强，类似于在save - strandja事件中观察到的情况。数字媒介的人际和小组讨论创造了引发街头抗议的势头，产生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导致了公众舆论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机构的反应。Strandja运动的核心是空间和实践的交织，经过一些修改，对反转基因运动的发展和成功也至关重要。在这里，不是个人的博客和网站，而是一个感兴趣的在线社区，充当了一个大锅，在这个大锅中，个人公民的声音找到了共鸣，并在权威中成长。通往传统媒体的页面和屏幕的道路再次穿过城市的街道和广场，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不服从行为(堵塞交通)，而是以各种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形式出现。

争取到公民行动一边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代表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由数字构成的集体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看到私人的意义、解释和立场向集体的细微转变，以及个人与集体、虚拟与具身行动之间的流动转换。媒体城的复杂网络跨越并交织着个体母亲的日常生活和私人关切，他们公开的私人在线讨论，他们最初的谦虚和逐渐响亮和更明显的声明进入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大众媒体，她们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战略性互动。它使他们的关切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并为他们与政治机构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仅是数字媒体，而是母亲们对媒体城不同股的深思熟虑的导航，打破了政治决策者原本排他性的会议室，并允许更广泛地参与转基因生物的监管。

保家卫国:facebook对峙

在我试图阐明媒体城运作的过程中，我要提到的第三个案例是围绕2012年一小群年轻专业人士发起的一系列公民行动展开的。这些行动的目标是对保加利亚森林使用监管法律的拟议修改。该组织确信这些修正案不利于保护和公众进入受欢迎的山区目的地，而且它们迎合了少数商业参与者的利益，因此开始“激活”广泛的公民圈子，以期阻止改革。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称自己是滑雪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他们认为监管森林利用的规则与自己利害攸关。多年来，他们一直担心，在政治家和政府的帮助下，保加利亚的旅游和滑雪行业正在形成一种有效的垄断——少数公司。标志性的滑雪胜地正被强大的商业垄断企业接管，这些企业随后在山区进行了不合理的、破坏性的建设项目。新提出的修正案将解放这些公司的手，进一步开展这些项目，并巩固他们对这些宝贵的私人控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公共资源。“但一个普通人能拯救整片森林吗?”这样一个人能阻止Tseko Minev(一位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在考虑中的滑雪场有商业利益)吗?”

当一位年轻的滑雪者决定开始写博客，观察该国森林管理和利用实践的发展时，他问了自己这些问题。他是一名律师，他结合了知识、激情和坚韧，对有关森林的立法措施和商业发展进行了分析性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博客和他的立场在主要参与者中变得“知名”，并帮助他结识了生态组织的活动家。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促成了他自己逐渐“被激活”的过程。“激活”的概念是本案的核心。它捕捉到了一种动态，通过这种动态，一个关注对他/她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公共问题的私人个体走出了主观的、被淹没的“次活跃分子”(Bakardjieva, 2009)的运作模式，并出现在媒体城的表象空间中，即使在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

其他幻灭的滑雪者和滑雪板爱好者，比如这位律师兼博主，寻找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某一特定公司的主导地位及其政治权力的优惠待遇的反对。他们组织了一项名为“骑4维托沙”(Ride 4 Vitosha)的倡议，让年轻人在靠近保加利亚首都的维托沙山上骑着滑雪板和滑雪板，以表明他们决心反对让选定的公司垄断对这座山的开发的幕后交易。在vimeo.com (http://vimeo.com/34606144)上发布了一段讲述这一问题和描述这一事件的短视频，几天内就获得了4000多次观看。一些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更重要的是，“骑4维托沙”成为一个Facebook个人资料，把对这项事业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案展开的时候，Facebook已经是一个受到许多保加利亚人，尤其是年轻人青睐的知名平台。事实证明，它是媒体城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朋友和家人的社交网络之间的私人互动，以Facebook群组和页面的形式出现在公共思想问题和活动中。因此，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将一个人支持或拥护的公民问题拉入个人认识的人的私人视野，反之亦然，就可以找到与以前不知名的支持公民运动的其他人的个人联系。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本案核心群体的经历中，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面对面的会面，冬季运动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一个重要的通道点。然后，这些会议可以以数字方式记录下来，从而在Facebook等平台和网页上永久保存下来。因此，围绕着这些特定的行动者和他们所倡导的问题，媒体城的多样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和加强。一个封闭的Facebook小组和一系列google.doc文档允许他们在内部进行讨论和组织。随后，一个精心设计的Facebook页面成为了他们传播信息、凝聚支持者的交流平台和替代媒介。

然而，对这个团体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完成我所说的“媒体城的三螺旋”，通过编织由传统大众媒体组成的链条，它提供了进入广大公众关注领域的唯一直接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主流媒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该组织所批评的企业参与者与媒体组织之间存在交叉的商业利益。年轻人必须非常有创造性地制定一项战略，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吸引主流的形式。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三个主要方向。这位年轻律师的博客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和法律意义，阐明和寻找来源就是这种做法的典范。它通过Facebook页面进一步扩展，收集和解释有关森林、森林保护和管理的信息。

通过在这些平台上的熟练表演，这个现在被命名为“为了维托沙”的团体，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库尔德里(2010)所说的“来源演员”，即作为记者和官员的来源的演员，因此能够对问题的框架施加概念上的影响。除此之外，正如成员们所指出的那样，该团体的在线出版物起到了将法律问题翻译成“人类语言”的作用，使其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和相关。第二种可区分的策略是附和和纠缠。该组织不知疲倦地煽动精心策划的行动，以艺术和有趣的方式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庆祝由于受到攻击的垄断造成的障碍而从未开始的滑雪季节的结束;给政府和市政代表寄明信片;以维托沙山的名字来装饰一条中心街道，上面挂满了“已售出”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第三，他们成为了一场实质性街头抗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场抗议吸引了数千人，并封锁了一条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在议会投票通过有争议的修正案的当天，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对中心外观空间的果断接管和对城市生活正常进程的破坏，就像前面讨论的案例一样，导致警察以及与他们一起参与的大众媒体。

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当时正因其司法和法律改革的失败和违规行为而在欧盟委员会的严厉审查下汗流浃背，最终被迫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邀请抗议者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最终，在公众压力下，有关森林的法律修改被总统否决。

结论

虽然这里叙述的案例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我认为最不可能的是将它们作为公民成功的秘诀，进而作为新媒体增强民主的保证。相反，我认为这些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新媒体只是公民行动者所处的充满机遇和制约的复杂领域中的众多要素之一。为了使这些媒体成为有效民主参与的工具，我们需要以一种超越既定模式、超越公共领域规则手册、也超越个性化和私有化数字公民身份的安全舒适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新媒体提供的机会在于，它们有能力将这些截然不同的领域和运作模式连接、穿越和交织到媒体城的结构中。在数字化的媒体城中，公民的可见性从未得到保证，但它可以通过跨越孤立的社会和组织领域的智能和开放的导航创造性地实现。在内容和话语形式方面，新媒体在社会语言和认知框架之间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博主和Facebook群组参与者的写作用普通公民的日常白话表达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网站和论坛讨论不断产生并详细阐述街头抗议中所携带的标语和口号。所有这些媒体加在一起，重新构建了报纸文章和电视节目中提出的论点。

此外，除了关注能见度的斗争(Silverstone, 2007)和声音的重要性(库尔德里, 2010b)，一个全面的概念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Mediapolis需要包括可听性问题。媒体城中的公民行动，如果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也不过是一场社会事件、表演和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我放纵。效能可以有许多维度和各自的衡量标准，但其中的核心是吸引更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力，迫使政治和行政机构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回应。上述案例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谁是引导新媒体技术和表现形式的公民和团体，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和回应?哪些新媒体被证明是适当和有效的手段来解决哪些(以及谁的)问题?从这三个案例产生的证据来看，公民倡议的成功似乎可以归因于数字媒体的支持与中上阶层城市专业人士的教育和文化资本(不仅仅是技术熟练程度)的结合，这些专业人士将数字媒体投入到工作中。这一观察结果证实了文献中已经出现的一种怀疑:即，通过数字平台和类型生成内容和创造性表达的天赋远非平均分配，并使某些阶层的用户和公民比其他人更有优势(Hargittai和Walejko, 2008;Brake, 2014)。数字鸿沟可能正在消退，但可见性鸿沟仍然存在，尽管它们的配置发生了变化。

对于政治和行政机构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是，面对公民的要求，要么保持沉默和僵化，要么相反，屈服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而没有充分考虑数字媒体传播的声音和可见的关注实际上有多广泛的共享和代表性。然而，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区分真正的公民倡议和被操纵的公民倡议，因为在数字化生产可见性的时代，强大的参与者之间正在进行设计自己的“公民声音”和形象的竞赛。

总而言之，当媒体城的全部动态被揭示出来时，数字媒体的民主化质量，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兴高采烈地庆祝。看来，民主参与仍像以往一样充满争议。获得民主取决于新调解技术和新装备的公民代理人的结合，这些公民代理人可能比过去的政治和公民精英更聪明，数量也更多，但他们在一个充满机遇和制约的转变领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在一个数字增强的媒体城市中，这种对包容性和可听性的新颖追求的规则和人物才刚刚开始出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参考文献

Bakardjieva, Maria. 2008. "Bulgarian Online Forums as Carnival: Popular Political Forms and New Media." In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d. Fay Sudweeks, Herbert Hrachovec, and Charles Ess, 286–300. Perth, Australia: Murdoch University.

———. 2009. "Subactivism: Lifeworld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5(2): 91–104.

Bennett, Lance, W. "New Media Power: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Activism." In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ed.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Bennett, Lance W.,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6): 770–99.

Bimber, Bruce, Andrew Flanagin, and Cynthia Stohl. 2005. "Reconceptualiz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5(3): 389–413.

Brake, David. 2014 "Are we all Online Content Creators Now? Web 2.0 and Digital Divid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3): 591–609.

CIVICUS. 2013. *State of Civil Society 2013: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CIVICUS House. http://socs.civicu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4/2013StateofCivilSocietyReport_full.pdf.

Couldry, Nick. 2010a. "New Online News Sources and Writer-Gatherers." In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ed. Natalie Fenton, 138–52. Los Angeles, CA: Sage.

———. 2010b.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London: Sage.

Dahlberg, Lincoln. 2001.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nline Deliberative Forums Extending the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4): 615–33.

———. 2005. "The Corporate Colonization of Online Atten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9(2): 160–80.

Della Porta, Donatella. 2011. "Communication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s Agent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6): 800–819.

Feenberg, Andrew, and Maria Bakardjieva, "Consumers or Citizens? The Online Community Debate." In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ed. Andrew Feenberg and Darin Barney, 1–2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gittai, Eszter, and Gina Walejko. 2008. "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Content Cre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2): 239–56.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Herring, Susan. C. 2003. "Gender and Power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ed. Janet Holmes and Miriam Meyerhoff, 202–28.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Janssen, Davy, and Raphael Kies. 2005. "Online Forum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cta Politica* 40: 317–35.

Kaposi, Ildiko. 2006. *Virtual Deliberation: An Ethnography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Hungary*. Ph.D. dissertati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Kiesler, Sara, and Lee Sproull. 1992. "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2: 96–123.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pacharissi, Zizi. 2004. "Democracy Online: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 *New Media and Society* 69(2): 259–83.

———. 2010.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Silverstone, Roger. 2007.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 Cambridge: Polity.

Wellman, Barry, Anabel Quan-Haase, Jeffrey Boase, Wenhong Chen, Keith Hampton, Isabel Díaz, and Kakuko Miyata. 2003.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8(3). http://jcmc.indiana.edu/vol8/issue3/wellman.html.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14 Facebook群组中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

Sharone Daniel

William a . Gamson在他的《*Talking Politics*》(1992)一书中指出，构建不公正、同一性和代理这三个集体行动框架是构建社会运动的基础，因为运动成员使用这些框架来识别不公正的情况，发展集体同一性感，找到适当的目标，然后采取行动——尽管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在本章中，我使用集体行动框架理论来部分解释为什么一个Facebook小组成功地动员其成员采取持续的、有针对性的集体行动，而另一个小组却失败了。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Kullena Khaled Said)是最终引发埃及革命的埃及组织,它成功地动员了成员组织和实施反对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行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Justice for Damini)是一个抗议2012年新德里一名23岁女子惨遭强奸的页面，在几周内聚集了7万名成员，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逐渐消失，表面上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尽管它所参与的更大的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虽然领导力的概念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因素在许多方面将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区分开来。

达米尼案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Facebook页面本身的文本和超链接，该页面的内容是用英语和印地语写的，我对这两种语言都很熟悉。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事件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革命2.0:人民的力量比掌权的人更强大——回忆录*》(2012)一书，该书由埃及组织的创建者和管理员瓦埃尔·高尼姆撰写，同时也基于该事件的新闻剪报。不幸的是，《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所有内容都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因此，本文中提到的库伦哈立德·赛义德的所有内容都摘自高尼姆的书，其中包含大量翻译的帖子和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因为这意味着分析是基于高尼姆认为重要或相关的帖子和回应，以便在呈现他的故事时进行翻译。

不幸的是，尽管我一再要求，只有达米尼案的五名成员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两名成员同意并接受了采访，或者给我寄回了一份调查问卷。我联系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成员的努力尤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在我开始联系的时候，该组织的管理员阻止了他们自己和该页面的所有成员在上面发布任何内容。因此，我选择不从这些数据中做出任何推论，也不将其纳入我的分析中。然而，我在文章的几个地方提到了我收到的回应，因为它们为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提出了可能的假设。为了匿名起见，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改了。

集体行动框架理论在数字语境下的应用

Gamson的框架很容易应用于在线语境，尤其是主要的交流形式是公开可用的(并且被作者理解)。这是因为，通过在线发生的整齐的、按时间顺序的、有时间和日期戳的帖子和对话，我们可以追踪每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发展。危险之处在于，所写和表达的内容与所感受、思考和行动的内容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不连贯性。然而，普通成员与研究人员一样了解相同的数据，因此使在线可用的内容至关重要。对私人对话的访问，无论是数字的还是其他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信息，可能会指向具有不同或更强大的集体行动框架的核心行为者，但这并没有带走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从任何关于更大群体的发现中。尽管如此，差距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处理线下行动时更是如此。虽然在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成员之间的交流仍然可以供研究人员分析，但并不是所有在断开连接时发生的事情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个人访谈有助于填补这两方面的知识空白。在这种规模的团体中，个人接触的障碍可以通过前往运动发生的地区来克服。

背景

2010年6月初，已故的28岁的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被残忍毁损的脸的照片被发布在网上，并在网上疯传。赛义德曾被埃及警察严刑拷打并杀害。谷歌中东和北非市场营销主管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和一位住在迪拜的埃及人看到赛义德的照片后，在Facebook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小组。在第一天，总共有36000名年轻的埃及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它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个页面组织了线上和线下的政治行动，然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六个多月后，随着突尼斯独裁政权的垮台，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决定号召埃及革命。高尼姆创建了一个Facebook活动，邀请埃及人在10天后的2011年1月25日开始革命。两天之内，就有27,000人回复了他们的参与。许多其他运动、反对党和活动人士共同推动、协调和策划了这次活动，成功地在18天内结束了胡斯尼·穆巴拉克30年的独裁统治。虽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两名管理员，但本文主要关注高尼姆在报告这些行为时的行为。

德里强奸案涉及一名23岁的印度女子被残忍轮奸，印度媒体给她取了“达米尼”的笔名。2012年12月16日，达米尼在一辆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被六名男子多次轮奸。犯罪的性质是如此的暴力，以至于达米尼不得不把她的大部分肠子都切除了，如果她活了下来，就再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了。事发13天后，也就是12月29日，她去世了。在她去世后的这13天里，印度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处死被告，并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以及一系列其他要求。在此期间，各种脸书群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成立了一个支持达米尼的组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拥有7万多名成员。

比较的理由

我之所以选择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是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在动员和行动力量方面与众不同的脸书群组。我之所以选择将其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相提并论，是因为与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一样，它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是为了应对一场危机而出现的，这场危机是由于另一名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人遭受了极端不公正的待遇。在本文研究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数量都增长得非常快，并且都有匿名的管理员。这两组人都是脸书的“页面”。这意味着只有组的管理员才能将内容发布到访问页面后立即可见的“墙”或界面上，从而使管理员能够对页面的立即可见内容进行重大控制。此外，考虑到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成员明确希望不与政治青年联系在一起，以及他们对政治青年的相当负面的看法，以及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成员缺乏批判性的政治话语和行动，这两个群体可能主要由非政治化的年轻人组成。

也就是说，这两个群体也有重要的差异。哈立德·赛义德被政府雇员攻击，因为他被认为是对专制政权的威胁，而达米尼被公民社会成员攻击，因为她是一名脆弱的女性。因此，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埃及群体对身体暴力做出了回应，而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印度群体对性暴力做出了回应。达米尼和赛义德的苦难受到关注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苦难仍然是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此外，尽管赛义德之死与系统问题之间的联系对普通公民来说可能更为明显，但达米尼之死在印度妇女争取安全和平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虽然这两个群体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

不公正的集体行动框架需要两个要素:道义上的义愤和一个至少要部分负责的有动机的人或实体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不公正。特纳和基利安认为，如果没有一种道德义愤填膺的感觉，并且信仰某些“既定的实践或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应该被取代”，一场社会运动就不可能存在。道德义愤是由“正义的愤怒”或基于情感的对“不平等”的理解，以及(但不一定需要)对其的理智理解组成的。前一要素在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和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的创造中都非常突出(Gamson, 1992: 32)。

《正义之怒》

用瓦埃尔高尼姆的话说，当他看到哈立德被残酷毁容的照片，读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后，他“感到痛苦、沮丧和愤怒”，“无法控制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虽然其他因素影响了高尼姆创建这个小组并投入大量时间来管理它的决定，比如他是一个网虫，并且坚信技术的力量可以引发变革，但高尼姆对哈立德的照片的情感反应激发了他创建这个页面的愿望。这也是在该组织成立后，经常重新点燃他与埃及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愿望的因素(高尼姆，2012:51, 89)。

如果你访问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在脸书上的页面，你会看到类似的情感流露。该组织的描述要求人们点赞该页面“向所有犯罪混蛋强奸犯(原文如此)表明，我们ALL为ONE，ONE为ALL人”(大写字母)。该页面上的第二个帖子是一封充满愤怒和悲伤的信，写给强奸犯(此时还不知道有六名男子参与其中)，称他为杀人犯、小偷、恐怖分子和血腥的狗等等。页面上的大多数评论都表达了类似的悲伤和深深的愤怒(为达米尼伸张正义, 2012)。

同样强烈的情绪也蔓延到了采访和问卷调查中。例如，Priyanka说该组织很好，因为它帮助许多人“感受到Damini的痛苦”(对2013年8月4日调查问卷的回答)，而Sumaiya写道，她加入该组织是因为“作为一个人，你不能忽视[强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想象袭击发生时的情况[原文如此]”(2013年8月4日对调查问卷的回答)。Bipen加入了为Damini伸张正义，然后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观点而创建了自己的组织，他说:“当我读到发生的事情的新闻时，我哭了很多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痛苦的死亡方式。(2013年8月4日对调查问卷的回答)。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动机演员

然而，正义的愤怒不足以构建一个不公正的集体行动框架。一群人还必须能够识别出一个行为人，无论是个人、公司、传统还是政府政策，至少要对行为负有部分责任。这个行动者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如果不公正的原因过于抽象，或者“没有行动者”，比如“制度、社会、生活、人性”，就很难或不可能理解不公正的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并可能导致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和/或接受情况“就是这样”。在另一个极端，“在将不公正框架的目标具体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危险，即人们会错过产生困难和不平等的潜在结构性条件”(Gamson, 1992: 32-33)。

通过阅读为达米尼正义(Justice for Damini)页面上的帖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即为达米尼正义无法确定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这使得该团体没有一个合适的目标来组织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员和评论者在命名敌人时过于具体。他们分享的大部分内容都充满了愤怒、厌恶、悲伤，以及希望看到强奸犯受到惩罚的愿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所有强奸犯都被逮捕，针对他们的司法程序启动，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该国的强奸法，抗议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了，特别是与这六名强奸犯有关。毕竟，他们是六个随机的人，与更大的公共或私人组织没有联系，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有动机的行为人不可能被识别和锁定。当然，媒体和街头抗议活动提供了几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它还没有成功地教导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德里警方本身，他们系统地、公开地助长了对受害者的指责和有罪不罚(Bhalla et al.， 2012)。有一些适当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或“敌人”成为运动的目标。

那些确实提供了替代目标的帖子遭受了泛泛之苦。例如，两篇提出强奸文化概念的帖子将这个问题归咎于整个社会。其中一篇名为“每个强奸犯的背后”(发表于2012年12月21日)的文章列出了所有人，从“把妻子当作奴隶的父亲”到“允许强奸受害者嫁给强奸犯的法律制度”，再到抗议达米尼被强奸的人。虽然这篇文章很有见地(如果不是完美的话)，但它是一篇潜在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公正的批评，它包罗万象，最终让“社会”这个“无演员”的实体为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负责。或许可以预见的是，那篇帖子之后的评论聚焦于改变自己，也包含了对整个印度文化和社会的模糊评价。他们说诸如“首先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然后是我们的国家”、“印度文化和社会糟透了”、“我们都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对这次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之类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发出我们的声音，站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只有一条评论更有针对性，但包括管理员在内，没有人试图鼓励这个人的想法，也没有人试图以任何方式引导对话。

当发布与根本原因或采取集体行动有关的帖子时，它们在追求主题或行动方面缺乏后续行动。例如，1月20日，管理员要求成员组织活动并发送活动链接。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虽然没有重点，但是，虽然在随后的197个帖子中，只有少数包含了一个事件的部分形成的想法，但这些帖子都没有被管理员评论或转发，以鼓励这种思考和/或给想法的种子更大的可见性。甚至连一份要求政府强迫那些被指控强奸的政客下台的请愿书的优秀倡议都没有被转发。因此，管理者和其他成员未能在群体中扮演领导者或协调者的角色，也未能确定强奸犯在其中活动的“更广泛的结构”(伽姆森, 1992: 33)。这样做可能会给该页面的关注者一个目标，一旦强奸犯被逮捕，针对他们的司法程序开始，他们就可以围绕这个目标组织起来。但这也将是一项极其耗时的任务。高尼姆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页面上，以至于他忽略了他的家庭和工作来照顾它(高尼姆，2012:110)。

有趣的是，一位来自达米尼法官的受访者Bipen特别抱怨说，小组管理员没有指出强奸背后的“实际原因”和“主要原因”，他认为后者是印度的法律和秩序体系。他觉得，这样做是管理员的责任，他/她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对小组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创建了自己的小组，目的是“至少让我的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并认为“人们对社会中存在的针对妇女的不公正现象缺乏认识”(2013年8月14日对问卷的答复)。另一名受访者，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Rohan也觉得小组是无效的，但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互联网的媒介(专访作者，2013年7月27日)。

另一方面，Wael高尼姆立即指出“内政部的腐败行为，我们镇压政权的邪恶右手”是一个具体但不太具体的行动者。在高尼姆最早的帖子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演员和其他出现的演员的名字。然而，从一开始，赛义德的正义就被框定在一个更大的关于所有团体成员的正义和自由的话语中。例如，第一条帖子写道:“今天他们杀了哈立德。如果我不为他着想，明天他们就会杀了我。”第二条是:“各位，我们在两分钟内变成了300人。我们想要达到10万。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很快，高尼姆“开始关注这样一个概念:发生在哈立德身上的事情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身上。”无论如何，达米尼法官的行政人员在强奸和强奸文化之间建立同样的联系都不是一件牵强的事。这并不是说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没有关注正义，特别是哈立德·赛义德，或者他们选择的动机演员总是连贯和稳定的;然而，作为一名管理者，高尼姆总是回归或包含更广阔的正义视野(高尼姆，2012:59-60)。Zeeshan,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的追随者，在我对他的采访中支持了这个观点。他说，他通过小组学会了政治(2013年8月14日对作者的采访)。

集体行动框架:同一性

继续讨论集体同一性，我们会发现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集体同一性的衡量标准有很多，这些衡量标准之间一直缺乏高度相关性，这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安石, Deaux, and McLaughlin-Volpe, 2004: 100)。因此，不太可能有任何一个群体会展示或报告所有元素的存在。由于与集体同一性相关的元素列表很广泛，根据安石等人对二十年集体同一性研究的深入分析，我选择了七个主要元素中的六个，这些元素被认为是集体同一性的基础。伽姆森对集体同一性的定义以及《多纳泰拉·德拉·门》和马里奥·迪亚尼对同一性和身份仪式产生的理解也为本节提供了部分理论框架。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Ashmore等人(2004:84-93)列出的清单包括自我分类、评价、重要性、依恋和相互依赖感、社会嵌入性和行为参与。其中很多都是不言自明的。*自我分类*指的是将自己定位为特定群体成员的行为。没有自我分类，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同一性几乎都不可能存在。紧随其后的是“*评价*”，它指的是一个人评价或感觉别人评价他认为自己属于的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重要性*指的是“某一特定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人整体自我概念的重要性，从低到高”。*依恋和相互依存感*指的要么是“一个人对某一社会类别的情感参与程度，要么是认为该群体的命运与个人命运重叠的程度”。*社会嵌入性*关注的是集体同一性在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有多少朋友和家人属于自己所在的群体。*行为参与*关注的是“一个人参与直接[牵连]有问题的集体同一性类别的行为的程度。”对于Gamson来说，

> 同一性组件指的是定义这个“我们”的过程，通常与具有不同兴趣或价值观的“他们”相对立. . . .集体行动需要有一种必须改变其政策或做法的人类代理人的意识，以及一个将有助于实现这种改变的“我们”。(Gamson, 1992: 8)

让我们从追溯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我们”意识开始。利用Donatella della门户和Mario Diani对同一性和身份仪式产生的理解，我认为，在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时，团体成员采用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建立并加强了运动的同一性。这些行为模型包括诸如标识符之类的对象，“它使特定事业的支持者能够立即被识别出来”，以及“扮演重要角色……”的角色哈立德·赛义德。在(该运动)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在集体行动中使用这些“对象”，将群体成员与“普通人”和“他们的对手”明确区分开来(della门户等人，1999:97-98)。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高尼姆敦促组织成员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由另一个青年运动和其他团体和活动家组织的哈立德·赛义德的公开葬礼。我不可能说团体成员是否参加了那场被警察袭击的葬礼。然而，他们的参与似乎对Kullena Khaled Said内部的集体同一性几乎没有影响。然后，高尼姆提出了一个“属于”该组织的行动。也就是说，Kullena Khaled Said的管理员想到了这个想法，并要求那些属于该组织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想法是让会员们把他们的头像换成“匿名设计的哈立德·赛义德的横幅，以埃及国旗为背景，配上“埃及烈士”的标题。高尼姆报告说，“数千人的反应是积极的。”这是一个低风险和容易参与的行动，这在Facebook的世界里是很常见的。该行动要求Kullena Khaled Said成员通过改变他们的在线“服装”——他们的个人资料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公开表明自己与该组织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同时表明了自己与那些杀害“埃及烈士”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或尚未加入该组织的人的区别。通过在徽标中使用该运动的一个人物——哈立德·赛义德，参与该运动的人正在加强他们作为一个与哈立德·赛义德之死有关的运动的同一性(高尼姆，2012:63,67)。

在第二次行动中，高尼姆要求成员们拍照，他们举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Kullena Khaled Said:

> 数百人照做了，我们开始在页面上发布他们的照片。这些图片所产生的影响比张贴在页面上的任何文字都要强烈许多倍。各种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年龄在14岁到40岁之间，现在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化身。(2012: 68)

成员们再次采用了一种标识符，即他们所在群体的名称，在危险的情况下，这将他们与对手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从而加强了他们的“我们”感。在这两次行动之后，运动实际上就流动起来了。

小组组织并参与的第三个行动是沉默站，这是一个小组成员建议的线下行动。他们的想法是让成员穿上黑色t恤(另一种标识)，在亚历山大的海岸站一个小时，彼此相距五英尺，默默地表达他们“对哈立德·赛义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涉及到团体成员和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最终要求他们公开表达对政权的不同意见。甚至在行动发生之前，就有可能看到这个群体的集体同一性正在形成和增强。例如，成员们决定他们想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尽管我们既悲伤又愤怒，但我们仍然是非暴力的”(高尼姆，2012:70,72)。

高尼姆利用小组成员所表达的这些愿望和感受，并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强化，大胆地断言该小组是谁，不是谁，甚至给予小组成员“Facebook青年”的集体同一性:“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也不是一个政党……我们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 . . .我发誓整个世界都会对Facebook青年感到惊叹”(2012:72)。在我对Zeeshan的采访中，他自豪地宣称他也将自己定位为Facebook青年(2013年8月14日)。

当该组织因组织“沉默站”而受到政府和国有报纸的攻击时，该组织的数字同一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面对那些试图给它另一个不那么光荣的同一性的人，它阐明并捍卫了自己的身份:

> 你知道为什么媒体要攻击Facebook吗?因为它没有收受贿赂来发布虚假故事……而且它也不会屈服于安全压力，删除一个故事. . . . Facebook成为我们表达观点、抱负和梦想的工具，没有任何人的压力. . . .现在我们的信息传到了他们有偏见的报纸上…但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自己的. . . .我们是埃及青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我们有发言权。(高尼姆，2012:74)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批评它，认为它没有做任何改变现实的事情，而且是愚蠢的。高尼姆回应这些批评的文章，在团体成员和“他们”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而“他们”并不是集体采取行动的动机行动者。他写道:“很多人会想，‘那又怎样?你得到了什么?“……正是这些人说埃及人是懦夫，没有人会出现在沉默站上。”他接着陈述了他们的收获，比如“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埃及人团体，彼此关心……他们不是被动的。”这篇帖子以“谢谢你，脸书青年”结尾。高尼姆报告说，在沉默站之后，“团结的感觉压倒了参与者，并将摊位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又举行了三次“沉默之站”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群体经历了一段“看不见”的时期，这在社会运动中很常见(高尼姆，2012:80)。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非常成功地培养了一种“我们”感，一种同一性。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Ashmore等人作为集体同一性指标的一些元素的存在。也许最明显的标志是行为参与，成员通过参与成百上千的群体组织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在高尼姆发布的一项调查中，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拥有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所宣传的事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很多会员对这个页面也有非常积极的评价。例如，一些人说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显然，群体中存在强烈的集体同一性迹象(高尼姆，2012:108,80)。

当我们看《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时，一开始并没有从页面的帖子和评论中出现具体的同一性，我们在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中看到的强烈声明也不存在。在采访小组成员之前，我得出结论，这个小组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集体同一性。直到一个多月过去了，才有迹象表明，该组织或管理员同意或甚至提出了一种行为模式或目标，将他们与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印度人区分开来，页面上的帖子和评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同一性模式。从表面上看，这个组织似乎在这方面失败了。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种不可否认的低但可察觉的集体同一性存在。虽然这些受访者的回答不能被理解为代表整个群体，但有趣的是，这种感觉是存在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都没有真正参加过这个群体组织的活动。

五个受访者中有三个人具备了集体同一性的最基本条件，因为他们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其中两名成员对团队的评价总体上是积极的，这是集体同一性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位成员的批评则更为复杂，但三人都认为该页面提高了人们对该事件的认识，并提供了重要的更新。其中一人认为，它做得更多。此外，小组所坚持的价值观和不受欢迎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在对Rohan的采访中，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他说他对管理员和他所说的“男孩和女孩”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是正义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因为他们“试图摧毁印度文化”，并将男性妖魔化。他不同意页面上所说的很多内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违背我们的文化”，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天黑后还出门。相反，她们应该“举止正常”。

罗汉的言论与普里扬卡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普里扬卡表示，她尊重行政长官的观点，并对印度女性面临的双重标准、不平等和压迫感到相当担忧。她还对那些“对达米尼提出愚蠢问题的人表示非常恼火，问她为什么晚上还不在家?”她和她的男孩朋友在一起做什么?(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答)。考虑到他们的不同观点，罗汉并不像普里扬卡那样强烈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达米尼正义的一部分，这并不奇怪。他在使用“我们”和“他们”来指代这个群体时，总是在切换，在表达支持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时，他会使用第一人称，而在反对该页面的内容时，他会使用第三人称。显然，尽管没能确定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敌人”，但该页面确实在属于(我们)的人与不属于(他们)的人之间划清了界限。

当被问及如果团队一夜之间消失，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感到失落或悲伤，这表明他们对团队和集体同一性的情感依恋。普里扬卡特别伤心:“我一定感到非常难过/震惊，因为它是我为达米尼而战的伙伴。即使是现在，当小组不像开始时那样活跃时，我也感到很难过”(2013年8月12日对问卷的回应)。

普里扬卡甚至通过这个小组交了几个朋友，表现出了社会嵌入性，她声称，尽管她无法亲自参加小组主办或组织的任何活动，但她“在Facebook的帮助下尽了最大努力鼓励他们”，并觉得这意味着她“在家参与”。从她的角度来看，她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坚持自己的行为参与。考虑到上面的回答，我的假设是，如果管理员再次活跃起来，如果他或她有时间、精力和所需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围绕一个不同的目标或目标重新动员这个页面的成员，因为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很可能存在。2013年8月12日)。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集体行动框架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能动性:“能动性是指通过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条件或政策的意识。集体行动框架暗示了某种集体效能感，否认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情况的不变性。它们通过将人们定义为自身历史的潜在代理人来赋予人们权力。他们不仅认为可以做些什么，而且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Gamson, 1992: 7)。

对于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来说，第一次沉默站是一个强大的时刻，因为那些在互联网上“相遇”并组织起来的人看到他们的工作以成千上万的年轻埃及人默默地站在一起反对压迫政权的形式蔓延到线下世界。这个创新的、非暴力的、非对抗性的想法来自于一个小组成员，而不是高尼姆本人。高尼姆把发到库琳娜·哈立德·赛义德电子邮件账户上的想法，连同活动的日期和时间，贴在了页面的墙上，并征求“所有有助于实现这个想法的建议”。他回忆道:“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最重要的评论是，这种努力不应该变成一场典型的政治示威....根据其中一名成员的建议，参与者被要求携带一本《古兰经》或《圣经》，以便安静地阅读。”

在收到第一封电子邮件后的一个小时内，高尼姆在脸书上发起了一个名为“沿亚历山大海滨为哈立德·赛义德烈士沉默站祈祷”的活动。他在周三发布了这条建议，而沉默站活动原定于周五下午5点举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该组织的成员合作撰写和分发新闻稿，设计标志和横幅，邀请国内和国际媒体报道这次活动，联系哈立德·赛义德的母亲邀请她参加，甚至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宣传这次活动。成员们邀请了很多人，这个团体迅速发展到超过10万人。如上所述，该事件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国有报纸开始攻击脸书，声称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有，许多间谍和敌人匿名使用它来给埃及年轻人洗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周前刚刚成立的一个小组完成的，在这个小组中，主要协调者是匿名的，而且很可能是通过许多人的合作完成的，这些人彼此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亲自协调他们的行动(高尼姆，2012:70,74)。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高尼姆写道，虽然他觉得实际人数要低一些，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报道称，有8000人参加了沉默站”。这个摊位的照片被贴在网上，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成员们表示，这个团体对他们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在高尼姆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4%的参与者表示“沉默站”非常有效或效果令人满意，72%的人表示他们会参加下一次活动。机构的集体行动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没有什么比高尼姆在“沉默站”之后的一篇帖子更能表达这种感觉了:

> 上周五，这个页面启动了…周二穆罕默德发送了他的建议，并宣布给大家. . . .周五，超过10万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数千人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市实施了一个埃及从未有过的想法. . . .所以我们能做任何事情吗?!

虽然该组织在代理意识上从来没有统一或一致，尽管它经历了一段缺乏行动和关注的时期，但在该组织组织的其他行动中，同样强烈的代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沉默革命，当然还有1月25日的革命(高尼姆，2012:79,81,84,103)。

这种话语和焦点与我们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一种沉重的挫败感和缺乏代理的感觉悬在空中。这是因为，首先，正如你在上面关于不公正框架的章节中看到的，管理员和小组成员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来对抗。他们没能将一群无关联青年的随机性暴力行为置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结构中(Gamson, 1992: 33)。如果没有正确的“敌人”和目标，就很难觉得一个人可以改变任何事情，或者他所寻求改变的事情会真正产生影响。正因如此，在强奸案发生后仅仅几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页面的“点赞者”们就不断地发布着对强奸犯尚未被绳之以法感到沮丧和愤怒的信息。虽然有可能，但考虑到准备这类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个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和公民仔细审查、分析和撕裂的案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位像高尼姆这样的管理者在场，帮助将对话转向更广泛的司法体系结构，那将是非常理想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让针对达米尼的罪行得以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并确定该组织能够带来结构性和持久变化的方式。

对于强奸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有不切实际的、自私自利的期望，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是阉割。不幸的是，这些都得到了管理员的鼓励。例如，他/她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名被指控强奸的男子被下巴下的钩子拖着穿过黎巴嫩的街道，标题是“这就是黎巴嫩官员公开对待强奸犯的做法!印度到底在搞什么鬼?分享给印度政府吧!!”显然，对于一个处理高度公开案件的民主政府来说，这种法外和非法的惩罚是不可能的。这在黎巴嫩也不是常态。一个既允许愤怒又允许理性的温和声音会更有用，因为它会庆祝这样一个事实:街头抗议确保了所有强奸犯都被立即逮捕和起诉，强奸法正在被审查，让追随者不再认为立即将强奸犯阉割并处以绞刑是他们的事，并将他们推向一个更合适的发泄愤怒的途径，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为对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有影响。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这个页面也从“这次……”这样的评论转移了。将会有变化!重大变化!，“我也想加入这个……”并为这个女孩做SMTHNG……”，以及“人民抗议的力量……”应该继续……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为“让达米尼失望”而道歉，并抱怨和叹气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为达米尼伸张正义，2012年12月20日发布，原文拼写错误)。

除了无法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或庆祝已经完成的目标而感到沮丧之外，该页面也未能利用活动来帮助成员看到他们在线微行动的结果。在运动早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了两场由其他团体和个人发起的抗议活动。人们将在圣诞节前的几天聚集在印度门要求正义。但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要求穿戴或携带任何可能表明他们属于该组织的东西。由于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抗议，为达米尼伸张正义的成员不太可能有机会与其他页面成员见面和交谈，这样做，看到有可能离开互联网，走上街头要求和得到结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当这个页面最终真的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要求人们穿黑色衣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距离强奸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成员们已经感到沮丧和没有动力，这个页面也失去了很大的动力。据另一位受访者迪内什(Dinesh)称，在250多名回复者和7万多名页面“赞”者中，只有大约1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2013年7月20日)。这次活动很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Facebook上并没有发布这次活动的最新消息，迪内什也没有提到这次聚会的任何结果。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共同努力参与集体行动，也没有目标对手，该组织似乎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些因素将成为构建代理的主要障碍。

此外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不适合集体行动框架的因素，但在考虑微观行动主义的影响时，它们是相关的。首先，不管他们在动员和行动上有多么成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都履行了向该网页的关注者提供案件重要更新的职能。第二，尽管“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未能将焦点集中在一个有动机的演员身上，该组织可以动员起来反对这个演员，但该网站只是不时地宣称，达米尼被强奸是没有借口的，该网站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表明了反对指责受害者和羞辱受害者的立场。

结语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别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并促成其成功参与集体行动的三个因素是，该组织有能力建立三个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代理和同一性。当谈到不公正的框架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能够引导埃及年轻人对“敌人”的强烈道德义愤，这种“敌人”足够具体，让人觉得它可以被击败或至少受到攻击，也足够抽象，让人觉得可以进行长期的结构变革。该团体还利用创造性的集体行动和一定的象征元素来发展集体同一性，并建立了强烈的归属感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通过成功地将埃及青年聚集在一起抗议，培养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位积极参与、目标明确的领导者和团体管理者的帮助下实现的。不幸的是，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似乎在这三个领域都失败了，尽管对该组织成员的初步采访表明，集体同一性的种子可能已经在该组织内部生长，尽管它无法提出一个合适的目标，也无法围绕这个目标组织起来。

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群体成功而另一个群体失败时，还有更多的因素必须考虑。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我希望这篇文章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理解和消除数字行动主义的过程，并为数字和其他活动家提供一个如何明智地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工具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例子。

参考文献

Bhalla, Abhishek, and G. Vishnu. 2012. “The Rapes Will Go On.” *Tehelka*, 20 December.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3. http://www.tehelka.com/the-rapes-will-go-on/.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2009. “10 Worst Countries to be a Blogger.” Special Reports. Accessed March 18, 2013. http://cpj.org/reports/2009/04/10-worst-countries-to-be-a-blogger.php.

The Candle Light March. “Description.” (online forum message). Accessed March 20, 2013.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77621478945841/. Gamson, William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honim, Wael. 2012. *Revolution 2.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Justice for Damini. 2012. “Mr. Rapist.” (online forum message). 19 Dec. Accessed March 12, 2013.

———. 2012. “About.” Accessed March 12, 2013.

———. 2012. “Behind every rapist.” (online forum message). 20 Dec. Accessed March 13, 2013.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 1998.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Verma, Ravi, and Ajay Singh. 2011. “Evolving Men: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Instituto Promundo.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1. https://www. euskadi. net/contenidos/informacion/material/es_gizonduz/adjuntos/Evolving-Men_ICRW.pdf.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后记

拉斐尔·福沙伊

*政治*理论家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政治*身份*的形成》(*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的导言中，概括了他所认为的20世纪末、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形势。拉克劳认为，主导二战后政治格局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主义的新兴时代，给政治身份的划分留下了一定的空白。拉克劳在数字媒体转型和政治、社会和个人日常经验与实践的重新语境化的新兴时代的尖端写作。二十年后，我们正深入到冷战后全球格局的去语境化中，其地图主要围绕着经济、国家和跨国霸权重新绘制。拉克劳反思了围绕政治同一性问题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本卷导言中提到的哈贝马斯对千禧年之交的现代性的晚期现代和后现代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分析相一致。关于哈贝马斯倾向于称之为晚期而非后现代性的政治身份形成方式的变化，拉克劳指出:

> 如果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总是有一个已经确定的位置，那么从激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同一性问题就不会出现，或者至多被视为人们发现或认识自己的同一性，而不是构建它。因此，社会错位的问题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问题

> 社会行动者的矛盾位置，而不是激进的缺乏威胁到这些行动者的同一性。(2)

拉克劳正确地指出，“激进的缺乏”是千禧年之交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是社会同一性的数字媒体表达扩散的肥沃土壤。同一性形成经验中的流动性和建构主义，源于拉克劳所看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全球景观(至少就意识形态在20世纪的特征而言)，鼓励了对技术转化的交流实践的开放性和适应性。通信中的计算转向构成通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多个虚拟身份的快速形成，再加上匿名或身份屏蔽的潜在选择，甚至不需要相互协调或一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传统就一直担心拟态的、有意的虚拟表征的认识论和伦理地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苏格拉底的性格，引用了"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将模仿诗人驱逐出理想的理想国，除非他们能为自己的价值提出哲学正当化rôle。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模仿者，“是世界上最具模仿性的生物，最初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1448b, 7-8)。特别是，他观察到:

> 而且，所有人都喜欢模仿作品，这也是很自然的。第二点的真理是由经验证明的:虽然对象本身看起来可能很痛苦，但我们喜欢在艺术中看到它们最真实的表现. . . .观看图画的乐趣在于，人们同时也在学习——收集事物的意义。(1448b, 8 - 11,15 - 17)

我们在表现中自然体验到的快乐，虽然本质上是令人愉悦的，而且可能具有教育意义，但它显然与世界上的物理行为的直接后果无关，因此隐含着令人困惑甚至不安的含义。作为表征和日益强化的虚拟化的管道，传播媒体展示了我们在所有表征中所附加的快乐元素和知识元素之间所经历的矛盾张力。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电影和电视这种单向媒体对暴力的沉重关注一直伴随着对裸体和性行为的相对禁止。然而，后者却在更为个体控制的互动结构中找到了肥沃的环境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的互联网。虚拟媒体连接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在意味着，在发达国家(随着移动设备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虚拟而非具身的互动上。以至于曾经明显的真实与虚拟、呈现与呈现之间的区别不再适用，一种比例和含义都不确定的再现与虚拟行为的新制度出现了。

随着个人和移动设备对独处时间和与他人交流的日益虚拟化，真实与虚拟体验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平衡仍然存在于电影和电视时代。在计算机化和互联化之前，媒体消费的被动性与阅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也保持着世界上阅读与行动之间明显对比的明确性。随着计算机虚拟化和互联网交互性的出现，这种清晰的对比不再适用。我们正迅速适应虚拟社区和虚拟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前(假定的)关系迅速接近(或可能远远超过)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不再被自然化在一个生物圈中，这个生物圈本身由于科学和技术干预的影响而变得极度不平衡(参见，例如，Hayles, 1999;Wolfe, 2010)。人类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和物种同一性，并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下承担起自己的能动性，为伦理和政治反思和辩论开辟了新的视野。这本关于数字文化的合集的作者确信，这场关于数字联系中的同一性和代理的辩论的必要性和价值。

参考文献

Aristotle. “Poetics.” 1984.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yles, N. Katherine.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clau, Ernesto. 1994. “Introduction.”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ed. Ernesto Laclau, 1–8.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lato. “Republic.” 1997. *Complete Works*. Ed. John M. Cooper. Indianapolis: Hackett. Wolfe, Cary. 2010.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机器有权利吗?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学

David J. Gunkel, Paul Kellogg采访

凯洛格:也许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在哪里教书以及你的背景。

冈克尔:我的背景是媒体研究和哲学方面的一种分裂/双重人格。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读本科，所以我两样都学了，我在媒体制作、媒体批判研究和大陆哲学方面都有高等学位。我研究和研究与技术哲学有关的问题，以及与伦理、数字媒体和新媒体有关的相关问题。

凯洛格:2013年4月在埃德蒙顿举行的数字研讨会上，我有幸听到了您的演讲，当时您是主讲人。这是一场非常吸引人的演讲，它提出了一个我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将伦理学应用于机器世界的问题。我有机会读了您的书《*机器问题*》*(The Machine Question)*，正是您在书中以及在那次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有趣的问题，促使我提出了这次采访的要求。

首先，准确地说，您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与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机器有权利吗?”其次，如果这是真的，

难道你不会立即遇到那些认为权利问题完全与人类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怀疑或抵制，因此，机器甚至可以被视为伦理领域的概念立即被驳回?

冈克尔:让我先作个序言，然后马上回答你的问题。当我们从工具的角度思考技术时，我们想到的很多东西。也就是说，技术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在交流领域，它总是被视为一种人类行为或互动的媒介。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电脑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电脑调节了我们与Skype的互动。所以在我们的很多历史中，与技术打交道一直是与被视为中立的东西打交道。技术并不是道德的组成部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是人类决定用它为善还是为恶，这取决于技术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应用或不应用。

在这个新的世纪，21世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机器越来越多地从人类之间的中介转移到作为一个互动主体的位置。因此，计算机和其他类型的机器，如计算机-机器人、具有人工智能(AI)的机器和算法，不再仅仅是我们行动的工具，而是成为与我们互动的“他者”。例如，如果你看一下有关网络流量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现在网络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是机器对机器和机器对人的互动。因此，我们已经被一种机器入侵所排挤，机器正在越来越多地接管通常被认为是人类主体的交流交流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互动。这导致最近很多哲学家将机器视为一个道德主体。也就是说，机器是否应该为它所做或未做的事情负责?如果机器拒绝你赊账，那是谁的错?是信贷机构和编写算法的人的错，还是算法本身的错?最近十多年来，关于信用机构的各种问题都浮出水面。

但你是对的;我主要关心的不是代理。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代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机器道德代理是处理我们当前社会环境中机制所占据的新位置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我想看看它的另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耐心”，或者可以看作是配股。如果我们现在确实有机器，我们正在相当认真地考虑作为道德行为人，并询问它们是否对我们负有责任，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机器是如何使它们成为道德行为人的?我们对这些机器有什么责任吗?在与我们的关系中，这些机器有相反的权利吗?所以你是完全正确的。我最近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机器权利的问题。

话虽如此，你的第二个问题还是很切题的，因为直接的反应是:“你在说什么?”机器怎么会有权利呢?”我们通常认为权利属于有意识的或至少是有知觉的生物，而我们所知道的机器只是我们设计用来做某些事情的愚蠢设备。因此，权利问题立即与道德哲学的悠久传统发生冲突，道德哲学通常只将权利分配给人类，直到最近才开始认为非人类动物也拥有任何权利。我反驳这个观点的方式，或者说是回应这个评论的方式，就是把它和动物权利哲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在动物权利中，我们开始打破我们传统中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伦理，并问道:“你知道，如果非人类动物也可以成为道德病人呢?”

如果你回头看看启蒙运动的奠基人，比如笛卡尔，他认为动物和机器是一样的。他认为在这个术语中，*bête机器*，动物机器，机器和动物表面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开始开放对动物的思考，如果我们遵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就有另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应该开始思考机器的权利。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机器问题，因为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必须询问机器的权利，因为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互动的主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参与其中。

凯洛格:我很高兴你提出了动物权利的问题。我记得二十、二十五年前，当动物权利的问题被提出时，即使是在餐桌旁的随意谈话中，人们也会以不理解的方式回应，因为有这么长的传统，动物被视为工具，作为物品，作为我们用来做食物的东西，或者我们自己的东西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人的需要。改变这一观点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情绪的可见性问题，尤其是在捕猎海豹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一种情感上的识别，因为海豹幼崽有眼睛，我们可以看着它们的眼睛，似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人类和机器之间似乎更加困难。所以在一个层面上是平行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平行可能会被打破一点。这和你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

冈克尔:这是个好问题。从外部看，似乎很难把这些点联系起来。但当你开始审视道德哲学的发展方式和逻辑的论证方式时，就以一种一致的方式遵循这种思考而言，它真的是无可辩驳的:除了机器的权利之外，你无法得到一个结果。我来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道德哲学在传统上是一种历史发展，它不断地向先前被排除在外的事物开放自己。所以，举例来说，在西方思想的早期，被算作道德主体的只有像你这样的其他人。在雅典，被算作道德主体的应该是白人男性，被排除在外的应该是奴隶、野蛮人、妇女和儿童。只有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才被认为是道德共同体的一员，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属性。举个例子，当奥德修斯结束旅行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女奴都吊死，他能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是属性，她们不被认为是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扩大了谁被认为是人类的焦点或范围。到启蒙运动时期，被认为是人的主要是任何年龄的欧洲白人男性，但被排除在外的是土著人、非洲人和女性。慢慢地发展到包括其他这些人，所以随着美国内战，非洲奴隶或以前的奴隶被纳入道德主体的社区。随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出现，女性开始被视为道德考量的对象，然后到了20世纪，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里根(Tom Regan)认为动物现在应该被纳入道德主体的群体。

现在在动物身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你也提到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最初，当我们试图扩大道德主体的群体时，它总是关于一种能力——它是关于这些其他人是否有理性的力量，或者在希腊传统中，*动物*的力量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Logon echon，即说话或使用语言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土著人没有理性，因此他们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完全参与者，或者女性不像男性那样理性思考，因此可以被排除在道德社会之外。有了动物权利，我们就从一种能力变成了一种被动。德里达说，动物权利思想的重大转变是杰里米·边沁问的不是，它们能思考，能推理，能说话，而是它们能受苦吗?受苦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它是被动的——被动受苦和被影响的能力。德里达说，这是20世纪道德思想的真正转变，因为它从拥有主动能力转变为被动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所以，正如你所指出的，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变，因为这是我们关注道德思维方式的真正转变，从这种说话、语言和逻多斯的能力，到痛苦的被动性。

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开始把机器作为一个道德病人来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再次遇到人们把他们的手臂高举在空中说:“你在说什么?很明显，机器不会受苦。它们没有任何对它们重要的东西。”你不可能伤害你的iPad。它没有任何情感。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除了工程师在设计带有情感的机器这一事实。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整个时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参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边缘感知机制的工程师们正在设计具有情感能力的机器。拥有情感意味着它们可以与我们交谈，更有效地与我们互动，因为我们是有情感的生物。

例如，罗德·布鲁克斯(Rod Brooks)设计的机器人害怕光，并能感受到光的痛苦。这是一种设计到机制中的情感反应，让机器寻找黑暗的角落，避开明亮的区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机器，这些机器可以模拟人类的情感，其程度几乎与真实的人类痛苦无法区分。日本有一家机器人公司(森田)制造了一种能感知疼痛的机器人，旨在帮助培训牙科专业的学生。所以当牙科学生使用钻头的方式不正确时，机器人就会痛苦地喊出你在伤害它，大多数学生都说这是无法模拟的。这与他们认识到的疼痛非常接近，以至于他们给这个物体注入了疼痛感。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有两点非常重要，需要指出来。一个是“别人的想法”问题。我怎么知道一个能提供疼痛证据的物体，是不是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一个动物，一个人，或者一台机器，真的处于疼痛之中吗?除了我自己，我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的痛苦，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解读外部信号，并假设这些信号来自某种内在的矫揉造作。至于我的狗是否在受苦，这并不是我能确切知道的。我只能根据它在被以某种方式触摸时的畏缩或嚎叫等方式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设计的机器能提供疼痛的证据，那么很难说这不是真正的疼痛，因为我可以对任何其他生物说同样的话。我也可以对老鼠说:“嗯，那不是真正的疼痛。”我最近刚在缅因州，有人告诉我，煮龙虾是可以的，因为它们真的感觉不到疼痛。我的问题是，真的吗?我们知道吗?

凯洛格:我们当过龙虾吗?

冈克尔:没错。我们怎么能确定，是的，确实，我们可以把龙虾活活煮熟，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从事动物研究的人说，是的，动物能感觉到疼痛，但它仍然会导致“其他思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任何看起来痛苦的东西是否真的痛苦。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个统计推测，但我们必须将同样的决策扩展到机器上，这些机器被编程为在其外部伪装中表现出各种痛苦或快乐。

另一件事——让我提一下，因为它真的很重要——丹·丹尼特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叫做《为什么你不能制造出一台能感受到痛苦的计算机》。他所做的就是花了大约二十多页的篇幅，试图通过一个思想实验，设计一个能感知疼痛的机器人，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真的不能设计一台能感知疼痛的电脑。”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制造出一种能感受到疼痛的机制，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疼痛是什么，这个我们称之为疼痛的决定因素是如此主观，以至于我们甚至不知道设计一个能感受到疼痛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说你不能设计一台能感知疼痛的电脑，不是因为我们有工程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问题，我们有一个哲学问题。这个我们把一切都挂在上面的东西，疼痛，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以至于很难确切地定义它是什么或者它是什么样子。

凯洛格:对，所以你非常认为你的研究符合关于权利的经典叙述，以及谁被视为道德主体的扩展——扩展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从白人男性，到有色人种，到女性，再到动物。你给机器等无生命的物体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你刚才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给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机器和其他没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区分开来吗?或者你的意思是，当我们扩展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对这些新单位的责任会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

Gunkel: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嗯，是的，当然，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足够有知觉或有意识的机器，被认为拥有权利，这就是AI。”例如，在《*2001太空漫游》中*，哈尔显然是一个设计良好的AI。他是否有知觉，是否感到痛苦，这些都是电影叙事中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电影观众必须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好吧，我们关闭哈尔会伤害他吗?他说他的思想在消失。我能感觉到。好吧，我们可能会承认权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当我们看到割草机、汽车或手机时，显然没有足够的AI来考虑权利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因为它在传统中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通常是根据一些内在的能力来决定谁拥有谁没有权利:知觉、意识、感受痛苦的能力，不管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论点是，当机器跨越了感知的障碍，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权利了，但在那之前，它们只是工具，我们不需要为此做任何事情。正如我所说，从传统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哲学论点。

我想说的是，即使在我们拥有哈尔9000型AI之前，机器的权利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机器是社会互动的对象，在我们的世界里，它们对我们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行动能力产生影响，而不管它们的智力如何。因此，我提倡一种以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哲学为基础的方法——列维纳斯式的方法——也就是说，甚至在我知道另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之前，我就遇到了另一个人，他把我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对待。我该如何回应呢?列维纳斯说，在我们对他人的认知能力有所了解之前，我们必须做出道德选择。我们必须选择是作为伦理主体还是作为客体来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这就把问题推向了下游。换句话说，我们不必等到哈尔 9000才开始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现在，当机器最聪明的时候，也许甚至是愚蠢的时候，但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机器的社会地位，因为伦理是关于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能力中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关于我内心决定如何处理我遇到的其他实体。所以马克·科克尔伯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决定伦理的是关系，而不是问题对象的能力。我认为他是对的。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如何与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有关;动物、环境、其他人和机器。

凯洛格:有意思。那么让我把它带到当代世界的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周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问题。我想到的机器是无人机。

现在，你可以提出伦理问题，保留无人机作为工具。以无人机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使用为例。我可以说这是不道德的，违反了人权，或者违反了国际法，等等。但道德责任在于使用无人机的人，或者是决定使用无人机的人。这是让道德规范或评估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你的意思是，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伦理问题，我们必须在了解他人的伦理能力之前，就伦理问题做出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说，我们对无人机有责任，要确保我们不会强迫它做出不道德的、违反国际法和人权的行为。是我理解错了吗，还是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道德和无人机的问题，你会怎么看?

刚克尔:正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无人机很有趣。目前无人机的配置是，它真的是一种远程呈现的仪器，对吧?我们在美国西部有飞行员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其他地方驾驶这些装置，他们从事的是“远距离行动”，在这种行动中，应该由人类来决定何时扣动扳机，何时不扣动扳机。但这些无人机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发现它们可以飞行超过24小时，而由于疲劳，你不能让一个人类飞行员飞行那么长时间。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功能被植入这些无人机。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会有这样的无人机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要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还是在很少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关于目标获取和是否发射导弹的决定?如果你跟跟踪无人机发展的人聊一聊，他们会说，这显然是制造自主作战无人机的下一步，它需要很少的人类监督，比我们目前的监督少得多。但这是一个代理机构的问题，对吧?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谁是代理人?从耐心与权利的关系来看，“无人机有权利吗?”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会说，“不，无人机没有任何权利，它是一种工具。”也许如果它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得谈权利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推到后面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已经认定无人机拥有权利。我们只是不按照国际会议或哲学家联盟的方式来做。我们通过工程实践和战场实践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语言更响亮，我们实际上是在决定无人机的权利，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正如我们所知，无人机不是最精确的武器。它们可以让美国士兵不受战场伤亡的影响，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人类附带伤害，当无人机击中错误的目标或瞄准错误的汽车时，平民就会死亡，这是令人愤慨的。但真正让人抓狂的是。如果人权真的比机器权利更重要，我们就会停止使用这些东西。但我们仍在使用它们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天平向无人机的方向倾斜了。我们已经决定，在无人机的导弹袭击结束后，无人机物体比其他人类更有价值。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有召集道德哲学家来决定这个问题，工程界和军队的实践已经使它成为现实，所以实际上我们已经扩展了无人机持续存在权利的某种价值，这类似于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凌驾于作为附带损害的人的生命权的权利。

凯洛格:所以你是说权利问题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得到承认?

冈克尔:是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权利已经决定了。这是在实验室里决定的。它是由装配工厂决定的。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这是由战场决定的。是在行动中决定的。我们对这些决定的思考落后于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以完成任务的实际必要性。

凯洛格:如果我们说我们对无人机负有责任，就像我们对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或者在现代话语中对一个非人类的动物负有责任一样，那么设计算法赋予无人机无限的杀害平民的权利，就违反了这种责任。然后，这将构建我们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与无人机相关的权利和伦理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他者”，那么这就会对我们构建控制无人机行为的算法的方式产生影响——或者这只是我的传统主义方式，试图解决问题?

冈克尔:不，我认为你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在做出有关机器权利的决定，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些决定，没有意识到我们做出这些日常的、看似平凡的决定的后果。“决定”这个词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削减，对吧?决定。而一个决定总是一个“切”的例子，它说:这是在这一边，那是在那一边:这些是重要的事情;这些是不算数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工程师，还是战场指挥官或其他什么人，我们都必须不断地做这些事情，而不知道我们正在设计道德的未来。但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认为学者和哲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把需要进行的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带到表面上来，这样我们就不会盲目地做这些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让这些决定创造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到达的未来，或者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这里有很多好的批判性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必须开始走到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不能再落后了，我们必须与工程师、军事指挥官以及其他所有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算法相关的人站在一起，并开始问，这将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世界?这项工程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社会义务?什么样的伦理和道德困境正在发生，因为某些已经做出的决定，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凯洛格:而且经常与科学和工程联系在一起的工具化确实造成了一种情况，你可以暂停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伦理是建立在将机器视为没有知觉的存在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有很长的历史，科学和工程的创造继续在世界上做绝对骇人听闻的事情。

冈克尔:没错。

凯洛格:你的论点正在以一种极其有力的方式把道德问题带回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用乐器的这个行为在未来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关于你正在与之互动的机器以及我们对它负有什么道德责任的问题。这构成了我们现在如何进行，而不是十年后机器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候。它的结构贯穿于整个过程。

冈克尔:正确，这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将道德问题推迟到使用它的时候的问题。这意味着道德问题在我们开始设计系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凯洛格:而且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过程。这是一种关系。

我教社会运动，每当我谈到权利问题时，对我来说，它总是与人类试图打破旧范式、打破旧压迫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因此，托马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下写作并不是巧合。或者，第一个表明非洲人是人类的欧洲立法机构是在法国，当时海地代表团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周围的大动荡背景下抵达法国。《世界权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下诞生的。这种对社会运动的叙述与你所参与的讨论，在机器拥有权利或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相关的伦理问题方面，是否有相似之处?

甘克尔:我想是有的。我认为社会运动，如果我们要对它进行识别的话，应该是后人文主义的运动，即自19世纪以来，从尼采开始，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通过人文主义的偏见来思考的努力。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人”一直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它一直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不管他们是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非洲人，无论他们是原住民，还是女性，还是动物，人类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掌权的群体剥夺其他群体权力的一种方式。比如，想想纳粹是如何通过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而灭绝了600万犹太人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工具，用于排斥他人。海德格尔在写《论人文主义的信》时就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不把我的哲学与人文主义统一起来，因为人文主义有一大堆问题。

因此，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了这种发展，现在被称为后人文主义，由唐娜·哈拉威，凯瑟琳·海尔斯和卡里·沃尔夫等人具身出来，他们都试图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特权和人类例外论的限制进行思考。动物权利哲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环境哲学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机器问题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关于试图消解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正在被我们可以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所打破，对吧?我们思考的是实体和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凯洛格:我认为生态学运动中有一些人会对您刚才所说的许多事情表示赞同，他们的思考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就机器的权利而言，就地球的权利而言，目前出现了一种平行的话语。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大会上，宣言的一部分是《地球母亲权利宣言》。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把地球当作一种工具或一个促进人类发展的物体;它也有权利。你同意这和你所从事的工作是平行的吗?

冈克尔:是的。我可以从两个方面说，因为我最初的哲学形成是在我与一个名叫吉姆·切尼的人的相遇中形成的，他是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通过他的工作，通过托马斯·伯奇和其他人的工作，在那种后现代的环境伦理传统中，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接触到了很多这种思想。事实上，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这些环境哲学立场，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不再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者思维。我的意思是有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权利的扩展超越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受限制的方式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把对方看作只是另一个有机体。现在是土壤，是水，是地球本身变成了需要某种回应和照顾的物体。

凯洛格:很有意思。我自己也知道，谈到地球母亲的权利，你提出的关于机器权利的讨论，与生态学的相遇，迫使我试着“换一种方式思考”，因为它与我们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遇到的大量培训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所理解的，这种挑战是关于“我们”的社会建构。谁或什么包含在“我们”中，谁是或什么被排除在外?在机器问题上，你觉得我们应该把包容圈投得多广?有没有一种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在试图另辟蹊径的时候，决定如何画出这个包容圈?

冈克尔:关于“否则”这个词，我只想说，它实际上是想同时唤起两件事。“否则思考”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跳出框框思考，跳出我们成长过程中所遵循的那种既定思维方式，也就是传统体系，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它的话。但“不一样的思考”也指向了列维纳斯的方向，以及暴露于他者的问题，这使思考成为可能，思考应该对什么做出回应。所以我想让“他者”和“他者性”在这种双重意义上被听到——它不仅是不同的，而且也是对他者暴露的回应。

至于包容的圈子，以及这个圈子应该画得多广，我想说，我的努力不一定是按照那些规则来玩。换句话说，伦理学的特点总是画一个圈，包容一些人，排斥另一些人，所以德里达在*《纸机》*中说，大问题是谁和什么之间的区别。谁在里面，什么在外面?而随着这个圈被画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东西变成了谁，越来越少的东西变成了什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最近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叫做信息伦理学的东西上，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展起来的最普遍、最不排外的伦理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存在的一切都在圈内，唯一在圈外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请注意，所有这些姿态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包容与排斥、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之间做出决定。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以其他方式思考就是在努力解决这个辩证法，并说，你知道吗，必须有一种方法来跳出这个框框思考。换句话说，我一直在努力说，不是更大的包容，而是质疑那些反对包容的姿态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首先是排斥。这是一个非常列维纳斯式的观点因为列维纳斯并没有试图创造一种更包容的伦理学而是试图创造或设计一种不同的思考伦理学的方式它不依赖于包容和排斥，它超越了那种二元对立。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会说这是德里达的解构，因为解构是我们可以反对或干预二元对立的方式，二元对立已经让我们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的伦理规划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设计的，即我们认为事物是包容和排斥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解构包容/排斥的概念对立，以发展出不再符合该分类的替代方案，不再落入一个与另一个的对立之中。

我认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因为，在列维纳斯的意义上，任何事情都可以表面上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脸，但没有预先决定什么是，什么是不包括在内的。事实上，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列维纳斯说，很好;不需要完全决定。在不同的时间，有些事情会有面子，有些事情可能没有，但重要的不是事情是否有面子，重要的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如何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伦理。

我会说，如果我对任何指控都持开放态度，那就是对相对主义的指控。但我认为相对主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相对主义允许我们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来做伦理学，它不像康德那样锁定他的伦理学，一切都是提前规定的，不能对新的、独特的、新奇的可能性爆发做出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把相对主义看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东西，它说，你知道吗，我们不仅要为道德行为负责，还要为设计道德负责，为决定什么是道德负责，并在我们遇到的非常具体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而不是依靠简单的虔诚，简单的公式或道德规范，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失败。

凯洛格:太棒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语，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讨论的方式，它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尤其是你对相对主义的讨论，让我想到了一条全新的探究之路，我认为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刚克尔:让我说一件可能有帮助的事。你知道，相对主义在人文科学中被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硬科学，物理学中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特别是，相对主义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于爱因斯坦物理学来说，相对主义说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点可以用来观察世界，对一切事物做出决定。一切都在运动，我认为道德宇宙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相对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是由权力的位置决定的，从特权的位置决定的，从某个主体在某个时间占据的位置决定的，这个位置充满了某种主观性。我们必须把这看作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我们必须开始把它看作是一个积极的机会。

凯洛格:我对大卫刚克尔的采访到此结束。这真是太棒了，我真的玩得很开心。非常感谢，大卫。

推荐信

Birch, Thomas H. 1993. “Moral Considerability and Universal Consider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15(4): 313–32.

Brooks, Rodney. 2003. *Flesh and Machines: How Robots Will Change Us*.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Cheney, Jim. 1989. “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Ethics of Bioregional Narra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11(2): 117–34.

Coeckelbergh, Mark. 2012. *Growing Moral Relations: Critique of Moral Status Ascrip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ottingham, John. 1992. “Cartesian Dualism: Theology, Metaphysics, and Scienc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scartes*, ed. John Cottingham, 236–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nnett, Daniel C. 1978. “Why You Can’t Make a Computer that Feels Pain.” *Synthese* 38(3): 415–56.

———. 1981. *Brainstorms: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Mind and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rrida, Jacques. 2005. *Paper Mach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Trans. David Willi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2013.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 In *Signature Derrida*, ed. Jay Williams, 380–43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loridi, Luciano. 2010.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nkel, David J. 2012. *The Machine Ques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I, Robots, and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Haraway, Donna Jeanne.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yles, N. Katherine. 2008.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degger, Martin. 2008. "Letter on Humanism." In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 ed. David Farrell Krell, 213–66.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Thought.

James, C. L. R. 2001.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Kubrick, Stanley. 1968. *2001: A Space Odyssey*.

Levinas, Emmanuel. 1969.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ime and the Other and Additional Essays.*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Morsink, Johannes. 2011.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rigins, Drafting, and Int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aine, Thomas. 2011. *Rights of Man*.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Regan, Tom, and Peter Singer. 1989. *Animal Rights and Human Obligation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Wolfe, Cary. 2010.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ollstonecraft, Mary. 1999.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2010.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Climate and Capitalism* (27 April).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0/04/27/universal-declaration-of-the-rights-of-mother-earth/.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贡献者

伊恩·安格斯是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著有九本书，包括《*交流的原始场景*》(纽约州立大学，2000年)、《*(扭曲)形象:话语/批判/伦理*》(Verso, 2000年)和《*未被发现的国家:加拿大知识文化的散文*》(阿萨巴斯卡大学出版社，2013年)。

Maria Bakardjieva，卡尔加里大学传播与文化系教授。她是《*互联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互联网*》(Sage, 2005)一书的作者。

Daryl Campbell是阿萨巴斯卡大学计算服务部网络部门的高级系统管理员。他曾*在巴迪欧研究国际杂志和怀特:Gegenwartkunst*上发表文章。

Sharone Daniel是阿萨巴斯卡大学综合研究硕士课程的学生。她的研究由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加拿大研究奖学金资助，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和政治行动。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技术哲学加拿大研究主席，同时也是应用通信与技术实验室主任。他是六本书的作者，包括*改造技术:重新审视*的*批判理论*(OUP, 2002)*和理性与经验之间:技术与现代性*的*散文*(MIT，2010)。

Raphael Foshay是阿萨巴斯卡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副教授。他教授文学、文化和跨学科理论，最近编辑了一本关于跨学科的论文集，《跨学科的*价值:理论、实践、教育学*》(阿萨巴斯卡大学出版社，2012)。

Carolyn Guertin是多伦多约克大学增强现实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德国柏林Transart研究所MFA和博士课程的教员。她最近出版了《*数字禁止:新媒体艺术*中的*盗版和*作者身份》(Continuum, 2012)。

David J. Gunkel是北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的校长教学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机器问题: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伦理*的批判*观点*》(MIT，2012年)。

鲍勃·汉克在多伦多约克大学传播研究与人文系教授媒体与技术文化研究。他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参与编辑了《走出废墟:即将到来的大学》(*TOPIA:加拿大文化研究杂志*)特刊。

保罗·凯洛格是阿萨巴斯卡大学综合研究硕士研究生项目的副教授。他的出版物包括《*从钉书钉陷阱*中*逃脱*》(2015)，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包括*《*新政治*科学》、《*加拿大*研究*杂志*》、《*国际*杂志☒i☒*ek*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

莱斯利·林德巴勒是阿萨巴斯卡大学综合研究硕士课程的学生，她在那里研究数字和模拟同一性的交叉点。

Mark A. McCutcheon是阿萨巴斯卡大学英语和跨学科研究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文学、媒体和表演研究，以及版权的文化政治。

Roman Onufrijchuk, 1950-2015，曾任☒zmir理工学院工业设计助理教授。他在媒体理论和技术哲学领域著述。

Josipa G. petruniki，加拿大城市交通研究与创新联盟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她主要在数学史领域发表文章。

彼得·j·史密斯，阿萨巴斯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在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化以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宗教和政治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文章。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

洛娜·斯特凡尼克是阿萨巴斯卡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治理、法律和管理项目协调员。她最近出版了《*控制知识:网络世界中的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阿萨巴斯卡大学出版社，2011年)。

凯伦·沃尔是阿萨巴斯卡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她的研究包括集体记忆、迁徙、跨文化相遇、社会变革以及转型或混合模式。她最近出版了《*游戏计划:*阿尔伯塔省*体育社会史*》(*阿尔*伯塔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